



小小鳥

以文学之名

卷三十九 2024.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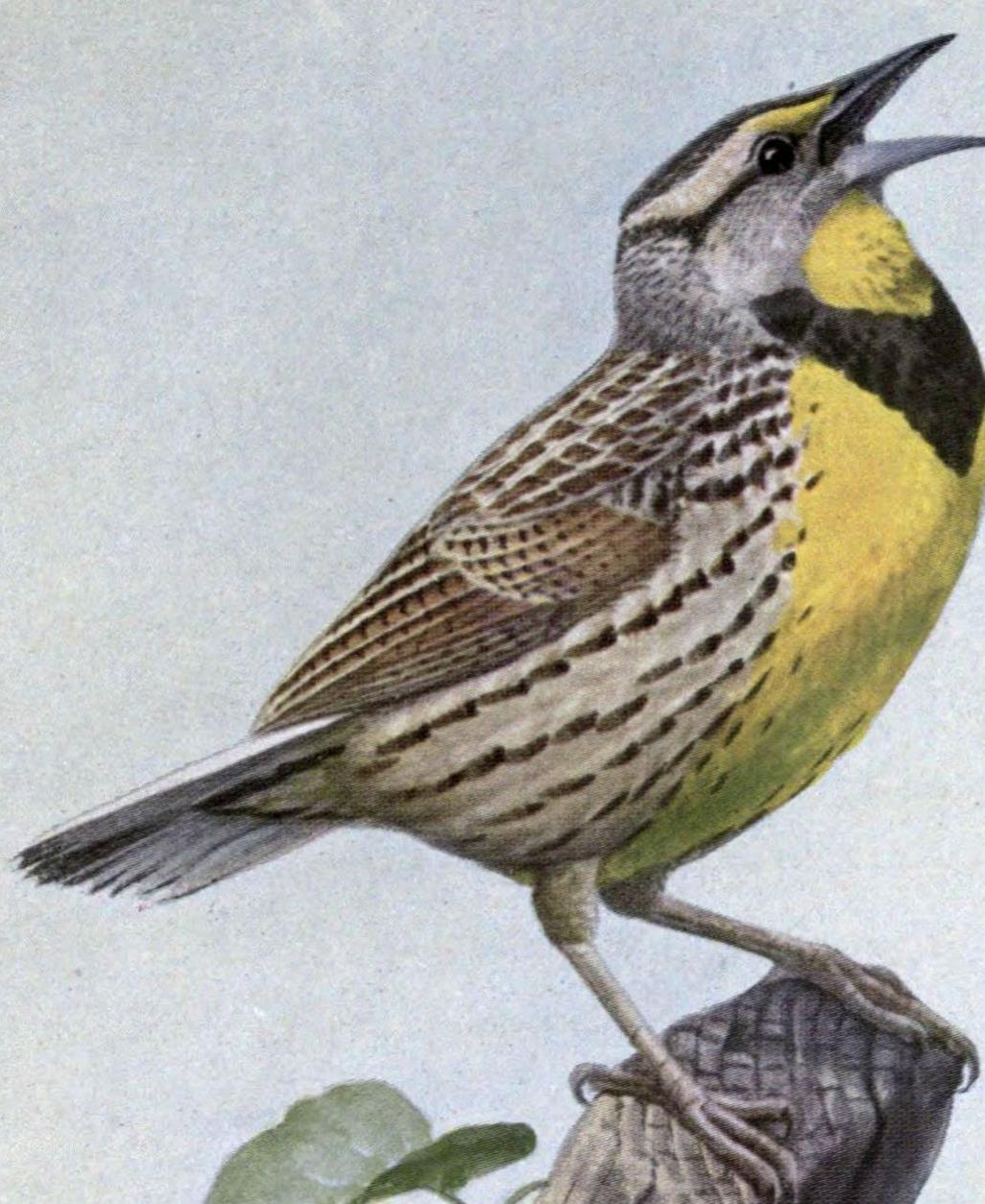
早安，怪物

凯瑟琳·吉尔迪纳

切文古尔 |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

守灵夜和葬礼是老年人的派对 | 洛尔·西格尔

汉字革命 | 钟雨柔





小说

- 新书试读 | P.05 “我们是孤儿，在一个平地而起的新世界”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
P.15 人生很美好 金劲旭
P.25 我父母的灵魂在雨中升腾 帕特里西奥·普隆
P.31 距离月亮三公里 伊与原新
P.37 鱼缸与霞光 韩松落

非虚构

- 田野中国 | P.55 《九路口》为什么探讨的是权力问题？ 晓雅
新书试读 | P.63 一次华工征文比赛，及其背后的“汉字革命” 钟雨柔
P.73 普通人如何从孤岛上汲取生命的另一种可能？ 库索
P.83 创造艺术家：伍尔夫与她的写作实验 林德尔·戈登
P.93 令人窒息的家庭，和一个人的隐秘心疾 凯瑟琳·吉尔迪纳
P.113 守灵夜和葬礼是老年人的派对 洛尔·西格尔



题图为电影《利益区域》(2023)剧照

小鸟回答 Vol.39

小鸟 | 小鸟回答

你做好准备了吗。你知道要为什么做准备吗？

i

艾略特说诗歌是高级消遣。“如果我们想到诗歌的性质，那么，诗歌就不是消遣；倘若我们想到诗歌或许似乎是别的东西，那么，我们的麻烦更大。我们对某种诗歌的用途的定义，可能没有穷尽其用途，可能不会运用于其他种类的诗歌；或者说，如果我们的定义运用到所有诗歌，它将变得非常宽泛，以至于没有意义。”他还说：“一方面，诗歌不是道德说教，不是指引政治方向；更不是宗教或宗教的等价品，除非有人邪恶地滥用语词……在另一方面，诗歌肯定与道德相关，与宗教相关，甚至或许与政治相关，尽管我们说不清究竟是什么相关性。”

ii

奥登说：“成长并不意味抛下童年或青春期，而是用成年人的方式利用它们。要不是我们身上的那个孩子，我们不会有精神好奇；要不是我们身上的那个青少年，我们不会对其他个体有严肃感情。我能想象一个完全‘抛下’童年和青春期的人，尽管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他会是一个标准的公务人员，有社会身份，却没有个人身份。”

iii

C.S. 路易斯说，我们阅读，是因为“我们还想用他人的目光去观看，用他人的头脑去想象，用他人的心灵去感受”。在最伟大的作家身上，我与其说是意识到在用他们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倒不如说是意识到他们创造的那些世界总是多么现实，坚固和丰满，意识到那些世界与自己的经验和邻人的经验多么吻合。

iv

上面几段话来自于海伦·加德纳的《捍卫想象》。当年，企鹅出版社因为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而被起诉，她作为专业人士去伦敦为其做辩护，在火车上，她遇到一位朋友。那位朋友跟她说：“我希望你不要说，书不会造成任何害处；因为假如真是这样，那你必须相信，书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v

近来我们大都是推荐书。每个人对书的需求各有不同，对书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以往觉得看书有一定的门槛，可以天然地让不同的理解力作出区隔——就像你知道艾略特在说“高级消遣”的时候究竟是在说什么——实际情况也并不尽然。有一天在豆瓣上看王笛老师的《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个短评赫然发问，“谁告诉你说封闭了？”

vi

艾略特还说，“更多情况下人们需要的是温习旧知识，而非输入新学说”。看到一本不是那么新的书《一切都在流动》，瓦西里·格罗斯曼的小说，他的小说有一种金特小说的风格（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

书中有一段：

他从不告密。当被传讯到卢比扬卡监狱时，他总是拒绝提供任何有关被捕同事的情况，拒绝这种有损名誉的行径。当他在大街上遇见被流放的同事的妻子时，也从不避而不见，总是热情地迎上前去紧握她的手，问候孩子们的健康。所有这些，使他常常感到非常自豪。可是今天，当他突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丝不挂地站在人群面前时，发现这种自豪感简直荒谬至极。

还有什么可自豪的呢……

他的全部生活都是由巨大的顺从构成的！他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不听话的时候！

想起两年多以前，各种人在多个场合里说“无能为力”这样的话。在瓦西里·格罗斯曼为主公母亲所设计的思考中，他说：

可现在我发现，灾难并不在于拟定富农的名单全部出自一群恶棍之手。在这些积极分子中，诚实的人远比恶棍们多，可诚实者恶棍者的行径都一样凶残，并无区别。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名单都是不怀好意的，都是不公正的。无论谁进了这份名单还不都一样，都是不公平的。伊凡是无辜的，彼得也是无辜的。是谁向整个俄罗斯提出了这个庞大的数字？是谁向所有的农民提出了这项计划？又是谁签发的命令？

一年已经过去六分之一，真快啊。两年前的事已经更为久远。

vii

卡尔·雅斯贝斯在 1945 年——纳粹刚刚失败，两个德国远没有成立，纽伦堡审判尚未开始——的时候替德国人思考罪责问题。他提到一些民间人士对罪责的态度。

一位八十高龄的学者说：“在过去的 12 年里，我的立场从未动摇过，但我对自己从未感到满意。我曾经想过，我是否能从纯粹的消极抵抗转变到付诸行动，希特勒的组织太邪恶了。”

一位年轻的反纳粹主义者说：“即使我们这些纳粹的反对者们也需要自我的反省——毕竟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咬着牙向‘邪恶的政权’低头了。有些人认为自己没有佩戴纳粹党徽就足以自封为大好人了，我们不想与那些伪善者为伍。”

一位官员在“去纳粹化”的过程中说：“当我想到自己在党内任人摆布，为了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为一个纳粹国家添砖加瓦，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即使我内心是纳粹的反对者——现在我饱尝苦果，但我没法抱怨什么。”

或许有一天，我们也要思考这样的问题。

viii

封面的鸟

三月的小鸟叫草地鹨，Carol the Meadow Lark。

ix

联系我们

微博留言 @ 小鸟文学，微信公众号“小鸟与好奇心”，或写邮件到 info@aves.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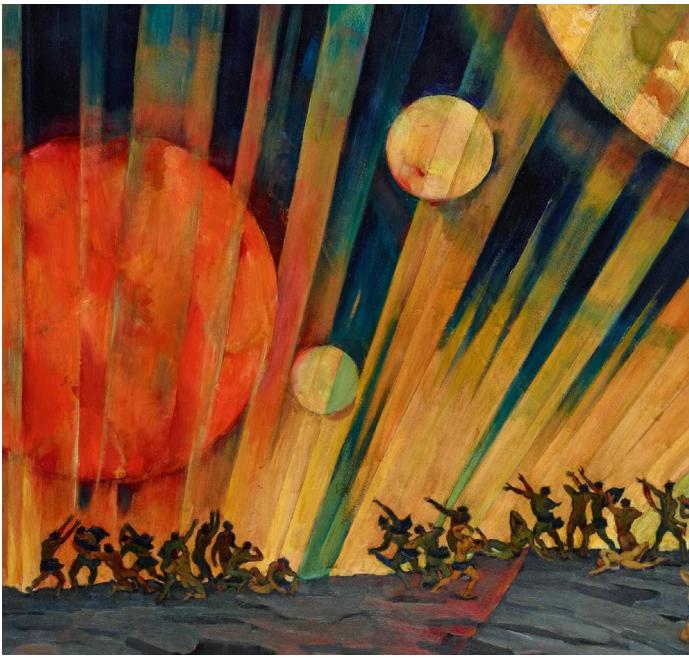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题图为 *Konstantin Yuon. (1921) New Planet*

小说

“我们是孤儿， 在一个平地而起的新世界”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 | 新书推荐

俄语文学大师安德烈·普拉东诺夫长篇代表作

《切文古尔》是俄语文学大师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生前未能问世之作。小说描写了一群孤独的革命幻想家试图在偏远的县城切文古尔寻找、创建一个新世界的故事。他们消灭放逐资产阶级，毁灭森林，拆除房屋，停止一切生产活动，露宿原野，以草充饥，靠太阳的力量度日。他们凭借对世界的想象和一腔热情积极地探索、建设新生活，却由于没有理论的支撑和实践的经验，最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作者对笔下的“怪人们”极尽嘲讽，又饱含温情。小说凝聚了作者对当时社会思潮的冷静审视与痛苦反思，以及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忧虑。

以下经可以文化授权，节选自本书。



从清新晴朗的早晨开始，公社按惯例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为了及时关注日常事件，两天就要召开一次大会。议事日程包括两项：“目前形势”和“日常事务”。大会开始之前，科皮奥金请求发言，大家表示欢迎，甚至建议演说不受时间限制。

“你就敞开说吧，离天黑时间还长着呢。”主席告诉科皮奥金。

但是，科皮奥金没法有条有理地说上两分钟，因为脑子里会冒出各种各样的想法，它们争先恐后，乱作一团，结果他不得不停止演说，兴致勃勃地倾听头脑中的吵闹声。

现在，科皮奥金终于摸到了门道。他说，“贫农友谊”公社的目标就是使生活复杂化，从而造成混乱局面并以全部的复杂性回击隐藏的富农科皮奥金解释说：待到一切变得复杂、混乱和莫名其妙的时候，老实的头脑才能出活儿，而另类分子根本无法钻进复杂的狭缝中。

“因此，”科皮奥金想尽快结束演说，免得忘了具体的建议，“因此，我提议公社的全体大会不是两天开一次，而是每天都开，甚至一天开两次：第一，为了使共同生活复杂化；第二，为了目前的事件不至于因为不受重视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天一夜之内发生的事情还会少吗？而你们还蒙在鼓里，就像在草丛里睡大觉……”

科皮奥金的演说突然停止，就像河水流到浅滩上干涸了，所有的词儿他一下子全忘了，只是把一只手按在马刀的刀柄上。大家看着他既害怕又尊敬。

“主席团建议一致通过。”主席用老练的口气做了总结。

“好极了！”站在最前面的公社成员说，此人就是相信陌生人智慧的畜力运输部部长。大家举起手——举得又齐又直，展现出一个好习惯。

“这样可不行！”科皮奥金大声宣布。

“怎么回事？”主席慌了。

科皮奥金沮丧地朝与会者挥了挥手。

“最好有一位姑娘始终投反对票……”

“为什么，科皮奥金同志？”

“你们真是少见多怪：也是为了复杂化呀……”

“明白了一——说得对！”主席高兴极了，立即建议大会指定家禽和黑麦部主任玛拉尼娅·奥特维尔什科娃永远投反对票。

接着，德瓦诺夫报告目前形势。他注意到了一个致命的危险：到处流窜的土匪威胁着那些分散在人烟稀少、充满敌意的草原上的公社。

“这些家伙，”德瓦诺夫指的是土匪，“他们想扑灭曙光，可曙光不是蜡烛，而是伟大的天空，空中那些遥远而神秘的星星隐藏着人类子孙后代的崇高而强大的未来。因为毫无疑问的是，征服地球之后，全宇宙共命运的时刻即将来临，人类最后审判宇宙的那一刻也将到来……”

“说得真精彩。”夸奖德瓦诺夫的还是那位畜力运输部部长。

“认真听，别打岔。”主席悄悄提醒他。

“你们的公社，”德瓦诺夫接着说，“应该用巧计战胜土匪，让他们不明白这里的名堂。你们办事要办得既聪明又复杂，从外表一点儿看不出有共产主义，实际上就在眼前。譬如说，一名土匪拖着支破枪闯进公社的庄园，他在观察可以抢什么东西杀哪个人。可是书记手拿票证簿迎上去对他说：‘公民，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那你可以领取一张票证再去仓库——如果你是贫农，那可以免费得到自己的一份口粮，如果你是另类分子，那你就在我这儿担任一定的职务，比如说担任打狼员，就在这岗位上服务一昼夜。我向公民们保证，没有一个土匪敢向你们搞突然袭击，因为他不可能一下子明白你们要干什么。接下来，你们要么花点钱把他们打发走，如果土匪比你们人多，那么就抓他们几个俘虏，如果他们感到纳闷，莫名其妙地扛着破枪在庄园里到处转悠。我说得对吗？’

“大体正确。”还是那个多嘴多舌的畜力运输部部长说。

“一致通过，一票反对，是吧？”主席宣布。不过，最后的情况更加复杂：玛拉尼娅·奥特维尔什科娃当然投反对票，除了她，肥料部主任——那个红褐色头发，面孔与群众相同的公社成员——投了弃权票。

“你怎么搞的？”主席为难了。

“我弃权是为了复杂化呀！”那人想出了应对的理由。

结果，根据主席提议，大家规定他要一直投弃权票。

晚上，德瓦诺夫和科皮奥金打算继续赶路，前往黑色卡里特瓦河谷地。一帮土匪公然盘踞在那儿的两个村子里，有计划地杀害全区的苏维埃政权成员。公社主席央求德瓦诺夫和科皮奥金留下来参加公社的晚间会议，一起讨论建立革命纪念碑的问题。主席提出建在院子中央，而玛拉尼娅·奥特维尔什科娃主张建在花园里。肥料部部长弃权，什么也没说。

“照你的意见，哪儿也别建，是吗？”主席问弃权者。

“我弃权就是表明我个人的意见。”肥料部长回答得符合逻辑。

“但是多数人——赞成，那就只能建了。”主席心里没底，“主要的是，树立什么样的形象。”

德瓦诺夫在纸上画好了图样。

他把图样交给主席，解释说：

“横躺的‘8’字表示时间永恒，竖直的双头箭表示空间无限。”

主席把图样展示给全体与会者：

“这里既有永恒又有无限，什么都有了，比这高明的谁都想不出来：我提议通过。”

大会表决通过，一人反对，一人弃权。纪念碑决定建在庄园磨坊的一块石头上，这块石头盼望革命已经盼了好多年。纪念碑交给铁匠用铁条制作。

“我们在这里组织得挺好。”第二天早晨德瓦诺夫对科皮奥金说。他们沿着土路，头顶仲夏的云彩，朝着远方的黑色卡里特瓦谷地前进。“现在他们要开始搞加强的复杂化，为了复杂化，开春前他们肯定会去耕地，再也不吃庄园里的剩粮了。”

“想得真周到。”科皮奥金幸福地说。

“当然要周到。有时候为了复杂化，健康人装成病人，只要告诉他病得还不够，说得他深信不疑，最后他的病自然就好了。”

“明白了，这时候他会觉得健康是一种新的复杂化和看走了眼的稀罕之物。”科皮奥金觉得明白了，但心里在嘀咕，“复杂化——这词儿多好，可是说不清楚啊！就像说‘目前形势’一样。瞬间，又是流动的：简直难以想象。”

“那些个说不明白的词儿叫什么来着？”科皮奥金虚心地问道，“是不是叫‘书语’？”

“叫术语。”德瓦诺夫回答很简单。他内心喜欢愚昧胜过文明：愚昧是一片纯洁的土地，上面可以长出各种知识的植物，而文明是一片长满了植物的土地，土壤的精华已经被植物吸收掉，再也长不出什么了。因此，德瓦诺夫感到满意的是，俄罗斯的革命已经把少有的几个长满植物的地方彻底铲除干净，而人民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片干净的土地——没有种过庄稼的肥沃的空地。因此，德瓦诺夫不急于去播种什么：他认为，好的土壤不会空等很久，只要战争的风不把资本主义杂草的种子从西欧吹过来，一定会自动长出某种前所未有、极其珍贵的东西。

有一天，在一马平川的草原上，他发现远处有一群人在那儿慢慢走动。看到他们人数众多，他内心不禁升起一股欢快的力量，仿佛他与那些无法接触到的人之间是息息相通的。

科皮奥金低着脑袋，一心想着罗莎·卢森堡。突然，他心神不宁的谜底无意间被揭开，但是，延续不断的生命的谵妄马上用自己的温暖使他一下子恢复了理智。于是，他再次预见到自己很快就会到达另一个国家，然后去亲吻罗莎那柔软的、保存在她亲人手中的裙子，他要把罗莎从坟墓里挖出来，运回到自己的革命中。科皮奥金甚至闻到了罗莎裙子的气味，那种垂死的芳草与生命遗骸的余温混合的气味。他不知道，索尼娅·曼德罗娃像罗莎·卢森堡一样，也在德瓦诺夫的记忆中散发出自己的气味。

有一次，在一个乡革命委员会驻地，科皮奥金在卢森堡的肖像前站了好久。他端详着罗莎的头发，把它们想象成一个神秘的花园；然后他又仔细打量她红润的脸颊，想到她身上那股火一般滚烫的革命血液正冲刷着她的双颊和外表文静、却迫切向往未来的整个脸庞。

科皮奥金久久地站在肖像面前，他那难以觉察的激动最终化为汹涌的心潮，搅得他热泪横流。就在那天夜里，他残忍地砍死了一个富农。一个月之前，那富农唆使农民剖开一名余粮征集队队员的肚皮，然后往肚子里塞满了黍子。余粮征集队队员痛得在教堂前的广场上满地打滚，直到母鸡们把黍粒从他肚子里啄出来才停止。

这是科皮奥金第一次那么残忍地杀富农。他杀人一般不像他的生活那样充满奇思幻想，而是不动声色地一刀毙命，仿佛有一种精于算计的力量在他身上发挥作用。在科皮奥金眼里，白军和土匪不是太重要的敌人，不值得大动肝火；他杀死他们就像农妇在麦地里除草，细心而平静。他打仗目标明确，动作利索，在行进中或在马背上也是手起刀落，刀刀毙命，下意识地为今后的希望和运动保存自己的感情。

大俄罗斯的淳朴天空照亮了苏维埃大地，显得那么习惯，那么单调，好像苏维埃自古以来就存在，天空对它也完全适应了。德瓦诺夫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无可指责的信念：革命前，无论是天空还是整个空间，都是另一副模样——不像现在那么亲切。

远方渐渐露出一条寂静的地平线，就像是世界尽头，那里天与地相接，人与人相连。两位骑马的旅人正深入到荒僻的祖国腹地。有时候道路绕过山沟的顶部——这时候就可以看到远处沟底有一个可怜的小村子。德瓦诺夫心里不禁对这个孤零零的无名村庄产生了怜悯。他打算拐进村子，尽快让他们开始互帮互助的幸福生活，但科皮奥金不同意：他说先要解决黑色卡里特瓦村的事情，然后再返回这里。

漫长的白天还是那么乏味，令人沮丧，两位武装的骑士连一名土匪都没有碰到。

“他们躲起来了！”科皮奥金感叹说，觉得内心有一股沉重的压力，“为了大家安全，我们

恨不得砸碎你们的脑袋。这帮坏蛋，正躲在角落里啃牛肉呢……”

大路边突然出现一条白桦树林荫道，尽管树木没有被农民砍光，但已经变稀疏了。林荫道很可能通往大路一侧的庄园。

林荫道的尽头是两根石柱。一根石柱上挂着一份手抄的报纸，另一根石柱挂着一块铁皮招牌，招牌上的文字经过风吹雨淋已经变得模糊不清：

巴申采夫同志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自然保护区

朋友可进敌人找死。

手抄的报纸一半已被敌人的手撕掉，剩下的另一半任凭风吹雨打。德瓦诺夫托起报纸，从头至尾大声读了一遍，他要让科皮奥金也能听到。

报纸的名称是《贫农的幸福》，是韦里科缅斯内村苏维埃和区革委会驻波索沙乡东南地区安全特派员的机关报。

报纸撕得只剩一篇文章——《全世界革命的几项任务》，以及半篇简讯：“请保留地里的积雪——提高劳动收获的生产率”。简讯写到一半就跑题了。“翻耕雪地吧，”简讯说，“即使有成千上万个胆大妄为的喀琅施塔得我们也不惧怕。”

什么是“胆大妄为的喀琅施塔得”？德瓦诺夫既紧张又纳闷。

“写文章就是要吓唬群众压制群众。”科皮奥金不明就里，便脱口而出，“发明书写符号的目的也是要让生活复杂化。识字的人动脑筋，不识字的人替他干活。”

德瓦诺夫笑了：

“别乱说，科皮奥金同志。革命就是人民的识字课本。”

“你别蒙我，德瓦诺夫同志。我们这里什么事都由多数人决定，他们几乎都不识字，将来总有一天不识字的人会让识字的人不再识字——这样就可以一律平等……再说了，少数人放弃识字总比所有学会识字容易得多。只有魔鬼才能教会他们！你教会了他们，他们一转眼就忘了……”

“咱们顺着去看望巴申采夫同志吧，”德瓦诺夫沉思道，“我得向省里写汇报了。省里的情况我一点都不了解……”

“没必要了解：革命正在大踏步前进……”

沿着林荫道走了大约一二里地。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宏伟的白色宅院，但已经无人居住，满目荒凉。主楼前几根立柱活像女人的腿，昂然地自下而上托着横梁，而天空又自上而下地压着横梁。立柱后面是大楼，中间相隔数丈距离，大楼柱廊的形状与众不同，是一排弓着腰默默劳作的巨人。科皮奥金不明白这些孤零零的立柱派什么用场，以为那是革命惩治不动产后留下的残迹。

一根立柱上嵌有一块白版，上面刻着设计建造该楼的地主姓名和他的侧面像。白板下面是一首醒目的拉丁文诗歌：

宇宙——奔跑的女郎：

她的双脚在转动地球，

她的身体在空中飘摇，

她的眼睛如星辰闪亮。

德瓦诺夫在封建主义的寂静中忧愁满腹地叹了口气，他重新仔细打量柱廊——三个贞洁的女郎，六条匀称的腿。他顿时恢复了平静和希望，以往观赏古代艺术之后都会产生这样的心情。

唯一遗憾的是，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腿是别人的腿。幸好拥有这腿的那个姑娘将自己的生命变成了迷人的魅力，而没有去生儿育女。尽管她以生命为养料，但生命对她而言仅仅是原料，而不是意义——这原料经过加工之后成了另一种东西，从蓬勃的生机变成了难以言传的冷艳之美。

面对立柱，科皮奥金也变得严肃起来：他尊重任何宏伟壮丽的东西，虽然它们没有意义但是很美。宏伟的东西一旦有了意义，譬如一架大的机器，那么科皮奥金认为这是压迫群众的工具，他内心会充满仇恨和蔑视。面对无意义的东西，就像面对这些廊柱，他会可怜自己，会仇恨沙皇制度。他认为沙皇制度有罪，他自己也不会因为看了这些女人的大腿而激动，只是看到德瓦诺夫一脸愁容才发现自己也应该悲伤。

“如果我们除了种种日常的关怀，也能建造某种具有全世界意义的美妙的东西，那就多好啊！”德瓦诺夫忧伤地说。

“你一下子还建不成，”科皮奥金表示怀疑，“资产阶级把我们与整个世界分隔开来。我们现在要建造的是更高更好的柱子，而不是下流的大腿。”

左边，在杂草和灌木丛中散布着杂用房和小屋的断墙残壁，活像乡村墓地里的一个个坟墓。几根柱子守护着这空荡荡的被埋葬的世界。在这死气沉沉的废墟上，几棵供观赏用的名贵树木勉强支撑着自己瘦小的躯体。

“我们会做得更好——在全世界而不仅仅是在偏僻的角落！德瓦诺夫手一挥指着一切，但在内心深处，他感觉到了自己。“小心！”一个不受诱惑、爱惜自己的声音在里边警告他。

“那还用说，我们肯定能建成：这是事实，也是口号。科皮奥金受到希望的鼓舞，肯定地说，‘我们的事业永不疲倦。’

科皮奥金发现了一串巨人的脚印，于是策马跟踪而去。

“这里的居民穿什么鞋？”科皮奥金吃惊不小，赶紧拔出马刀：就怕冷不防窜出来一个巨人——旧制度的保护者。过去的地主往往豢养这样的彪形大汉——他们过来就是一巴掌，打得你筋都崩断了。

科皮奥金喜欢筋——他认为筋就是提供力量的绳子，他怕弄断它们。

两位骑马人来到一扇结实耐用的门面前，这扇门一直通往那幢被毁大楼的半地下室。那串巨人留下的脚印也是通到那里，甚至可以发现巨人在门口跺过脚，把地折磨得都裸露了。

“究竟是什么人在这儿？”科皮奥金很惊讶，“肯定是个凶恶的家伙。马上会攻击我们——做好准备，德瓦诺夫同志！”

科皮奥金甚至兴奋起来：他感受到了那种惊恐的狂喜，就像迷失在夜间森林里的孩子——他们的恐惧有一半是好奇。

德瓦诺夫大声喊：

“巴申采夫同志！……这儿有人吗？”

没有人，没有风，草沉默，天变暗。

“巴申采夫同志！”

“哎——！”从潮湿的地底下传来一个遥远、响亮的声音。

“出来，老乡！”科皮奥金大声命令。

“哎！”从地下室传来一个阴沉的回声。但这声音听不出是恐惧还是不愿出来。那人大约是躺着回答的。

科皮奥金和德瓦诺夫等了一会儿，接着就光火了。

“给我出来，听见没有！”科皮奥金吼道。

“我不想出来，”陌生人慢慢回答说，“去正楼吧——厨房里面有面包也有酒。”

科皮奥金下了马，用马刀使劲敲门。

“出来！我要扔手榴弹了！”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也许正饶有兴趣地等着手榴弹，看看还会有什么动静。但是过了一会儿，还是回应了：

“扔吧，捣蛋鬼。我这儿的手榴弹整整有一仓库：一爆炸就送你回到娘肚子里！”

说完，他又不吭声了。科皮奥金没有手榴弹。

“你快扔呀，混蛋！”陌生人不动声色地从地下室请求说，“让我检查一下我的大炮：我那些炸弹没准都生锈了，受潮了，绝对不会爆炸，这些鬼东西！”

“呵呵！”科皮奥金发出一串奇怪的声音，“好啊，那就出来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文件吧。”

那人默默地想了想。

“他跟我算什么同志，他是发号施令的角色！革命的管理员都不是我的同志。你还是扔炸弹吧——让我瞧瞧！”

科皮奥金一跺脚，将一块陷入土里的砖头压了出来，再捡起来用力扔到门上。只听得哐的一声，过后铁门又恢复了平静。

“没爆炸，笨蛋，里边的物质凝固了！”科皮奥金找到了毛病。

“我的也哑了！”陌生人严肃地回应，“你导火索拉开没有？让我出来看看是什么型号。”

传来一阵有节奏的金属响动的声音——真的有人迈着铁的步伐。科皮奥金等待他的出现，马刀已经收入刀鞘——好奇心战胜了警惕性。德瓦诺夫没有下马。

隐身人走动的哐啷声越来越近，他并没有加快步伐，依然不紧不慢地走来，显然他在克服自身的重量。

门突然洞开，原来它没上锁。

科皮奥金一看到眼前这景象就呆住了，不禁往后退了两步——生怕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或者可以立即揭开谜底。那人已经暴露，但还保持着自己的神秘性。

从洞开的门里走出一位个子不高的人，他身披铠甲，头戴钢盔，手握重剑，脚蹬一双很大的金属靴——左右靴筒各有三节钢管连缀，一脚下去可以立即把草踩死。

那人的脸——尤其是额头和下巴——由头盔保护，头顶由一排金属条罩着。这装备可以使军人免遭敌人的任何打击。

他本人个子矮小，模样也不太可怕。

“你的手榴弹呢？”来者问道，声音又细又嘶哑。他的嗓门从远处听起来很响，那是因为种种金属物件在空洞的住处发出回声，他真实的声音细小得可怜。

“嗨，你这坏蛋！”科皮奥金大喊，不再凶狠，也无尊重，只是对这位好汉怀有强烈的兴趣。

德瓦诺夫不加掩饰地笑了起来——他一下子明白了这行头是从谁身上剥下来的。不过，他大笑的原因是在那古老的头盔上发现有一颗红军战士佩戴的红五星，是用螺栓和螺帽拧着的。

“有什么可乐的，畜生？”巨人冷冷地问，他没有找到那颗没爆炸的手榴弹。巨人无法弯腰，只能用剑轻轻地触动地上的草，不停地与沉重的盔甲做斗争。

“别找了，傻瓜，算我倒霉！”科皮奥金严肃地说，他慢慢恢复了自己的正常感情，“带我们去找睡觉的地方吧。你这儿有干草吗？”

巨人的住处位于庄园副楼的半地下室。那儿有一个大厅，里面点着一盏半明半昧的油灯。大厅远处的角落里小山一样堆着巨人的盔甲和冷兵器，另一个角落——靠中间的地方——是一大堆手榴弹。大厅里还有一张桌子，桌子旁是一只方凳，桌子上有一瓶不明底细的饮料，也许是毒药。瓶子上用面包糊着一张纸，纸上用墨水笔写着一句口号：

杀死资产者！

“帮我卸了好睡觉！”巨人请求说。

科皮奥金费了好长时间替他卸下那不朽的服装，还仔细揣摩各个部件的巧妙用处。巨人终于彻底解除了武装，从铜质的外壳中走出来一位普普通通的巴申采夫同志——火红头发，三十七八岁，缺了一只不妥协的眼睛，另一只变得更加专注。

“咱们喝一杯。”巴申采夫说。

科皮奥金即使在旧时代也不嗜酒，他不喝酒是出于自觉，他认为酒是一种对感情没有好处的饮料。

德瓦诺夫对酒也是一窍不通，巴申采夫只能独饮。他拿起酒瓶——酒瓶上系着“杀死资产者”的标签——直接把酒灌进喉咙。

“坏蛋！”他说着一饮而尽，然后坐下，脸色变得和善起来。

“怎么样，好喝吗？”科皮奥金问。

“甜菜酒，”巴申采夫解释道，“是一个未出嫁的姑娘用贞洁的双手酿造的，纯洁的饮料，好香啊，老兄……”

“你究竟是什么人？”科皮奥金有点恼火了。

“我么——就是我自己，”巴申采夫告诉科皮奥金，“我给自己颁布了一个决议：我们这里的一切在一九年全部结束——军队、政权和秩序统统滚蛋老百姓呢——该干什么干什么，从礼拜一开始……给我老实点……”

巴申采夫简要总结了目前的整个形势。

德瓦诺夫停止思考，耐心听巴申采夫议论。

“你记得一八年和一九年吗？”巴申采夫说着竟流出了兴奋的眼泪。永远失落的时代勾起了他狂暴的回忆；他边说边用拳头敲打桌子，威胁地下室里的所有人和物。

“眼下什么事也没有了，”巴申采夫恶狠狠地说服不断眨眼睛的科皮奥金，“一切都结束了：法律已经完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出现了——好像有个魔鬼把人放到了天平上……拿我来说吧——难道你一生下来就知道这里在想什么吗？”巴申采夫敲打自己狭窄的脑门，那里的脑髓必须是浓缩的，这样才可以容纳智慧。“是的，是这里，老兄，能够容纳所有的空间。人人都一样。可人家偏要向我发号施令！这一切你都能明白吗？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欺骗？”

“是欺骗。”科皮奥金坦率地回答。

“就这么回事！”巴申采夫满意地结束了自己的议论，“我现在自个儿在燃烧，远离大伙的篝火！”

巴申采夫觉得科皮奥金跟他一样是地球的孤儿，于是诚心诚意地请他留下来，永远跟他在一起。

“你还要什么？巴申采夫说，他为自己找到了朋友而喜不自胜；你就在这里住下来，管你吃，

管你喝,我腌了五桶苹果,晒了两大袋烟叶。咱们就像朋友那样住在树林里,在草地上唱歌。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都来找我——凡是穷人到了我公社里都高兴:大家缺的就是这么一个轻松的好地方。在村子里他们有苏维埃管着,有政委们守着,县粮食委员会在他们肚子里找粮食,我这儿一个当官的都不会过来……”

“人家怕你呗,”科皮奥金得出结论,“你一身铁甲,睡的又是炸弹……”

“肯定害怕,”巴申采夫表示同意,“他们曾经打算跟我合并,还想拿走庄园,我穿上全副铠甲走到政委面前,举起炸弹说:把公社交出来!还有一次他们来收余粮,我跟政委说:‘你尽管吃尽管喝,狗崽子,要是还想拿走别的——就要你的狗命结果政委喝了一杯酒就走了。‘谢谢你,’他说,‘巴申采夫同志!’我给了他一把葵花籽,用一根铁条顶着他的背,打发他回到公家的地盘……”

“现在情况怎么样?”科皮奥金问。

“就这样,我不受任何人领导,感觉很好。我宣布这里是革命自然保护区,不让政权来插手,我把革命保留在不受干扰的英勇范畴……”

德瓦诺夫认出了墙上的题词,这题词是由一只不善书写的用手木炭抖索描出来的。德瓦诺夫手擎油灯,看了墙上写的革命自然保护区概况。

“念吧,念吧!”巴申采夫兴致勃勃地催他,“有时候你老不说话老不说话——最后憋不住了就跟墙壁说话。假如长时间没有人说话,我会觉得难受……”

德瓦诺夫念墙上的诗句:

资产者没了,那就要劳动——

庄稼汉的脖子又套上绳索。

你要相信,勤劳的农民,

野花的日子过得蜜样甜!

别再去犁地、播种、收割。

让所有土地自己长出庄稼。

你活着就尽情地快乐吧——

生命不可能连续两次,

拉起神圣公社诚实的手

对着大家的耳朵大声高喊:

别再愁眉苦脸地过苦日子,

我们都该好好地吃喝玩乐,

去他妈的贫苦的田间劳动,

土地会白白供给我们吃喝。

有人敲门,声音不急不慢,如主人一般。

“哎!”巴申采夫回答道,他酒劲已退,不再长篇大论。

“马克西姆·斯捷潘诺维奇,”门外的人打招呼,“请允许到林中空地上找根长杆子做车轍:半道上咔嚓一声折了,到时候只能在你这儿猫冬了。”

“不行,”巴申采夫一口回绝,“到什么时候你们才能学会自己动脑子啊?我已经在粮仓上贴了命令:土地——是自动开垦的,因此不属于任何人。假如你自作主张取走了,那我也就允许了……”

门外的人高兴得暗暗笑了。

“行,那就谢谢了。杆子的事我就不提了——那已经答应给我了,我还想给自己送点别的什么。”

巴申采夫随意说了一句:

“千万别求人,那是奴隶心理,自己要什么就送什么。你生下来的时候又不是凭你自己的力气,你没费一点劲儿——那你活着也就别顾这顾那。”

“的确是这样,马克西姆·斯捷潘诺维奇,”门外那个访客一本正经地附和说,“你要活就得去抢。要是没有这个庄园,半个村子的人早饿死了。我们从这里搬走财产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布尔什维克办公道! 谢谢你,马克西姆·斯捷潘诺维奇。”

巴申采夫一听就光火了:

“你别来这一套,谢什么谢! 你什么也别拿,糊涂蛋!”

“你生什么气啊,马克西姆·斯捷潘诺维奇? 当初我在前线三年流血流汗是为了什么? 我跟亲家来取个大铁桶,可你说——不准拿……”

“瞧,又出来个亲家!”巴申采夫对自己也对科皮奥金说,接着又转身对着门口说,“你刚

才不是说来要车轍的吗? 这会儿怎么又说要铁桶了呢!”

来人一点儿也不奇怪。

“总得拿点什么吧……有时候你手里提着一只鸡,一看路上有段铁棍,一个人扛不动,结果那铁棍像个无赖那样躺在那儿。怪不得我们的经济一团糟……”

“既然你们来了两个人,”巴申采夫结束谈话,“那就把白柱子的女人大腿搬走吧……搞经济能派上用场。”

“行,”来客满意了,“那我们用根绳子把它慢慢拖走——回头可以把它敲成瓷砖。”

来客走了,他们要去查看立柱情况——以便顺顺当当把东西弄走。

天一擦黑,德瓦诺夫就建议巴申采夫做更好的安排——不要把庄园搬到村里,而应该把村子迁到庄园。

“可以少花力气,”德瓦诺夫说,“况且庄园的地势高——土地的产量也高。”

巴申采夫说什么也不同意。

“一开春全省的流浪汉都会集中到这儿——那是最纯洁的无产阶级。到时候让他们去哪儿? 不行,我决不允许像富农那样霸道!”

德瓦诺夫想了想,觉得庄稼汉跟流浪汉的确难以相处。另一方面,革命自然保护区的居民什么庄稼也不种,肥沃的土地白白浪费掉,吃的全靠果园留下来的那点剩货以及地里自然长出来的那些东西:他们做汤的原料可能就是滨藜和荨麻。

“这样吧,”德瓦诺夫茅塞顿开,“你和村子交换一下:把庄园交给农民,把村子办成革命自然保护区。你反正都一样——重要的是人,而不是地方。老百姓在下面沟里受苦,你却一个人独占高坡! ……”

巴申采夫怀着幸福的惊讶看了看德瓦诺夫。

“这太好了! 我就照这样办。明天就去村里动员群众。”

“他们肯来吗?”科皮奥金问。

“一天一夜之内他们全都会过来!”巴申采夫怀着狂热的自信大声说,还忍不住扭动了一下身体。

“我现在马上就去!”巴申采夫改了主意。现在,他爱上了德瓦诺夫。一开始的时候,他不那么喜欢德瓦诺夫。瞧他坐在那儿一声不响,也许能把所有的纲领、章程和提纲背出来——巴申采夫不喜欢这样的聪明人。他一生中看到愚笨和倒霉的人比聪明人善良,更善于改变自己的命运去追求自由和幸福。巴申采夫私底下相信,工人和农民当然比有学问的资产阶级愚蠢,不过他们比较真诚,因此非常幸运。

科皮奥金安慰巴申采夫,说不必匆忙,胜利属于我们,这是十拿九稳的事,巴申采夫一听就放心了。

巴申采夫觉得科皮奥金说得有道理,于是也讲了杂草的故事。在那被毁的童年时代,他喜欢观察那些可怜的、必定死亡的杂草在麦地里疯长。他知道天气好的日子农妇们会毫不留情地除去这些不合时宜的野草——矢车菊、草木樨和风车草。与不起眼的庄稼相比,这些杂草更加美丽——它们的花朵很像孩子临死前悲伤的眼睛,它们知道,汗流浃背的农妇们会把它们拔除。但是,这些杂草的生命力比柔弱的庄稼更强,也更有耐力——农妇们走后它们重新长出来,数量多得数也数不清,除也除不尽。

“穷人也是这样!”巴申采夫做了比较,他觉得遗憾的是把“杀死资产者”喝光了,“我们的力量更强大,我们比另类分子更真诚……”

这一夜,巴申采夫心情难平。他在衬衫外面套上铠甲,出门朝庄园方向走去。夜间的寒气逼人,但他没有冷静下来。恰恰相反,布满星星的天空以及自己在星空下身材更加矮小的意识诱使他去体验更大的感觉,渴望立即去建立功勋。在茫茫的夜间世界的力量面前,巴申采夫感到羞愧不已,于是,他不假思索地打算提升自己的人格尊严。

主楼里住着几个无家可归、从未登记过的人。四个窗户亮着微弱的光,那是敞开的壁炉的火反射,他们就在壁炉里煮饭。巴申采夫用拳头猛敲窗户,根本不顾住户的安宁。

出来一位头发蓬乱、穿高帮毡靴的姑娘。

“你要干什么,马克西姆·斯捷潘诺维奇? 干吗拉响夜间警报?”

巴申采夫走到她跟前,用自己热情洋溢的好感弥补了她所有明显的缺陷。

“格罗尼娅,”他说,“让我亲亲你,没出嫁的宝贝! 我的炸弹干瘪了,炸不了了——刚才还打算用它们去炸立柱呢,现在不行了。让我同志式地拥抱你吧。”

格罗尼娅顺从了。

“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你这人以前好像还挺严肃的——你把身上的铁家伙卸下吧,我全身的肉都会给刺穿的……”

巴申采夫简短地吻了吻她又黑又干的嘴唇皮就转身走了。在悬着的宏阔天空下,他感到

轻松了些，也不那么心烦意乱了。凡是规模巨大、品质优良的东西，在巴申采夫身上激起的不是那种旁观者的赞赏，而是军人的感觉——努力争取在力量和重要性方面超过大规模高质量的东西。

“你们怎么样？”巴申采夫无缘无故地问两位来客——为了舒缓自己得意的心情。

“该睡觉了。”科皮奥金打了个哈欠，“你已经记住了我们的规则——把农民迁移到大容量的土地上：我们哪能在你这儿白吃白喝呢？”

“明天我就把那些庄稼汉拉过来——绝不会消极怠工！”巴申采夫肯定地说，“你们再留几天吧——为了巩固联系！明天格罗尼娅会给你们做午饭……我这儿有的东西，别处根本找不到。我在琢磨，最好把列宁叫到这儿——他毕竟是领袖啊！”

科皮奥金仔细打量巴申采夫——这家伙居然要找列宁！于是提醒他：

“你不在的时候我看了你的炸弹——全废了。你怎么能统治呢？”

巴申采夫没有反驳：

“没错，是废了，我自己退了弹药。但是老百姓看不出来，我单靠策略就把他们镇住了——我穿铁甲，睡炸弹……我用小股兵力实行迂回抄的战术对付敌人，你明白吗？得了，今后想起我的时候就别再提这事儿。”

油灯灭了。巴申采夫解释形势：

“行了，弟兄们，随便睡吧——什么都看不见，我这儿连床铺也没有……在别人眼里，我是个糟糕的成员……”

“你不是糟糕，而是胡闹。”科皮奥金说得更确切，一边收拾东西准备躺下睡觉。

巴申采夫也不气恼，回答说：

“老兄，这里是新生活的公社，不是女人国——没有鸭绒被。”

天快亮的时候，浩渺的星空已经黯然失色，鱼肚白代替了灿烂的星光。黑夜如同金光闪闪的骑兵撤退了，而白天犹如艰难行进的步兵登上了大地。

巴申采夫送来了烤羊肉，科皮奥金甚为惊讶。不久，两位骑士离开革命自然保护区，沿着南方大道前往黑色卡里特瓦山谷。巴申采夫一身盔甲，站在柱廊下目送志同道合的两位客人渐渐远去。

两人再次策马前行。太阳在贫瘠的大地上冉冉升起。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

作家、戏剧家、诗人，被誉为“二十世纪唯一继承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光荣传统的苏联作家”。

二十世纪早期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切文古尔》，中篇小说《基坑》《原始海》，短篇小说《疑虑重重的马卡尔》《归来》，诗集《蔚蓝色深处》，儿童文学故事集《七月的雷雨》等，另有戏剧作品多部。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其主要作品才陆续得以出版。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wu yi](#) on Unsplash

小说

人生很美好

金劲旭 | 新书推荐

韩国鬼才作家，“不断进化的小说机器”金劲旭
短篇小说代表作首度引进

在百货商场皮鞋专柜工作的售货员，每天在同一时间起床，在同一时间洗漱，某天在邻居的快递箱中发现猫的尸体；从战争中幸存的军人，余生都佩戴着两只手表，等待昔日荣光再次来临；一生从未做过一次坏事、循规蹈矩的男子，突然怀揣刀、氰化钾和骰子踏上复仇之路；拥有超能力的三位落魄老人，循着幻境寻找多年前的上司，却发现他们的命运成为一个完美的黑色玩笑；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人，一次又一次飞上了天，照亮夜空的北斗七星化作伤疤落在他的额角；在被白雪覆盖的废弃村落里，一名留守少年守着永远睡不醒的爷爷，在无穷的时间里漂流——在韩国作家金劲旭短篇小说集《少年不老》中，一群从小被否定的人，像是活在自己琥珀般世界里的“少年”。

经磨铁·大鱼读品授权，我们摘选了《人生很美好》这个故事，分享给读者。



吊唁过四十年的知己后，他决定考取自杀资格证。逝者是一名语文教师，是他在工作的第二所学校相识的朋友。在同一个学校教英语的朋友转来了讣告。以前发工资的晚上，五个老友就会凑在值班室打牌，现在只剩下两人还活在世上。教科学的伙计五年前因为

交通事故走了，教社会的伙计也罹患肝癌离世了。

当“英语”打电话来告知死讯的时候，他正在看一部最近大火的越南电视剧。女主角刚得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就接到了心上人的求婚。男主角说：“错过你，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我希望两鬓斑白的我们并肩坐在长椅上欣赏满天晚霞时，可以在你耳边呢喃：人生很美好。”

他用纸巾按了按眼角的泪水，接了电话。因为在妻子的葬礼上没有落泪，他被岳丈一家斥骂冷酷无情。葬礼结束后，一个人回家呆呆地看电视剧时，他却忽然号啕大哭。太多的愧疚与后悔涌上心头。跟酒吧女一夜风流的事，妻子初次分娩他却因为打牌缺席的事，妻子一提出国旅行他就大发雷霆……最让他后悔的，还是妻子一打呼噜，他就拽她的耳朵。

“语文”走了。

他按下遥控器的静音键。四周陷入寂静，失语的不仅是电视机。接到讣告的事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他对于死亡仍然感觉十分陌生和不舒服。电话那头同样沉默了一阵。不知从何时开始，沉寂催生了他内心的愧疚。“语文”好像说过，如果无缘无故地想跟什么人道歉的话，那就离死不远了。

今年春天他冒着风沙去了疗养院，最后一次见到了“语文”。原本记忆力超群，人称“电脑”的“语文”，如今已经衰弱到认不出四十年的老友。都说人上了年纪就会变成小孩子，“语文”穿着纸尿裤，嘴含棒棒糖的样子就像个婴儿。他拉着“英语”的袖子落荒而逃，甚至打消了趁着出国做一次廉价前列腺手术的念头，慌慌张张地搭上了火车。

回首的路上，他始终一言未发。“语文”的凄惨模样印在车窗上怎么都抹不掉。这可不是很遥远的事。他每次小便时就像针刺一般痛苦，病痛倒是能忍受，生活无法自理的事却令人惶悚。他想象着自己穿着尿不湿的样子，狠狠地摇了摇头。绝不能让任何人看见这副丑样儿。与其穿纸尿裤活着，不如去死。他突然想起自杀资格证。这样看来，自杀算得上最后的养老对策了。

光是“养老”这两个字都令他忧心如焚。为了让三个子女考上世界一流大学，夫妻俩好像腰都累弯了。

老大上了xx大学板门店校区，老二去了xx大学横城校区，老三考上了xx大学利川校区。当初出于爱国情怀生了三个孩子，确实非常辛苦。还清种种债务后，他的退休金所剩无几。妻子一直叹息夫妻俩的后半辈子怎么过，两人很早以前就加入了出国旅行契合，就在可以支取钱日期的两个月前，老伴却突发脑出血晕倒在老二家厨房，手里还攥着奶瓶。为了给妻子治病，他卖掉了房子。

他很遗憾竟然一次都没跟妻子出国旅行过。只要在机场附近，他连尿都不肯撒，因为有恐高症。妻子只要提个出国的“出”字，他都会生气地质问妻子是不是有钱没地方花了？其实他只是不想被人发现他害怕坐飞机这件事。

在“语文”的葬礼上，他下定决心考取自杀资格证。“语文”唯一的儿子是丧主，却连父亲的朋友来吊唁都没察觉，只顾盯着手掌上面生成的虚拟光屏。那是一种只有在手掌里植入芯片才能使用的虚拟手机。他不断翻动着画面，那里充斥着芝麻大小的数字、红色箭头、蓝色箭头。丧主正在父亲的灵前确认股价。

他喝了几口辣牛肉汤，站了起来。

“这就要走吗？”“英语”边嚼鱿鱼干边问。

“去厕所。”

“又去？”“英语”皱眉问道。

他坐在马桶上发出了痛苦的低哼。他已经习惯了坐在马桶上撒尿。从“那时”开始，只要有人站在身边就尿不出来，都成习惯了。

他感觉到下身深处的汹涌尿意，小便却毫无迹象。他努力想要分散注意力。越想小便，尿液就在体内藏得越深。有份报纸就好了，他想。他开始阅读厕所门上贴着的各种脏兮兮的小广告。

千里马快递。买卖指纹。宠物担保贷款额度最高可达三十万。替你解决最大胆的问题！大浦洞跑腿中心，乌拉圭新郎——你忠诚的伴侣……

贴在最下面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江北地区合格率最高一所罗门自杀资格证培训学院。一位笑容如孩童般灿烂的白发老人的照片下面，印着一句话：最高龄合格者兼人气院长主讲。

所罗门自杀资格证培训学校坐拥宝塔公园大道上的一座三层建筑。一楼是办公室，二楼是教室，三楼是实习室。实习室？他看着入口的楼层分布图，疑惑地歪了歪头。实习自杀？自杀成功的话还怎么考证呢？转念一想，觉得自己的疑惑很可笑。“自杀失败免罚，成

功则定罪”不正是“自杀资格证特别法”的宗旨吗？无证自杀成功者的遗属需要缴纳巨额的自杀税，八竿子够不着的亲戚也会丧失当公务员的资格。不能连死也要被儿女埋怨。他想起连续六年公务员考试落榜的老三。

人们在六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摩肩接踵。完全出乎他的预料，见到的都是年轻人的身影，老年人反而一个都没见到。好像来了不该来的地方。早知如此，应该总想“英语”一起来的。也是，月月花退休金的人怎么可能想自杀呢。一想到退休金他就恼火。为了还债，他放弃了退休金，领取了一次性补偿。

他抽了号，坐在等候位用手掌当扇子。

214 号！

听到工作人员叫自己，他猛地睁开眼睛。看样子是睡着了。自从整宿跑卫生间之后，只要屁股沾上凳子就会打瞌睡。去一次排一点儿尿，一个囫囵觉也没睡过。医院开的处方药也只是初期有效。医生说如果一直没有好转就要做手术。医生说的手术很怪异，要什么电切镜从尿道伸进去，烧掉前列腺组织增生的部分。老天爷啊，往那个地方塞火钎吗？医生还提到了更荒唐的事。“这种手术效果虽好，但是会有副作用。手术后，精液无法通过阴茎射出来，而是倒流回膀胱。就是逆行呗。不过，对您来说可能也无所谓了。”从那天起他就开始打听别的医院。

从前不满意医生就可以更换医院，还算好的。自从实行定制型医疗服务后，见医生一面比登天还难。使用器官反向抵押贷款，即把器官抵押给银行贷款，每月领到的钱还是连医院的门槛都过不了。他已经两年没去过医院了。四天前，他开始便血。钱固然是原因，但他更害怕自己患上前列腺癌。以前他压根儿没想过要去医院。

“奶奶，轮到我的号了。”

“我的号过去了，我就出去一趟带珍淑散步去了嘛。”

“那您也不能插队啊，奶奶。”

“就理解一次嘛。我家珍淑到了去医院的时间了，不能再等了。”

一位抱着毛茸茸小白狗的老奶奶，在旁边窗口前跟一个孙女般大的女孩发生了争执。

“那是您自己的事，我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女孩提高嗓门说道。

女孩身后的年轻人也都面露不满。看老奶奶的表情好像就要哭出来了。她的眉毛浓密，眼神温柔。如果他小时候迷恋的香港演员没有自杀，老了之后应该就是这样子吧。

“您到这边来吧。”他朝老奶奶招招手说道。

他很高兴这里还有其他的老人。老奶奶怯生生地走了过来。跟其他老人不同，她身上的味道很清爽。

“珍淑，得说谢谢啊。”

毛茸茸的小狗像中暑了一样瘫软在老奶奶怀里。

“它原来不这样的，应该是太累了。”老奶奶忧心忡忡地说道。

报名结束后，老奶奶又让小狗道谢，小狗仍然没有反应。

“它本来很有礼貌的……”

“没关系。我还以为夏天都过去了呢，还是这么热啊。”他摆摆手说道。

看她的样子生活得应该不错，为什么要考自杀资格证呢？他茫然地望着老奶奶离去的背影。

“有什么可以帮您？”一位穿粉红色制服的年轻女子问道。

“啊，我要考资格证。”

“考哪类？”

“哪类？”

“您是要考一类还是二类？”

“一类？二类？”

“一类资格证可以结伴自杀，比二类难一些。”

“我要考二类。”

学费非常贵。他需要抵押器官贷款才能勉强糊口，这价格简直是在杀人。虽然教养课的学费比他一个月的生活费还多，但是必须完成法定课时后，才能参加笔试。自杀技能训练课的学费相当于两个月的生活费，同样需要完成法定课时，才能参加实践技能考试。幸好他仅有的一张信用卡与培训学校有合作，可以按照六期免息支付。

“本来就只有年轻人多吗？”他接过收据问道。

“放假了嘛。”

“刚才看楼层布局示意图，三楼是实习室，实习什么，怎么实习？”

“笔试合格后您就知道了。”

“笔试合格之后才能去吗？”

“对，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的。ID 卡上会记录您的听课时长和考试结果还有其他数据等，只有笔试合格，您的指纹才能打开实习室的门。”

“指纹？”

“是的，请把右手大拇指放在上面。”

为了办理 ID 卡，并且在警察厅备案，必须录入指纹。虽然感觉成了前科犯心里不舒服，但也只能照做。

“上课日期和时间，怎么帮您安排呢？”

“可以随便定吗？”

“教养课每天两个小时，一共六天，您可以自由选择日期和时间。”

“就跟前面的人一样吧。”

“您需要习题集吗？”

“习题集？”

“有历年试题集、预测试题集、押题集。”

“给我一本历年试题集吧。”

他走出大楼转过身仰望，只有三楼垂挂着黑色的窗帘。他拿出手机连接网络，输入“自杀技能考试”。网页弹出“含有敏感词汇”的提示，并警告若再次搜索将自动断开网络连接。他不满地咂了咂嘴，把试题集卷起来塞进脱下的外套内侧口袋。

他第一个走进教室。随着上课时间临近，学生也陆陆续续地走进来，全都是年轻人。他们像约好了似的都坐在远离他的座位上。教室里的座位渐渐坐满，而他身边的座位依旧空着。长得像早年香港演员的那位老奶奶还没到。他一边庆幸没有年轻人一屁股坐在旁边，一边又觉得有些恼火。人老了就是罪过啊。他产生了拂袖而去的强烈冲动，反复琢磨着黑板上方匾额中的院训，强忍着怒火没有起身。

一切都会过去。

年轻人一坐下就开始翻书学习，甚至边做题边勾画重点。他也打开了试题集。

挖掘机在首尔到开城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最高时速是__？

① 50km/h ② 60km/h ③ 70km/h

④ 80km/h ⑤ 90km/h

他翻到书的封面看了一下，是自杀资格证考试试题集没错，但是下一道题仍然让人摸不着头脑。

下列选项中没有登上月球的人是？

① 艾伦比恩 ② 阿尔菲特波登 ③ 查尔斯杜克

④ 吉恩塞尔南 ⑤ 查尔斯康拉德

他目瞪口呆。首先是有这么多人登上过月球令他震惊，而且他唯一知道的宇航员竟然不在选项里。更令他吃惊的是，这样的问题居然有五十道，答对四十道以上才能通过考试。二类资格证倒还算容易些，一类要答对四十五道以上。这些题和自杀有关吗？为了猜测出题的意图，他皱紧眉头，如同之前无数个夜晚一样努力集中注意力。这不是国家实行的考试吗？不可能与自杀无关。周围的年轻人也都一脸认真地跟练习题展开搏斗，居然无人表现出疑惑。他也目不转睛地看着习题集，带着不能输给年轻人的斗志。

因为疲劳和困倦，他想跟年轻人比试一下的斗志逐渐消退时，貌似早年香港演员的老奶奶在他旁边坐下了。如梦境般隐约的香气让他睁开了双眼。他甚至没察觉自己睡着了。最近他健忘到连自己打过瞌睡都记不起来，像出了故障的灯泡。再这样下去，不久之后就会彻底断电吧。他用手背蹭了蹭嘴角，幸好没流口水。

“哎哟，老师也选了这个时间上课吗？”老奶奶笑眯眯地问道。

“您怎么知道我教过书？”他故作惊讶地问道。

“啊？啊！”

老奶奶用手掩着嘴笑了起来。在老奶奶春日阳光般温暖笑容的鼓舞下，他果断地与她互通姓名，甚至还了解到老奶奶，不，金女士至今未婚。

“宝宝呀，对不起啦。妈妈要学习了，你要乖哦。”

金女士把塑料宠物包放在地上，把毛茸茸的小狗抱了进去，上课时也会不时地确认小狗的状态。反正这课也没什么可听的。中年老师的头顶已经秃了。他滔滔不绝地解释了自

杀资格证相关特别法的宗旨后，就让学员们一齐大声诵读。

从“为迅速完成创建先进祖国的历史性任务，制定本法……”开始，一直读到结束部分“保护人民宝贵的生命，避免社会经济受到损失”为止，反复让学员齐声诵读了两个小时之久。老师强调每年都会从中出两三道题，摆明了让他们两眼一闭，背下来就好。他在习题集的封面上写下：两眼一闭。

决定要考自杀资格证之后，他认真地思考了自杀方法。跳楼？听说跳楼的人在头骨撞碎之前已经死于心脏停搏了。心脏停搏还不够，连脑袋也要摔个粉碎！相当于死两回嘛。更何况抵押贷款的器官受损的危险就增大了。他的脏器评估价格本来就逐年递减，一旦脏器受损，子女就需要连本带利地还贷款。孩子们这才勉强能糊口，就算没有留下遗产也不能留给他们一堆债务啊。跳汉江？他怕水，甚至没穿过泳衣。而且器官受损的可能性也很大。上吊？听说囚犯在接受绞刑的瞬间会射精，人生如此落幕也太不体面了吧。割腕呢？据说如果身体泡在热水里，血液就会瞬间涌出。可惜他寄居在老三的单间房里，没有浴缸。选来选去，最后还是选了安眠药。他以前责怪妻子呼噜声大得好像吃了火车烟囱，妻子总会反驳说他睡得像具尸体。一想到只是沉睡不再醒来，死亡也不是很可怕了。

第二次上课时，他仍旧是第一个进入教室，拥挤的教室里他旁边的座位也仍旧空着，金女士仍旧在快上课时抱着毛茸茸的小狗登场了。

刚一上课，就有一个年轻的女人走上讲台。她介绍自己是一位哲学博士。“关于叔本华虚无主义哲学中体现的道教研究”，这是她博士论文的题目。她像机关枪似的滔滔不绝，用“表象”“思想”“无为”这些艰涩的词汇解释自杀的哲学意义。越是晦涩难懂的部分语速越快。没办法，只能背重点了。两眼一闭。

虽然老师的解释不得要领，叔本华的话似乎还能听懂。他听到叔本华尽管“推崇”自杀，却因害怕剃须刀而从不靠近理发店的逸闻时，会翘起嘴角。听到叔本华呵斥“人生不过是忍受着希望的嘲弄，被死亡簇拥的一场舞蹈”时，也会不由自主地点头。他奋笔疾书记录老师的话，准确地说是老师引用叔本华的话，然而金女士连手指头都没动过。

“您不记笔记吗？”

金女士羞涩地笑着按下手掌上网络电话的按钮，通过 3D 全息图像程序自动生成了老师的形象。“很高兴能给大家上课。我是一名博士，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叔本华虚无主义哲学中体现的道教研究’。”这是录制的全息影像课程。他潇洒地竖起大拇指，就像年轻人常做的那样。

“奶奶，这里不允许录视频，您这么做属于侵犯课程的著作权。”

金女士红着脸关掉了手机。教室的各个角落传来窃窃私语。录制课程的似乎不止金女士一个人。

“请大家关掉网络手机，或者把移植了芯片的手放到口袋里。如果发现有人录制课程，我会请他离开教室。”老师斩钉截铁地说道。

金女士在移植了芯片的手上戴上没有指头的手套。其他年轻人要么戴上了与金女士的样式相似但材质、颜色不同的手套，要么把手塞进口袋。他有些郁闷好像只有自己在做笔记。

下课后，他到办公室买习题集，把预测试题集和押题集都买下了。他下定决心，暂时要把吸烟量减少到每天半包。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教室里的景象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他总是最先走进教室，无论教室里挤了多少人，身边的座位总是无人问津，快上课的时候金女士才会抱着毛茸茸的小狗出现，坐到旁边的座位上。接下来就是各领域的专家讲授自杀相关课程。神学家、法医、经济学家从宗教、法医学、经济的角度阐述了自杀的意义。虽然专业领域不同，但是结尾都大同小异。不用担心记不住，试题集里面都有。金女士是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才坐在他旁边的吗？虽然很好奇，但他没有问她。

第六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与往常不同，快要上课时他才走进教室。他在公交车上一不小心睡着了，一直坐到了终点站。他气喘吁吁地走进教室时，只有金女士旁边的座位还空着。

“您来晚了呀。”金女士高兴地说。

“有点堵车。”他挠挠头答道。

他发现金女士旁边座位上的宠物包后，表情变得明朗起来。毛茸茸的小狗好像是在打瞌睡，又好像不是。

“啊，瞧我这记性！”

金女士红着脸把宠物包放在地上。

“珍淑今天也好乖啊。”他笑着说道。

“它病得很严重。”

金女士的脸色突然暗了下来。他看着她过于阴沉的表情，没有忍心接着问下去。

院长是最后一节课的讲师。他气色很好，活力四射，看上去比照片里年轻一些。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持有自杀资格证的人。更何况院长还是最高龄的合格者。他拉开椅子坐下。

院长闭着眼睛聆听了教室的寂静后，终于睁开眼睛说道：

“我因为受不了父亲的虐待，九岁的时候第一次尝试自杀。”

院长顿了顿，观察学生的反应。教室的氛围冷了下来。

“不相信吗？你们信不信我的大腿就是我爸爸的烟灰缸？”院长作势要解开腰带。

“我相信。”金女士急忙喊道。

“原来有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啊。”

院长露出了满意的表情。金女士的耳垂通红。

院长把自己尝试自杀的经历当作英雄事迹侃侃而谈。离家出走时的惩罚、小偷的污名、拜把子兄弟的背叛、失恋、生意失败、病痛、贫穷、孤独、醉酒、怒火。放弃生命的理由多种多样。在巨大的痛苦中甚至想要颠覆世界的孤独瞬间，对于那些令他痛苦不堪的语言和行为，就算逆转地球也想予以回击的瞬间，他不是没有经历过这些瞬间，就是在“那个时候”时候。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首尔的一所中学当老师。虽然这所私立学校培养出了许多知名人士，但自理事长去世，学校里一直风波不断。理事长的妻子和儿子都对财团所有权寸步不让。三年的骨肉相残结束时，儿子一方阵营里的教师被迫离开了学校。学校马上录用了大批新教师，而他的名字重新列入了教职员名单。

校长是新任理事长的左膀右臂，他打压加入工会的教师，工作蛮横霸道。教师们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不过都是私底下的空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给猫的脖子挂上铃铛。

有一天，校监把他叫去，询问他对校长的评价。他一时间没能揣摩出校监的意图，不敢贸然开口。校监随后以从教三十年的名誉起誓，会把今天他们之间的对话带进棺材。他不得不点什么了。

“校长的行为的确欠妥，大部分老师也都是这样想的。”他小心翼翼地说。

“我很担心学校未来的发展。如果放任校长这样下去的话，学校一定会一团糟。”校监压低声音说。

校监的想法跟自己一样，让他松了一口气。

“那怎么办好呢？”

他附和道。他想强调自己和校监一样，都在担心学校的未来。

校监犹豫了一阵子，开口道：“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向教育局投递了一封匿名检举信，检举校长的各种贪污腐败行为。几周后，特别检查组突然出现在学校，调查出校长的各种不法行为。贪污器材购置费、私吞补课费、收受工程项目贿赂……简直是贪污腐败的百科全书。把虚构的学生名单列入拟录取合格学生的名单里，并处理为未登录状态后，再开后门招收新生，收取巨额钱财。一桩桩的恶行摆在眼前，令人瞠目结舌。校长辩解说，这么做是为了打点理事长，不得已而为之。校长倒是没有说谎，很快就有证据显示部分赃款进了理事长的口袋。最后理事长的儿子接手了已经千疮百孔的财团。从那时起，他经历了意想不到的煎熬。

同事们开始明目张胆地孤立他。没有人跟他说话，甚至没人与他对视。就连之前在酒桌上激烈吐槽校长的人，也开始不动声色地躲开他。他们冷漠的脸上都写着两个大字：叛徒。

他开始害怕坐在办公室。他很想两眼一闭，从天台上跳下去。他也确实数次爬上了天台栏杆，可是每次都重新爬下来。太冤屈了。把他赶上天台栏杆上的固然是委屈，让他下来的也是委屈。每次一到休息时间，他就习惯性地躲进厕所。不是为了上厕所，也不是要确认自己已经掉进粪坑的人生。他裤子也不脱，就坐在马桶上，听到别人小便的声音，天台就逐渐遥远起来。他没事找事地往返于卫生间的工夫，校监升任了校长。

不知何时院长已经讲完了他的人生故事，开始大谈训院的含义。

“一天，大卫王叫来金匠，命令他做出世界上最美的戒指。还要刻上一句话，这句话须既能警示人在胜利中不能骄傲自满，又能安慰人在失败时不必绝望。金匠打造出世上最美的戒指，却没有寻找到这样的话。于是他向以智慧闻名的所罗门王子求助。所罗门王子给了他一句话：一切都会过去。

“所以各位，即使考试不及格，也不要气馁。绝望也一定会过去。我拿到自杀资格证之后，就再也没有自杀过。对，证书上都落灰了。想自杀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看着失败十次才考下来的资格证，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也会从容地觉得，自杀这么丁点儿的小事，

只要下决心就可以马上做到。所以各位，在拿到自杀资格证之前千万不要自杀。”
他扑哧笑了，金女士也捂着嘴笑了，周围的年轻人却都是一脸的真挚和决绝。最近流行遇到好笑的事也不笑吗？他赶忙收起了笑意。

“我有个问题。”坐在最前排的男孩子举手说道。

“有什么问题？”

“技能考试怎么考？”

“看来你是想死想疯了。”院长微笑着说。

他强忍住笑意。班上的年轻人这次也没人笑。院长面露慈祥的微笑，说道：

“先好好准备笔试吧。通过笔试之后，就算你不想知道也会知道的。没通过的记得申请补课啊。”

虽然已经完成了法定的听课时间，他的心情却非常沉重。他完全没有信心通过笔试。到时候交了补课费，一点富余的钱都没了。估计就得戒烟了，他想。

“那个，能拜托你一件事吗？”

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时，金女士犹豫不决地问道。

自杀资格证的笔试考场设在钟路警察署。考场也是挤满了年轻人。大部分人手里都握着考试材料，就好像来参加招聘会似的。他先在二楼的受理窗口取了号牌，然后到一楼办理手续。填写申请书，贴上照片和印花税票，又交了考试费。果然很贵。

他不停地摩挲放在口袋里的信封。里面是从银行取出的一百张十元纸币。为了把信封弄厚一点，他特意只取了十元的纸币。这是他的全部家当。摸着信封，紧张情绪就会有所缓和。信封的厚度意味着与其相当的胆量。他想起之前揣着一整月工资打牌的日子。虽然那时候充满了愤慨、仇恨和羞愧，也是一段不错的日子。至少膀胱还生机勃勃。

到了约定的时间，金女士才走进考场。她说一个人会发抖，果然一脸的紧张。这次毛茸茸的小狗没跟来。

帮金女士办了手续，走上二楼一看，只剩十来个人在候考了。

轮到他时，他跟着金女士走近服务台。

“谁先考？”服务台的工作人员问。

“女士优先。”他朝后退了一步说道。

金女士对他道了声“谢谢”，递过去应考单。服务台的工作人员看了看照片，问她是什么时候拍的。

“这照片是珍淑爸爸出生那年拍的。”金女士神色恍惚地回答。

他看了看申请书上的照片，是一位漂亮的中年女人，表情高傲。

“您说什么时候拍的？”服务台的工作人员皱着眉头问。

“嗯……”金女士眯起眼睛，似乎在仔细回忆。

“奶奶，这里得贴一个月以内的照片。”

工作人员将资料还给她。金女士一脸惆怅。

“没办法了，看来我只能下次再考了。”金女士无力地说。

“别担心，楼前有一家快速出片的照相馆。”

“今天还是算了吧……”

“没事，就在前面。”

他走在金女士前面，挤过拥挤的年轻人。

跟金女士一起走进考场时，他一直用手捂住口袋里的信封。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坐在监考的位子上。他把准考证交给他。监考官又让他出示身份证。监考官看了看身份证又看了看他的脸，打量了好一会儿。

“有什么问题吗？”他问。

“没，没什么。请坐那里吧。”

监考官把身份证还给他，指了指角落最后的位置。

每张桌子上都摆着电脑。他做了一次深呼吸，输入考号，点击开始。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是看到试题后，他还是不由得叹了口气。下列选项中不含有反式脂肪的食物是 ____？下列选项中与巴洛克风格最不相符的建筑是 ____？下列选项中第三位成功登月的人是 ____？没见过的问题自然是答不上，就连在习题集中见过的题，也都是模棱两可。

他歪了歪头，挠了挠脖子，又开始抖腿。又想撒尿了。没有一道简单的题。他不时地低头，盯着无辜的手表。

他感到身边有人，抬头发现监考官站在自己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更令他吃惊的

是，监考官竟然抢走他的鼠标开始答题。咔嗒，咔嗒，咔嗒。监考官肆无忌惮地敲击鼠标。他像共犯一样四处张望。所有人都盯着自己的显示器。答完最后一道题，监考官泰然自若地坐回自己的位置。他好像中邪了一样，呆呆地望着监考官，差点忘了提交试卷。

点击“结束考试”后，画面上立即显示出考试结果：

84分，恭喜您通过考试。

他将准考证递上去盖合格章，视线却始终无法从监考官的脸上移开。无论怎么看都是一副陌生的脸。

“卧室面积等于两个耳房面积之和。”监考官一边盖章一边低声说。

“我教过你吗？”

“我还挨过耳光呢。”监考官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啊。”他像挨了一记耳光似的退缩了一下。

用所教的科目称呼该老师，不仅是扑克小队成员之间的习惯。学生们在谈论老师的时候，也不会说出具体名字。“语文”讲课让人困得要死。“数学”长得特像急着拉屎的小狗，不是吗？

他们叫老师“语文”、“数学”的时候，声音中隐含着某种茫然的愤怒。学生们都很清楚，无论怎样努力学习，最终也逃不过整日追赶狍子或者当佣兵的命运。如同他不是不知道，无论自己怎样拼命挣扎也无法回到首尔一样。

在那个只能伴随着野兽的嚎叫入睡的地方，他靠着对自己的憎恶熬过了一天又一天。落入校监圈套的那个天真的自己，对那些孤立他的老师也没能大声反驳一句的那个傻瓜般的自己，爬上天台栏杆却没有理直气壮地跳下去，反而躲进厕所瑟瑟发抖的那个懦弱的自己。

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的憎恶，当学生们喊他“数学”的时候，他反而自虐般地感到某种解脱。除了你教的勾股定理以外，你什么都不是。不，勾股定理也一文不值，就跟你一样。

什么都不是，所以什么可能。他很清楚，教那些每天一睁开眼就擦枪的学生勾股定理的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是，所以为了教会他们勾股定理，他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别的不重要，他们只要记住勾股定理就可以了。他的心中涌起了破坏性的冲动和不可理解的偏执。

为了教会学生勾股定理，他走进教室随意叫几个学生，不由分说地抽耳光。那些长着青春痘的学生，虽然平日像一群饥饿的野狼一样凶狠，在突如其来的暴力面前也都气馁了。

教室一片死寂，连咽口水的声音都听得到。他在黑板上画出直角三角形，大声说道：

“这是一间客厅。面向客厅建三个正方形的房间，最大的是卧室，剩下两个是耳房。此时，卧室的面积等于耳房面积之和。”

脸颊红肿的学生里，没有一个站出来质问他为什么打人的。本来就没有理由。就像要塞进这些家伙脑袋里的东西，不一定必须是勾股定理一样。这才是重点。暴力没有恰当的理由。无辜被打也默不作声的你们，在不正当的暴力面前一边庆幸自己的脸蛋子没挨打，一边屏声息气的你们，是垃圾。只有将毕达哥拉斯完美的定理永远刻入脑子里，方能拯救你们腐朽的灵魂。

调到附近的城市工作后，他连学生的一根汗毛都没有碰过。那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动手打人，也是他极力想要抹去的一段记忆。这个人好像是当时被打的学生中的一个。他极力回避监考官的视线。

“您不认识我了吗？”监考官甚至递给他一张名片。

“认错人了。”他逃命似的跑出考场。

“老师。”

金女士气喘吁吁地追了出来。

“您突然有什么急事吗？”

“不是。这里太热太闷了。”

“考得怎么样？”

“嗯……”

金女士看了看他手中的准考证。

“Bravo！太厉害了。连年轻人都抓耳挠腮呢，您居然一次就过了。”

他感到困惑、羞愧和不安。对羞耻的记忆感到困惑，对不光彩的合格感到羞愧，对莫名其妙的帮助感到不安。那个孩子，不，那个监考官到底为什么要帮我呢？他想上厕所，却不想再回到考场。

“您考得怎么样？”他问道。

金女士摇了摇头。

他一时无语。不清楚是该祝贺她落榜，还是应该安慰她。

“不要太灰心了。我请您吃晚饭，算是安慰吧。”

他故作爽朗地说道。

“不用啦。”

“您别客气。”

“真的不用啦。”金女士看着手表说。

“您已经有约了吗？”

“那倒没有……”

“就当是庆祝我通过考试吧，不要有负担。”

他朝寺洞方向，不，是国际大道方向走去。

金女士推荐的地方是乐园购物中心的意大利餐厅。他一进餐厅就去了卫生间，不过有人正在使用。意大利餐厅也是年轻人的天下，年轻的男男女女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都说最近的年轻人不谈恋爱，果然一对情侣都没有。那些年轻人好像总是往他们这边瞄，让人如芒在背。

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服务生过来用英语点单。他不懂英语。

“您想吃什么？”金女士问道。

他上下扫了眼菜单。去陌生的餐厅时，他一定会点菜单最上面的菜。

“海鲜意大利面。”他答道。

“您要什么酱料？”

金女士向服务生转述后，又问他。

“Domado。”

他对服务生说。自从听说西红柿对前列腺有益，他就成为西红柿宣传大使。

“Domado？”服务生用生硬的口音反问。

“Tomato。”金女士对服务员说。

“OK。”服务员点点头。

他被自己脱口而出的方言弄得很慌张。他的妻子总会把西红柿说成“Domado”。每次妻子这样说的时候，不管孩子们在不在身边，他都会捧腹大笑。不，孩子们在身边时他笑得更大声。“孩子们，如果说话太土，会被所有人瞧不起的。”他用训斥的口吻说。现在他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妻子说“Domado”的时候嘲笑了她。他想跟妻子道歉。因为不可能道歉了，这种心情反而更加迫切。他甚至觉得妻子太无情了，连道歉的机会都不肯给他就匆匆地离开了人世。

“您的妻子是什么样的人呢？”

金女士喝了口水润了润嗓子后，小心翼翼地问。

他犹豫了一下。妻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已经看过一遍的电视剧，重看到同一个场面时仍然会流泪的人；从来没出国旅游过的人；睡觉打呼噜的人；把“Tomato”说成“Domado”的人。也就是一边哭着看电视一边会突然放屁，虽然从未出国旅行但总是随身携带护照，虽然打呼噜，但一揪耳朵她就会安静下来，嘲笑她把“Tomato”说成“Domado”就会哭鼻子的妻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看来我不该问。”金女士一脸愧疚地说。

因为他一直缄口不语，气氛逐渐尴尬起来。沉默的时间越长，就越难以启齿。他不知道要说什么才能缓解尴尬的气氛。膀胱沉甸甸的，卫生间的门却依旧关着。

“您为什么要考自杀资格证呢？”他问道。

金女士的神色黯淡了。

“不想说的话，就不要回答了。”

“不是……”

四周突然陷入一团漆黑。黑暗抹去了一切，四周传来惊呼声。他瞪大眼睛环顾四周。室内没有一丝光亮，外面也是一片漆黑。

寂静了一会儿，响起嘈杂的声音。有人大声喊服务生，有人高声询问情况，有人安抚人群，请客人少安毋躁。几个年轻人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隐匿在黑暗中的脸露出部分轮廓。

“天啊，说是停电了。”有人喊道。

他这才察觉空调也没了动静。

“您没事吧？”

他朝对面的黑暗问道。他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隐约看见金女士的脸。金女士不知道在给谁打电话。

“民哲妈妈，我是珍淑妈妈。那边是不是也停电了？怎么办啊，珍淑很怕黑，晚上也得开着灯才能睡觉。什么？珍淑和民哲不一样啊。它得了子宫癌啊。珍淑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办。

可怜的珍淑，该有多害怕啊。我现在得马上回去。”

一挂电话，金女士一下子站起来。

“老师，不好意思。我得回去了。”金女士哽咽地说。

她眼角好像有些湿润，因为四周太黑了他看不清楚。他慌忙起身，金女士踉踉跄跄地走向门口。

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后，他重新坐回座位上。他感觉只要挪动一步，小便就会喷涌而出。

卫生间的门隐藏在黑暗里难以辨别。

不清楚年轻人在高兴什么，凑在一起窃窃私语时不忘嘻嘻哈哈。据说全首尔都停电了。说是因为“秋老虎”电力不足，采取了紧急措施呢。他们似乎觉得很神奇，餐厅里充满了熙熙攘攘的喧闹。就好像他们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礼物一样兴奋。就像一群戴着彩纸尖顶帽的人从黑暗中跳出来，一起大声尖叫着庆祝。这叫什么来着，像是享受惊喜派对一样。他的小便憋不住了。

卫生间仍然在使用中。他的脸因不安和痛苦而变得扭曲。他害怕会尿到裤子上，感觉膀胱快要爆炸了一般异常痛苦。为了缓解不安和痛苦，他把手伸进口袋。厚厚的信封。那是打消不安的符咒，打倒痛苦的疫苗。他摸到了硬邦邦的纸。这是他在慌乱中接过来的名片。如今他的人生中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打了无辜孩子们的耳光。怎么能做那种事情呢？他想向监考官，还有被他无故抽耳光的孩子们道歉，真心地道歉。

一直紧闭的卫生间门呼啦一下开了。远处小便器灰蒙蒙的轮廓就像救赎的预言家一样矗立着。他跑到小便器前拉下裤子拉链。尿意凶猛，疼痛剧烈，尿液却淅淅沥沥的。但至少是感觉活过来了。



金劲旭

韩国小说家，1971年生于光州，现任韩国艺术综合学校教授。1993年作品《局外人》获作家世界新人奖。曾先后获韩国几大奖项——韩国日报文学奖、现代文学奖、东仁文学奖、金承钰文学奖、李箱文学奖等。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天国之门》《少年不老》《谁杀死了科特·柯本？》《危险的阅读》《99%》

《别人的生活》《神没有孙子》《巴格达咖啡馆里没有咖啡》《去见贝蒂》，长篇小说《卫城》《莫里森酒店》《黄金苹果》《千年王国》《如童话一般》《棒球是什么？》。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Inja Pavlić](#) on Unspla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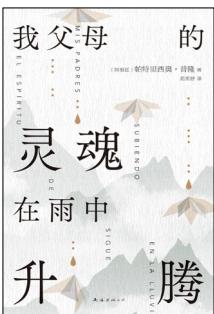
1

有一次——早在所有的这一切发生之前——母亲送给我一幅拼图，她的目光催促着我一定要把它拼出来。我拼完了，肯定没花很长时间，因为这毕竟是个儿童拼图，没有多少块零片，可能总共还不到五十块。拼完之后我骄傲极了，兴致勃勃地拿着拼图给父亲看，可父亲却摇摇头，说这太简单了，让我把拼图给他。我给了他，他开始把零片割成更小的、更没有逻辑的碎片，直到把原先的每一片都切小了，父亲才停下来对我说，现在再去拼吧，可我再也没能完成这幅拼图。再早几年，父亲还未曾毁坏过拼图的时候，他也亲手给我做过一幅拼图，拼图由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和圆形的木板组成，之后他还给它上了色，以便分辨不同形状——具体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依稀记得圆形是黄色的，正方形要么是红色，要么是蓝色的。然而，最重要的是，当我合上父亲的文件袋以后才发现，父亲其实还给我留下了另一幅拼图。只是这一次，每一块碎片都在不停地闪转腾挪，而图像的全貌则放大到了人类的记忆迷宫，甚至整个世界。我再一次问自己，父亲究竟为什么要参与到搜救工作中，去寻找那个被谋杀的男人；他究竟为什么非但没有丢弃搜救工作的一切过程和结果，反而将记录收集整理并保存至今；以及为什么在他最后一次为了失踪的布尔迪索发声时，挂念的还是布尔迪索早已失踪的妹妹。我有一种感觉，父亲其实并没有真正参与到对被谋杀的布尔迪索的搜寻工作当中，这件事对他意义甚微，或者根本毫无意义。他真正付诸实践的其实不是寻找阿尔贝托·布尔迪索，而是寻找他的妹妹艾莉西亚，而且深陷其中。在整个寻找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无比凄惨的事情，不光是我在努力想要忘却，可能就连父亲本人还有母亲都想摆脱。这些惨案迫使父亲在一九七七年的六月停止了对艾莉西亚的寻找。那时的父母和我——弟弟妹妹尚未出生——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这恐惧强烈到外界的声音和动作都要延迟很久才能到达我们的耳边与眼前，就好像我们都生活在水下一般。我觉得，父亲一定是想要通过艾莉西亚的哥哥阿尔贝托来找到自己的这位好友，但是我又不禁疑惑，父亲为什么不早一点开始寻找呢？为什么不在哥哥阿尔贝托被谋杀之前就开始这项工作呢？阿尔贝托尚在人世时，想要找他聊聊或了解些什么一定更容易。我想，哥哥阿尔贝托失踪后，父亲和死去的艾莉西亚之间仅存的寥寥联结中的最后一条也就断掉了，正因如此，再去寻找阿尔贝托已经毫无意义，因为逝者无法发声，死去的阿尔贝托永远不会从散布在阿根廷茫茫原野上的枯井井底重返人间。我不禁自问，父亲是否知道他的寻找终将徒劳无功；是否真的只是被一种对称吸引———对亲兄妹相继失踪，中间有三十一年的时间遥遥相隔；父亲是否做好了准备，一次又一次地迎着那炫目的光芒奔跑，直至被晃得双眼迷乱，跌倒在地，一如在夏夜炽热的空气里，昏暗的天地中，某只不断扑火的飞蛾。

3

重症监护室的走廊尽头摆着一台咖啡机，妹妹沉默地站在一旁，直到我说完父亲文件袋的事情后，她才开口告诉我，父亲参加了寻找布尔迪索的工作，但都是独立做的，没有与其他任何方面共同行动。他去的都是警察觉得没有吸引力的地方，比如小溪边、水沟旁、河上已经损坏的桥梁下，以及乡间小路交叉路口的一些废弃的房屋。也许他那时已经患病，也或许正是因为寻找布尔迪索而积劳成疾。在进行搜寻的那几个星期里，父亲只谈论这件事，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说。我问妹妹，父亲为什么会全身心投入寻找一个他都不怎么认识的人的行动，妹妹却做了个手势打断我的话，说道：“父亲认识这个人。他们有段时间是同学。”我问她：“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妹妹耸了耸肩：“我也不知道。但是父亲有一次告诉我，他很后悔没在布尔迪索还活着的时候问他妹妹的事情。之前，父亲时常能在街上碰见他，总是想过去问他妹妹的事是否有什么了解，但总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最后就这样搁下了。”“凡妮是谁？”我问。她想了一会儿说：“凡妮是布尔迪索的一个远房亲戚。父亲想说服凡妮去做布尔迪索案审判中的平民原告，推动审判的进行。”“父亲到底为什么想要去寻找布尔迪索失踪的妹妹？”但妹妹拿起了纸杯送到嘴边，喝了一小口，然后把杯子扔进纸篓中。“咖啡是凉的。”妹妹喃喃地说，又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投进咖啡机里：“你在博物馆见到他了吧。”她自顾自地跟我说道，仿佛在继续之前的一个话题一样。“见到谁？”我问。妹妹说出父亲的名字。“市博物馆里办了一个展览，有人采访了他。你应该去看看。”妹妹又说，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走进博物馆，买了票，寻找专门展示本市报业的那个展厅。三叶草市博物馆收藏的展品都是些不太重要的混杂物，作为一个商贸城市，其历史实在乏善可陈，只有港口运输粮食的价格波动这方面还算有几分悠久，这也是这座城市被建在河边，而非再往南两公



里，也不再往北两公里，更不在其他地方的唯一原因。走过一个个展厅时我不禁想，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一定有某个时候自然而然地想过自己会留下来，会永远生活在这里，会用一种永恒的方式和她联系在一起。维系我和三叶草市的是一种共生的力量，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个中缘由，但它确实影响了住在这里的许多人——人们强烈地痛恨这里，但是又永远不会离开，这座城市永远不会放出生在她这里的子民。人们可能会短暂地离开，但终究都会回来，或者一生都不会离开。人们在炎炎夏日把自己晒得黝黑，在冬天刺骨的寒风中咳嗽，一起买东西，养育子女，然后他们的孩子也永远不会离开这座城市。

4

报业展厅里摆放着一台电视，里面的视频循环播放着，对面还放着一把椅子。我颤抖着坐在椅子上，听着电视里播放的信息和数字，看着展现的一份份报纸封面，一直等到父亲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电视里的父亲和我记忆中最后那几年见到他的样子一样。他留着长长的白胡子，时常常用一种迷人的姿态梳理他的胡子，谈论那些当年工作过的报社，那些倒闭了可后来又在别的地方换个名字、改个格式东山再起的报纸，整个过程他都亲眼见证。雷打不动的是，这些报纸很快还是会因审查再次铩羽，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就再换个面貌卷土重来，再从头开始如果这个倒闭一重来一再倒闭一再重来的循环能够存在的话，无止境的恶性循环还会引发一连串的过度剥削和失业问题，将做出一番事业的雄心和一切希望消耗殆尽。电视里，父亲讲述着他的故事，讲述着这座他决定留下的城市里的报业故事。我坐在屏幕外，看着展厅电视机里的父亲，心中涌起一丝骄傲的感觉，同时也感到深深的绝望。因为我想起了父亲所做的一切，想到自己永远不能像他一样，永远不能达到他的高度。想到这些经常让我感到绝望。父亲取得的成绩在他培养的那么多记者界的后起之秀间口口相传，报纸长篇大论地讲述他的故事，他的弟子也成为了我的授业恩师。而且，父亲还带我走进了一段政治往事，我曾经了解事实，之后又竭力将之遗忘一空。

5

那个下午，我把那部包含对我父亲采访的纪录片看了三四遍。我听得太认真了，里面出现的日期和名字开始变得十分熟悉，熟悉到甚至让我觉得有点可怕。我要哭了，我想，但一有了这种念头，我便哭不出来了。到了某个时候，一名工作人员走了进来，说展厅五分钟后即将关闭，然后他走到电视机前，在里面的父亲还正说着话的时候，把电视机关上了。父亲口中的那个句子被打断，我试图把句子补全，却办不到：本来应该出现父亲面庞的地方，现在显现出来的是我的脸。漆黑一片的屏幕上倒映出我的脸庞，痛苦与悲伤来势汹汹，程度之猛烈前所未有，将我的五官都揪在了一起。

7

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他想写本小说，说起这件事的那个晚上，父亲就在那个曾经属于我的、采光似乎永远都不够好的房间里，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我不禁自问，父亲是不是真的没有写过小说。在他留下来的文件当中，有一张纸上写了许多名字，排成两列，用与之相关不同的颜色标注出来，最多的是红色。还有一张地区报纸，名叫《每周画报》，据我所知——因为之前我听父亲说过，哪怕我的记忆几乎消失殆尽，关于这份报纸的事，尤其是他谈及它时的那种骄傲，依然在我近乎一片废墟的记忆中存活下来——《每周画报》是父亲少年时代曾经参与创建的一份报纸，也是他初入记者行业的首次尝试，比他离开三叶草市，到阿根廷中部一个城市去读新闻专业的时间要早得多。文件里还有一些照片，可能就是他为了那部一直想写却未真正动笔的小说收集的材料。

8

父亲想写的那部小说会是什么样的？我猜，一定短小精悍，由一个个片段组成，其中留下许多漏洞，因为那些地方他可能已经记不起来，或者根本不想想起，但一定充满对称，前后呼应——父亲写的故事一定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就好像墨点在一张风琴折法的纸上晕开，一个极小的主题会像交响乐或者疯子的呓语那样反复出现，比孤儿院中的父亲节更加令人伤感。

9

有一件事情再清楚不过了：父亲想写的那部作品不会是讽喻小说，也不会是家庭故事、冒险经历或浪漫爱情。他不会写讽喻小品、叙事小说、教育故事，更不会写侦探小说、寓言故事、志怪小说或历史传奇，绝不会是喜剧、史诗或传奇，不会是哥特风或工业风的小说，当然，也不会是自然主义的或后现代派的，不可能是报纸连载，更不可能是十九世纪风格的现实主义小说。当然，以他的风格，也不会是寓言式的、科幻的、悬疑的或社会的，不会是游侠骑士或者才子佳人的故事，可能也不会是神秘或者惊悚类的小说，虽然他的小说读到最后，必然会引起恐惧和痛苦。

10

在剩下的文件里，我找到了阿根廷报纸《第十二页》刊登于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的一则报道，内容如下：

艾莉西亚·拉凯尔·布尔迪索，记者，就读于文学系，享年二十五岁。于 1977 年 6 月 21 日被图库曼市安全部门逮捕，之后失踪。

如今，距离你被捕（离开工作岗位时）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我们依然无法得知事件始末。我们无法忘记在你的失踪背后隐藏着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对于这起让人不齿的犯罪，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的解释。

心怀赤诚的热爱和万般的深情，我们怀念你。

阿尔贝托、米尔塔、凡妮、大卫

报道内容的右侧刊登了一张年轻女子的肖像。照片中的女孩有着一张椭圆脸蛋，周围衬着乌黑茂密的头发。她的面庞上，两弯细眉十分抢眼，一双大眼睛轮廓分明，目光没有望向看着照片的我们，而是投向了更远的远方。在那位不知是谁的拍摄者捕捉这个女人的这一瞬间时，好像有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正位于她的右上方，吸引了这个姑娘的注意力，她薄唇紧抿，表情严肃而疑惑。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相信这个照片里的女子就是艾莉西亚·拉凯尔·布尔迪索，更进一步说，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这就是艾莉西亚。但她的目光和她脸上坚毅而严肃的表情让人不由得怀疑她是否真的只有二十五岁，它们让她看起来像是一个历尽沧桑的女人，决定奔赴远方，一刻也不想停留，甚至不愿意抽出时间停下来摆个姿势拍张照片。艾莉西亚坚定地注视着远方高处的一点，仿佛在被照相机捕捉到的这一瞬里，她连自己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都无法说出口一样。

11

接下来还有几张照片。第一张里，十几个年轻人围坐在桌旁，桌上放着两瓶红酒，一瓶尚未开封，还摆了几个杯子。照片里的这些年轻人中，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向了拍摄者。我在照片中找到了那时还非常年轻的父亲，只有他左边的那个年轻人和他背后站着的两个女孩看向了镜头。照片上一系列的元素，尤其是窗户上的铁栅栏，让我认出来他们这次聚会的地点是我爷爷奶奶家的客厅。这些年轻人中，有两个人带着吉他，其中一个是父亲，他左手按在吉他柄的上部，看起来好像是弹了个 E 和弦。另一个拿吉他的是个年轻的女孩，好像弹了个 C 小调——也有可能是升 G 小调，照片里的吉他没有拍到弦枕，实在让人难以判断——正望向照片的右边。父亲和另一个年轻男孩穿着格子衬衣，还有人穿着条纹衬衣。有两个女孩穿着六十年代常见的印花连衣裙，两个女孩留着直发，还有一个梳着法国著名女演员让娜·莫罗式的短发。父亲那时候留着长发，浓密的胡子挡得下巴都看不到了，实在应该剃一剃了。这群年轻人的后面立着一块黑板，上面有一行手写字，写着“《每周画报》，有毒的一年”。照片的右半部分有一个年轻的女孩满面微笑，看向前方，像是在唱歌。这个女孩就是艾莉西亚·拉凯尔·布尔迪索。

12

还有一张照片，拍的也是这十几个年轻人，另外还加了一个——大概是上张照片的拍摄者。这张照片是在我爷爷奶奶家院子里拍的。有个人在吸烟。父亲微笑着。艾莉西亚斜靠在另一个女孩的肩膀上，几乎把她全部遮挡住了。

第三张照片上，年轻人们在恶搞。父亲头上戴着个头盔一样的东西，手里拿着一只玩具娃娃。艾莉西亚站在他的右边，戴着一顶草帽，头发上别着一朵花，正抽着烟。在我看到的所有照片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艾莉西亚大笑。照片的日期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如果能有一份这张照片的电子版，我就可以像父亲那样把照片放大，放大到女人的脸被解构成一个又一个灰色的色块，直到色块背后的那个女人从照片中完全消失。

父亲还为照片上的每一个人写了人物小传，用箭头连到文件袋的第一页：在那一页上，有人名，有日期，还有政党和业已不存在的团体，他们的记忆传递给我，如同在降灵会上听到亡灵们缥缈的声音抵达脑海。名单里有十几个人名，其中六个与政治组织相关。除此之外，文件夹里还收集了一些父亲主编的报刊头版的照片，黄色的记号笔把名单中出现的人名特别标记了出来。其中有一个就是艾莉西亚·拉凯尔·布尔迪索。在父亲列出的名单中，艾莉西亚的信息很简单，只有出生日期，在去世日期处标着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问号并不代表一个问题，而代表一个答案。一个问号让一切真相昭然若揭。

接下来我在文件袋里找到了一份打印材料，应该是从网上摘录的文章及配图，照片就是我曾经在《第十二页》上看到的悼念短文里带的那一张。文章内容如下：

艾莉西亚·拉凯尔·布尔迪索·罗洛蒂于1977年6月21日被捕并失踪。艾莉西亚出生于1952年3月8日，享年二十五岁。她是新闻文学系的学生，曾为阿根廷妇女联合会暨阿根廷共产党妇女分部创办杂志《我们在这里》创作诗歌，为阿根廷共产党机关及历史报《我们的话语》撰写评论文章。艾莉西亚在图库曼圣米格尔的工作岗位上被捕，有人曾在图库曼警察局看守所的秘密关押中心见到过她。

还是在同一张纸上，有一份以致艾莉西亚的一封信的形式写的证词，署名为雷内·努涅兹。信中写道：

我的灵魂姐妹艾莉西亚，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寒冷的地方，在令人生畏的寂静中，我眼前的遮掩落地，我看不见你，那么瘦小可怜的你，在我眼中像是个十二岁的小女孩。你面带微笑，向我们问好，我从你的身上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力量，让我充满希望。尤其是在你鼓励我的时候，你对我说（用了符号和暗语）“从这里我们将走向PEN（国家行政权力）”“我们会自我拯救”。从那时起，我明白，一切都结束了，我要被带去刑场了，但我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杀我，只是把我扔在一个满是垃圾的荒原上。因此，我心中充满希冀，从来没有想象过会再也见不到你。艾莉西亚，我的姐妹！我的朋友！我的同志！除了怀念你，除了一天天加深对你，还有对那些我们不再为之斗争的同志们的敬意外，我不知道还能为你做些什么。

接着，在最后，还附有一首小诗：

来吧，抛却这后半夜 / 抛却你的空洞和孤独； / 在那里，自私隐于缄默 / 无可饶恕地将你噬空。 / 那时你将看到，你只是莫名糊涂 / 就像灵魂蒙上了阴影； /
我们能够携手，一同走向清晨 / 走向夜尽天明。

我猜，这首诗可能就是艾莉西亚·布尔迪索所作。

我把那叠照片扔到父亲的办公桌上，在那一刻终于明白，父亲对阿尔贝托·布尔迪索失

踪案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完全是出于对他妹妹艾莉西亚的遭遇的关注。而这种热情到底从何而来，也许连父亲自己都无法言说清楚，但是为了弄明白，父亲收集了能够找到的所有材料。材料中表明的事实是，将艾莉西亚带上政治这条不归路的领路人正是父亲，但他却从未想到艾莉西亚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苟活下来的父亲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无时无刻不在经受恐惧和悔恨的折磨。多年以后，这一切的一切的影响又传递到了我的身上，而在努力忘记刚刚看到的那些照片的时候，我突然生平第一次明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批年轻人的子女们都和我一样，会像侦探似的去拨开笼罩在我们父母过往之殇上的迷雾。我们去调查的那些过往，听起来就好像那种我们这辈子都不愿意买的侦探小说。但我也明白，我们无法用侦探小说的形式讲述父母的那些故事，或者说，如果我们真的把那些故事讲成侦探小说，就将是是对他们过往意愿与斗争的背叛。因为把他们的经历讲成侦探小说只会更加肯定一种分类系统、一种惯例常规的存在，而这无异于对他们曾经付出过的所有努力的一种背叛。因为他们曾经想要做的，正是将这些惯例常规、社会传统以及它们在文学中的苍白化身推下神坛。

除了以上原因，还有就是，这样的书我也已经看得够多了，未来还会再看更多。我觉得，如果从文学种类的角度来讲，讲述父母当年的那些经历应该算是一种伪文学。因为，从一方面来讲，个人犯罪比社会犯罪的重要程度低很多，但是社会犯罪却不能写进虚构的侦探小说中，而只能精心粉饰，或者在外面披上一层个人故事的外衣，写成普通的叙事小说，以避免透露全貌，这就好像一幅残缺的拼图，令读者不得不再去寻找与之相关的其他碎片，不停地寻找，直到把完整的图形拼出来。从另一方面来讲，大部分侦探小说都会迁就读者，不管作者在书中展示的情节对于读者来说多么难以接受，草蛇灰线，伏埋千里，小说中所有的伏笔最终都将水落石出，令读者深信大案已破，作案的坏人得到惩罚，所有的疑团都被解开。读完后合上书，一切都已经结束，读者就可以心满意足地回到真实的世界当中，并且深信书外的那个世界也和书中的一样，遵循着相同的公平和正义，一切都毋庸置疑。



帕特里西奥·普隆

1975年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著有长篇小说《春天的开始》《我们行走在梦中》《别为住在这条街上的人哭泣》《明天我们会有另外的名字》、短篇小说集《回家时带上一切》《室内植物的内心活动》等。作品屡获拉丁美洲及西班牙各大文学奖项。2010年，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将其评选为22位杰出西班牙语新生代作家之一。2011年出版《我父母的灵魂在雨中升腾》。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Gustavo Ardon](#) on Unsplash

小说

距离月亮三公里

伊与原新 | 新书推荐

这里是地球上离那个孩子最近的地方。
您相信吗？

人生失意的男人、渴望爱却又不敢爱的女人、笼罩在天才哥哥阴影下的次子、家中陡生变故的小学生、为家人而活乃至忘却了自我的家庭主妇……一群走投无路的普通人在意想不到的时机，窥探到了不可思议的科学真相：月亮从不示人的阴暗面、美得客观纯粹的雪花结晶、承载历史痕迹的菊石、镌刻无言亲情的海底沉积物、神秘而熟悉的外星生物、沉默却又躁动的火山……

人类为探求自然真相而创造的科学，反过来引导人类拨开日常的迷雾，发现了生活的真相。被烦恼、孤独和焦躁倾轧的心，在科学的星光闪耀下，发现了原本就在脚下的路。

《距离月亮三公里》是东京大学地球行星科学专业出身，新田次郎文学奖等得主伊与原新，倾情打造的“治愈系科普小说”。经湖南文艺出版社授权，我们节选了与标题同名的这篇故事分享给读者。



父亲的健忘愈发严重起来。直到前年七月份才确认他患的是老年痴呆症。那天下班回家，惊觉父亲的房间热得要命，发现空调居然开着暖风。拿起遥控器正准备调成冷风时，

父亲大发雷霆。无论怎么跟他解释，他都固执地认为“现在才三月”。

自那以后，父亲的认知痴呆症状开始急剧恶化。一些本来会做的事情开始不会做了，连正常的对话都难以进行。他开始翻垃圾桶，吃一些腐坏的饭菜。早上七点半，还会穿上工作服准备到市政府去上班。把父亲一个人丢在家太久，实在是不放心，交通协理员的工作只好放弃，超市的工作时间也尽量地缩减。

没有别人可以依靠。住在四日市的姑姑——与父亲年龄差距较大的妹妹，还要看护自己的公公，根本无法脱身。而根据市内有关机构提供的信息来看，那些价格比较低廉的养老院等公共设施全部爆满，排队等待入住的人还有一大把。

渐渐地，父亲连如厕都需要协助。糊里糊涂地出门迷了路，最后被邻居带回来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很快，就发展到人不能离开半步。这样一来，连超市的工作都要辞掉了。最后告别时，只有店长那句“你工作非常努力，本来已经考虑录为正式员工”，算是给了自己某种安慰。

父亲不再到处去寻找母亲，也开始认不出儿子了。帮父亲清理大小便，擦洗身体的时候，父亲经常会问：“你是福利部的人吗？”似乎，他把自己的儿子当成了市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

父亲一整天都需要人照顾。夜里也会时不时地闹起来，谁都睡不了整觉。面对越来越任性乖戾的父亲，自己的动作也不自觉地开始变得粗暴起来。一来二去，父亲闹得更凶。每天像是搏斗一般的日子持续了将近两年。身心的疲劳已经接近顶点。

就在那天。那天是母亲的忌日，佛龛前供上了斋饭。父亲抓起供品就要往嘴里塞。若是放在往常，大概就由他去了，但是那天，父亲从早上开始就不停跟自己作对，让人心情十分烦躁，忍不住攥住他的手腕去制止，没想到却被父亲反手抓住。用尽全力挣脱开之后，一拳捣在了父亲的脸上。摔倒在地的父亲又失禁了。一股骚臭味儿飘荡在空气中。看着尿液渗进榻榻米的缝隙里，眼泪再也止不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失声痛哭起来。

很明显，已经到了极限。想从这个世界消失掉，想丢下父亲一走了之。却没有勇气去付诸实施。所幸母亲过世后，父亲把名下剩余的地产全部过户到了儿子名下，说是以防万一。找到买下水田的那家不动产公司商谈，请对方买下了剩余的土地连同房产。金额比市价低了很多，但是已经无所谓了，只要可以立即套现就好。用这笔钱加上父亲的储蓄，付了高额的入住押金，将父亲送进了岐阜市内的一家民营养老院。那是上个月，也就是九月初的事情。

心里也明白，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决断。也许别人会说，一定还有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但是，已经无法考虑将来的事情。一心只想从所有的现实当中逃离出去。

真是不可思议。失去了母亲，摆脱了父亲，抛弃了家园之后，似乎连自己的存在都变成了半透明状态。没有任何目标，却朝着名古屋的方向进发。想以这种稀薄的存在形式溶于都市的混浊之中。行李只有一件，原本放在家中壁柜里的一个旧旅行袋。将二十几万日元的现金也塞了进去。那是自己的全部家当。在荣町的“yashiro 商务酒店”订了房，游荡于繁华的街市中。

大概两周之前，站在一家房屋中介公司的门口，漫不经心地扫视着张贴在外面的租赁信息。一位女店员热情邀请入店，准备进行一番详细推介。神情恍惚地跟着她进了店内。照例要填写申请表格。写下姓名之后，到了年龄那一栏突然愣住了。这才意识到，就在一个月前，自己已经过了四十九岁的生日。一个已知天命之年的男人，借住在连浴室都没有的廉租房里，从事着日薪微薄的工作，努力返还着两千多万的债务。这样的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默默地放下圆珠笔，离开了房屋中介所。

已经不想去找工作了。经过游戏厅门前的时候，感觉到的只有嘈杂。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

回到又窄又脏的房间，开始想到死。开始考虑在世上还有什么未竟的心愿。

“您看！”

司机的声音将人拉回到现实。

“天龙川。就在路左侧。”

扭头看去，只见树丛的那边是一片漆黑的平面。孤零零地点亮在对岸的灯光在平面上拖出一条光带，微微地摇颤着，表明那里是水域。

“下游不远处有船明水库。”司机伸出大拇指朝后方指了指，“这一带比较容易积水，所以水位高，河面也比较宽。”

确实。水位大概只在道路的两米之下，到对岸足有一百米以上的距离。与其说是河，感觉上倒更像是一处细长的湖泊，车子仿佛正沿着湖畔行驶。

“沿着这条河走，很快就到了！”

是的，很快就要到了。

真的再没任何未竟的心愿了吗？

养老院的月租金会从父亲的退休金里面扣。父亲可以在那里一直住到死。大概吧。

母亲的牌位和遗像，放在了父亲在养老院的房间里。对了，应该给院方留一个四日市姑姑的联络方式才好。

要不要给祐未写点什么……唔，何必多此一举呢。没理由打扰别人的幸福。

也许是因为想起了祐未的缘故，突然想到，如果有孩子的话会怎样。能不能生活在一起暂且抛开不论，自己会丢下孩子去死吗？也许，哪怕吃泥啃土，也要尽力重建自己的人生吧……

算了。想这些也没用。不曾为人父，从未体验过舐犊之情，这种想象毫无意义。

河流沿岸林木成排的绿地消失了。隔在左侧的河面与柏油路面之间的，只有低矮的防护栏。渐渐陷入一种错觉，仿佛出租车正在黑色的水面上滑行。道路的右侧是山，树影绰绰，仿佛要斜插过来。

前方可以看见隧道的入口。那里似乎稍微与河道拉开了些距离。司机在隧道前打开了左转灯。左侧似乎还有条岔路。

出租车变更车道靠向左侧，进入了岔路。这条细窄的小路，跟刚才一样，依然沿着河边铺展开来。

道路悠徐地向右方面画出弧度。转弯过去，前方可以看到一座红色的铁桥。正在这时——“快瞧！您瞧那个！”

司机抬高了嗓音，将食指指向车顶。

“看到了吗？”

“没有……”他指的是月亮吗？

“再开慢一点就好了。等下停车。咱们过去看。”

车子开到铁桥桥头，路肩上有一处比较宽敞的空地。司机将车子停了下来。一起下了车，朝着来路折返回去。没有路灯，司机用手电筒照亮脚下。看得出是有备而来，也许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闻得到河水的气味。或许由于前面的水库拦腰截住了川流，听不到水声。走着走着，眼睛逐渐适应过来。周围并不是完全的黑暗，还有月光。

抬起头来，只见正前方浮起一轮满月。

大概是颜色的缘故，使它看上去像是一轮清冷的、放射出硬质哑光的混沌冰球。比之黄色，倒更接近于青白。不过，月亮原本应该是什么颜色呢？

“今天的月亮真的很不错啊。差不多刚好位于中天。”司机仰头望着天空，“昨晚一定下了一夜的雨，所以空气的透明度才会这么高。”

也许吧，但还是不懂。为什么要说这里是距离月球最近的地点呢？

又走了五十米左右，司机站住了。他回过头来，将手电筒对着上方照过去。

“快看，就是这个。”

安装在立柱上的一块蓝色的金属板，是道路标志牌。用手电筒的光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上面的文字：

“月 Tsuki 3km”

——距离月亮三公里……

确实是这样写的。瞬间迷惑了，不知自己是不是遇到了狐仙。

“看，我没骗你吧？”司机抬头看着标志牌，得意地说道，“只有三公里哦！毫无疑问，这里是地球上距离月球最近的地点。”

难道，这位司机是狐狸？认真地看了看对方的侧脸。司机也转过脸来看着这边，眼角的皱纹更深了。

“其实啊，刚才那座铁桥的前面，有一个名叫‘月’的小村子。滨松市天龙区月村。”

“哦……”原来是这样。

“很少见的地名对不对？我生在滨松，之前却一直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

司机走近河边，在防护栏上轻轻地坐下来，抬头看着月亮。

“自从我知道了这个路牌之后，满月的晚上肯定会来这里。”

“肯定……为了赏月？”

“不是，不只是为了赏月。”

朝司机那里走近了一些。倒映在河面上的月亮摇摇晃晃。隔开1.5米左右的距离，将臀部搭在了防护栏上。跟司机一样，抬头看着月亮。

如果说有三十八万公里的话，看上去确实像。但如果说它就在三公里之外，感觉也没错。

今晚的月亮，看上去很近。

抽出一根香烟，点燃。果然还是没什么滋味。

“请问，您有孩子吗？”司机问道。

“……没有。”

“哦。那，我也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我的心情……”

司机突然有些难为情地搔了搔鼻子。

“我觉得，养育孩子，就有点像月亮。父母是地球，孩子是月球。”

“……啊”

“您知道吗？实际上，月球有可能诞生自地球哦！一个火星大小的小天体撞击到原始地球，飞散的碎片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月球。虽然这还只是一个假说——大碰撞说。”

没听说过。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月球是怎样诞生的。

“刚才我也说过，当年，婴儿月球就在地球的旁边。小的时候，月球天真无邪，轱辘辘地围着地球旋转，所有的面都会亮出来给地球看。高兴的、悲伤的、赌气的、快乐的、寂寞的，所有的面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月球渐渐地离地球越来越远，也不大转动了，慢慢地就开始出现了不给地球看的那幅面容。不是说背面的一定不好。只是孩子不想给父母看到的那一面吧，就像月球的背面。”

自己又是如何呢？大概从十岁开始，自己的想法和感情就不会告诉父亲了。父亲也没有想了解儿子的想法的意愿。一方只是简单粗暴地提出要求，另一方也不问青红皂白一味拒绝。如此反反复复。

“虽然知道那是成长的标志，但是，还是会让人觉得很伤感啊！”

“……伤感，会吗？”自己的父亲似乎原本就不具备那种情感。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辆汽车驶过这条岔路。视线飘向右侧，主干道上偶尔会有车头灯朝这边逼近，但是随后就全部消失在了隧道方向。

“我啊，”司机说道，“在开出租车之前，住在东京。是高中的地理教师。”

“啊……”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

“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研究宇宙啊，天体啊之类的。大学也朝着这个方向选，一直读到了研究生。然后在搞研究还是当老师之间犹豫，最终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跟学生们一起做些什么，一直是我憧憬的事情。于是，我就到一所初高中一贯制的男校去任职当老师。那是所重点学校。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升入东大。”

不懂司机为什么突然开始讲起自己的故事。只是有种感觉，对方好像从一开始就想说这件事。

“争取过学生的意见之后，我在校内成立了一个天文兴趣小组。现在回想，那也只是一种自我满足吧。”司机自顾自地笑了起来，“不过，大家都特别热情。您知道吗？在月球表面的某个区域，根据撞击坑的数量，计算出密度，就可以推算出那里的岩石的生成年代。这叫作撞击坑年代学。我跟学生们一起进行有关方面的研究，还在学会发表过研究成果，获得过表彰呢。那时可真是快乐啊，真的。”

司机充满怀念地眯起了眼睛，继续着他的诉说：“后来，我成了家，有了孩子。唯一的一个孩子。记得是在儿子九岁生日的时候吧，我给他买了一台天体望远镜。虽然只是一台便宜的折射望远镜，但是孩子特别高兴。我们爷俩每天晚上都用它观察月球。那孩子，真的很喜欢月球啊。哦，您有没有用望远镜看过月亮？”

“……没有。”

“最好能看上一次哦。很震撼的。就算是那种便宜的望远镜，用来看月球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真的，一些细节都能看到呢！别说是三公里，甚至感觉伸手就能摸到，就那么近。所以，那孩子就专门看月球。”

抬起头，看着月亮，开始想象。不是想象望远镜中的月球，而是想象自己和父亲一起看月球的情景。当然，这种经历一次都没有过。就算是想象，也很难有令人愉快的画面。

“学校的天文兴趣小组，还举办了夏令营活动。每年都会去长野的乘鞍观测天体。我也带儿子去过两次。他特别开心。升初中之前，他提出想报考我执教的那所中学。我们当父母的当然不会反对了。从五年级开始，我就送他去培训班补习，那孩子也非常努力地学习，但是，最后却没考上。”

手指夹着的香烟不知何时已经燃到了过滤嘴的位置，便直接将它扔在脚下。

“最后，上了当地的公立中学，说是考高中的时候再挑战一下。我任职的那所学校，也接受高中的报考，只是名额非常少。虽然我觉得难度很大，但是孩子自己有这个愿望，我们

除了鼓励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到了二年级分了班，他开始不爱上学了。早上起床，要不就说头疼，要不就是肚子疼。因为我也还是老师嘛，所以一下子就明白了，我想，他是遇到了校园霸凌……”

“啊……”不自觉地发出低吟。

“有一种霸凌是无形的。无视，或者私下里说坏话。我儿子个头小小的，瘦弱，敏感，就是那种喜欢科学的书呆子。太容易成为被欺凌的对象了。但是那孩子咬死了不承认。不知是怕父母担心，还是因为自尊心的缘故。十四岁的男孩子。不想给父母看到的一面正在逐渐形成啊。”

“我觉得与霸凌直接斗争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不必勉强去上学。或者，也可以转学。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儿子。于是，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基本没去学校，一直在家里学习。上了三年级，又重新分班，状况似乎有一些改善。从第二学期开始，他几乎每天都会去上学，我们也放下心来。但是，学习进度落后了不少，再加上缺席太多，评定分数肯定不会好。他本人也明白自己进不了好的高中。但是，他还是坚决表示想考我那所学校。”

目光已经无法从司机的脸上离开。本来没想听这样的故事，但是却想从对方的表情中读出什么来。而司机依然带着他标志性的苦恼微笑，视线落在柏油路面上。

“就在考试的那天早上，我因为也要去学校做相关的考前准备工作，很早就离开了家。临出门前，我还对儿子说放轻松去考。他点头答应说嗯。那个，是我们最后的对话。那孩子，并没有出现在考场。他出了家门，走到附近的一座公寓，上了屋顶，就那么跳下来了。”

下意识地，一直憋着的一口气从嘴里慢慢地释泄而出。说不出话来。

寂静还在继续。隐约觉得，月亮似乎正在从天空俯瞰，观察着这里，看谁会先开口打破这片寂静。

似乎是讨厌这样的沉默，司机站起身来：

“无法逾越的悲伤，在这个世上是有。”

像是在说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一样司机看着河水，将双手撑在防护栏上抬起了下巴。我呢，怎么也想不明白。那孩子为什么一定要死呢？他想了些什么呢？当时我为他做些什么才好呢？究竟怎样才是最正确的做法呢？您，明白吗？”

似乎都是些愚蠢的问题。突然感觉有点烦躁。甚至都没摇头否定。

“在那之后，我就辞职了。我老婆怪罪我，我也埋怨她。其实我懂，对于她来说，除了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发泄她的痛苦。当时，我母亲因为打击太大，病倒在床。我父亲已经去世，我就只身一人回到了滨松。从那之后就没见过我老婆。也没离婚，就这么过了十五年。我老婆回千叶娘家去了。是不是一对很奇怪的夫妻？”

“回到滨松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那段时期，我觉得活着是很难捱的一件事。有一天，母亲睡下之后，我就开着车从家里出来。跟您一样啊。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去死。我漫无目的地沿着天龙川向着上游方向开，就在那时，非常偶然地进了这条岔路。看到这块路标牌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当时就在想，我终于是疯了啊。停下车，走回到这里想看个究竟，我无数次地揉着眼睛一再辨认，就见这块牌子上确确实实写的是：距离月亮三公里。”

司机面向月亮。月亮的白似乎比刚才更清透了一些。

“正好，也是像现在这种完美的满月。我当时想，啊，这轮月亮就是那孩子。是我儿子把我叫到了这里。因为，这里是地球上离那个孩子最近的地方。您相信吗？一个做过理科教师的人，在当时居然会冒出那样的想法。”

司机轻轻地晃了晃肩膀。那姿态就像是在对月亮诉说着什么。

“那时我懂了。我必须活着，到这里来继续探问我的儿子，一直问到死才行。我要问他，你当时都在想些什么？为了什么而痛苦？有什么样的话是不能对我们说的？爸爸那时应该为你做些什么才好呢？”

“他当然不会回答了。那孩子背对着我呢！但是，在距离月球最近的这个地点，我必须想办法看到那孩子无法转向我们的那张脸，看看他的脸上有什么样的表情。就算是个侧面也好，哪怕只有一瞬间也行。因为，我是他的爸爸啊。”

空气又一次静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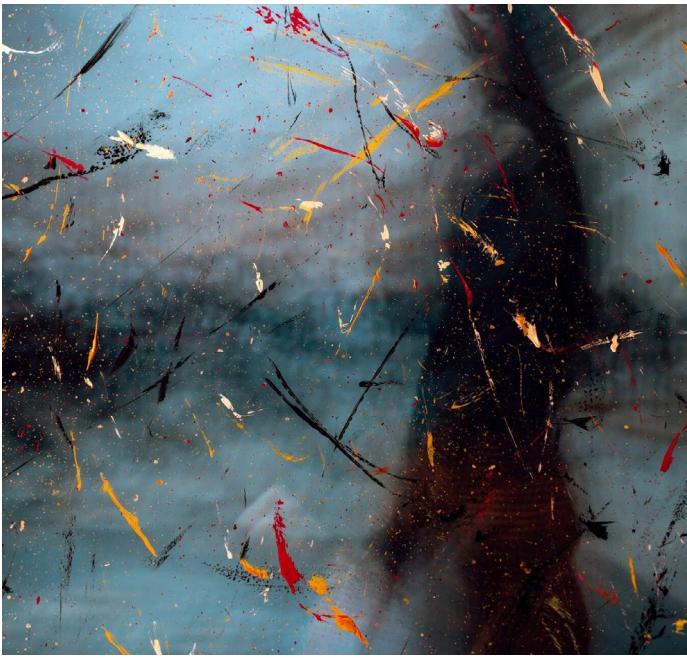


伊与原新

日本知名小说家、推理作家。1972 年生于大阪。自神户大学理学院毕业后，于东京大学专攻地球行星科学，修完博士课程。2009 年、2010 年两度入围江户川乱步奖。2010 年荣获横沟正史推理大奖。2018 年推出《距离月亮三公里》，先后获得第 8 届静冈书店大奖、第 38 届新田次郎文学奖及第 3 届未来屋小说大奖。2021 年入围第 164 回直木三十五奖及第 34 回山本周五郎奖。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 [Jr Korpa](#) on Unsplash

小说

鱼缸与霞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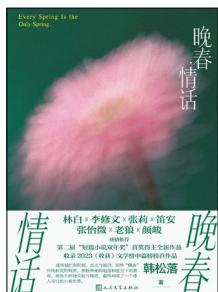
韩松落 | 新书推荐

那个入口，或许就挂在一辆自行车的车把上，
以蓝色野菊花的形象存在

《晚春情话》是作家韩松落继《春山夜行》之后最新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以他独具西北大地特色的笔触，冷峻地观察、细腻的记录着属于自己的时代故事。

六个故事，合奏一段时代曲。《鱼缸与霞光》的故事横跨近三十年，通过讲述偏远小城一个失踪事件，在几代青年心中投下的暗影。《写给雷米杨的情歌》以一九九〇年的广东流行乐坛为背景，讲述两位华语歌手的故事，两段成长史，两段璀璨时光，一段混杂着友情、欲望的往事。《晚春情话》的故事也跨越二十五年，讲述一个孩子被拐的农村家庭，在被拐孩子成年后，通过艰难寻亲重返家庭后发生的故事，一周的相聚后，是更久的离别。

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第一篇故事分享给读者。



大卫·林奇是这样开始一个故事的：碧蓝天空，白色栅栏，红色玫瑰和黄色郁金香，圆鼓鼓地盛开着，翠绿的叶子托着花朵，孩童过马路，女人喝下午茶，老男人浇草坪，年轻人徘徊在草地上，低头翻捡着什么：哦，草丛里有一只爬满蚂蚁的人耳朵。

这里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开始：群山环绕的小城，白杨树和槭树的叶子被夏天的太阳

晒成墨绿，灰色的楼宇，阳台上鸽子咕咕鸣叫，屋檐下，燕子在泥窝边轻盈地弹跳一下，然后飞走，燕子飞走的地方，有一扇窗，阳光照进窗户，投在临窗的木桌子上，桌上有一张信纸，写着一些字，随后，有个男人走进屋子，拿起这张纸，皱着眉头，开始阅读。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甘肃东部的天泽县，省矿业机械厂电工班的李志亮，留下一封信，离家出走。

李志亮生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祖籍辽宁，是矿业机械厂的子弟。父亲李东强，一九四〇年生于辽宁。母亲郝琴，一九四三年生于河北。李东强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矿业机械厂担任工程师。哈工大毕业生为什么会来位于甘肃县城的机械厂工作，他从来未曾解说过。郝琴则在李东强的安排下，到厂里的后勤部门工作。

李志亮生于河北，四岁时随父母到了天泽，在矿业机械厂幼儿园度过两年，六岁时到天泽县东关小学读书，十二岁小学毕业，随后进入天泽县二中初中部就读，初二时转学到教学条件较好的天泽县一中初中部，高中依然在天泽县一中就读，高三时考入中原机械工业学校，一九八九年，回到省矿业机械厂工作。开始在车间，后来在父亲的协调下，转到电工班工作。

矿业机械厂所在的天泽县，位于甘肃东部，距离省城兰州二百公里，面积三千五百平方公里，人口三十八万，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秦始皇时代设县，其后两千多年，面积有扩有缩，但大致位置没有变化。因为地势平坦，位于陇海线，且有河流，有矿产，五十年代之后，陆续有工厂迁移至此。除省矿业机械厂之外，天泽县还有一家冶炼厂、两家修造厂、一家塑料厂，几支驻守在当地的部队。矿业机械厂在当地是大企业，有员工两千。县城的商业，都集中在矿业机械厂、冶炼厂所在的云川北路上。

矿业机械厂的核心部分从辽宁迁来，创始阶段的工人，多数是东北人和河北人，他们的后代也多半在工厂工作，工厂有自己的生活区。矿业机械厂由此成了一块飞地。天泽人说当地话和兰州话，矿机厂的人说普通话、东北话、上海话，当地人听秦腔，矿机厂的人听京戏和越剧、沪剧。天泽县最早穿牛仔裤、最早跳迪斯科的，都是矿机厂工人。李志亮在这里长大，需要在两个世界转换。在厂区和家里说普通话和东北话，在学校和县城说天泽话和兰州话。

李东强的外形，有明显的东北人特质，方头大脸，眉眼端正，但性格温暾，沉默寡言，倒是和本地人比较接近，在非常年代也没有因为言行出挑带来麻烦。但他有个喜好，和本地人不一样，也和他的粗糙外形不一致——他有藏书的习惯，家有藏书接近五百册，而天泽县图书馆的藏书，也不过两万册。但李东强极少邀请人到家里做客，也从不徒手拿书在街上行走，甚至一再告诫家人，不要在任何场所被人看到手里拿着书。因此，他的藏书和读书习惯，从没引起人们注意。

李东强和郝琴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李志明，生于一九六六年，中专毕业后，到矿业机械厂工作二儿子就是李志亮。两个儿子的相貌，比父亲英俊许多，但两个人都有一种蒙尘之感，像是在刚刚制作完成的匕首上，撒了一把土，英俊得毫不明显，需要仔细辨认。两个儿子的性格，也比父亲爽朗，因为基本是在当地长大，有童年朋友，交往范围也更广。

一家人居住在矿业机械厂的家属区，十一号楼三单元 302，他们的住房由矿业机械厂自行修建，在一九九二年竣工，根据面积和楼层，以每套 1.5 万元到 2.5 万元不等的价格，卖给厂内职工。售卖之前，根据工龄、职称、职务等因素进行了排序，李东强分配到的这套，房本面积九十平方米，实际一百四十平方米，售价 2.5 万元。

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丝毫古怪之处，全家人的性格、行为，乃至消费、娱乐，就在天泽县城居民的均线附近摆动。生活中的一切细节，一切用品，也像所有天泽人一样，非常容易辨认出处。军便服、军大衣、军靴、军用皮带，通常购自县城附近部队门市部，每逢部队廉价处理军用品或者周边，小城青年就蜂拥而至；工作服、绒衣、手套、电工绝缘鞋、挎包，是厂里的劳保用品；脸盆、香皂、洗发膏、牙膏、球鞋、皮鞋、文具，购自天泽县百货大楼，每批就那么几款，可以凭借款式分辨出购买时间。偶然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的物品：比如，有些年轻人，会在周末乘火车去兰州（通常都会设法逃票），买花衬衣、卫衣和饰品。还有几次，是白银针织厂等日用品工厂遭遇经营危机，用白汗衫和背心等产品抵工资，员工们拉着产品来到天泽县，在街心花园兜售，价格极为低廉，汗衫五块，背心三块。第二天，天泽县的男性，几乎全部穿上同款汗衫和背心。

在其余地方，天泽县居民的生活，也显得单调和整齐划一。八十年代末，广场舞兴起，因为起初的主力是中老年人，被叫作老年迪斯科。后来，全县三十岁以上的女性，几乎全部加入。九十年代初，气功热，几大气功门派，统治了全城成年人，也有儿童和少年加入。有一位八岁男孩，由家长引领，用一年时间，练到某种气功二级，成为“气功神童”，到处参加报告会并展示神通。一九八八年，《红高粱》获得金熊奖，全城居民出动观影。因为

传说此片儿童不宜,小孩都被留在家里,有个孩子因无人看管,在家触电身亡。一九九二年,《大红灯笼高高挂》上映,全城居民又一次倾巢出动。

天泽县也极少发生凶案,大多数治安案件,都在盗窃、斗殴、诈骗这个层级。仅有的几起凶杀案,都是熟人作案,很快就破案。公安局门口,有四个装了玻璃的看板,两左两右,用以展示公安局侦破的凶案,从现场血迹到尸体远景、近景和伤口局部,全部彩色照片,配以仿宋体手写的案情介绍。看板的更换速度,依据凶案发生频率,或者说,凶案被侦破的频率而定。如果半年没有适合展示的凶案,就半年不换,以至于彩色照片全部褪色。

李志亮的性格,也在均线附近,不算温和,也不至于暴戾,不细腻,也不算粗糙。他的日常穿着,也没有出格的地方,毕竟,父亲李东强最担心的,就是自家人过于引人注目,带来灾祸,每每发现这种苗头,就全力打压。李志亮常穿的衣服,包括一身军便服,两件化纤夹克,几件白衬衣,一身工装蓝的运动款绒衣,冬装是部队的劳保棉袄和军大衣,还有一件托人在空军基地买到的深棕色飞行员皮夹克,带毛领,非常昂贵,但他一直舍不得穿这件衣服。一九九四年,他还曾用一百八十块钱,在兰州市东部批发市场,购买了一件墨绿色的羽绒服,回家之后,在周围的环境衬托下,他发现这件衣服的颜色还是扎眼,第一次穿出去,就被熟人评价为“真骚情”,他再也没让这件衣服上身。

李志亮的爱好很少,可以算作爱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用机械厂的边角料,制作各种摆件。有一阵子,兰州青年流行用炮弹壳、子弹壳制作工艺品,这股风气也蔓延到了天泽县,李志亮不能免俗,找到部队上的熟人,要了些训练用过的弹壳,做了几件东西,但很快就厌倦了。

另一个爱好,是骑自行车游荡。他有一辆凤凰二八,黑色,不是轻便型号,但他很喜欢,他经常骑着这辆车,在城外游荡。城外有大片麦地,他就骑车在麦地中的白土路上穿行。麦收之后,他会把车推进麦田,在麦垛上靠一会儿。曾有人看到他从城外回来时,自行车把上挂着一个用蓝色野菊花和麦秸编织的花环,这是他唯一算得上浪漫的经历。

没有谈过恋爱几次相亲都失败了好在他对相亲也没有多少期望如果他是天泽本地人,二十八岁还不结婚,就显得异常,但人们对矿机厂这块飞地,以及这块飞地上居民的看法,多少有点不一样。当地人甚至觉得,矿机厂的男青年,如果热衷恋爱,会对当地的婚恋市场造成冲击,他们都打光棍可能更好。总之,他生活里并没有出现会带来精神上的重大挫折,或者人生中的重大挫败感的事件。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农历五月廿七,晚上六点十分,郝琴下班到家,换了拖鞋,放下厂工会分给每位员工的一箱杏子,就去厨房准备晚饭。六点四十分,李东强和李志明下班到家。父子俩的工作地点不在一起,他们是在回家路上遇到的,李志明接过父亲手里的杏子,一手一箱杏子,和父亲一起回到家。三个人打算等李志亮到家后一起吃饭,就坐在餐桌前说着话,对话的重点是杏子,李志亮必然也领到了一箱杏子,四个人,四箱杏子,该怎么处理,毕竟杏子不禁放。直到八点,他们也没等到李志亮回家,以为他被朋友叫去吃饭了,就先吃了饭。李志亮当晚没有回家,一家人也并没觉得异样,直到第二天早上上班前,李东强到李志亮屋子里去,才发现他留在桌上的信,只有十几个字,写在一张矿业机械厂的信纸上:

我走了。我要走遍中国,走遍大地,走遍星球。

李东强拉开衣柜,发现李志亮带走了自己常穿的衣服,下楼去派出所报案时,发现李志亮骑走了凤凰二八。报案时,警察认为,李志亮是成年男性,留了信件,不能算失踪,无法立案,何况,他离家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根据他们的经验,很多离家出走的人,通常会在三个时间段内回来:一周,三个月,半年。

李东强全家,分头到李志亮的同事、同学和朋友家打探消息,想看看李志亮有没有留下更明确的信息,却发现他出走前没有任何异样,当天下午还在正常上班。唯一不同的是,他五点就提前下班,因此没有领取发给员工的那箱杏子。被李东强一家询问过的同事和同学,又自发扩散消息,到认识李志亮的人那里打听消息,都没有结果。

很快,警察所说的第一个时间节点过去了,一周了,李志亮没有回家,也没有任何消息。就在这时,天泽县的城南,距离县城中心五公里的垃圾场,发现了一具焦尸。其实,一个拾垃圾的老人,在几天前就看见了那具焦尸,但那具尸体被扔在一个大垃圾坑的沟底,需要踩着垃圾走一段陡峭的下坡,才能到达那里,加上他视力不好,并没有看得很清楚,“不知道那黑黑的是个啥”。直到几天后,他看到有野狗在撕扯那个黑色的物体。这时距离李志亮出走,刚好一周。

尸体经过了很充分的焚烧,衣服和皮肤都被烧毁,看不出身份样貌,唯一能作为线索的,

是一条没被完全烧毁的军用皮带的皮带扣那个皮带扣和李志亮使用的完全一样,但那时,在天泽县或者邻近区域,系同款军用皮带的人实在太多了。认尸之后,李东强认为这不是李志亮的尸体。当然,还有更好的方法——当时,DNA检测技术已经用于刑侦了,只是需要送检测物到北京去,检测费用加上差旅费,非常昂贵。焦尸案最终成为悬案,没有出现在公安局的宣传栏里。

三年后,天泽县文化馆的赵老师,在西安参加培训,在街头看到一个人,酷似李志亮,只是头发略长,衣服略时髦。这个人迎面走过来,似乎也认出了赵老师,眼神顿了一下,走过去之后还回了头。据赵老师说,他立刻掉头追上这个人,跟他打了招呼,这个人不承认自己是李志亮,但当赵老师说“你父亲母亲都在等你回家”的时候,他的表情大变,泪水瞬间滑落,愣了很久,然后转身离去。赵老师认为自己遇到的就是李志亮,回到天泽后,专门找到李东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言之凿凿,情绪丰富,两分钟的相遇讲了一个小时,却没有任何证据,整个场景也酷似民间鬼故事里的情节,加上这位老师经常发表古怪言论,比如别人死去的亲戚给他托梦,以吸引别人注意。所以,他所说经历,并没有人当真,转眼就变成小城传说,流传了一阵,就逐渐湮灭。

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李志亮的消息了。李东强和郝琴,依旧在矿业机械厂工作,退休后,两人回到辽宁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无法忍受漫长的冬季和动辄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最后还是回到了天泽县。李志明也依旧生活在天泽,一九九九年结婚,三年后有了女儿,他和妻子另外购置了住房,多数时候还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李志亮的那间房子,始终保持原状,他留下的那张纸条,被李东强夹在了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里。他说,这种收藏方式最保险。

在李志亮出走前两年,有两只燕子,在李家的阳台上筑了一个窝,整日飞来飞去,啁啾不停,这在楼房小区是很罕见的事。李志亮出走之后,那窝燕子再也没有回来过。郝琴视之为某种昭示。

这件事看起来就这么过去了,但这仅仅是对李家而言,在距离李家不远的六号楼一单元501,这件事引起了另外一些后果,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持久的风暴。

住在501的,是矿业机械厂的另一家人。这家人是标准的三口之家,父亲曹广仁,生于一九五六年,矿业机械厂经营科业务员,这个科在一九九六年分出一部分员工,成立了多种经营科,曹广仁也在其中。母亲王自强,生于一九五五年,矿业机械厂工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是个男孩,生于一九八〇年,名叫曹景,在李志亮出走那一年,刚好十六岁,正在读高一。

曹景一家,和李志亮一家生活在同一个厂区,两家家长很少交集,也没什么来往。不过,在曹景十一岁时,他表姐的追求者,李志亮的同事,为了让曹景表姐高兴,以及显示自己是爱孩子的,时常带曹景出去玩,也带他去了李志亮家里,看李志亮用边角料做东西。那天,李志亮穿着工装蓝的绒衣,一条看起来很厚实的卡其色裤子,脚上穿着一双白色回力鞋,用了三个小时,做了一艘二十厘米长的铁船,并且用木板喷了蓝色油漆,做成海面的样子,粘了几块黑色的石头充当礁石,一块稍大的形状不规则的炭渣,被他做成了一个小岛,填了一些青苔,还种了几棵草。一片海和一座岛,就带着油漆味诞生了。

后来,曹景还看见过李志亮打篮球,看见过李志亮骑车去往城外,也在商业街上碰到过他。李志亮唯一一次穿墨绿色羽绒服出门,就被曹景看到了。因为见过一次面,曹景很能从人群中认出李志亮来,他总是隔着老远就站定,等李志亮走到跟前,认真地打个招呼。但他再也没有被带去李志亮家里看他做东西。记忆里,只有那么一次,只有那么一个下午,安静的、若有所待的一个下午。他觉得有点奇怪:李志亮后来为什么再也没有穿过那件羽绒服。

李志亮出走三天后,曹景从父母那里知道了消息。当时,他们一家三口正在吃饭,曹广仁说起了这件事,曹景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一阵虚热,喉咙里似乎有液体涌上来,却没吐出什么,只是干呕了几声。在父亲扶他去卫生间的时候,他听到母亲抱怨说:“给你说了别在饭桌上说这些东西,容易把孩子惊到。”

之后几天,他始终情绪低落,神思恍惚,无法入睡,这些他都没有告诉父母,父母也并没有注意到,其实就连他自己,都不能明确地知道,这种情绪低落和李志亮的出走有没有关系。因为当时的他,正面临自己的问题。初中毕业时,他没有考上中专,尽管全年级也只有两个人考上了中专,但曹广仁仍然非常失望,考不上中专,就意味着曹景失去了在两年后就业的可能,还要上三年高中,高中毕业之后,鉴于当地的升学率非常低,他未必能考上大学,也未必能有工作。曹广仁开关门的声音都大了很多,王自强则刻意拖长声叹息。曹景认为,自己的情绪和这件事有重要关系。

除此之外,他还经历了更折磨人的事。他也考入了李志亮曾经就读的天泽一中高中部,高一的第一个学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的信被“截”了。事情是这样的,这所中

学的收发室，收到所有的信件和包裹之后，除了挂号信会由门房托学生带话，通知本人来登记和领取之外，其余的邮件，并不会做进一步分发，而是全部放在校门口的信报夹里，任由所有人翻阅和领取。这样一来，信件到达收件人手里的概率就非常低。有些信件，就被路人截取了，他们会选择那些看起来有点出挑的信封，拿走，读完，然后扔掉，或者通知信件主人，拿钱来换信。信报夹是无数斗殴和悲剧的发源地。但学校一直没有改变这种信件发放方式。

曹景就受到了这样的威胁。截走他信件的，是初三补习班的学生，他们把信拿走，小范围传阅后，托人带话给他，要他拿八十块钱来，才能把信给他，否则就把信件内容公布出来。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八十块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拿不出这笔钱。但根据他的经验，这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不把信件拿回来，就得准备迎接极其猛烈的下流谣言。他盘算了一下的自己的存款，一共二十多块钱，这二十多块钱，攒了差不多半年。之后一周时间，他每天放学后到县修造厂模具车间后的沙堆里筛废铁，去废品收购站卖，一周下来也只卖了十块钱，他又到血站去，试图卖血，但血站以他年龄不够为由拒绝了他。

几天后，初三补习生撕票了。其实信早拆了，他们只是把拆信这件事公开了，并把信件内容添油加醋告诉了很多人。那封信没有任何过火的内容，写信者是他初中女同学，女同学在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技校或中专，就到省城去打工了，写信过来，无非是要他帮助联系几位初中同学。但截信的人却故意扩散说，信件内容非常下流，他们肯定“拔包了”。曹景的“风流韵事”由此流传开了。

为什么初中补习班的学生能威胁到高中生呢？当时，初中补习班的很多学生，入读中学通常比较晚，又补习了两三年，实际年龄要比高中同学大得多，甚至大过高三同学。而且补习班管理松懈，补习的目的也是为了考技校和中专，学生很有些江湖气，跟社会青年交往频繁，和高中部的风气完全不一样。

这件事对曹景产生了影响，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总觉得同学在对他指指点点，传播他的“风流韵事”，有人走过他的身边，不巧表情不好，或者吐了痰，他会以为是在唾弃他。甚至班上同学写信、收信，甚至读到冰心的《寄小读者》，所有与“信件”有关的讯息，都会让他心惊肉跳。这后遗症持续了很久，一直到高二下半学期，班主任任命他为班长为止。整整一年，他就耗在这件事上，这一年，他如同在浑浊的深渊里任人搅拌。

也是那时候，他读到一本书，这本书是父亲从县图书馆借回来的，老鬼的《血色黄昏》，一九八九年版，讲述知青在内蒙古的生活。封面画着暗红色的天空，血红的落日，黑色的山峦，黑色的大地，一个壮硕的黑色男人，站在天地之间，搬运着一个黑色石块，整个身躯，似乎都被这石块压到弯曲。这本书的书名、封面，和书里描绘的一场大火，带给曹景一种特殊的感觉，这种感觉和李志亮的出走搅拌在了一起，最终形成了一个画面：血红的天空，黑色的大地，天地之间，有一个黑色的人影，向着目睹了这个画面的人走过来，不停地走，无声地走，但始终也走不出这画面。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就是觉得异常恐惧，画面消失之后，又是持续性的情绪低落。

起初，他只是不断想象这个画面，只要停止想象，画面就消失了。没过多久，这个画面出现在了他的梦里。有时候是出现在别的梦境里，别的梦做得好好的，突然画面中断了，血红天空黑色大地和黑色行走者出现了，无声地行走着。有时候，整个梦境都是黑色行走者在天地间的行走，无休止地走，可能走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有一次，梦境出现了变体，这个行走者还推着一辆自行车。这个梦境和时不时袭来的情绪低落，还有现实中各种事件的叠加，让曹景的整个高中时期，都处于一种抑郁状态。遗憾的是，那时候，人们对抑郁症还没有什么了解，曹景只能靠自己对自己进行观察，以及自我安慰。

在李志亮出走前，他居住的那座居民楼上，出了一件很小的事。住在二单元 402 的居民，同样在矿业机械厂工作的三十六岁的王林平，被一种来历不明的噪音困扰，这种噪音是一个拖长了的“嗡”声，像是在头顶上悬挂了一个巨大的金属钵，然后摩擦钵的边缘形成的回声，听起来不很明显，却令人烦躁不安。这个声音每天早晨六点准时出现，持续“嗡”一天，到夜里十一点准时消失。更奇怪的是，王林平全家五口人，只有他能听到这个声音，所有人都认为他出现了幻觉。

整整一年时间，王林平被这个声音折磨，无法入睡，更磨人的，还有周围人的嘲笑和敌意。他对这个声音和自己受害状态的描述，似乎是一种自供，表明他是过于敏感的，有被害妄想的。而不论敏感，还是被害妄想，还是无法忍受一个小小的噪音，都和一个矿业机械厂工人的身份不符。这种精神状态和睡眠状况，让他出了很多次小事故。他并没有坐以待毙，到处寻找这个声音的来源。起初，他以为这个声音来自楼上人家，借口到楼上人家串门，进去打探，楼上没有任何异常，没有发声装置，也没有异常的物件，更没有那个“嗡”声。于是，他又请求厂里的水电工，在查水表电表的时候带上他，让他可以到紧邻他家的三单

元 401 和 501 家去“串门”，水电工答应了，在上门的时候带上了他，结果依然如此，那两户人家没有任何异常。一年后，他偶然听说，三单元 602 那户人家养了一缸金鱼，邻居们说起这家人来尽是嘲笑，“也不看看自己一个大老粗，养那么贵的鱼图个啥，又费电又吵”。他突然产生灵感，觉得这个鱼缸的噪音和自己听到的噪音有点关系。于是声称自己想看鱼，托邻居把自己带去了那户人家，一打开门，一只巨大的鱼缸，增氧泵正在工作，发出“嗡嗡”的声音，但只要进到卧室里，就听不到这个声音。而且这家人开关增氧泵的时间，和他听到的噪音时段完全一致，每天早上，老爷子起床的时候打开增氧泵，晚上十一点，老爷子睡觉的时候关掉。他立刻回了自己家，让那户人家五分钟后关掉增氧泵，五分钟后，噪音消失了，他终于确定了那个怪异声音的来源，并分析出了这个声音的传播方式。鱼缸靠墙，增氧泵发出的声音被墙壁吸收，墙体和楼的结构，可能正好形成了一种扩音机制，声音经过墙壁的共振、扩大，成为一种噪音。当然，那时候他们都不知道低频噪音这个说法。

奇怪的是，这户人家和他家既不在一个单元，也不在一个楼层，更不在一个方位，但鱼缸发出的声音，就是能跳过三单元的 502、501、402、401 这几家人，神秘地、无法解释地，传到他的耳朵里，让他无法入睡，使他近乎疯狂。也因为这种跳跃式的传播，他始终查不到声音的来源。这件事的结束没有那么复杂，王林平请求那户人家挪开鱼缸，不要靠墙，并在增氧泵下面加装一个防震垫。说到恳切处，几乎声泪俱下，差点当场跪在那家人的客厅里。那家人和他同在矿业机械厂工作，经常见面，没有那么难缠，也被这位邻居的激烈情绪吓住，生怕招来祸事，就按他的要求做，低频噪音从此消失。

厂区不大，鱼缸事件很快传遍全厂，这户养鱼的人家收获了更多的嘲笑。六号楼的少年曹景也听到了这个故事，起初他没觉得这件事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把它当作这个世界教给他的一点新知识。不久之后，李志亮出走了，在持续的情绪低落中，曹景突然想起那只鱼缸，并且产生了一些联想。

他觉得，李志亮似乎就是那只鱼缸，发出了一种声音，或者一种信号，这种声音经过复杂的环境和心理的共振，变成了一种超常规的信号，最终到达他这里。他分明离李志亮很远，仅有一次交往，和若干次街上遇见，但那个由李志亮酿成的“低频噪音”，终归是兜兜转转来到了他这里，和他发生了关系。这个世界上，未必只有他收到这个声音，但只有他听到了这个声音。

曹景上了大学，毕业后进入交通设计公司，在大城市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李志亮和他的出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曹景遗忘了，他甚至忘记了那座小城，那座小城被他隔离在了一个不会碰触的区域。但有一天，大概是在二〇〇七年，血红天空黑色大地和黑色行走者的梦境又出现了。

曹景分析过这个梦境重现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公司重组，自己所在的研发部门被压缩，他被分流出去，在几个部门之间流转了一段时间，最后总算到了新的部门。部门领导却比较跋扈，而且酷爱喝酒，经常拖着下属或者乙方公司人员一起喝酒，所有人都苦不堪言。喝酒唱歌，经常要熬夜，熬夜后的两天，曹景的情绪都会比较低落，星星点点的低落，最终连成了线，他开始持续的轻度抑郁，并第一次萌生了辞职的念头。就在那时，黑色行走者的梦境开始出现了。几个月后，他换了部门，但黑色行走者一旦开始行走了，就像野兽在某处撒了尿，做了记号，从此不断重返旧地。

那之后的十年时间，血红天空黑色大地和黑色行走者，常常出现在曹景的意识里。戴上手套开始工作，黑色行走者也迈出了步子；冗长的会议中间，拿起笔假装做笔记，黑色行走者在笔记本的纸页中出现了；家里的水龙头坏了，等待修理工上门的时候，黑色行走者嗒嗒地行走着，步子的节奏和水龙头滴水的节奏一致；女朋友不接电话的时候，黑色行走者在远处行走着。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也不太敢看天空，尤其是黄昏的天空，那时候的天空，一律是血红的，云彩像是女娲用刚从炼石炉舀出的熔浆抹出来的，还沿着天空不断滴落。

黑色行走者的出现，是有预兆的，每当这个画面快要出现的时候，曹景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都变得大、浓、深，空气越发透明，雾越发浓重，红色越发暴戾，黑色越发深渊，事物的细节越发清晰，连灯泡和星星散发的光芒，都像是一束束细细的玻璃管子。黑色行走者出现之后，那种浓重、鲜艳就留在了他的心里，甚至，不是精神性的存留，而是物理性的，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身体里，有红色的血液或者油漆，一伸手就黏在手指上，那些事物刻录下的波纹，能够用手指像读盲文那样读出来。

他也会反复想象李志亮行走中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都是他用自己的旅行经验来填补的。他怎样看地图，怎样向别人打听路线，怎样打零工赚钱，怎样找到临时的居所，会不会突发病痛，会不会在乡村小诊所输液，周围都是呻吟着的病人，黧黑的脸，肿胀的手掌，医生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卷了角的《知音》杂志。他甚至能想象到，李志亮走在路上，路边的水塘里长满藻类，覆盖了整个水面。夜晚行走在正在修建高架桥的山谷里，周围都是

巨大的钢筋框架和吼叫的水泥搅拌器像走在异星的地狱里。这都是他工作时经历的场景，被李志亮挪用了。后来，当他减少野外作业之后，他想象中的李志亮，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城市里，他在喝咖啡，他成为深夜食堂的店主，他在盲人按摩店接受按摩，按摩师在讲述自己的悲苦经历，他隐居在闹市区的老房子里，屋子里有昏黄的灯光。

但这还远远不够。几乎是，每当他有了新的生活体验，经历了新的场景，他就会把这个体验和场景，安放在想象中的李志亮身上，像是——供奉。他有种可怕的感觉，似乎李志亮和他幻化出的这个行走者形象，正在变成一个黑洞，一个填不满的黑洞，自己的所有经验都用来填补他、充实他、丰满他，给他以血肉，而自己在填充过程中迅速干瘪下去。

但彻底触发他的迷狂的，是二〇二〇年十二月的“西藏冒险王”失踪事件。“西藏冒险王”叫王相军，是四川人，长期驻留在西藏，拍摄西藏的地理景观。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在拍摄西藏那曲嘉黎县的依嘎冰川时，失足落入冰川暗河。直到第二年三月十四日，他的尸体才被发现，警方确认他是意外溺水高坠死亡，排除了他杀。

在“西藏冒险王”还只有六万粉丝的时候，他被推送给曹景，曹景起初没有关注他，但不久之后，平台又一次把“西藏冒险王”推送了过来，这一次，曹景关注了他，一直关注到他拥有一百四十万粉丝。曹景通过“西藏冒险王”在快手和抖音上将近五百个视频作品，以及若干直播中的片言只语，逐渐拼出了他的人生概貌，记了笔记，最后写成了一篇短文：

王相军希望人们叫他老王。老王是四川广安人，一九九〇年出生。十九岁高中毕业之后，离开家去打工，曾经去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广西、云南，在这些地方，他做过三十多份工作。在广东，通常是在电子厂工作；在广州，当过搬运工；在云南，就在饭店洗菜洗碗。

之所以每份工作都做不长，是因为他并不喜欢大城市，他觉得，那些地方一开门就是高楼大厦，特别憋闷。他也不喜欢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家乡的时候，他看到往日的小伙伴，慢慢长大后，一个个变得很社会，很假，找个大哥罩着，“就开始欺负个子小的，打不过他的，没有背景的。”他觉得很失望。后来出门打工，他也不喜欢那一个个小社会，“就连一个厨房里，老板、切菜的、炒菜的，这么几个人，都还要拉帮结派钩心斗角”，他觉得“人心很不好，很假”。他喜欢大自然，“喜欢真实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山，就是很真实的”，“我们看到山是这个样子，它就是这个样子，看到这个树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它也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出门前，他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了，“有了路费，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觉得这个想法特别棒”。只要打工一段时间，攒够路费和一段时间的生活费，他就去下一个地方，看山看水，直到“一个地方看得差不多了”，再去下一个地方，找下一份工作，攒够钱，就离开。如此周而复始。

打工攒的钱不太多，工作两个月攒的钱，可以给他提供去下个地方的路费，并且生活半个月，然后就得继续找工作了。他最后一份通常意义上的“工作”，是在那曲的一家青海拉面馆。拉面馆的工人都爱刷快手，尤其夜班，都是用快手打发时间，他也下载了一个。因为喜欢风景，他自然关注了很多拍风景的、徒步的博主。看多了他们拍的风景之后，他觉得，“我去的那些地方比他们的漂亮得多”，如果自己做快手的话，“搞到 5 万、10 万粉丝应该没问题”。于是他就辞职了，开始拍快手。

他的启动资金，就是打工攒下的七千块钱，他用四千块钱买了一辆摩托，剩下三千块作为路费和生活费，就这么开始了。拍视频的收入不稳定，有时候一周都没有一毛钱收入，有时候一天几千块钱，但他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他就希望通过拍视频得到的收入，能让他继续走下去。

他去过很多地方，最喜欢的还是西藏，他在西藏停留的时间最长。自从二〇一二年，他第一次到西藏，之后的八年时间，他有六七年都在西藏，他在两个短视频平台上的作品，也多半和西藏有关，因为，“西藏是最舒服的，西藏的山更大”，“去了很多地方，只有西藏待得住，一天看不到雪山都不行”。

他拍了日照金山，为了拍到金山，他等了整整四天；他拍到了喜马拉雅的冰川，也拍到了喜马拉雅的春天，和山上的百里杜鹃；他为雪山上零下十五度的天气里，盛开的兰花惊呼，匍匐在地上闻花朵的香气，也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山上为盛开的荷花雪莲苞叶雪莲惊叹，反复说着“这个是珍稀植物不能采，不能采哦”；他在无人区的湖泊边，光着膀子和马卡鲁峰合影；他站在念青唐古拉山前，反复说，这山比阿尔卑斯山更美。

这么多年，他只在二〇一七年回过一次家。也很少和家人联系，因为一联系就要回家，“回家就有很多琐碎的东西”，他认为自己的状态不是“旅行”，而是“流浪”，但他喜欢这种状态。

有人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他忽然放慢语速：“一直能走下去，就非常好了。”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老王落水，引起巨大轰动。短视频平台上迅速出现大量和他

的落水有关的评说视频，每个都流量巨大，点赞几万、几十万，回复几百上千。因为搜救者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也没有其他线索，人们就在他的视频和直播片段里寻找蛛丝马迹，阴森的传言很快出现，传播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他是被谋杀的，最大嫌疑人就是他的助手。有人把他落水前一天的蓝色冰洞视频的声音，做了慢放和降噪处理后，疑似听到了对话，有“流血”“杀死”等词语。人们认为，助手嫉妒他的成就，嫌老王给自己的钱少，就把他杀了。尽管这个说法很快就被证伪。总之，他的死，变成了一个离奇阴惨的传说。而几乎每个评述解析他的视频，都会配上 Else 的 Paris，一首被大量用于案件纪实、恐怖片和神秘事件解说视频的乐曲。

差不多有一个月，曹景每天要用几个小时看这些视频，看了一个两个，平台就会推送更多。在曹景的宇宙里，老王由此成为唯一的内容。面无表情的出走者，遥远的西藏，蓝色冰洞里的低语，冰川上的“谋杀”，冰河里的死亡，反复出现。他被这件事里那种阴郁的、非现世的，又有点超脱的气氛吸引了，放任自己沉溺在这种气氛里不能自拔。更重要的是，断断续续的封锁，也让他有大量的时间沉溺其中。

他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但不是那种具有伤害性的低落，他知道自己的低落情绪是“西藏冒险王”的失踪带来的，不是由自身生发的，这就意味着，它不具攻击性，不是向内的，只停留在表皮。

这件事让他意识到，李志亮正在变成一个不断吸引同类事物的磁铁，让他身上背负的铁屑越来越多，他决定，要和李志亮及他幻化出的形象，带来的长久的抑郁情绪，做一个告别。他选择的方法，是回到现场，坐实李志亮的存在，复原当时的细节，破坏这件事的幻觉之光，给李志亮的出走除魅。

就在王相军落水一个半月后，他回家过春节。回到天泽后，他发起几场聚会，召集了许多朋友，打听李志亮的人生细节。他知道自己得准备一些理由，于是努力编造了一些，比如想写写家乡的故事，想给李志亮的父母一点安慰，等等，又觉得不合适，小地方的人，对这种调查行为非常警觉，对“书写”就更为警惕，会以为他是媒体卧底，并产生严重抗拒。李志亮的家人，也必然会听到消息，并且产生阻抗。最终，他编造了一个不会被人深究的理由，来柔化自己的行动：当年，厂里一个姐姐暗恋李志亮，曾经托他给李志亮送过情书，这个姐姐现在和他在一个城市，前不久在一次活动中，两个人偶然遇见了，姐姐五十岁了，孩子也大了，还是非常牵挂李志亮，想在不打扰李家人的情况下，了解李志亮的现状。

这个故事基本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符合一般人对感情的期望，特别是非常时期人们的期望。朋友们果然对这个凄美的暗恋故事产生了极大兴趣，非常热心，努力向那个遥远的姐姐表达善意。他们的见识也超出曹景的想象，曹景本以为他们会带来一些过时的信息，提出一些土而落伍的看法，比如“他可能就是厌恶和尚去了”，并对他的郑重其事不以为然。没想到，他们和他想的不一样。

有些朋友是“调查派”的。一个“调查派”的朋友说：“可以查一下户口，有时候一个户口上的人早都迁走了，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但派出所会留底子。”另一个朋友说：“在抖音上看过一个特大凶杀案，凶手是五六个人组成的犯罪团伙，杀了人抢了钱，就跑到内蒙古去了，然后买通了人，在一个农村重新立了户口，又把户口陆续迁到内蒙古，等于是重新出生了。李志亮会不会也找个废掉的户头变成另外一个人？问题是李志亮又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这么费劲变成另一个人干啥，直接迁走不是更方便？”曹景听他们讨论得如此认真，有点不好意思：“这个是不是不好查，现在查身份信息都会留下痕迹。”同学一笑：“我们这是小地方，小地方懂不。”打了个响指。

第二天，同学先给警察朋友打了个电话，随后带他去派出所，见到警察朋友后低语几句，警察看了看站在一边的他，点点头，指着他说了一下：“我把你认得，你是高二三班的班长。”然后进了挂着“副所长办公室”牌子的屋子，大概十分钟后，警察朋友出来了，同学问，为什么去了这么久，警察说：“到领导办公室去，也不能请示完就走嘛。”随即带他到户籍室去，打开电脑一通操作。李志亮的户口，依然挂在李东强为户主的户口下，沉寂已久，没有迁出，也没有注销。

消息还在汇集。有人汇集出李东强家的家史，有人拼凑出李志亮的几次相亲，以及相亲对象的下落，也有人认识李志明全家，知道一些零碎但无用的消息。这的确给了曹景极大的安慰。他以为老朋友们生活在偏远封闭的小县城，早都失去了生机，对生活毫无想法，但没想到他们另有一种生机勃勃，经常聚会，经常喝酒，还结伴出去野炊、爬山和露营，一样在看《山海经》《小偷家族》，玩《阴阳师》，时下的消息都知道，也知道云南人又到了吃菌子看小人儿跳舞的时节，吃火锅时会拿平菇、香菇当笑料，尽管这些知识多半来自抖音和快手，但至少不是毫无波澜，信息多了，互相矫正，也能凑出对的一面。

有些朋友是推理派的。在李志亮离家出走后第二年，厂长被抓了，他的罪行超乎人们想象，

勒死情妇，车撞知情者，给竞争者投毒，巨额现金藏在柜子和空鱼缸里。于是有人认为，李志亮很可能知道厂长做的见不得光的事，被厂长害了，至于那封信，或许是被迫写的，也或许是厂长找人仿照他的笔迹写的。写好之后，拿着他的钥匙，趁他们家没人，开门进去，把出走信放在桌子上就可以，就算遇到李志亮的家人也不要紧，那时候同事之间的来往紧密得很，拿着钥匙出进都很正常。还有人说，李志亮的父亲其实已经认出那具焦尸就是李志亮，但害怕厂长加害他们全家人，没敢当场指认。

还有一位朋友，更出乎曹景想象，他从文化底蕴、风俗习惯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甘肃处于半农半牧区，本来就有游民传统，出走并不少见。天泽县在历史上，更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带，羌人来过，匈奴来过，现在也是多民族杂居，有回族、东乡族、蒙古族、藏族、羌族、维吾尔族等。城外不远有个贺家营，三千村民，据说是吉卜赛人的后裔，以算命为生，平时在家种地，农忙结束了就带着《周易》《万年历》《麻衣相法》，牵着狗和毛驴，游走全国算命卜卦，他们有自己秘密的神灵，自己的隐语，也不和外族通婚，他们的算命技艺也从来都是父传子、母传媳，服饰也和汉人不一样，男女都穿黑，女人梳“高头”，裹黑色头帕，穿带花边的大襟褂，戴了很多银穗的耳环。

还有一个曹家堡，全村不到两千人，以养蜂为生，政府给村民分了地，他们也不怎么种，荒着，长草，顶多种点自己要吃的菜，他们就喜欢养蜂，一年到头流浪在外面，回来一个月，就又走了，可能养蜂是假的，他们就是为了找个理由走出去。“我们班上的蒋个铁，他爸爸就是养蜂的，有一年过完年，押着蜂箱出去，说是追油菜花去，再也没回来，他们的习惯也奇怪，男的可以走掉不回来，在外面结婚养娃，女的就不能再婚，一直在家里守着。他们村子上，这种情况还不是一两个。所以你看，蒋个铁后来也跟他爸一样，跑到南方去，说是打工去了，再也没回来，带回来的信说是又结婚了。”

他还说，甘肃人往外跑是长在基因里的改不掉的。五十年代开始，甘肃人又开始往新疆跑，农民、要饭的、右派、逃犯、逃婚的、娶不上媳妇的光棍，都往新疆跑，新疆遍地都是甘肃人，现在所谓的新疆话，其实就是兰州话的变种，抖音上几个拍方言段子的新疆人，他们说的话，别处的人听不懂，甘肃人一听就懂。这位朋友认为，这种气氛下，发生什么都不奇怪，“丢下老婆、丢下丈夫、丢下娃，突然走掉的人多得很，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李志亮也有可能受了些这种影响。他一天天骑着车在外面浪，你知道他都认识些什么人，给他灌输了些什么想法”。

李志亮既不是真正的本地人，也不是游牧民族后代，李东强和郝琴也是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他的出走冲动，不太可能是受家庭影响，他也许就是被这块土地上的空气影响的，就像王林平被鱼缸影响，曹景被李志亮影响一样，鱼缸噪音既然能辗转抵达王林平，吉卜赛浪人、游牧民族传统就能抵达李志亮。

几次聚会，没有结果。聚会的主题就变了，变成纯喝酒。李志亮一家，也不见有人提起了。还是没有真正的线索，反而让李志亮的面貌更神秘更复杂了。曹景决定，既然无法从李志亮这里切断抑郁信号，就从自己身上着手。回到自己常住的城市，就开始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他找到了我。

我是在十五岁的时候，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那一年，我沉迷于推理小说，并且读到了江户川乱步的《飘忽不定的魔影》。那部小说里，有一个江户川乱步小说里经典的“妖女”形象，这个女人精通心理操控术，并且擅长催眠，心理学在她这里，几乎是近乎妖术的存在，她利用心理操控技术，制造了一系列凶杀案，包括迷惑保镖，进入一间防卫森严的密室，让人以为这是一桩较为典型的“密室杀人案”。

这本书激起了我对催眠术和心理学的兴趣。我在市图书馆，找到了一本日本人撰写的《催眠术》，反复阅读揣摩。当然，江户川乱步和他的“妖女”，对一个想了解心理学的人来说，不算一个太正统的开始，但的确是一个有着强劲动力的开始。强劲到，让我去读其他的心理学书籍，也强劲到，让我在学了金融，又在金融机构工作了五年之后，最终回到和人心有关的行业。曹景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在心理咨询行业，工作了十年。

他的朋友推荐了我和我所在的平台，我和曹景用视频连线进行咨询，五次咨询，每次五十分钟，上面所有这些，就是他在这近五个小时里对我的讲述。

曹景这样的来访者，是我最喜欢也最惧怕的，他是自觉的，已经把自己理得清清楚楚，甚至主动挖掘了影响自己的各种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这个过程旷日持久，已经被他打磨得逻辑通顺，没有毛刺了。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地方，他呈现给我的，都是经过他选择的，深加工过的，留给我的空间并不多。

我试着从一个比较平凡和俗气的角度，来梳理曹景的状态和他抑郁的成因。在曹景的

少年时代，李志亮所代表的，是少年曹景不曾拥有的事物，包括他想要拥有的外貌、衣着、技能和身份，以及家庭环境和人际关系。李志亮是一个显性的投射对象。如果按照正常的进程，这种投射对象，在曹景成长之后就会失效了，毕竟，曹景后来拥有的都是李志亮不曾拥有的生活，长大的曹景很快就会发现，李志亮的局限性，以及小城生活的单调，少年的神和神龛一起倒掉。

遗憾的是，李志亮失踪了，他的失踪，和天泽小城的环境，以及曹景在高中的遭遇联动，酿成了一种特殊的心境，一种急性的抑郁，拥有了这种特殊的心境和气氛之后，李志亮在曹景这里，就获得了不朽。这个神龛就没法轻易推倒了，甚至越来越牢固。因为你无法让一个消失的人消失。此后发生的事，打个比方，就像沙漠里有一株草，拦住了一些风沙，慢慢变成一个小沙包，小沙包就能拦住更多沙土，最终变成一个巨大的沙丘，也像珍珠蚌，被种入沙砾之后，会分泌珍珠质包裹沙砾，最终形成珍珠。或者，像一个普通人，因为干了一件不平凡的事，就渐渐在传说里变成了神，人们自觉地添砖加瓦，塑造金身，寄托愿望。

失踪的李志亮，在别人那里，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失踪者，但对于曹景这样一个特殊的个体来说，却意义非凡。平凡小城里的曹景，在成长过程中，期待得到一些人性的材料，进行深加工，但没想到，他最终得到的材料，是李志亮和他的失踪，对他来说，这个材料是相当不平凡的，甚至具有某种异色，他用自己当时的心境，和此后的生活体验，对这个材料进行重重包裹，让它越来越复杂，甚至可以说，他把这个失踪者，锻造成了一个自己的小神，把出走和失踪，锻造成了一个小信仰。这种信仰的可怕之处在于，他是以一己之力进行锻造的。整个过程中都充满了自我重复、自我强化和升华，这种重复和强化，最后可能走向偏执，甚至带上邪异的色彩，这就是他抑郁的来源。

他的抑郁，之所以被“西藏冒险王”激发，或许因为，李志亮是故事的前半段，是一个提问，而“西藏冒险王”更像是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是一个回答。李志亮和“西藏冒险王”，都是脱离生活常规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幸福感，但这个世界不会认为这种幸福感是合理的，他们会动用各种微妙的力量，让这个脱离者再也不能回头。“西藏冒险王”身后的诡异传说，说明人们是怎么评判他的人们显然认为他遇到这些诡异的结局并不意外这样才算合理，他人生的逻辑必须继续延伸，延伸到这些结局上。

从“西藏冒险王”所受的待遇，曹景足以推断出，李志亮最后会有怎样的结果，这个结果还会被进一步歪曲，变成李志亮无法掌控的样貌。曹景的抑郁于是被全面激发了——他不但被李志亮本身困住，他还发现，自己抑郁的来源，是无法讲述，也不可能获得理解的，甚至是会被歪曲的，而且必然会被歪曲。

这是我的理解，我把我的理解交给了曹景。这大致就是一个咨询师要做的事，“对他人的理解”，这个任务到我这里，似乎已经完成了，这种理解似乎也得到了曹景的认可，因为他本来就是带着对自己的理解来的，所以我们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还算轻松。

起初，我们约定的是七次咨询，第五次结束之后，他却没有约下一次，然后就突然消失了。我有点失落。我其实还想给他一个建议，我希望他能让别人参与这个信仰，重铸这个信仰，甚至毁灭这个信仰。比如，把李志亮和他的故事讲给更多人，让一个人的异教变成许多人的文学。就像一种四处散播的病毒，一边传播，一边变异，毒性随之减弱。“李志亮病毒”其实并没有减弱，于是我隐隐约约觉得，事情没有这么快结束。却没想到，它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我们没有留私人的联系方式，与咨询师有关的工作纪律，都严格禁止我们和来访者有额外的交往，国内心理咨询界对咨询师的要求是，在咨询结束后，三年时间内，不能和来访者有咨询以外的联系，国外就更严格，有些协会要求，咨询师和来访者，终身不能产生咨询以外的交往。但半年后的二〇二一年九月，我在微博上收到一条未关注人的私信，发私信的人说自己是曹景的朋友，受曹景委托前来，想加我的微信，发一些资料给我，反复考虑后，我留下了微信，马上接到了他的添加请求，打过招呼后，他发来了一系列照片。

这些照片是曹景搜集到的和李志亮有关的照片，包括李志亮的几张单人照片，几张合影，和家人的和同学朋友的，还有他的工作证照片，他制作的模型照片，他留下的出走信的照片，以及天泽县城的照片，矿业机械厂、车间、家属区、李志亮家所在的楼栋，他家屋内的照片，他的房间，他的床铺。还有天泽一中，甚至还有城外的麦地，以及那个发现焦尸的垃圾场。总之，他在那五天时间里告诉我的所有事，都有照片佐证。

李志亮很英俊，那种英俊略微超出一个小城青年的英俊，但也并不十分触目，它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就像一种基本款的衣服，你都不知道它算不算出色，直到它被合适的人穿在身上。天泽县城，以及矿业机械厂，和我的想象差别不大，我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也有一群久未联系的留守儿童。

其实，在知道自己即将看到李志亮的照片时，我就应该拒绝的，但好奇心战胜了一切，

而好奇心是有后果的。——让一个具体的形象进入眼中和让一种病毒进入身体是一样的。更何况,这个形象不是一个单纯的形象,它还包括了一座小城的历史,一段九十年代动荡史,一个未解的凶杀案,一场被人忘却的失踪,以及一个工厂、一家人、一个人的故事,而且有可能是全部故事。更不巧的是,我完全能理解这个故事。

这个形象让我对曹景有了进一步的推断,对他来说,李志亮是个“他者”,是个阴郁的男人。在曹景生活在天泽县的时候,这种意义还不明确,因为,县城生活,有另一种危险,它把人埋没,它让人不愿意相信,在这种不起眼的地方,会出现刻骨的、独立的、不需要任何参照的美,会有空前绝后的机遇,它让人蒙尘,也让人失去判断,在小地方,你不知道自己遇到的是一颗坠落的废星,还是壮阔的银河。

等到曹景去往大城市,后果就显露出来了。他逐渐发现,大城市的人,从形象到内心,从情感到表达,都不得不互相驯化、互相学习,越来越相似,落入那个“同质化的地狱”。它貌似让人更鲜艳,更有光泽,形象和内心都得到更多的扩张,但它同时也是毫无止境的埋没。因为它早就具备了人工智能时代的一切特征,它是一片混沌海。你只有更巨大,更独特,获得更多的支持,才能稍稍抵抗这种埋没,这种被混沌海吞噬的可能。为此,你只能不停地卷入放大的自己的战役之中,而这场放大的自己的战役一旦开始,结果可想而知:你在二十米见方的显示屏上露脸了,别人就获得了在五十米见方的显示屏上露脸的机遇,你露面十五秒,别人就能露面十五分钟,你生产出了一种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会迅速被效仿和普及。而大多数人连这样的机遇都没有,大多数人都无法成为生产者,只能接受自己平庸、懵懂、被埋没的命运。

曹景忍受不了这种“不是生产者”的宿命,但他能做的,也只是努力否定、嘲笑“不是生产者”的那些人。在和我交谈的时候,一旦提到周围的人,他就会走题,开始肆意评价他们,说他们“一模一样,特别无聊”,“A和B毫无区别,是互相复刻的关系,构成他们的最小积木块都是一样的,同样的游戏角色,同样色号的口红”。他甚至还举了一个例子,他们的领导有段时间迷上了安藤忠雄,所有的同事,都开始讨论安藤忠雄,会议上不时地用他作为例证。他起初以为这是权力影响的结果,但后来发现,是因为周围的人处于空心状态,无所适从,急需言辞、内容和故事,权力只是他们接受填充的理由之一。只要有人愿意领头,哪怕那是一个没有权力的人,懦弱的人,他们也会马上起身,跟着他去向任何一个地方。他们把自己交出去太多次了,也已经驯化成功了,他们不能忍受一刻落单。

李志亮却和任何人都不一样,而且永远没有可能变得一样了。他的英俊,他的自行车,他的荒野,他的小城,他所在的九十年代,他和那个游牧传统日渐远去的往昔的若即若离,他和那桩焦尸案的迷离关系,都让他拥有了神秘感,让他有别于所有人。天泽县的生活,虽然也是由各种积木块构成,积木块的来源甚至更单一,但那些积木块更大,更草率,更接近人性的根本词汇、根本欲望,所带来的禁锢感反而没有那么牢固。李志亮也没有可能表露出自己对高迪或者黑川纪章的看法,也不会因为讨论时事而翻车,失去了新进展,失去了产生新进展的可能,他就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原人”,并将永远锁定在这个位置上。他具有了一种永久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甚至像一口深井的井水,取之不尽,每过一个晚上,就会自动悄悄注满。因为这口井拥有一个曹景这样的信徒,不断从现实生活中搬运东西到过去,现实中的面孔、话语、扑朔迷离的信息,加上他的新感受、新认识、新理解,再搬回去,去充实它的丰富性,强化它的差异性。他不断注水,又不断从中打出新的井水。这也是曹景在事隔多年之后,又回过头来探寻李志亮的轨迹的原因。我在看到他的照片的第一时间,就明白了这件事。但我没想到,这种推断对我同样成立。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遇到一个来访者W,这个来访者是一位普通的司机,唯一不寻常的地方是,他是大剧院的司机,车上载的都是演员等文艺工作者,或者由文艺工作者变成的领导。总而言之,是一些略微超出常规生活的人,耳濡目染之下,他懂得向心理咨询师求助,并且有所准备。

W生在唐山,经历过地震,是地震孤儿。地震过后,远走他乡投奔亲戚,在亲戚照顾下,上中专,到厂里当电工,在厂子倒闭前,调到剧团为领导开车,后来又跟随剧团领导,调到了大剧院。他在二十五岁时结婚,妻子在广播电视台学校后勤部门工作,岳父岳母,则在大学后勤部门工作,妻子的工作是岳父岳母安排的,他们的安排显示了他们对现实的想象力和触手的长度。

W有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问题:他不能出门旅行。在描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说法矛盾而混乱,起初他说,“我很宅,喜欢待在家里,不喜欢出门”,后来又说,“我成天开车往外跑,已经跑得够够的了,不开车的时候,就想待在家里”。对仅有的几次旅行,他的说法都是“被迫的,被动的”,“单位组织大家出去,我不去能行吗?出去了我就尽量待在酒店里”,但当我问他是否去过新疆、海南的时候,他又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问我:“听说海

南的海是蓝的,不是泥汤子海。”

之所以在“出行”“旅行”这件事上产生这么多的对话,是为了突出他的宿命感,引出他真正要说的事情:“你看,我这么不爱出门的一个人,偏偏找了一个莫名其妙爱出门的老婆。”但他妻子的事,却并不是“爱出门”这么简单。

结婚三年后,W的妻子突然离家出走,不知去向,半个月后,妻子又突然回来,神色疲倦,对出走期间的事只字不提,状态类似梦游或者失忆。在刚发现妻子出走时,W就向岳父岳母报告了消息,岳父岳母并不惊慌,只是神色羞赧,似乎已经知道了会发什么,并且安慰W,让他不要过分焦急。此后几年时间,妻子又出走多次,最长的一次出走,足足有五个月,每次出走归来的状态也都大同小异,仿佛经历了一场白日梦游。从她的谈话中,可以隐隐约约得知,她是追随某个男人去了,每次追随的都是不同的男人。W的岳父岳母终于吐露实情,他们的女儿在青春期曾经爱上海员,后来遭遇冷暴力分手,从此留下心理创伤,在结婚前就曾多次出走。

岳父岳母讲述往事的时间场合,略有点离奇。当时正逢中秋,大剧院推出迎中秋戏剧周活动,W得到作为福利的十张门票,邀请亲朋好友前来看戏,岳父岳母也在其中。在门诊等候时,或许是人来人往的嘈杂,让岳父岳母稍感松弛,不断走来打招呼的熟人,也分担了他们的压力,他们便从某个中秋讲起,那个中秋,他们的女儿离家出走,导致他们没有过好中秋。起初,他们吞吞吐吐,半遮半掩,但看到W并没有激烈反应,逐渐坦然,话语也越来越顺畅,但最终的落脚点,显然又掺杂了一点心思,“我说这个的意思是让你放心,她往外跑不是因为你引起的,和你没有关系,不是你不好,你们好好过”。最离奇的是,谈话结束,进了剧院,剧院里演的竟是《倩女离魂》,却是在郑光祖的版本上,加入现代戏剧元素改编而成,甚至有暗黑舞蹈的场景,岳父岳母吃不消,提前离场。

那时已经有了精神科以及各种心理门诊,良莠不齐泥沙俱下,W带着妻子四处看精神科,竟也有了点成效,妻子出走的时间间隔逐渐拉长,到W向我进行讲述时,妻子已经有八年没有出走。

但W的问题在于,他竟然暗暗期待妻子再度出走。生活逐渐变得庸常,妻子也不像从前那样,似乎总有无穷的力气,折腾出各种生活戏剧来,突然发生的出走事件,让她有了神秘感。她去了哪里,为什么出走,和谁在一起,遇到了什么,她和别的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她遇到的人,和他又有什么不同。她每一次出走,似乎都在为她的神秘感充电,直到电力消耗殆尽,她就又一次及时出走,如此这般,几次三番,让他对她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欲望,甚至对她涉足的地方也充满了欲望,他想象着她的迷狂之旅,甚至想在她出走后,悄悄跟着她,看看她都去了哪里,遇到了什么。如果是光明正大地和她一起出去旅行,就没有这样的魔力。

他甚至描述了一个很具体的想象场景。在想象中,他跟踪着出走的妻子,去了所有她去的地方,在妻子没有觉察的角落窥视着她,等她回家之后,他独自出行,把妻子走过的的地方重走了一遍,还住进她住过的酒店房间,洗她洗过的温泉,坐她坐过的车,和司机聊天,打探妻子和司机的谈话。甚至具体到,他想象出妻子睡过的酒店床单,和他跟父母一起生活时睡过的床单一样,肉色,有牡丹和孔雀的图案。

但他周围的一切人,却都在给他压力,像他妻子这样的出走是不正常的,是必须要矫正的,并且给出了一个很现实的后果,“再这么下去班还上不上了”。他也服从了这种压力,佯装焦虑,佯装痛苦烦闷,但真正让他焦虑的,却是妻子终于被矫正了,八年没有出走的时光,对他来说犹如服刑。

是的,他用了“服刑”这样的说法。

在我看来,她不出走,他就没有机会“出走”。在“出走”这件事上,他是失能的,地震摧毁了他的家庭,和他的童年生活,并且给了他一个强有力的暗示,他需要安定的生活,他需要一个不会垮塌的窝,他需要重建,任何出行,任何一种不安定的生活,都是对他曾经遭受的痛苦的背叛,会让重建的努力付之东流。犹如电影《唐山大地震》中,幸存者所说的“我如果过得花红柳绿,就更对不起你了。”他不能背叛。她的出走给了他一线生机,一点可能,牵扯出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这样的出走让她变成了一个“他者”,让她拥有了神秘感。她出走带来的焦虑、痛苦,则占据和替换了他已有的焦虑。

他之所以把妻子的出走,简单地描绘为“爱出门”,是为了在面对陌生人时,淡化妻子出走事件中的失德色彩,更是为了淡化自己内心欲望的失德程度,也有可能,他既不觉得妻子是失德的,也不觉得自己是失德的,这种淡化只是刻意彰显自己的妥协,如果,妻子只是爱出门,那也好办了,他的压力就不该有这么重。

我头头是道,侃侃而谈,在我谈话的过程中,一丝忧虑从我心头掠过,我和曹景是不是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曹景是用出差代替了旅行,那不是真正的旅行,我则假装自己是因为

工作走不开。我甚至怀疑起自己的职业选择，起初，我的老师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我给出的回答就是：“我从小跟着父母，搬家太多次了，就希望过安定一点的生活，这个工作正好可以在家做。”

对曹景和我，都一样，李志亮是一个可以恣意行走的替身，一个外部世界的引入者，一个“他者”，一个阴郁的男神。

一旦理解了这个逻辑，就是有后果的。

二〇二一年三月到九月，曹景结束咨询后的半年时间里，我偶尔会想起他讲述的事，也偶尔会想象血红天空和黑色大地的景象，但都是浮光掠影，稍纵即逝。直到九月，看了那些照片之后，一个晚上，我突然梦到了那个场景，梦里，那个黑色的人影披着漫天的血色霞光，不停向我走来，却永远走不到我面前。惊醒之后，我莫名其妙想到两个字：感染。

之后，我需要在一个月时间里，前往五个地方开会或者工作，在那几个地方，我少则停留三天，多则停留十天。我去了很多以前想去却没有去成的地方，李志亮的形象，时不时叠加在我看到的人和事之上。在大同云冈石窟，看到那些严重剥蚀的佛像，我联想到的，却是照片上李志亮的脸。在平遥古城，一个卖砖雕的小店，年轻的店主说自己卖完这批货就要去上学了，我问他，这种零工好找吗？你是怎么找到的？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个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可能一直在做这种短期工作。

到了四川绵阳，正是华西秋雨季，这里已经连续阴雨许多天，我冒着雨去一条小街上吃米粉，在一家被油烟熏得乌黑的小店坐下，店主很快端上米粉，然后把围裙一卷，和一个孩子在厨房的后门坐下，面对着一条被绿萍覆盖的小河对话。他们讨论的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店主的妻子，孩子的母亲。这个母亲，显然也有些不同寻常之处，“她从哪里来的，莫得人晓得”，“她整天坐在窗户前头，对住这条河看，这条河有什么看头，臭的哟”。

显然，她不在这个家了，有可能是短时期去了别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永远消失了。我凭着断断续续听到的几句话，拼出一个轮廓。自从开始关注李志亮的故事以来，我突然发现，现实世界里的“失踪”实在太多了，这些消失的人和他们的故事，被一个隐蔽的大数据库，不断推送到我面前。此刻，大数据又在工作了，它知道这正是我要听的故事。可我不想再多知道一个失踪者的故事了。

回到酒店我有两天不想出门天气似乎也在配合我始终阴雨连绵给了我不出门的理由。两天后，我买了动车票，离开了绵阳。

我的抑郁状态被彻底激活，是在二〇二二年五月。在家封闭了将近两个月之后，一天晚上，楼上突然传来了“嗡”声，很长，很有金属感，就像曹景描述的那样，像“在头顶上悬挂了一个巨大的金属体，然后摩擦体的边缘形成的回声”，这个声音每天晚上十一点准时开始，第二天早晨八点结束，在这个时间段里，它响十分钟，停五分钟，然后再来十分钟，就这样循环。我毛骨悚然地想到，我的“鱼缸低频噪音”来了。但此时此地，我不可能像天泽县的王林平那样，挨家挨户地去查找声音来源，小区是封闭的，单元门是封闭的，即便没有封闭，大城市居民楼的邻里关系也不可能给我这个机会。

因为李志亮的故事，我想当然地以为，这个噪音的来源也是鱼缸。我于是在业主群里发问，谁家养了鱼，谁家有鱼缸，能不能在增氧泵下面放一个减震垫，能不能把鱼缸挪开一点，不要靠墙放。但业主群的全部注意力，都被抢菜占据，没有人注意到我，哪怕我在刷屏。我试着录下这个声音，发现它录不下来，我 @ 我周围几户人家，他们陆续回答了我，说自己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我打电话给物业，甚至报警，都没有结果，警察打来电话，声音非常疲惫，说即便出警，也还是要交给社区来协调。

这个低频噪音持续了一个月后，终于有一天，群里有个邻居回应了我，说她也能听到这个声音，我看到她的楼层，有点犹疑，她在四楼，而我在九楼，即便我已经知道，曹景故事里的那个鱼缸噪音，也是跳空传播的，但四楼和九楼相差得也太多了。我还是加了她，问她是在什么方位听到这个声音的，她说是在朝北的屋子里，她怀疑那是屋后的加工厂发出的声音。当那个噪音再度出现的时候，我打开了我朝北的屋子——两个月来我只在白天进去过，果然，那个噪音比我在朝南的卧室听到的，要强烈得多，打开窗户，窗外，一百米外，一个平房院落里，一个形似水泥搅拌机的巨大的设备在工作，轰轰作响，并且喷出白雾。它发出的声音打在我们北面的墙上，沿着墙壁传送到朝南的卧室，就成了我听到的声音。向市长热线和市政、环保部门投诉之后，那个声音消失了。它消失得如此容易，让我有点意外。它的来历如此简单，也让我有点惆怅。

被这个噪音笼罩，无法入睡的深夜，我在抖音和快手上看视频，开始是什么都看，后来就变成只看旅行视频，原因非常简单——越是无法出行，越渴望出行，只有看户外旅行视频纾解。这个原因是如此简单、赤裸和直白，如此理所当然，让习惯用幽密的语言和复杂的理论进行心理分析的我，感到无比震惊。

李志亮就在这些旅行视频里，无处不在。

看“旅游轨迹”，看着两位主人公开着车，在大盘鸡发源地沙湾城外，在公路边停下车，买了一个西瓜吃，他们的脸就慢慢变成了那些旧照片上的李志亮。“白强游记”，主播在湖北宜昌 827 厂，走进已经被废弃的厂区和生活区，在食堂打饭的窗口向里望去，“李志亮在外面这么多年都吃什么这个问题就出现了”。黑皮晓洁一起看世界“夫妻两人在新疆兵团，钻进七十年前挖的地窝子，仿佛就会吵醒睡在深处的李志亮。”向西行“浪迹天涯”米奇妈（房车旅行）“陈雄（极限户外）”“扬帆在旅途”“小白的奇幻旅行”……镜头里那个热爱荒山、废墟，正在走遍中国、走遍星球的人，对他们家乡的人来说，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李志亮。

看着看着，我就明白了，曹景其实已经找到了解决之道：把他的感受分享给我，不，传染给我。他的生活停顿了，新进展变少了，那口井，让他有了匮乏和枯竭之忧，他急需新人加入，和他一起，搬运新东西注入井中。

他一定用了很长时间，在平台上选择合适的咨询师，再一个个去了解他们，二〇二一年这样的年份，他有的是时间。选定目标之后，他还会继续通过微博、抖音和别的平台了解咨询师，看他们是在什么环境里长大，是不是易感体质，是不是和他同频，对荒野、废墟、失踪、死亡是什么感觉。我在抖音上仅有的十个视频，那些晚霞、鲜花、荒草、废墟，那种在“恋生”和“恋死”之间的摇摆，足够让他最终确定要联系我。

的确我生长的环境与他和李志亮几乎一样，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他。在我理解他的同时，甚至在我起心动念的一瞬间，我就已经被感染了。我希望他能让他一个人的信仰，去经受更普遍的审视，他其实已经在做了，给我看李志亮的照片，就是给我埋下种子，拦住风沙变成沙丘，等待一个时机激活它。他知道必然有这么一种时机。

我一边疲惫不堪，精疲力竭，一边毛骨悚然——我每天看到的荒野、废墟和我想象中的李志亮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毛骨悚然。我决定向别的咨询师求助了。我用的是曹景用过的方法，先在平台上找咨询师，然后通过他们的自媒体去了解他们，最后我圈定了一个人，一个叫刘茵的咨询师，在业内有声望，翻译过几本心理学著作，操办过很多线下项目。

尽管我们的职业规范是，让我们尽量减少社交暴露，她显然也遵守了这个规范，但我的职业经验，让我足以通过非常少的材料，就能了解一个人，我通过她的不到五十条微博了解到，她在东北和内蒙古交界的地方生长，那个地方，是一个叫牙克石的城市，有工厂、废墟、林业站，也有森林、河流、草原和荒野。她在微博上转发一个荒野旅行视频的时候说，她哥哥有个朋友，毕业以后回到牙克石工作，教书教画画，对荒野非常着迷。她还说过一句话：“咨询其实就是陪着来访者一起探险。”我预感她能了解我的经验。

五天时间，每天五六十分钟，咨询开始后，我告诉她，我也是咨询师，之所以来找她，是因为我在一次咨询中被感染了，希望她有准备。然后告诉她，我的出身来历，我中学时候遇到的霸凌，我的复仇方式。我怎样入行的，接触过哪些理论。我怎么遇到曹景的，我对他的分析，他讲述的故事在哪些地方影响到了我。她说：“这是个击鼓传花游戏，只不过，第一个接到花的人，有点不太寻常，他让这个花变成了花束。”我明确地感受到，她理解了。

在她看来，曹景出生于一九八〇年。这是一个刚刚经过巨大动荡的时代，时代遗留下种种创伤，而在当时的背景下，人们仍然停留在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中，为生存本身而活。

“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性不敏感的人，就可以随波逐流地选择大众生活，而对于敏感的孩子来说，很多东西，时代的，父辈的，自身成长中经历的所有所引发的情绪，是没有地方可以放置的，只能自己默默承受，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尝试解决、解释和突围，或者就变成了一个秘密的困兽，成为抑郁和焦虑的来源。

“症状是一种表达。很多人内在的隐患，日常处于潜伏状态，会让人隐隐不安，但是人都有逃避的本能和功能，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防御机制，实现了表面的平衡和相安无事。不到迫不得已，没有人会主动地去查看。但是经年累月积累在那里，一直是隐患，有一天被一些相关事件激发，隐患就藏不下去了，趁机呈现，也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寻求关注，寻求解决的路径。

“想要症状消失，或者说获得某种程度的痊愈，最好的契机，是在某个故事中找到自己，放置自己，以自己的真实肉身为这个群体的故事找到结局，也为自己的隐疾和故事找到结局。完成自我的叙事，也完成这一类人的叙事，自我实现了完整和意义，症状也就消失了。”

没过多久，我就找到了结束这个阶段性抑郁的契机，完成了“自我的叙事”。这个契机非常简单和直接：我们“解封”了。

此后，我休息了两个月，打算回老家的前一天晚上，朋友约我去一个新疆餐厅吃饭。这家餐厅似乎是按照新疆时间来运营的，晚上九点半，我和朋友落座之后，旁边临窗的一个大桌，才开始有人前来，到了十点，陆陆续续来了十二三个成年人，他们带了四五个小时，小孩子对饭菜兴趣不大，简单吃了点，就在店堂里奔跑和看电视。成年人们坐在那里，互

相问候，寒暄，烤肉和大盘鸡陆续上桌，白酒，啤酒，红酒，酒换了几种，有人开始轻声唱歌，老板及时送来两把琴，一把吉他，另一把琴我不认识，冬不拉？热瓦普？我分不清楚，但已经有人开唱了，一首非常沉郁的歌，唱歌的人闭着眼睛，表情深沉而痛楚。

他唱完歌，他的朋友们开始鼓掌，我也示意朋友一起鼓掌，他们听到我们的掌声，向我们点头示意，坐在左侧的一个光头男士，招招手，似乎是请我们坐过去的样子，我指指自己，一个疑问的表情，不等他回应，就坐过去了。

“你们从哪里来？”乌鲁木齐，不过我们是博尔塔拉人，不是乌鲁木齐的，乌鲁木齐嘛是省会，我们不是省会的，我们是小地方来的。他们一家，维吾尔族；他也是：他，柯尔克孜族的；这个是他女朋友，维吾尔族，他，蒙古族；他们三个，汉族。“你们是亲戚吗？同事？”“不是的，我们是朋友，汉族的这个朋友嘛，到我们那里援疆，援疆你知道吧，支援新疆，我们就认识了。他们是你们这里人，今天晚上是他们招待我们。”“你们刚才唱的是什么歌？”《萨马勒山》，你没有听过吗？”

我搜到了那首歌，《萨马勒山》：

萨马勒山我挚爱的故乡，像镜子一样的湖水，如今我是士兵却不是为你而战，每天都是煎熬。你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生我割下我脐带的我挚爱的土地。我们没有马，双脚已麻木没有知觉，好像已经走了十五天，好像已经快到下一个战场了。

“再唱一个。”“好，再唱一个。”琴交到了另一个人手里，他调调琴，唱起另一首歌，似乎是蒙语，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年轻小伙子，看我一脸茫然，拿出手机，找到正在唱的这首歌，给我看歌词，《阿拉套山》，也是和山有关的歌：

啊朋友，我想听你歌唱，
唱唱我们的夏尔西里时光。
草原繁花把我们埋藏，
我们静静或坐或躺。
啊朋友，我想听你歌唱，
唱唱我们的爱情和酒量。
欢乐的宴会直到天亮，
你不停把《黑眼睛》唱。
啊朋友，我想听你歌唱，
唱唱我们的父母和家乡。
白杨树下说起父亲病况，
脚下厚雪咔嚓地响。
好朋友，我想听你歌唱，
唱少年的愿望是风的愿望，
唱那达慕大会的骄傲荣光，
唱我们寻找的天堂就在身旁。
啊朋友，我想听你歌唱，
我已经在回家的方向。
阿拉套山就在我的车窗，
痛楚般的欢乐心中回荡。

他唱完了，我忍不住问：“你们以后就不走了吗？”唱歌的男人故意用了一种不满的语气调侃说：“哎，咋了，你们这里不能来吗？”“是不是，不要误会，我希望你们留在这里啊。”“你们这里我们留不下，太贵了，我们就是路过一下，他们一家，后天去广州了，他要去海南，他要到厦门去，你旁边的这个到成都去，就是这三个汉人兄弟，还在你们这里。新疆太冷了，冷的地方出来嘛，都往热的地方跑。你不唱一个吗？我给你伴奏。”

那个晚上我和他们一起坐到凌晨两点，最后在路边告别，整个晚上，没有想起鱼缸噪音，没有想起李志亮，和他们在一起的那几个小时，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包裹着我的茧里的事物，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茧的存在，他们的不知道，把这个茧击碎了。

真正的最后一击，是在我回老家以后，和老同学聚会，我简单讲述了这一年多我遇到的事。在一个个给他们打电话约饭约酒的时候，我突然产生奇怪的感觉，感觉自己又在复刻二〇一二年二月的曹景，像他那样联系旧日朋友，希望一种更有人间气息的关系给自己支撑。

只是我的结果比较利落，所有这些，在我讲完自己的事后，就戛然而止——我被同学的一句话掀翻，抑郁猛然刹车，也许是暂时终结，但终归结束了。也可能因为，我是间接感染，我身上的“毒株”毒性已经比较轻了，所以能被轻易终结。

就一句话：“对县上的同学来说，你就是个失踪者啊，你还到处打听失踪者的事情，明明你就是，你还不知道你吗？”

“你还不知道你吗？”是我们方言中的表达方式，带点轻微的贬义，你还不了解你吗？你还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吗？还有一个第一人称的说法：“我还把你不知道吗？”我知道我，我知道我是什么东西。所有的失踪者，血红天空黑色大地中黑色的行走者，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我早都走出去了，我本来就身处不安之中，不用制造安稳的幻觉。我不用对他们有所寄托，我不会继续供奉了。

在那天酒局的中间，我给曹景打了语音电话，把自己最终的发现告诉了他。我说我有预感，我不会再梦到他的梦了，梦里那个人已经走过了，我已经看清楚了他是谁。他有一张脸，所有人的脸。我们要和“李志亮的血色黄昏”共存了，它来过就不会被彻底清除，但我知道接应它的是什么了，内部，我身体里的荒凉感，外部，时代的节点。每个人头顶都有鱼缸，也都有嗡嗡作响的时刻。

曹景说：“那就此，多保重。”停了一下，他说，“出来走走吧，我已经出来了。”

“好的，是时候出来了。”而在别处，在别处，李志亮早已经出来了。他在四川的小城，开了一家很小的面馆，为顾客做一碗面。下午四点才出摊，晚上十点收摊。他在国道边上，开了一家修车铺子，他是矿业机械厂的先进员工，修车对他来说不难。

他在甘肃、青海、新疆开包车，走大环线，一天八百块，从春天跑到秋天，冬天休息。有时候遇到好人，有时候遇到难伺候的人，遇到难伺候的人，他就不那么高兴。

他在宁夏，在贺兰山下卖饮料，他找了一个很好的位置，游客经常会在那里停留，停下来就会买点水和零食，顺便让他帮着拍张照。

更多时候，他都在行走，行走中的他，面目清晰了，甚至有可能带上了微笑。他走在戈壁、荒野、草原上，风滚草滚过马路，远处有群黄羊遥望着走路的人。他走在花海里，花海中，戴着彩色头巾的女人们，埋下身子在劳动，拔草，给花草浇水，把鹅卵石捡出来，扔得远一些，鹅卵石总是会吸收阳光的热量，变得滚烫，烤坏这些八瓣梅、万寿菊和波斯菊。鹅卵石是捡不完的，今天捡掉，明天还会出现，那足以证明，大地在震动。

他走在小镇的街道上，杂货店、五金店、小吃店，在他的视线里不断出现。街道尽头走过一些人，他们拉拉扯扯地，正在奔向某个葬礼，有人穿着白色的孝服，有人举着白色的纸花串、招魂幡，有人拎着一大袋花卷。

他在车站的长椅上休息，坐在对面的老人抽着纸烟，断断续续和他聊天，终于，他温和地说：“你怎么不找个工作，找个好工作啊。”

他把房车停在青海的雪山下的营地，清早推开窗，窗外不远处，就是悬崖、山谷，和对面的山峰。营地的朋友走过来打招呼，他们说着什么，也许是说昨天睡得好不好，也许是说下一段路怎么走，也许是在商议中午吃点什么，“我们在张掖买的丸子还没有吃呢，中午一起吃，我支桌子去”。

他坐在乡村大巴上，车窗外开过一辆拖拉机，拉着满满一车秸秆，一个孩子趴在秸秆顶端，牢牢地抓住捆秸秆的大麻绳。冬麦已经破土了，淡淡的绿色铺满整片大地，黄昏的雾气正在散开，雾气最深处，有人点了火堆，也许是在烧落叶。火苗很亮，火色很红，似乎足以让整片大地温暖起来。

他在西藏的雪山脚下，看见了日照金山。不枉早上五点起床。他想。他哈出一口气，他听到不远处有转山的人说话的声音。那声音带着轻微的回声，在山下回荡。

他在塔吉克人聚居的小城，坐在全城唯一的一家咖啡馆门前。旅游的季节已经过去，漫长的冬天就要开始。天边有淡淡的霞光，一个穿着黑色羊毛长袍的老人，沿着墙壁的阴影边缘，走向街道尽头。

他走在河西的玉米地中的白土路上，阳光很好，白土路很硬，在玉米地中间，像一条静静的白色河流，玉米已经结穗，绿色的叶皮被撑开。四下无人，他手舞足蹈，甩着手脚，似乎手脚长到一步就能跨出去很远，像走在水上那么轻松。

他走在大理三月街，街中心，售卖特产的人，支起巨大的舞台，在迪斯科舞曲中，一边唱歌，一边介绍他们的特产。路边的小摊上，摆着色彩瑰丽的物品，动物的皮毛、骨头，晒干的草药。天上有一朵飞碟形状的云，也许真有个飞碟藏身其中。

他走在太行山的山道上，已经是秋天，树叶正在变得金黄，偶然可以看到小小的院落，可不敢小看太行山深处的小院，就是最落寞的小院里，也至少有一个精致的佛像，一片异常精美的壁画。小小的院落，至少要有一件宝物，才能在太行山里立得住脚。

他走在琼海城外的防浪堤上，浪花扑上来，打湿了他的鞋子，渔船正在离开港口，开始一天的工作，有人站在船头，穿着白色的T恤，又有一个人走出船舱，也穿着白色的T恤。后出来的那个人，把手臂搭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海对他们来说，依然那么新鲜，每天早上，都像是第一次看到。

他不停地走，不停地看，永不疲倦地，投身风景，风景不是墙，风景可能是幻景，可能是肥皂泡，需要走进去，需要戳破，让它破碎，让它成为泡沫。

大地上，星球上，无数人兴高采烈地、手舞足蹈地，或者平静地、坚忍地行走着，一百亿双鞋也不够他们这么穿的，他们不顾一切地行走着，戳破一幕又一幕风景的幻景，风景的肥皂泡，让它们破碎，直到自己成为别人的景色。

镜头拉远，地球也在宇宙里转动着，平静地，坚忍地，向宇宙深处发出隐秘的信号，而那个召唤着它穿越，穿越后就能抵达另一个胜境的黑洞，那个入口，或许就挂在一辆自行车的车把上，以蓝色野菊花的形象存在。



韩松落

70年代生人。1995年开始创作，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收获》《花城》《天涯》《散文》《大家》《小说界》等。2004年开始在《时尚芭莎》《看电影》等百余家媒体开设专栏，获2012《智族GQ》“年度专栏作家”。著有《春山夜行》《为了报仇看电影》等，发行音乐专辑《靠记忆过冬的鸟：韩松落个人作品集》。出镜《跟着唐诗去旅行》《中国这么美》《文学的日常》等纪录片。担任平遥影展、澳门影展等多项电影奖评审。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非虚构

《九路口》 为什么探讨的是权力问题？

晓雅 | 田野中国

都有什么东西被拿来构建我们生活的地方？

这是一次纸上沙龙。媒体人晓雅向《九路口》两位作者伊险峰、杨樱，与谈嘉宾影像工作者杨潇发出十多个提问，除了探讨了这本书的写作初衷、视角和成书方法，也聊了聊上海这个城市给彼此留下的痕迹。

《九路口》对准的是当下，还是历史？是写人，还是写巨变中的街区？这是作者和读者在共同面对的两个问题。

作者的答案很明确——写街区，写当下。

用非虚构的方式，把写作主体定为无机物，对两位作者伊险峰和杨樱来说是第一次大胆地尝试。复杂的结构和实验性的书写，作者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观察收集信息，就是走来走去，聊来聊去。

跟着作者，很多时候行文呈现出影像式的书写，移步换景，口语化的节奏，像有声书，时不时飘出作者内心的尖叫。作者对这种行文方式用来传递讯息完全有信心吗？似乎也没有全然的把握，伊险峰把相关思考直白地讲在书里：“现实总会有各种担忧：你所津津乐道的东西，在没有背景了解的情况下，读者如何与你产生共情？”

确实是文本挑战，读者需要付出多一些耐心，收束起过往阅读经验筑起的藩篱，不要期待满篇都是人物故事，或者作者用某个理论来推导结论，作者并没有这么做。复杂问题的解套也并不单一，用非虚构铺展、揭露问题，而不草率地给出结论。

杨樱说：“这本书写的就是当下，是立马要写的东西，不是历史。”试图把当下复杂的结构说清楚，是非常困难的书写。用非虚构再现当下实况，就已经充满了抵抗的力道。

藉着写作当下，来讨论城市士绅化，宜居性，讨论不同人所理解的一座城市最好的时光，讨论什么是“繁荣”，创造一个城市繁荣的因素需要哪些，讨论政府如何“修正了城市的功能”。而这些所有被论及的要素，都和居于其中广泛的人相关。

九个路口，不仅是从网络传播中看到，想象过，打卡过的城市网红街区，把居住在此的人加入视角，便构成了不同的社区。社区，在特殊时期，承载着进退与共的样态，镜头再聚焦一点，每一户人家，每一个人，都怀揣过往、梦想、欲望、挣扎、奋进，抵抗，并非全然随波逐流的，而是具有很强的个人能动性。这便是这场非虚构写作带来的礼物——补足过往专断的报道中，没有呈现过的人所身处的不同境况，书写记录，是对小人物的赋权。

当我问及这本书讨论的主旨，杨樱的回答很简单：“探讨的是权力，这决定什么东西构建我们生活的地方。”

如果说要直面权力，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傍身，写作或许是一个途径。也正是因此，记下那些不可须臾或忘的重要时刻，消逝中的街区，人的记忆。如果借用海明威的“冰山原则”，海平面下坚固的脉络尚没有那么轻易，那么快就浮出水面，但是它已经化为书写者对城市的认识和知识的养成，包含地方知识如何去回应国家、地方政府的权威。

如此，从我的阅读体验而言，《九路口》书写的不只是一段城市的当下，一些街区中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立场的上海。

1. 晓雅：写作风格和写作对象同构，城市庞大，有复杂的肌理，在最初成稿时，你们思考过以什么样的写作方式进入写作对象，以呈现九个路口的复杂性吗？

伊险峰：这个问题有趣。我觉得可能先确认的是“写作对象”是谁，这一点从开始到后来始终还是比较统一的，就是这个街区是一个“写作对象”。

我们会思考，到底谁构成了这个街区，谁决定了这个街区的样子。它的基本结构在80几年间是没有变化的，我们有一节写新乐路和襄阳北路的路口就提到，它是80年来没有太变化的。但现在我们写的，2021年到2022年，这个街区当然不是80年前的人和事，没有杜月笙没有潘公展了……生意形态还有相关性，老虎灶现在变成包子铺，这些变化的推动者，毫无疑问是在这里聚散的人。

所以，你说到肌理，历史这些，有一点对城市审视的眼光，我们开始倒是很明确，不写建筑不写历史，这些东西关注的人多，讲其中的故事的书或者媒体自媒体相当多，写得也好。我们放在商业生态上，实际上就是写做生意的人，这些生意促成了城市景观，也是这个街区吸引很多人来的原因。最后，一点点就是这些人是怎么聚到这里来的。

最后复杂性是“实现你需求”的复杂性，有酒吧咖啡馆，有时装买手店，有各种好玩的只在这里出现的小生意，但它的功能是简单的，就是聚集对生活有兴趣的人，他们在这里满足自己的需求。它有点像设计，我们说简洁的设计是前台界面的简单友好，后台运转的体系是复杂的。九路口这个街区本质上就是这样，你来了，吃喝玩乐，你在这里住，衣食住行都会很友善的生活空间，但背后的体系是复杂的，想说得多深刻都行，这就是城市的意义，这就是文明本身。我们尽量展示的是这个东西，我们的倾向性是它为什么是好的，我们觉得舒适，为什么大家愿意到这里来，与之相反，为什么有些就是不好的，有些让人不舒服。

其实在《九路口》的书里谈到了一点这个成书的过程。

2. 晓雅：书中提到记录作为“档案”，本书带着强烈的个人视角，实验性的，非常有个性的文学语言，你们怎么看待档案，以及用什么样的方法、视角来编排这份档案？

伊险峰：我们说“档案”的时候，实际上是指信息是不是能留存下来。现在互联网，存储信息能力，貌似有很多东西被保存下来，但实际上赛博空间比想象的要脆弱。我现在找十几年前有影响力的报纸，想看全套，可能多半要去图书馆看实体的合订本；再比如某人被全网封杀，基本上是以这个人消失为代价的，并没有记录下来他的过往，演变。我们想记录下来的，有的故事，也有街区的布局，有些东西需要用些笨办法来搞定，我理解就是一个一个地写。

我们看到一本书，《老上海百业指南》，讲三四十年代上海的街区布局，一个一个地在地图上标出来。我觉得我在写的时候，这是一个冒险，你说的实验性不知道是不是指这个，因为它有点枯燥，一些人给差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玩意又没有大众点评小红书生动，你到底在干什么？但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另外一个你说到的视角问题，我们在确认从六条街九个路口入手之后，视角就简单了，它是一个整体。这其中的人和事还有物，物也包括店，都会出现。所以不可避免的，它是一个时间性很强的记录。“档案”这个词本身包含了时间性。

3. 晓雅：这本书有影像式的书写，读者要跟上作者 / 行走者 / 采访者的观察视角，文字叙述有移步换景，蒙太奇的转换，像有声书，这是行文策略吗？

伊险峰：我还没意识到这一点。简单点说，书中有一节叫《保罗·索鲁》（第七节），跟九路口其实没啥关系，只是想说这是旅行作家通常会采用的一种视角。他在行走，他在看，他在记录，这是一个他所观照的世界。有很多人不喜欢索鲁，好像有点咄咄逼人，或者说殖民者视角，他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可能是我写东西确实有口语化的倾向，我很喜欢口语中产生的天然节奏感。



4. 晓雅：内容中有大量人物出场，写作过程如何处理 / 选择采访素材？

伊险峰：人物这一块其实我们是最舍不得的，每条街上我们都会聊一些人。有的聊得多，与这一条街的特色联系也很直接，就会重点去写。复杂之处在于，九个路口多多少少会有意强化一些特点，这是一个选择过程。

比如阿力，他在新乐路做潮牌生意，很有特色，我们跟他聊，可能会对他在城市里打拼的经历更有兴趣，他有一个上学时被动地在城市生存，到主动地影响城市潮流的过程。很多个采访对象都是这样。

我们说它是丰富性的，它足以容纳很多东西。这是写作上海，或者说写作“巨富长”这个热门地区得天独厚的优势。

还有一部分素材，是不常规的，比如街上到底都有什么店，这个东西我们写的时候就会想，谁会有耐心读它呢？但最后我们还是把它们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前面也讲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代价吧。

杨樱：既然是存档，我们尽可能把我们有把握的东西都写下来，所以“取”的可能比“舍”的要多。

有一个人物没有写，是一个襄阳路上的停车管理员，并不住在附近，市中心

老房子被拆了，要从很远的地方来上班。和消失的书报亭从业者一样，很多人都是“四〇五〇”下岗再就业的人员。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写，但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机会。

如果说还有什么没来得及写，可能是这个田字格街区里的小动物和植物们，比如居民和植物的采光权之争。[植物我们在“小鸟文学”上写过一期](#)，书里倒是没写。

5. 晓雅：本书第一节的标题即是《“自己人”》，带有引号，是来自他人的判断，还是你们的自我评价，抑或是你们对他人的评价？此外，在什么时候，你觉得你是这个城市的“自己人”？又是在什么时刻，本地人会将你视作自己人？做为移民，你们怎么看待这个词？

伊险峰：“自己人”，感觉可能被过度解读了。有几个人问过我们“自己人”是不是“本地人”，“本地人”是不是“上海人”，这解释起来就不太容易。

我觉得是从“辉哥”（书中人物，中通快递员）角度看我们，辉哥送快递，是一个城市里对城市微观层面掌握最充分的人。他感觉我们是自己人，是我们对一个地方微观层面了解充分的一个肯定。我们很得意。

这是一个有点社会性意义的问题。我看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写革命与无产阶级，写历史上非凡的小人物，还是传统的发明里，他说 18 世纪的鞋匠有很多是革命者，因为在在一个小镇或者小城市里，鞋匠能接触到所有人，每个人都要修鞋补鞋，他们自然就汇集到所有的信息。阎云翔说中国农村刚刚搞承包改革时，村子里的信息中心从大队干部那里到了小卖店家里，农村的小卖店总是在村子里最先买了电视，平常大家都聚在这里，变成了信息中心。现在农村的信息中心是当地的快递员，村里可能没有顺丰三通什么的，但最后的节点都是一个人，他了解村子里大部分的事。

城市太复杂，但对城市细微处的了解肯定是快递员们。

6. 晓雅：在你们的观察中，书中的新老移民对自我身份如何定位，有融入本土的执念吗，或者是界限已经比较模糊了？

杨樱：这是一个自我价值实现的问题，不同世代，不同境遇，不同答案。有个读者写了个书评（很可惜豆瓣不知道为何把 ta 折叠了），里面提到的一段话或许可以回应这个问题——

“非虚构里为你提供一个与你完全不同的人的真实的一瞬，这个‘真实’的力度就是他们、我们尝试去理解那些人所付出的努力。比如莫先生九十年代开始在上海跑茶叶生意，靠两三家茶叶店买了房，还养三个孩子，爱好宏观经济，喜欢谈论大趋势，大走向。我是千禧年前后出生的，这样的人算作我的父辈一代，包括我自己的爸爸很喜欢谈论年轻时的奋斗，说忍耐吃苦是值得的，对他们我总是有一些意见要发表的。但读毕我有了一种新的感觉，莫先生说，‘大家都说上海生活是很难得。归根到底，哪里最难？北京广州我都去过，但想做生意还是要在上海。上海让人感觉安全，公平竞争，相信能力，上海给你机会。’那个机会是真的，这是一种真正的信心，即使看到同僚们失败了也拥有的信心。所以他们说的吃苦并不完全是吃苦，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可能初入职场两个月就明白，吃苦仅仅是吃苦，是浪费，三点一线的生活意味着一种一眼能看到头的生活。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完全是这样。”

7. 晓雅：行文保留了不少沪语方言，保留语音对本书重要吗？为何重要？如果要保留大量的方言，如何做才能让外地读者准确理解方言所传达的意思和情绪？在影像创作的处理上，在什么情况下杨潇导演你会主动使用方言？

杨樱：我们给出了一些注释，其实通过上下文也可以明白。有人说使用方言和普通话的比例是有讲究的，方言过多则不明白，过少则是奶油蛋糕顶上的樱桃，没有实际意义。

我们使用方言，往往是因为觉得它在那个位置不能为普通话所取代，否则会损失一些信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书中人物费里尼提到的“茄门”，它本身会有一些典故（据说来自殖民地时期的 German，取德国人理性冷感之意），聊一聊“茄门”蛮有意思的，就是这样。

杨潇：此前完成的一个与城市相关的作品就有意使用了桂柳方言，对于上海来说这是移民语言，它有效地激起我的能动性和边缘认同。

从边缘视角出发对我很有帮助。我想到最近在桂林与湖南交界处看的瑶族建筑，作为一个将迁徙作为根基的山地族群，他们的建筑风格反而是多元融合，不断自我重组，将自我作为宇宙媒介，近汉则汉，近壮则壮，近天则天，近水则水。

不同世代，不同境遇，不同答案。

8. 晓雅：我了解这本书最早的写作动机是探寻本土街区士绅化（gentrification），请问你们如何理解“士绅化”？通过观察，这个街区及其变化，和上海其他区域有什么不同？和中国其他城市，甚至世界其他城市的不同是什么？

伊险峰：“士绅化”是很早就关注的一个话题，大约从 2016 年左右开始。在那之前我们关注的实际上是拆迁问题，从媒体视角，城市大拆大建中的问题。在那之后，“士绅化”成为一个关注点主要在于城市更新，也从拆老房子向腾出老房子转换，这过程中，“人的因素就更突出了。全球意义上的士绅化，被人诟病批评的点，就是把穷人赶出去，让有钱的或者说中产阶级进来。

中国与世界其它地方相比不太一样之处，比如我们是政府主导的多，我们讲规划，讲腾笼换鸟，讲产业规划，这些主语都是政府。其它地方可能资本主导得多，比较典型的像特朗普公司。

另一个很大的不同，也是 2016 年左右开始意识到的，就是原来把人替换出去，是盖新公寓，有钱人买房子，像翠湖天地这种，对照的是“新天地”与“太平桥”。这个时候意识到，老房子不拆了，或者拆掉一部分，把部分老房子留下来，还是新天地模式，看起来是个旧街区，但实际上住户是消失了的。留下的是各种商业，它吸引的人是在这里工作的、逛街的、游客之类。

我们后来说打卡，网红旅游目的地，都跟这些有关，结果它就变成了一个旅游区。游客凝视，越来越突出。

这本书里探讨“迪士尼化”，整个上海都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感觉就是这样。这与“士绅化”已经没有什么关联了。简单点说，“士绅化”至少还有中产阶级住户，还有有钱人，迪士尼是没有住户的。迪士尼只有两种人——表演者和旅游者。

9. 晓雅：本书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借鉴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哪些人类学的书对此次的观察和写作产生了影响？

伊险峰：我们自己说借鉴人类学的一些方法，可能人类学者觉得我们是给自己脸上贴金。我们自己不太敢这么讲。

人类学有人类学的扎实，我们很羡慕。比如它以研究为目的——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不以读者喜好为目的，这是我们做媒体出身的人要学习的。再比如，我们媒体出身的人多少会被“时效性”这种追求为目的，总想搞个大新闻，所以时效性总是与锐利之类的相关，我们说这把刀很“快”，不是说时间，是说锐利，媒体作品也是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会有很多，比如急功近利。因为虚构写作者很多是媒体人出身，也会带进来这样的问题，我们也需要人类学的方法论、发现问题的能力、稳定稳健的世界观来完成。

10. 晓雅：杨潇导演也在上海长居过，这本书观察记录的街区，社区，人群，让你产生了哪些联想或共鸣？

杨潇：《九路口》提到的街道我大概都走过，有几年整天骑行于“巨富长”一带。尽管在上海生活了八年，但始终是拘谨的租客。租客没有记忆，只能隐约记得所有街巷深处都不好闻，有股幽寂无人的猫尿味。直到阅读这本书，那些街道才又在记忆中逐个亮起，串起了上海的中枢神经。

二零一七年刚毕业，我买了辆二手电动车，不到半个月，车就被四川中路的交警骑走了，上海出台新规，没换牌的电动车一律没收。再后来又出新规，不许载人，佩戴头盔，各种莫名其妙限行，并行，推行的路段。我经常需要与女友同行，载人罚款五十，算了算，罚款八十次也比再买一辆划算，于是养成了躲避交警的习惯：

哪个时间段在哪个路段会埋伏几个交警，是穿荧光绿的交警还是戴袖标的协管，我俩都了然于胸。到后来竟有了通感，第六感里没交警出门就不会遇到交警。我俩将交警简称“交”，去掉了后面那个字，心理上会轻松一些。

回想起来，每次骑行我都身体僵直，总担心突然冒出个荧光绿人，又或是并行的大卡车突然一声炸响，难免精神衰弱。总之，身体感受告诉我，非机动车是过街老鼠。与此同时，与我擦肩而过的是一场即将竣工的士绅化运动，被水泥封住的窗口丝毫没有挣扎的痕迹，只有命令的口吻。而黄浦江边拔地而起的地标美术馆里，没准正坐着几个关切土地问题的艺术家在大谈大卫·哈维。而我又有什么资格嘲讽呢，我不也经常拿到类似的社会脚本吗。在上海，你很容易对做艺术这件事一眼看到头。

“前面有条子，拐里弄走”，身后一位陌生骑手提醒我。经常碰到这类好心的骑手，他们从各地来到上海，跑外卖闪送或五金建材，做服装档口或餐馆采购。“条子”和“交”类似，都可视为黑话，是秘密社会的标识。看来他觉得我们是一伙的，我们当然是一伙的，我们享有同样稀少的城市权利，我们既是这场国际梦的污点，又是这场梦的燃料，是“既要又要还要”里龌龊的那部分。

女友和我一拍即合，提议开发一款“交地图 app”。有别于高德地图，交地图专门为规划避开交警的最近骑行线路，让您无忧畅游国际都会，一键开启上海平行次元。

这个计划当然只停留于幻想。在离开上海前，我说把电动车送给伊老师，伊老师说不用，他只骑自行车。一年后，他和杨樱寄来了《九路口》。这本书可以看成是“交地图”的替代方案。它对准的正是这样一个混杂了大量异乡移民的上海，对准的是流动性本身。书里的所有个体与空间，无不在处理着各自的流动性问题。



上海作为一个由庞杂流动人口构成的近代帝国产物，流动就是它的基础设施，反本质就是它的本质。然而越是飘摇的孤岛，越是需要本质主义的外在形象来解决身份的焦灼，于是这两层张力构成了上海的精神结构。结构的一端就像《爱情神话》描绘出的那个无奈的、闲静的上海。这部电影的流行随即将上海市民的自豪感推到顶峰，正值二零二一年年末，当时上海凭借其先进的防疫理念一时风光无限。年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流动被禁止了。

包括后来的离散与狂欢，无不是流动被压抑后，上海重拾破碎身份的仪式。

以长乐路的工作室为轴心，杨樱与伊险峰带我们走过一条条巷弄，指出那些涂抹一新的墙面背后的抓痕。若不是这些抓痕，我们都会忘记这里发生过的抢夺与捍卫。

回到问题，我觉得基于这本书发展成一个 RPG 沙盒游戏可能会蛮有意思的，也算是对交地图 app 的延续，当然这又是另一个幻想了，这也是这本书带给我的阅读体验。

11. 晓雅：上海是一座被过度打卡和记录的城市，创作者要怎么理解、思考，回应网络上短平快，娱乐化的解读？

杨樱：有个法国人 Christian Henriot，我们叫他安教授好了。他供职于斯坦福人文中心，专注于中国现代史，在他建立的一个网站上，你可以找到国内基本不可能获得的诸多中国现代史档案资料，我是通过看《老上海百业指南》的资料知道他的。

安教授做过一项很有趣的研究：历年上海地图册的封面。这篇叫做《什么是上海？城市标志和视觉》的文章，历数了上海在不同时期对外呈现自我的时候选择的地标景观。从外滩，到上海展览中心，到东方明珠塔，再到外滩——我想说的是，从这篇文章你大致就可以知道，上海被认为是什么样子，往往和当下整体的社会心态有莫大的关联。

唯一不变的是，上海始终是一个被“凝视”的对象，这件事是很有意思的。用一个

读者和我聊天时的话说，“为什么就连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成为一种景观？”我觉得提出这些问题，比给出答案更有趣。

12. 晓雅：如果从影像记录来看，作为专业的影像工作者，你会以哪种视角来给城市做记录？

杨潇：也是最近这几年我才开始留心到记录的必要和乐趣，才开始拍了一些被划入纪录片的东西，所以完全谈不上是专业的记录者。相比于文字，影像天然就有记录性，REC 键按下记录就开始了。

纪录片系统在中国分官方与非官方，官方有一套官方文艺传统；而非官方，一部分就是独立纪录片，完全自生自灭的野生状态，没有传统就是它的传统，另一部分，也是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同样没有传统可溯的业余民间影像。

比如在某些公共危机事件中，恰恰是这类民间影像承担起了直击现实表层的工作。遇事不决掏手机拍，这已成了某种集体的身体反应，是弱者的自决形式。影像作为一种分权力，在市民社会生根发芽，逐渐形成自己的“白话文”，这对于整个视觉文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强调专业与非专业的分野不如强调它们的共生，还有各自背后的更纵深的东西。

13. 晓雅：书中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段落是谈及一个城市最好的时光。面对不同的城市论及这个问题，我好像也被推进了忧愁和展望。你们认为，一座理想的城市需要哪些要素？是什么让上海成为上海？

杨樱：这个问题让我想起 Monocle，一本以探讨全球“理想城市”为己任的杂志，它的全球视野一度非常迷人，不知道现在还好吗？

如果非要给一个答案，我大抵希望“理想城市”可以是一个从行政制度到基础设施都对弱者友好的地方。Monocle 似乎从来没选择过上海（他们最喜欢哥本哈根这个地方），不过上海有个神奇的地方，就是相比于很多中国其它城市，它有一些东西（包括精神上和物质上）是 100 多年以来从来没变过的，在一些紧要关头还会格外明显。

14. 晓雅：作者最想通过这本书探讨什么？

杨樱：我觉得是探讨“权力”。

这决定什么东西来构建我们生活的地方。

成文，提问人：

晓雅 媒体人，参与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筹备及运作

答问人：

伊险峰 《九路口》作者，《好奇心日报》联合创办人，《第一财经周刊》原总编辑

杨樱 《九路口》作者，《小鸟 Aves》主编，《好奇心日报》联合创办人

杨潇 影像工作者，剪辑师。作品包括《欢墟》，《再见语言》等



晓雅

媒体人，参与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筹备及运作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来自 [五玄土 ORIENTO](#) on Unsplash



招募华工的计划叫“以工代兵”。欧战之初，北洋政府就渴望参战，期望在战后和谈中能改变被列强瓜分的局面，多次试图通过向协约国派遣军队和武装来达成参战目的，未果后，遂变通提出以工代兵的计划。然而，协约国始终拒绝北洋政府直接的军事参与，唯恐战后中国也要分一杯羹，尤其棘手的是中国的诉求将必然与日本抵牾，而按照 1902 年缔结的《英日同盟》，日本早就是协约国的一员。然而，协约国虽不希望中国加入战局，但欧战进行到 1915 年底，英法军队开始面临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以工代兵计划终于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作为协约国和北洋政府妥协商议的结果，以工代兵计划于 1916 年 5 月正式敲定，立即实施。具体来说，北洋政府不直接出兵，只提供人力，代替协约国军队承担部分战时劳动，如挖战壕、运营军用工厂、清理营地与机场、抢修道路、修筑轨道和运送补给等。为不引起德国的怀疑和日本的反对，由协约国监管成立了若干劳务公司，负责招募华工，并代表华工与英法政府签订劳务合同。从 1916 年 5 月第一份合同签订到 1918 年战争结束，共有十四万到二十万华工被招募并为协约国军队服务。

在为数不多存留下来的以工代兵计划的一手资料中，华工与英法政府签订的劳务合同能够让我们一窥当时的景况。让人不无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是识字问题，尤其是信件的读和写，成为华工欧游期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保证人力的平稳输送，且有鉴于早先美国和秘鲁虐待华工的事件，以工代兵的合同似乎都经过仔细协商和推敲。规定事宜包罗万象，比如旅行条件、工作条件、食品配额、医疗保障、处罚方式和工资发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工资发放的问题。以惠民公司与法国政府签订的合同为例：

第四条其作工工资，每工人每日得领法币壹法郎，由雇主直接交付于工人之手，每星期或十五天一付，按照其雇主处之定章。与同该项工作之法国工人，一律办理。

除以上所给每日工资外，雇主应每月给付每工人工资法币叁拾法郎，此项月给工资，应交由公司所指定之一银行，以便由公司在中国存储，归工人，或其家属或其指定之人收用。

此项付款与汇款之证明，应于合宜之时，交由雇主转付工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步走的薪酬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识字问题在华工营中的核心地位。两步走的薪酬结构同样见于旅英华工的合同当中，它意味着华工劳动力的完全商品化：一方面要考虑在欧洲发生的实际劳动，另一方面要兼顾对中国家庭中劳动力缺失的补偿。薪酬的两步走凸显了劳动力流通和交换的跨国属性，而这使得一定频率的长途通信变得必要。这样的薪酬安排理论上相当合理，但实际操作中，只有当华工能够确认自己的离家远行及时得到了补偿并会持续得到补偿时，以工代兵计划的薪酬机制才算奏效。华工们未见得会满足于惠民公司提供的“付款与汇款之证明”，他们更有可能寻求更少中介、更令人放心的确认方法——直接与家人联系。他们财力有限，自不会使用价格不菲的电报和电话。而因为受雇于军队，又导致他们的通信手段受到严格的军事管控。书信既被允许也能负担，于是成为华工与家人联络并确认另一半酬劳是否按月结清的重要渠道。对写信和收信的渴望于是不再仅仅是情感上的需要，也是经济上的必需。以合同为证，以工代兵两步走的薪酬结构构成了书信往来最实际的经济原因。

诚然，华工强烈要求写信，不能说成是对扫盲、学文化的主动追求，更多的是对工资发放制度的有机回应，以及在缺乏其他通信手段时所作的权宜之选。这历史的偶然，在基督教青年会 (Y.M.C.A) 及其战时工作会 (War Work Council) 的加持下，催生出了第一个现代中文扫盲计划。本着进步时代的精神，依社会福音运动的指导，基督教青年会为旅欧华工建立了六十多个服务站。为了给这些服务站配备工作人员，

将 20 世纪的“汉字革命” 作为理解中国文字、文学及语文现代性的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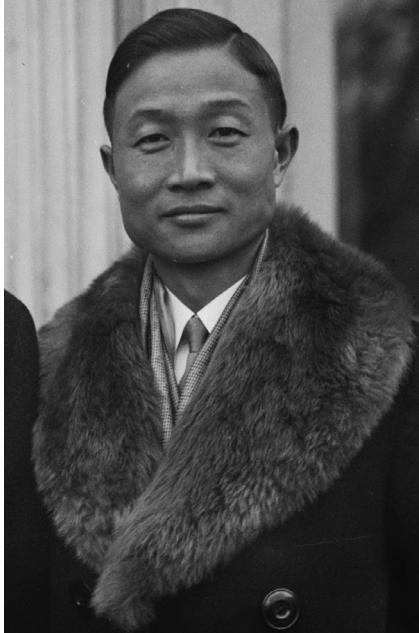
钟雨柔 | 新书推荐

20 世纪中国，风起云涌的汉字革命是一个几被遗忘的重要历史事件。这场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伴生同行，在废除汉字的号召下，试图在中文土壤里移植拼音字母系统、拼写大众声音，被理解成激进且进步的文学与政治革命之有机组成部分。

《汉字革命》以语音中心主义内部的辩证关系为切入视角，讨论汉字革命的发生、变异和中止，追索汉字革命在与文学革命的合流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变异。跟随作者钟雨柔的论述，可以看到多位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如赵元任、瞿秋白、许地山、晏阳初、叶圣陶、陈梦家、唐兰等参与汉字革命的经历，他们背景和立场各异，所提供的汉字改革方案也侧重各异，而汉字革命在中国一步步的变异，正与中国革命的紧张进程相呼应、重叠，从二十世纪初，历经五四、抗战、新中国成立，时代洪流为汉字革命赋予了不同面向。在最后，通过对周有光的介绍，阐明了汉字革命结束后的“余波”，并表示了汉字革命虽然已经中止，但“语文事业未竟”。

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授权，我们节选了第三章《底层工人能书写吗？》，分享给读者。

青年会派遣了大量志愿者，其中大多数是在英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这些站点起初提供的一系列服务，包括体育活动、电影放映、新闻翻译，但不久之后工作人员就发现，“华工最需要的一项服务，是替他们写家信”，而服务站作为代笔中心的功能压倒一切。识字问题的中心地位因识字能力的匮乏被凸显出来。当青年会确信识字问题已然成为欧洲与中国书信往来根本障碍后，一位青年会的志愿者第一个站出来开始扫盲。有必要说明的是，由青年会的志愿者发起第一个现代中文扫盲计划绝非巧合。青年会从进步时代以来，便开始践行美式慈善的新哲学，即以科学手段消除社会病根。所以，如果因为华工不识字可能阻碍有效沟通，妨碍华工营的运作，导致青年会不能达成海外使命，那么就必须扫盲。



晏阳初

这位领导第一个现代中文扫盲计划的志愿者就是晏阳初。晏阳初，其时刚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家之一、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之后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联合创始人、国际大众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军人物。晏阳初的教育和乡建项目遍及全球，包括法国、中国、美国、菲律宾、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加纳等国家，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他 1930 年代的定县实验。晏阳初在中美都颇受欢迎、备受瞩目。1943 年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之际，晏阳初当选世界贡献最大的十位“现代改革家”之一，与约翰·杜威、亨利·福特、迪士尼和爱因斯坦并列。1948 年美国国会拨款 2.75 亿美元援助中国，其中 10% 被指定用于乡村重建，这项条例后来被称为“晏阳初条款”。而晏阳初的整个志业，按他自己的说法始于他在法国布洛涅与华工的第一次接触。正如晏阳初多次回忆的那样，他在那里遇到了“新人”，受到了激励，于是投身教育和乡建。晏阳初坦言：“我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他们的智力和热诚，渐渐引导我发现一种新人。这新人的发现，比考古学家发现北京人，也许还要重要。”

1918 年 6 月中旬，晏阳初抵达法国，驻扎在布洛涅服务站，面向五千余名华工服务。他后来最为人称道的扫盲计划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摸索。第一阶段是华工营食堂组织的夜校识字班。初到华工营，晏阳初每天为华工代笔写信、代办汇款手续，忙起来有时一晚上要处理几百件书信和文件。几个月下来，晏阳初决定是时候让求学心切的华工们自己认字写字了。晏阳初于是召集了一场全体华工会议，向大家宣布他将不再代写信件，而是要教华工自己识字写信。台下一阵哄笑，过后只有少数大胆者加入了他的识字班。夜校每日在食堂开讲，从中文和阿拉伯数字开始，逐步推进到如何写华工的名字，如何写父母和家人的地址。四个月后，总计超过四十名华工参加了这个识字班，三十五人成功毕业，领到了大红纸写的毕业证书，获得了基本的读写能力。

食堂识字班的下一步是教“千字文”，又称基本汉字。受南朝周兴嗣《千字文》的启发，晏阳初自编教材：“从一本中文字典和国内寄来的一些报章中，选择了极常用的单字和复词，再加上华工的通俗口语及平常家信习用的词句，总共合起来千余字，作为华工识字的教材。”这千余字后来被同为教育大家、青年会成员的陈鹤琴及其团

队所作的定量分析证实，与用统计学方法测定的最常用的千字文有很大程度的重合。统计学的精确性助力古老的识字读本，成为现代扫盲计划的不二法门。新千字文被认为是科学解决文盲问题的解药，完全符合青年会用科学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宗旨。这个新旧结合的科学方法很快从法国传到中国，在 1920 年代作为全国性平民教育运动的基本方法被大规模应用。

最终，青年会于 1919 年 1 月创办《基督教青年会驻法华工周报》（以下简称《华工周报》），作为识字班中程度较高学生的补充阅读材料，每周发行五百至一千份不等。直到 1920 年晏阳初离法之前，他一直是该报主编。周报虽然每期不超过四页，内容倒五花八门，包括“论说”“祖国消息”“欧美近闻”“欧战小史”“华工近情”等栏目。虽然《华工周报》并非第一份以华工为读者的刊物——之前还有《旅欧杂志》和《华工杂志》，但是《华工周报》有两个独一无二的特色：其一，它征集并发表华工自己的作品；其二，它留存的文本以及引发的关于其文本的讨论，揭示了关乎现代汉语本质的若干重要线索。

口语与书面

《华工周报》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是第一个现代中文扫盲计划的产物，而且其影响力从欧战法国的华工营一路绵延到民国平教运动。更重要的是，《华工周报》凸显出一个关键的文体问题，直接关系到五四白话语和启蒙话语。具体来说，《华工周报》编辑部以及华工实际使用的书面语事实上是一种口语化的书面语，即语体文；而知识分子们在事后描述《华工周报》的书面语时，选择将其归为“白话”类。一方面，华工的书写被知识分子接管和再命名，作为五四运动之语文遗产的又一佐证，却始终名不副实、难以匹配；另一方面，《华工周报》发表的一篇华工撰写的批判性文章，虽被收编进入五四特定的启蒙话语，但其批判锋芒却又提示了启蒙的局限。

现代汉语是一种新的民族语言、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形成并延续的语文遗产，这是学界的共识。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沿用五四知识分子的叙述，称这种语言为白话，并将白话在现代中国取得的统御地位归功于知识分子。周策纵将白话运动总结为一场标志着“新式知识分子意图”的“文学革命”。舒衡哲则将白话的出现视为五四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辈合作的产物。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创造了一种白话文的修辞，本质化地建构出文言和白话的二元对立。这个二元结构中的白话是现代的、表音的，准确地说是语音中心主义的，以此区别于前现代的白话。前现代的白话内容丰富，囊括多种类型与体裁，既有口语也有书面语，包括唐代白话诗、宋代话本、明清小说等。事实上，前现代的白话一直以白话文的面貌出现，即便晚至 20 世纪初，早期白话报——如《杭州白话报》和《中国白话报》使用的仍然是带口语色彩的文学书面语。白话概念真正发生断裂性的变化是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时期，运动领袖们让现代白话扛起了纯粹口语的大旗，就此将其与语音中心主义绑定。理想白话的代言主张书写要彻底摹写口语，鼓励文字成为语言的附庸，许诺用白话大大降低现代中国的识字门槛。对理想白话的追求虽仍植根于汉字读写，但指向的是言文一致的中文字母。然而，名义上的理想白话，虽受五四知识分子追捧，却并不能用来描述实际构成新的民族语文的书面语，也不是五四时代产出的文学使用的文体。现代汉语作为书面语，其主体不是所谓白话，而是一种语体文，比起语音中心主义的现代白话，更接近兼收并蓄的前现代白话。这种语体文，已被赴法华工学习、使用，并被证明是降低读写门槛的有效文体；而恰是这种文体，被启蒙精英命名为新白话，成为通往纯粹口语的桥梁。值得玩味的是，虽然华工和青年会成员集体选择了语体文作为扫盲识字、大众教育和实现语文现代性的可行路径，但五四之后，《华工周报》的语体文却必须被重新命名，戴上现代白话的帽子，接受语音中心主义的折射，为文化精英们保留进一步追求纯粹口语的可能性，保留中文字母的火种。

为当年使用的语体文重新命名的人正是晏阳初。识字班结业十年后，晏阳初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1929 年出版的英文小册子中如是总结了当年的扫盲计划：

中国系统性的扫盲运动不甚成规模的开端要追溯到法国战场前线，包含如下部分：

- 1) 四卷本的口语白话 [Pei Hua (spoken language)] 读本，含 1300 个“基础汉字”。这些汉字是以科学的方法，从两百余种不同的文学作品和出版物超过 1600000 个汉字中挑选出来的。

晏阳初在这里未曾厘清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却清楚地认定，欧战法国火线后出现的就是可以被当作口语的白话，即严格符合五四规制的新国语。虽然白话从未达到纯粹口语的境界，但白话作为新国语的叙事到1929年已然稳固，稳固到晏阳初自觉地将十年前的语体文实践划归到五四文学革命阵营。公允地说，晏阳初十年后为现代中文第一个扫盲计划建构的白话谱系未见得不能成立，但凡他当年确实用白话一词来定义《华工周报》上的文字，抑或他自己当时确实写过口语式的白话。然而，晏阳初当时所撰稿件从未将《华工周报》采用的文体定义为白话，他自己也从未真正写过可被当作口语的白话。不仅白话从未出现在《华工周报》的文字中，晏阳初在《华工周报》面向华工的征文启事中还前后用了三个不同的概念来描述对参赛稿件文体的要求——普通话、官话和普通官话。这三个各不相同的概念均属语体文范畴，口语化程度按序递减，但是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可以等同于晏阳初回溯性使用的白话概念。

《华工周报》第2期刊登华工征文比赛时首先出现了“普通话”，此普通话并非第2章中瞿秋白倡导的鼓励各方言并存、追求激进平等的普通话，其定义值得推敲。第2期征文是唯一公布结果的，我们由此有幸得见一篇珍贵的华工论著。晏阳初对征文比赛作了如下说明和要求：

论著有奖……本会因要鼓励能著写的弟兄。特奖第一名以二十佛郎。第二名十佛郎。著作以六百字为限。文字以普通话为合宜。交卷须在阳历二月十五号以前。过期不收。著好之后。可交青年会干事先生代寄巴力。以免误延。兹将此次论题列后。华工在法与祖国的损益。

晏阳初自己使用并要求参加征文比赛的作者使用的语言，被称为普通话，可以是口语，也可以是书面语的普通用语，或者是二者的混合体。这里的普通话虽不完全是纯粹的白话，但距离白话理想不远，且和白话语一样，清楚表达了对文言的反感和拒绝。如果说晏阳初的普通话定义仍然在文言与白话二元对立的范畴内，那么下一个关于文体的概念则开始模糊二者的边界。

这个概念出现在《华工周报》创刊号的《本报特告》中，晏阳初在这里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文体为未来的读者来稿定下基调，他还给这个特殊的文体起了一个新名字：

知我驻法同胞，无论在青年会任干事、或在工营中当翻译、以及在工厂码头作佣工、都是急公好义的人、必愿担任义务、为本报谋进步发达。不致坐观成败，置之于不顾。况事方萌芽、需助为急、非得同胞诸先生的赞助、万难办得有成效的。著作不拘长短，本报无不欢迎的。但文字以用官话为合宜、题论以进德智为标准。

这段文白夹杂的文字，固然用了不少“的来表现日常口语，却也出现许多单个汉字（如“知”“谋”“置”“况”）、成语（“急公好义”）、四字结构（“需助为急”），后三种用法都相当书面，无论如何都不能算作白话。这种混杂的文体，晏阳初称之为官话。问题于是出现了，同为描述《华工周报》使用文体的概念，官话和普通话似乎是对应的，但是两者之间假定的对等关系实难成立。一方面，狭义的官话是指官员的语言，从历时角度看，官话自身是有流转变迁的，从共时层面考量，各地官话又有不同。所以，官话的复数性与普通话假定的单一性有直接冲突。另一方面，广义的官话也指政府公文中普遍使用的行政语言，这层含义的官话与普通话相近，但其作为书面语的功能与普通话之追求理想白话的目标又有相当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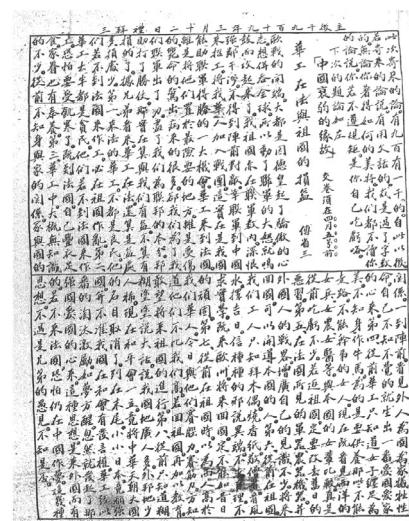
最后一个定义出现在《华工周报》第7期，这期设立了一个栏目叫“华工的论著”。宣布征文比赛的前三甲之后，晏阳初批评了那些以“文话”投稿的作品，希望大家未来都要用“普通官话”撰文投稿。他明确要求今后上交的稿子若不遵循这一语言模本，或是超过六百字，就不合格。“官话”前面一旦加上“普通”一词，就暴露了官话的复数性，并点明中和书面官话与口语官话以求得普通官话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尽管晏阳初将普通官话和文言相对立，反对不必要的文采，拒绝回归文言，他自己的训诫却既有文采又有文言元素。单字词（如“若”）被频繁使用，四字结构（如“十居八九”）时常出现，晏阳初自己使用文话的事实很难用若干句末语气词（如“咯”）一笔勾销。1929年的晏阳初宣称法国前线的扫盲计划遵循的是理想的、语音中心主义的现代白话，然而1919年他笔下写就的文字却并非白话。

将近六十年后，晏阳初才在自己的《九十自述》中澄清了《华工周报》文体的实质：

“这段文字，是当时的一种‘官话’，既不是文言，也没完全做到‘我手写我口’。标点符号，仅限于豆点（、）和圈（。）。”晏阳初告解的关键不仅在于他承认《华工周报》采用的语言是一种既非白话亦非文言的混合体，也在于这个混合体证明第一个现代中文扫盲计划和五四文学革命之间围绕白话语建立起来的系谱并不成立。不无讽刺的是，晏阳初的《九十自述》倒点出了五四在语言文学上的真正成就：五四一代成功生产的首先正是晏阳初所说的打破白话与文言二元对立的语文混合物；其次，便是依语音中心主义原则对语体文的重命名。晏阳初1919年的实践、1929年的重命名、1980年代的澄清，为五四一代成功制造白话语做出了最清晰的注解。对语体文的重命名是白话语制造的关键，也是衔接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汉字革命的关键。对语体文进行充满语音中心主义冲动的再命名，最终使得汉字和拉罗字母这两个相互排斥的文字系统能够在双生革命的大框架下并存和发展。

华工与启蒙

五四新文化的知识精英可能擅长语体文，但语体文未见得就是他们的专利。即便仅就《华工周刊》而言，晏阳初也不是语体文的唯一作者。相似的文风还出现在一位名叫傅省三的华工笔下，而他正是华工征文比赛的冠军。傅省三的这篇文章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篇“一战”时华工的文字。虽一直未曾引起学界关注，但华工的文字本身及其对战争、平等、启蒙话语的反思，都极为罕见且重要。一方面，华工的文字事后虽被语音中心主义裹挟且重新命名，但语体文的实质，因为傅省三文字的存在，并未完全被五四白话语淹没；另一方面，欧战之后世界范围内对战争和现代性的反思，虽一时被改良启蒙主义遮蔽，但傅省三的文章提示了华工对欧战和启蒙话语朴素而深刻的省思。正是傅省三留下的宝贵文字，为我们展示了欧战扫盲计划的语言实质如何被错误命名以适应五四白话革命的语音中心主义的冲动，并同时证明来自华工的对中国启蒙主义的批判又如何被启蒙领袖消音。



傅省三在《华工周报》第7期上的文章（1919年3月12日）

傅省三认为华工赴法利大于弊。他首先勾勒出了战争的地缘政治。战争之所以会爆发，“都是因德皇起了骄傲的心志。想并吞全球。所以动了联军的大怒”。将骄傲的德皇和被激怒的联军对立起来，傅省三指出欧战起于列强间的冲突。和热心欧战的北洋政府一样，傅省三对协约国表达了同志情谊，并对中国不能直接加入战团感到遗憾。尽管如此，他仍认为以工代兵计划是“我国能帮助联军得胜的一大机会”。

傅省三评估：“华工在法实在是益处多、损处少。”其后列出八条理由，涵盖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甚至还有从性别视角出发的考量，有效解释了中国人为什么对巴黎和会备感愤怒。前三条分别讨论华工是否遵纪守法，能否改善个人财务，提高个人知识水平，结论都是在法国比在祖国更能使人进步。接下来三条理由讲道，华工在法见识到的性别平等、工业化，有助于破除封建迷信。前六条理由围绕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发展展开，最后两条理由则升级为政论，以呼应开头。

伴随傅省三文思发展的是叙事视角的转换。论及犯罪、贫穷、无知和歧视女性的前四个较负面的问题时，傅省三使用的是第三人称，称上述恶习的受害者为“他们”或“华工”。第三人称的叙事距离使他得以客观描述华工不出国的种种弊端，转而讨论华工

赴法于已于社会的益处。从第五条开始，叙事视角开始变得微妙。尽管傅省三在论述中用了“自己”“本国”等指称，但句子没有正式主语，用第三人称“华工”可以成立，用复数第一人称“我们”亦可成立。所以，读者既可以认为傅省三在用他自己的声音代表华工群体发言，乐见中国早日像欧洲一样实现工业化，也可以认为傅省三仍延续前四点的第三人称来称呼华工，让华工以中法桥梁的身份，用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speech）表达他们为中国工业化事业做贡献的决心。第六条理由与第五条类似，人称依然模糊，“我们工人”的称谓游走在复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间。有且仅有第七条，傅省三陈述理由时，清晰地把自己定义为属于华工集体的“我们”。旋即，第八条的叙事声音又滑回了模棱两可的“华工”与“我国”。

第七条华工在法于祖国有益的理由，也是傅省三最珍视的理由，八条理由中只有这条让他明确无误地使用了复数第一人称“我们”，以华工这个集体的名义向欧洲人的优越感发问，对种族平等提出要求。傅省三坦承，他和工友们踏上欧洲土地前也认同“西人高于我们华人”的观点。然而与欧洲人日常接触多了，“与他们赛脑力”“赛筋力”，傅省三不得不对欧洲人似乎先天的优越性发生怀疑。“赛”这个动词意味着公开竞争和比较，反对先验性的种族等级秩序。傅省三虽口吻温和，但其对西方优越性的质疑远走在时代前面，要知道几个月后巴黎和会明确拒绝通过种族平等的条款，事实上支持了种族等级。实践出真知，傅省三通过日常劳作和交往，知道法国同事和上司“不比我们高”。这大大激励了旅欧华工群体去追求自立自决，并期待未来回国后服务祖国。

有必要指出的是，傅省三不是唯一认定华工可以与欧洲人一较高下的人，与华工密切接触的协约国指挥官亦对华工大加赞赏。英国军官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就说：“华工在欧，虽饮食起居，远不如欧人之丰富舒适，然仍能精神奋发，克苦耐劳，其工作效率，余虽不敢断言完全胜过白人，然至少能与工作最优之白人相等。”《远东评论》则认为华工在欧洲的存在可能是这次欧洲大战史当中最重要一环。

欧战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在旧帝国的废墟上建立新世界的可能性，而这个新世界似乎向所有被压迫者承诺了平等与自决权。《远东评论》对华工的美誉之词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若从边缘群体追求平等与自决权的角度来看，如何强调华工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从停战到《凡尔赛和约》出炉的数月中，种族平等和国际正义，包括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反帝反殖民运动，五四运动正是其中之一。历史学家马内拉（Erez Manela）认为，“国际范围内的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与美国奉行的“自由派国际主义外交”的兴起，都可以追溯到他称之为“威尔逊时刻”的时间节点上。

威尔逊关于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修辞或许确实为世界各地的反帝独立运动鼓舞了士气，比如朝鲜的三一运动、1919年埃及革命、印度独立运动等。但若认为世界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是应了美国总统的号令，那就有颠倒是非之嫌。马内拉认为中国之所以不满《凡尔赛和约》，是因为“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听到了这民族自决的呼声，并决心中国也应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虽然威尔逊最初勾勒的愿景确实慰藉和支持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反帝情绪，但是操纵和会的大国，尤其是许下美好诺言的美国，最终背叛对民族自决的承诺，正是点燃中国民族主义者怒火的重要原因。简单说，威尔逊时刻的希望和幻灭共同推动了反殖反帝运动的进程。当然，马内拉也正确地指出了民族平等和自决绝不只是威尔逊的个人观点。史学家迈克尔·阿达斯（Michael Adas）旗帜鲜明地点出，对“一战”的反思是“欧美亚非思想家们”的共识，构成了“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思想交流”，其追求平等自决的思想潮流可以追溯到战前。中国思想家们在这场全球性的交流中也并不缺席——梁启超、章太炎都有相当建树。而单从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角度出发，华工傅省三也为这场战后的反思发出了属于华工的声音。

20世纪之初，知识界领袖如章太炎已经开始将平等作为现代性的核心命题来思考。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究平等概念的过程中建立了全新的全球意识，开始重新认知中国在殖民主义世界秩序中的位置，与其他被帝国扩张倾轧的国家——如波兰、南非、菲律宾——无异。正如史学家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所言，晚清知识人开始认识到中国的状况是资本主义的线性发展“在全球规模制造的不均衡性”的又一例证，这一基本认识构成了此后几十年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根基。晚清知识人要打破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就必须先理解这一秩序。要理解这一秩序，就需要研究讨论这一秩序。报刊文章成了思想的试验场，而语体文正是出版物的主要文体。傅省三的文字虽事后被命名为五四白话，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其风格和内容都能在晚清的语

体新闻写作中找到踪影。当然，我们无法从判断傅省三这样的华工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当时报纸杂志的影响。但从将语体文写作当成批判性的思辨媒介这一点来看，他与晚清知识人并无二致。傅省三尝试用书写让自己与招募他到法国为协约国服务的种族等级秩序脱钩，而他不期然间成为华工代表，留下了参与战后反思、争取平等和自决的文字。

追求民族平等、自决的思潮，正如马内拉、阿达斯和卡尔指出的，推动了反殖民的民族主义。除此之外，这股进步思潮更与左翼国际主义的潜流交汇，而华工也在其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据保守估计，三万余名华工加入了苏联红军并参与了俄国革命。而合同期满滞留欧洲的华工中，至少有十人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姓名可考的目前仅有张瑞书（Tchang Jau Sau）与刘景田（Liou Kin Tien）两位。此外，留在法国的“一战”华工甚至在“二战”期间还加入了反法西斯的地下抵抗组织，比如张长松和他中法混血的儿子。华工的政治倾向与活跃表现和当时正在欧洲及中国兴起的左翼意识形态相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大规模学生运动的前提是“一战”华工的以工代兵，而五四学生运动的后续又是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罢工运动，工人影响之大之关键，绝非巧合。如果说五四标志着中国全盘西化的开端，那么它也宣告了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之间正在形成的新的政治联盟，而后者将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母题。舒衡哲定义的“中国启蒙运动”，从此便不得不在左右两极间摆荡，一方面是紧跟资本主义的线性发展，全盘西化；另一方面是追求平等，重建世界秩序，进行社会革命。这中间的复杂关系被华工理解并书写，也是20世纪革命的题中应有之意。

傅省三的第八条也是最后一条意见转至点评巴黎和会，指出中国正面临战后世界新格局的挑战。傅省三写作的当月正是和会召开的第一个月，他似乎对和会进程有相当的了解。此时，和会将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从五席减到两席，不过在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首轮辩论中，中国胜出。和所有人一样，傅省三无法预测山东问题的最终结局。尽管傅省三有一定的理由保持审慎乐观，但是文中的两个“竟”字准确捕捉到了背叛的气息，表达了惊讶。和会为战胜国界定了国家大小，中国被当成小国而日本被立为大国，华工们于是“如梦方醒”，“忽然就发起了那强国爱国的心来”。梦与醒的修辞在晚清之际就已相当流行，到民国初年则愈发重要。余下的篇幅里，傅省三为读者演示了极具批判力的“双重觉醒”。华工觉醒的梦既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所以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中国的“天朝上国”梦，二是欧洲的种族优越梦。他一方面哀叹华工盲目自大，视中国为“地广人多”的大国；另一方面也批评协约国对中国的贬损。华工的如梦方醒自然意味着中国与欧洲优越论的同时破产。扎根平等、自立原则的双重觉醒决定了华工对中国启蒙运动的态度。



《欧游心影录》

双重觉醒当然不是傅省三的独创。前往巴黎观摩和会的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也有类似感悟。亲眼见证了战后欧洲的穷困潦倒后，梁启超发问：“谁又敢说那如火如荼的欧洲各国，他那很舒服过活的人民，竟会有一日要煤没煤，要米没米。”以己度人，梁启超感叹：“我们是过惯朴素笨重生活的人，尚且觉得种种艰辛狼狈”，欧洲人由奢入简，“这日子怎么能过呢”。既然欧洲和中国都穷困潦倒，那么天朝上国和欧洲优越性的迷梦也就都无甚吸引力了。和傅省三一样，梁启超也用了若干“竟”字来表达惊讶，战后的见闻让他不得不反思欧洲文明的优越性，进而质疑这个文明本身是否参与制造了欧战的灾难。欧洲梦曾被当作中国病的解药，但如今因为战争的浩劫与和会的背叛，风光不再。知识界领袖和华工一样，对中国梦和欧洲梦的双重祛魅，为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批判性反思定下了基调。傅省三的短文关心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重建过程中对边缘族群来说最迫切的平等和正义的问题，这与彼时世界各地的重要思想家的战后反思不无共通之处。他的文章之不同寻常，不仅因

为劳工阶级的书写本就罕见，更因为底层劳工罕有对战争的批判性文字，且很难被知识分子重视。当然，我们不能天真地以为傅省三的文字在全球战后反思话语中有重要影响，这篇短文的影响力可能仅限于被晏阳初挑中成为《华工周报》征文比赛的冠军。坦白说，晏阳初看中傅省三的文章大概也未必是因为它的批判性。晏阳初在宣布征文比赛结果的声明中，虽对冠军文章不予置评，但坦率分享了他自己关于征文题目的看法。在赞扬了所有来稿后，晏阳初提出，决定华工在法与祖国的损益的，“大都实在我们自己的造作”。有两个问题，晏阳初认为尤其重要：一是金钱问题，二是对青年会老师们的态度。关于金钱，他告诫华工不要赌博，因为不仅会输掉用储蓄“立身兴家”的机会，更可能由此“使我们中国人在外国得了一个好赌博的坏名誉”。晏阳初于是问道：“这种人你想与祖国有益呢？有损呢？”紧接着，他谈到某些华工对青年会的服务不够珍惜。晏阳初告诫华工读者他们到法国“最好的”一件事，是“你们有那美国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白天演说，夜间开班，来教授你们。分文不取”。那些浪费这个“从来未有的机会”的华工，简直是“自己仍在睡里梦里”。晏阳初于是再问了一遍：“这种人到外国来与祖国有损呢？有益呢？”

和傅省三一样，晏阳初也使用“梦”的意象；和傅省三不同的是，晏阳初呼唤的觉醒并非“双重觉醒”。正如晏阳初的编首语所示，设置征文比赛的初衷不是为了邀请华工对中国的战时经验做批判性思考，而是为华工提供一个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的渠道。诚然，批判性思考与自我完善没有理由不能共存，傅省三的文章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晏阳初此处的编首语和其他文字，实际上将批判性思考从自我完善中剔除出去了。正如一个目不识丁、冥顽好赌的华工很难思考到种族平等这一层面的问题，一个认识到“双重觉醒”重要性的华工可能也同样不适合晏阳初的启蒙计划。晏阳初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的启蒙概念，既不是欧洲那种从宗教迷信中祛魅的启蒙运动，也不是舒衡哲界定的反对父权、拒绝盲从的中国启蒙运动。晏阳初式启蒙的核心，是一种文明开化的使命，其预设对象是不文明、未开化的大众，而他们将接受知识分子的教育并完成自我完善。晏阳初写过一本英文小册子《中国新公民》，是平教会筹款三部曲的第一部，晏阳初有如下宣言：“他们（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接受挑战，抓住机会教育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文盲去争取民主。正因为此，中国大众教育才被组织起来，才有了‘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

晏阳初对“除文盲”的坚定信念，自然导致他会拒绝对拒绝接受教育的华工不甚满意。相形之下，他最津津乐道的华工故事来自一位欣然接受了教育且慷慨反哺的华工。这位华工写信感谢“晏先生大人”办报并教他所有“天下事”，因为害怕报纸定价太便宜无以为继，遂向《华工周报》捐出三年的积蓄总计 365 法郎。晏阳初多次在演讲和文章中提及此事。在接受赛珍珠采访时，他更坦言：“这真是让我感动的事情。我决心用我的生命来扩大他的生命。”“苦力”对我来说于是变成了一个新词。我许诺将让他摆脱痛苦，助他发展并强大。”所以，穷困但感恩的苦力形象为晏阳初及其同仁的启蒙工程奠定了基石。这个启蒙工程从扫盲计划与平民教育开始，整合乡村重建和公民训练，最终指向基督福音。正因如此，傅省三这样开化且具有批判意识的华工形象自然与启蒙使命格格不入。所以，尽管《华工周刊》征集了不少华工作品，但是不可能让过多的华工政论付梓发表。批判性的文字不仅威胁扫盲计划的紧迫性，更有可能削弱启蒙工程本身。即便如此，傅省三的这篇获奖短文还是为我们保留了理解和想象华工的另类角度。晏阳初虽将傅省三的文字纳入文明开化的话语内部，但面对华工文章中的批判维度，晏阳初不得不选择沉默。这意味着深长的沉默多少说明华工的声音难以驯服。书写对晏阳初及其同仁而言，是通往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启蒙运动的康庄大道；对傅省三和他的工友们而言，书写则是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创作的领域，是底层工人提出要求种族平等、国际正义的重要媒介。这段复杂又充满反讽的历史，以语体文的方式为我们做出了如下总结和提示。首先，尽管华工的文字证明语体文能有效遏制纯粹口语的语音中心主义冲动，然而华工识字班却被追认为语音中心主义之新白话的创制时刻。其次，尽管语音中心主义的二律背反具有正面力量，能赋权不识字的华工，但在华工能够或者应该写什么的问题上，仍然限制重重。最后，尽管“劳工神圣”的故事似乎退出了关乎“一战”集体记忆的历史论述，但是华工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鲜活的例证，证明寻求和平、平等与正义才是真正的战后遗产，激励着五四一代和更多后来者。

附件

傅省三《华工在法与祖国的损益》

欧战的开端。大都是因德皇起了骄傲的心志。想并吞全球。所以动了联军的大怒。就鸣鼓而攻起来了。我祖国亦在联军数内。深恨强邻干涉。不得到阵前对敌。幸联军到中国来招工。将我华人加入战团。这实在是我国能助联军得胜的一大机会。华工来到法国。虽是将他们置于最险要的地方。虽是受伤的、毙命的、惊出病来的很多。却我们为了我们联军出了力。尽了我们为联邦的本分。邦助打了胜仗。那实在算与我们有益。不算有损的了。据兄弟看来。华工在法。还算是益处多、损处少。第一、来法的华工。不都是良民。他们若不到法国来作工。必在祖国作乱。第二、华工大半都是贫民。他们若不到法国来作工。恐怕要受饥寒了。既到法国。自己丰衣足食。家眷也有奉养。第三、华工中。大概无知识的不少。从前不知身与家的关系。家与国的关系。一到阵前。看到外人为国为家牺牲性命。自己不知不觉得就生出一番爱国爱家的心来。第四、从前华工只知道女子缠足为美。不知身作牛马。为的是要供养那些不能走路。不能干事的女人。现在既看见西洋的女兵、女农、女医等。与本国的女辈比较。真是从前吃亏不少。若返祖国。定要改去旧日的恶习。第五、在法国所见的军器、农器、机器。并外国人的战略。增广自己的见识不少。将来回国。可以开导本国的人。第六、从前在祖国。我们工人只知拜木偶。烧香纸。敬僧道。看风水。择吉日。信种种的邪说异端。不求真理。不求实学。既来欧洲。将来回国。定不能如昔日的顽固。第七、从前在祖国时。以为西人高于我们华人。今日与他们赛脑力。赛筋力。方知道他们不比我们高。若回祖国。再加以教育。敢望将来祖国的进行。第八、从前只知道糊糊涂涂说大话。说我国地广人多。外邦地少人稀。现在和平会一立。竟将中华天朝大国的名目取消了。列在末尾。小小日本。竟称强国。并不准我国在和会有发言权。华工经此番的淘汰激励。如梦方醒。忽然就发起了那强国爱国的心来。这种思想。是来外国而有的。若不来法国。恐怕仍在中国作梦。这几种思想。不过是兄弟的愚见。不知是否。



钟雨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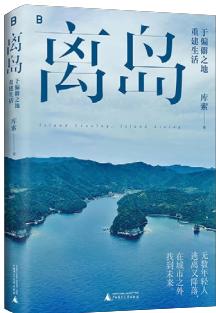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长聘副教授。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专业（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硕士、博士）。研究兴趣包括书写系统与技术、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比较文学、文学与媒体理论。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文内图片由作者拍摄



“四个孩子真够呛！”住在宫崎家的日子里，我经常会情不自禁发出这句感叹。继而，每当我思考要截取哪一个片段描述这个六口之家手忙脚乱的状况时，就会发现每一幕都是那么具有代表性，它们连贯地构成一个密不透风的日常。最后我只能说：每天都有一些时刻，我希望我手里有一个静音键，或者一件随时掉落的隐身披风。

对于我的感想，无论雅还是美穗，回答总是一致的，他们说，“顶峰时期已经过去了。从七年前阳太出生到如今的四个孩子，一直都只由夫妇两人抚养，没有向双方父母寻求过帮助。宫崎夫妇心中的顶峰时期，是双胞胎刚出生的时候，环保循环型的生活中没有‘一次性尿布’这个选项，雅也说，这导致了他们要洗四十片尿布，每天如此。而美穗经历的显然比丈夫更加混乱，她试图回忆那些日子，然后放弃了，她对我说：‘那是完全没有记忆的两年。’”

按照我对美穗的观察，即便是在她认为“已经缓过来了”的现在，她也无时无刻不在忙碌之中，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一个典型案例是在垒球大会那天：夫妇二人在早上6点起床，为孩子们准备早餐和便当，而后由雅也给孩子们换衣服、收拾行李、再用小面包车载去体育场，美穗则提前换上运动服，独自一人在烈日下骑车去四公里之外的场地比赛；打完两场球，她又独自骑自行车回来，快速冲了澡，立刻投入厨房去准备晚餐。这一天，我在早晨的起居室、正午的体育场、傍晚的厨房数次与她在一起，一刻也没有看见她的脸上流露出疲惫，美穗的体力令我惊叹，我认为她是一个钢铁战士。

“生四个孩子，是有计划的吗？还是顺其自然？”周末之外的早上，美穗送孩子们回到午饭之间的一小段时间，我才能单独跟她聊一会儿天。这种时候她可以短暂地从繁忙中脱身出来，暂时忘记水池里那一堆锅碗瓢盆和洗衣机里塞满的脏衣服，她可以坐在榻榻米上，对我谈起一些她自己的事情。

“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就憧憬一种有很多孩子的家庭生活，比起在事业上取得怎样的成就，更想和孩子们一起成长。只是年轻时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从结果来说，虽然很晚才结婚，我还是过上了这样的生活。”她语气坚定地告诉我：这就是她要的生活。我想，这就解释得通了，为什么我从未见过她抱怨过哪怕一次，也从未见过她发脾气甚至只是不高兴：一个人如果认定眼前的生活即是理想，那么无论它在外人看来多么兵荒马乱，她也能够总是面带笑容注视着它。

十四年前，美穗第一次来到海士町。那是世界有机农场机会组织（WWOOF）的一个活动，她作为团队里的一名志愿者，在岛上待了两周，就住在民宿但马屋——在那里工作进入第四年的雅也有了初次照面。于是，雅也听说了美穗丰富多彩的人生故事：她出生在名古屋的一个教师家庭，自己念的也是师范专业，但在大学毕业后没有着急找工作，而是用打工赚来的钱去全世界旅游了。我猜她的英语口语就是那时候练得很好的。直到过了25岁，她才开始找工作，不愿被工作剥夺自由，只是在大阪的一间高中做临时聘用的英语老师——这份工作每年有几个月寒暑假，能持续满足她看世界的需求，那之后她又独自去了许多地方，先后去了七八次东南亚，在中东和中南美洲一待就是三四十天……雅也从美穗口中听到这些故事时，没有想过这个女人在几年后会成为自己的妻子，等到他们从非洲的新婚旅行回来，世界就会回归起居室，宇宙将围绕四个孩子转动。这些都是后话了。雅也只是觉得美穗的经历很有意思，主动提出要介绍在岛前高中担任“魅力化特命官”的岩本悠给她认识，考虑到后者也是有过丰富世界旅行经验的人，他认为这两个人一定很有共同话题。就这样，美穗第一次到海士町，就和岩本悠见面了，岩本悠在那场谈话的最后向她发出邀请：“我们正在为岛上的高中寻找英语老师，你要不要来？”这个邀请，就像当年岩本悠接到海士町武士发来的直球一样突然，他显然已经沾染上这个小岛的行事作风，但30岁的美穗不是当年满腔热血的他。她拒绝了，觉得这件事绝无可能，

找回土地的力量，活出另一种人生。

非虚构

普通人如何从孤岛上汲取生命的另一种可能？

库索 | 新书推荐

离岛，指远离本土的、隔绝于世的岛屿。日本不止是东京、京都、大阪、北海道……日本有400多个有人的离岛。每200个日本人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离岛。

作家库索历时三年，独自走访了日本最为偏僻的数个小岛，切入岛国鲜为人知的边缘地带。五岛、佐渡、隐岐……离岛满足人们与世隔绝的浪漫想象：丰裕的自然，亲密无间的邻里关系，得以完好保留的古典之美，悠闲缓慢，自给自足。

在库索的视角和笔下，离岛存在着多元的价值和可能性，但也面临严峻的现实：这里没有超市、便利店、医院或任何娱乐设施，少子化和高龄化现象空前严重。交通不便、资源匮乏、性别歧视、传统文化与艺术无以为继……耕田捕鱼的原住民为生计所困，只能奋力逃离。

但意外地，她又看到很多崭新的气象：为日本人定制旅行的年轻美国亚裔，拜师学艺、移住小岛四十余年的加拿大老先生，从零开始种植葡萄的法国金牌酿酒师夫妇，毕业于东京名校、拒绝高薪offer的80后爸爸，带领非遗传统艺术重获新生的庶民表演者……在刚刚过去的、充满“错位感”与不可思议的三年里，他们活出了我们不敢过的人生。

离岛不只是日本的缩影，也是世界的缩影。近代东亚社会共通的矛盾点，在这里一触即发。闭塞与贫穷是否真的无解？

经北京贝贝特授权，我们节选了《离岛》第三章中宫崎一家的故事，分享给读者。

离开的时候也没有回望岛影。她默默在心里下了论断：有生之年不会第二次再来这个地方。

如果用离岛移住者的经验来解释命运，那么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种情况：有时候人选择命运，有时候命运选择人。美穗属于后者。与她一起作为志愿者来到海土町的恋人，是一个在菲律宾学英语时邂逅的比她小 10 岁的日本男生，用她回顾人生时的描述来说：他们之间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大恋爱”，为了开始这段恋爱，她甚至撕毁了一段既定婚约。轰轰烈烈的大恋爱，在从海土町回到大阪之后戛然而止。这一次失恋，令美穗感到遍体鳞伤，她决定放下自己一直在追求的婚姻、家庭和孩子，从此之后只靠工作生活下去。就在那时，她想起了岩本悠的邀请，仿佛看到一条出路。

一个决定放弃人生规划的 30 岁的女人，舍弃对爱情、婚姻与家庭的渴望来到小岛，却在岛上成了四个孩子的妈妈。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不仅是听故事的我，就连当事人自己也觉得命运颇为不可思议。

“一天都没交往过，突然就被求婚了，”她笑着提起和雅也的开始，“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

美穗进入岛前高中当老师，正是岩本悠倡导的“高中魅力化”在日本成为一个新概念的时候，媒体报道一边倒，皆是溢美之词。而作为亲历者，美穗却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她理想中的岛生活，应该是人们自己种植大米和蔬菜、出海钓鱼，孩子们赤身裸体在自然中游玩，离食物很近，离生命很近，因此能造就一个优秀的教育场所。但理想与现实永远不在同一轨道。美穗在岛上感受到的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人们完全不重视自然教育，各个环节都是公立教育机构，采取和城市完全一样的教育方式。美穗对此十分反感，日本传统而死板的应试教育，她称之为“扼杀孩子性格的教育方式”，其核心理念是：在学校里，只需要听老师的话，按照老师的指令做事，这样就是好学生。美穗陷入了深深的困扰，她听信宣传来到小岛，却发现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与她想象中相距甚远。此时，海土町又渐渐出现“名人效应”：东京的人们受到岩本悠的号召，从大型企业辞职来到岛上，开始实践各种事业。然而，在她看来，那又尽是些都市思维，完全不符合离岛水土。

“总觉得哪里很奇怪。”美穗说，在学校里，她意识到人们由于太过信任岩本悠，把他视为神一样的存在，谁也不会开口说感到奇怪。十年前的海土町，一切才刚刚开始，处处弥漫着一种“即便觉得奇怪也不会说出来”的氛围。

在无法纾解的困惑之中，美穗急需一个人倾诉，她想到了“移住样本”宫崎雅也：这个人很了解岛上的事情，应该能解答我的疑惑吧？于是，到海土町工作之后，美穗第一次联络了雅也，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雅也问她：“要不要考虑和我结婚？”

就像当初拒绝来海土町工作一样，美穗当然拒绝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求婚。也就像她最终还是来到岛前高中做老师一样，八个月后，她改名为宫崎美穗。答应结婚不久后，她由于对岛上的教育方式深感失望，已经签订了一份新的工作合同，计划回到大阪。于是，宫崎夫妇刚结婚就两地分居了，美穗履行约定在大阪当了一年高中老师，才重新回到小岛。就算回到了小岛，她也不打算再去高中工作了。

小岛从来不是什么世外桃源，它充满了问题，从美穗的角度来看，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她回到岛上，很快怀上了阳太，荷尔蒙开始失调，这时家附近的空地突然开始施工，也没有按照流程事先在居民之间召开说明会。每天噪音难耐，她觉得厌倦至极，再次作出决定：“太讨厌了！我要离开岛！”这一次，雅也决定跟随她，两人开始制订搬家计划，去全国各地考察那些已成规模的移住代表地，去了岐阜县，又去了德岛县的神山町……看了一圈，才终于发现：尽管存在着各种未解决的问题，但，还是海土町最好！

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我觉得美穗太勇敢了。她生阳太时 38 岁，已经是高龄产妇，却连续生了四个孩子，一直到 43 岁。年龄带来的风险自不必说，况且在这个岛上，生孩子并不是一件那么便利、那么有安全保障的事情。海土町虽然有学校，却没有医院，仅有一间小型诊疗所。孕妇做定期产检，要搭船去邻岛的岛前医院——每个月两次，会有来自岛后的妇产科医生在那里坐诊。就算是这间医院也没有接生条件，临产前，孕妇必须前往岛外的医院。

生了四个孩子，美穗每次经历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最初生阳太的时候，她去了岛根县松江市的医院，这也是距离海土町最近也是最优的方案，地方政府会按照国家规定报销部分费用：包括 42 万日元的生育补贴、5 万日元的交通补贴和每天 2000 日元的住宿补贴。几年后生双胞胎时，医生告诉她存在一定风险，美穗便在预产期回到了父母家，名古屋的大医院更有保障。这也是岛上常有的情况：比起独自在医

院生孩子，住在父母家，有人照看，也更方便。到了生小女儿，考虑到美穗的年龄，医生建议她早点儿去岛外待产，她便又回到了父母家，但因为身体状况还不错，最终没有去医院，而是请了一位专业助产员到家里接生。我知道日本政府正在大力倡导人们多生孩子，试图挽救一个少子化的社会，便问起了离岛的政策。美穗说，生孩子可以得到奖励，生得越多奖励越多，奖励标准在全国都大同小异：第一个孩子 10 万日元，第二个孩子 30 万日元，第四个孩子以后，可以一次性得到 100 万日元。

无论经济情况如何，无论生再多的孩子，至少在教育这件事上，即便是贫穷的家庭也不必担心太多。按照全国统一的标准，学校是否收取学费、学费收取多少，完全取决于父母的收入情况。宫崎家的年收入没有达到最低收费标准，四个孩子读书完全是免费的。但美穗偶尔还是有些担心：免费教育最多持续到高中，等到要上大学的时候，因为要离开岛，也许会花上一大笔钱。她对我说，宫崎家差不多也要开始考虑一些增加经济收入的方式了。

移住者们来到岛上多数会生孩子，基本生两个，平均生三个，这是海土町比日本其他地方高出来的数字。最近的新生儿真的很多，美穗也发现了这一点，不久前保育园的人数破天荒地超过了 80 人，甚至出现了孩子进不了保育园的情况。这是“海土町奇迹”的一个重要体现。

为了吸引更多育儿家庭的到来，海土町政府为岛上育儿的妈妈们打造了新的容身之地。保育园旁边有一个“育儿支援中心”，每月举办一次咨询会，给在育儿过程中有烦恼的妈妈们提供建议和帮助；我们举行 BBQ 大会的阿玛玛莱，重心之一就是给育儿的妈妈们提供交流的场所，她们聚在那里倾诉和分享；而在中央图书馆里，也开辟出了一个让亲子长时间共处的休闲角落。

如同我在 BBQ 大会上遇到的森田夫妇一样，确实开始有一些人为了孩子的成长而选择这个小岛，他们认为：海土町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它安全而友好，并且亲近自然。美穗还向我提起一个在大阪做理疗师的女人，她因为强烈地希望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接受教育，把丈夫留在大阪，独自带着两个孩子来岛上上学，待了两年才回去。在日本也存在许多这类“为了孩子的教育”而四处流离的家庭，听闻这个女人回到大阪以后，为了让孩子进入某所以教育见长的小学，又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一直过着陪读生活。

在海土町的教育设施中，近来人们频频提起的是“山的教室”——一个接纳 3 岁到小学入学前的幼儿的设施，可以视为一种私立幼儿园。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地方，是坐在福田的车上，它就位于金光寺山山腹，我们经过时，福田特意指给我看，称它为“森林幼儿园”，说也由自己所在的那间自然村经营。他向我描述它的特别之处：“传统的幼儿园，孩子们成天在室内学习和玩耍，但在这里，孩子们在外面玩耍着度过一天。”福田还说，这个“培养不一样的孩子的教育机构”仅能容纳 14 人，已经满员，全是移住的孩子，如今年龄最大的 6 岁，最小的 3 岁。甚至有人专门为了这间幼儿园移住到岛上来，因为在城市里，孩子绝没有机会在自然里成长。

宫崎家的双胞胎姐妹也被送到了山的教室。美穗选择它的原因和福田说的差不多，她也认为这里和日本传统的幼儿园培养孩子的方式截然不同，无论晴雨风雪，孩子们总是身处自然中，一边认识和思考自然，一边成长。“下雨天也会穿上雨衣戴上帽子到外面去，”美穗说，“因为在雨天活动的生物和自然里的声音，与晴天里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个五月的末尾，孩子们还会被带去宫崎家尚未开始插秧的水田里，尽情玩耍，滚得全身泥。

事实上，无论“山的教室”还是“森林幼儿园”，这两个名字都没错。称呼上的差异代表着它诞生时的两种想法以及实现这两种想法的两种力量：非营利组织隐岐自然村和岛上育儿的妈妈们。这件事最早要追溯到 2008 年，自然村开始举办面向小学生的自然体验活动，并逐渐将活动对象扩展到幼儿。2012 年，出于“想让孩子在大自然中玩耍”的想法，岛上育儿的妈妈们成立了“亲子散步会”，不久后，自然村的工作人员开始支援这个亲子自然散步活动，并在此基础上，于 2014 年正式开始运营山的教室，每周举办一次活动。育儿的妈妈们认为每周一次太少，希望能增加活动，又成立了“森林幼儿园创办会”，并在 2016 年成为海土町教育委员会的委托项目。

来自社区和育儿妈妈们的需求越来越大，山的教室从每周一天演变成每周两天，然后是每周三天，到了 2018 年，终于成为周一至周五开园的幼儿园。我去看了它的官网，发现收费并不算高，包括每月 3.7 万日元的保育费、每年 6000 日元的饮食费以及 1000 日元的会员费。

官网上还写着这所学校的口号：“山的教室，尽情玩耍的岛屿”。并作出了如下阐释：

什么是“尽情玩耍的岛屿”？

对于幼儿来说，“玩耍”就是“学习”，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基础体验。

然而，即使在现代社会的离岛上，孩子们自由地在田野上玩耍的机会也在减少。

此外，自然环境中的游戏，即通过五感促进身心发展的机会也在逐渐减少。

我们希望在这个集山、海、村庄、稻田等各种自然环境的岛上，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够在整个岛上奔跑、尽情玩耍的环境。

我们希望尽可能减少大人的干预和引导，让孩子们能够尽情地“玩耍”，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我们相信这样可以培养他们对岛屿的爱和生活所需的基础技能。

在宫崎家的日常生活中，我充分见识到山的教室的教育成果。一天，双胞胎姐妹每人捧着一盒胡颓子的野果回来了，说是老师带着去山上摘的，晚上几个孩子又一起把它们做成了果酱。又一天，双胞胎各自手里拿着一袋糖果，说是这天去了附近一个爷爷家帮忙采摘枇杷，不仅把枇杷作为伴手礼带回来，这位爷爷还给每个孩子准备了小零食。这是一间幼儿园可贵的地域联结功能。它把每周五定为户外活动日，老师会带孩子们到岛上各个地区的村落远足，和当地的老人们聊天，老人们偶尔也教孩子们玩从前流行的游戏。福田对我提及这件事时赞同不已：“岛上许多村落已经没有小孩了，老人们借由这样的机会和孩子们接触，他们感到很开心，这对恢复地区的活力至关重要。”



宫崎家的四个孩子，成长在一个没有电视和游戏机的世界里。独立生火煮饭和吊在枇杷树上的自制秋千，构成了他们的童年乐趣。

阳太进入小学前，也一直待在山的教室。他入学的那一年，这个教室刚开始推行每周五天制，美穗为此觉得运气很好。她又说，教室正在讨论从明年起将接收年龄下限调整到不满周岁，如果能通过，她就可以提前将小女儿也送进去了。

宫崎家的孩子会熟练使用菜刀，我想，与这个教室应该也有着密切关系：它的午餐由每周两次学校校餐、两次家庭便当和每月两次自己做饭构成，美穗向我展示了一张照片，是孩子们自己动手做饭的场景：年龄大的孩子带着年龄小的孩子，有人在生火，有人在切菜，有人在煮饭，有人在炒菜……在这个教室里，没人会对小孩使用菜刀大惊小怪。不过，美穗告诉我，阳太从两岁开始就会用菜刀了。我后来在宫崎家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书，书名令人震惊：《厨房育儿：一岁开始使用菜刀》，再翻到版权页一看，出版于1990年，作者是当时在NHK教育节目里登场的一位烹

饪专家。据说这种小众的“食育”方式，如今正在日本重新受到关注。

“你想不想去山的教室看看？”在我和美穗围绕着这间幼儿园的教育方式进行几天的讨论之后，她突然向我提议，并且在我表示乐意至极之后，立刻征询了教室老师的意见。我得到了许可，可以去旁观一个晨会。

按照美穗的说法，山的教室的一天从晨会开始：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老师先给他们读绘本，让他们从不舍离开父母的心境中安定下来，然后再让他们轮流发表意见，关于这一天想做什么，最后会一起商量出一个统一的答案，并用接下来的这一天去实践它。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老师不事先准备日程表的教室。

这是山的教室独特的行事方法，也是美穗颇为认可的理念，她认为这是一种颠覆当下日本教育的进步方式：在普通的幼儿园，通常由老师来决定这一天应该做什么，孩子们甚少有机会发表意见。而在山的教室里，是由孩子们决定自己想要做什么，他们也从来没有任何被禁止的事情，老师从来不说：“这样不行！”其实福田也对我提过这一做法，当时我不太相信，煞风景地问：“如果真的是不能干的事情呢？比如……想拿刀捅人？”“那当然是不行的，”福田笑道，“但是不能简单粗暴地说不行，要向他们解释清楚为什么不行。”我还是半信半疑。我有限的人生经验告诉我，没人能跟人类幼崽讲道理。

我很想见识一下山的教室的老师们究竟有何本领，能用成人的方式与孩子们沟通，次日早上便和美穗一起送双胞胎去幼儿园了。我受到了老师的热烈欢迎，他们对我提出了唯一的要求：请静默地注视着孩子们。

从早上9点开始，山的教室的晨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教室外的一片空地上，孩子们各自搬来凳子，围成一圈坐下，在老师念绘本之前，她们唱了一首以鱼类的名字做关键词的即兴歌曲，每个人都会唱出一些各自偏好的（很多人唱了前一晚出现在自家餐桌上的）鱼类名字，我心情复杂地发现：这个岛上幼儿园的孩子们认识的鱼远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念完一册绘本之后，我又意识到，这个教室也不是全然没有计划，比如这天，老师其实想带孩子们去山上采摘一种名叫DOKUDAMI的野生植物（我定睛一看，惊喜地发现：这不是折耳根吗！），但这里不会用一种命令的方式来执行计划，那位看上去刚刚20岁出头的年轻女老师，手里拿着一枚折耳根的叶子，用征询意见的口吻说道：“今天想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又到了蚊虫繁衍的季节了，大家在家里被蚊子咬了，都会怎么做呢？是用商店里买的药吧？DOKUDAMI的叶子很厉害，我们可以用它制作对付蚊子的药。怎么样？今天大家要不要一起去采摘DOKUDAMI呢？”

如我所料，人类幼崽是不会轻易配合的。一些孩子拒绝了这个提议，表示自己还有其他想做的事情，想要继续昨天的游戏，想要去另一座山，或是干脆就想躺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然后我也终于明白晨会需要开那么久的原因，这位老师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倾听、商量、谈判和说服，把各种天花乱坠的想法协调成一个集体行动。最后他们一起决定：早上上山采摘DOKUDAMI，作为交换，下午再执行其他两个方案。确实如美穗所说，在整个过程中，我一次也没有听说过命令或禁止。

我一直目送孩子们装备齐全地向山里走去，三个老师带领十四个孩子，每个老师都背着巨大的登山包，里面装着应急物资和专业的医药包。这些老师也都是从岛外来的移住者，看上去很年轻，其中甚至还有一个穿着鲜艳的大红色T恤、染着一头金发的小青年，看上去和孩子们关系十分亲密。我想，这大概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毕竟城市里充满了规矩，没有哪个幼儿园会允许老师打扮成这幅模样。

离开山的教室之前，我们遭遇了一些麻烦，双胞胎之一的一个，因为美穗的离开而放声大哭，据说每天如此。但到了下午放学回家时，她已经忘了早上离别的悲伤，兴高采烈地向我汇报：“今天摘了一大堆DOKUDAMI！”因此，即便是我这样对养育孩子没有经验的外行，也确实能感受到这种教育方式的特别，以及孩子们从中被培养出的强大的快乐能力和生活技巧。

宫崎家的育儿方式，是一种“让孩子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完全不严厉的教育方式，他们从不对孩子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我原本以为这是夫妇二人的性格使然，到这天才知道和山的教室一脉相承，是刻意而为之。反倒是我，由于惯性的思维还没改变，经常不自觉地对孩子们脱口而出：“不可以！”然后立刻就后悔：“不好！我是不是妨碍这个家庭的教育了！”那之后的某一天晚上，我心血来潮想试一试山的教室那位老师的沟通方式，在双胞胎的一位缠着我把她举起来时，我开始尝试商量、谈判和说服：“如果你明天去山的教室不哭，晚上我可以和你玩两次这个游戏。”奇迹发生了：人类幼崽竟然真的可以讲道理，也会遵守约定。那天下午回家时，双胞

胎的另一位立刻向我汇报：“她今天没哭！”

“教育孩子们学会忍耐，当然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美穗对我说。但是，基于自己过去受到的教育，她认为让孩子们学会自由更加重要。她的整个中学时代都在垒球部的社团活动中度过，每天早上上课前要先进行训练，下午放了学也继续训练，周六周日完全没有休息，一直处在高压的训练中。这也是一种日本典型的“以运动为中心”的教育方式，一个体育部的部员，是被默许在文化课上睡觉的。美穗觉得，垒球部的生活令她得到了很多，但同时也扼杀了她自由自在的想象力，忍耐和努力固然是好事，但人生变成这样真的好吗？所以她更加认同山的教室的教育理念：让孩子们从小就独自思考和行动，不把他们训练成整齐划一的群体。

“不能说哪种教育方式更好，只是想让他们经历我过去没有机会经历的一种生长环境，”美穗甚至有点儿羡慕自己的孩子们，“我觉得能够像那样自己去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真的很好。”不过，她又想了想，注视着刚刚进入人生第一个叛逆期、顽皮得有点儿过头的阳太，感到微微头疼：“因为自由过了头而无法忍耐的一天没准什么时候就到来了呢！”正如这个小岛正在摸索出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教育方式一样，宫崎家在努力避免孩子成为他们那样的死板而传统的应试教育产物的同时，也依然还在继续寻找和平衡着为人父母的正确方法。

“你想不想去小学看看？”从山的教室回来后，美穗又问我。

次日是阳太所在的小学的开放参观日，每个班级的家长被要求前去旁听一堂课，然后与老师进行面谈。美穗认为，如果我亲眼目睹传统小学的教育方式，会更明白山的教室的特别之处。我答应了，内心觉得无论内部还存在多少问题，海士町确实是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地方，因为就连公立小学也同意了我这个无关紧要的外来者的旁听要求。

我在海士町的时候，整个岛上的小学生加起来超过一百人，他们根据居住地域分布在两个学校：海士小学和福井小学。人数大抵相当，前者有五十三人，后者为五十六人。对于一个离岛来说，这就已经很热闹了。尽管每个年级仍只有一个班，而阳太所在的二年级，仅有十一个学生，其中八个是移住者的孩子。

我刚一走进海士小学，阳太，在学校里也保持着与在家里一致的亢奋状态，便从教室里探出头来，高声喊道：“中国人来了！”两旁攒动着一堆人头。我才知道：阳太家里最近来了一个中国人，这件事已经在海士町的小学生之间传开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为是第一次见到中国人，充满了好奇，企图从我身上打量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来，一位女孩大方地走到我面前，提出了她的问题：“听说你是作家？你是用笔写书吗？”

不过，等到上课铃声响起，小学生就没有时间再围观中国人了，他们迅速从我身边散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腰杆挺得直直的。这是一堂下午两点的语文课，老师手里拿着一册全国统一的课本，不断就其中心思想提出问题，并不时从中抽出一些生词来。这个时候，学生们总是高高抬起手来，整齐划一地在空气中书写这个汉字，并按照笔画大声地喊出“横”“竖”“撇”“捺”的口号来。刚才挤在窗前的自由自在变成了一种假象，他们仿佛是经过训练的军队。我在一堂45分钟的课堂上目睹了无数次起立、鞠躬，整齐划一地把椅子拉出来又推进课桌之后，充分理解了美穗对传统教育的那种反感从何而来。这间教室像精密系统一样按部就班，我意识到它的目的，它立志要把所有的人都打磨成同一个形状。

与小学生整齐划一的模式相比，我觉得坐在最后一排的家长也很有趣。我原本抱定了“做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中国人”的打算，偷偷坐到了最后一排，按照我在中国的生活经验，这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位置。不料，后来进来的家长们，全都挤在了两旁的角落里，最后我拥有了一个空旷的中心位。我再一次感受到了日本人的性格——论把自己藏在人群中这点儿心思，我还差得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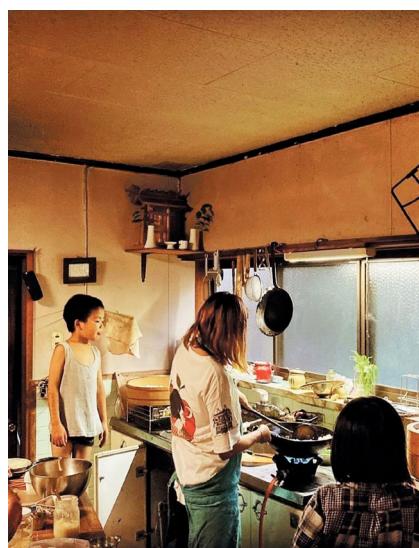
在海士町这样的小岛，即便只在十一个小学生家长构成的人群里，我也可以遇见一个熟人。我看见过山口先生。几天前我刚认识他，他是“成人的岛留学”项目的负责人，有一个孩子也在这个班上读书。他告诉我，在这堂课上担任助教的是一位成人的岛留学生，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几个人。在一个仅有十一个学生的教室里竟然同时存在一个老师和一个助教，这样的场面在我看来实在有点儿多余，整堂课我盯着那位助教，她不时被某个孩子叫过去，单独讲解着一些问题。但这是为了公平教育，后来美穗告诉我，在日本人口顶峰时期，每个班级的小学生通常有四五十人，孩子之间的水平差异巨大，偶尔还有一些心理发展障碍的孩子，一个老师完全应付不过来，“助教”这一职位就是在那时出现的，他们负责填补这种差异，辅助跟不上进度的学生。

如今，虽然少子化造成班级人数急剧减少，但助教仍在许多小学保留着。

我发现了，在这间教室里，不仅是孩子和孩子之间、家长和家长之间，所有的孩子和家长也都互相熟识。几天前我经历了山口和阳太的一场对话，山口说：“大叔种的土豆，下周会出现在校餐里哦！”阳太则自豪地说：“雅也做的米花，已经在校餐里出现过了！”我吃过雅也做的米花，一个下午阳太把它泡进牛奶里，盛情招待了我。雅也的工厂里有一台小型爆米花机，把自家种的有机米扔进去，就会变成健康的零食，放在港口的商店里卖，也供应给山的教室和小学。海士町的小学生和城市里的小学生念着同样的教材，要说他们的教育中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不同应该就在于这一点——他们知道午餐里吃的米和菜来自哪里，有时候甚至可以对同学炫耀：这是我爸爸种的，我也帮忙了！

这是海士町的校餐中心主动寻找的结果。这个岛上的中小学学生和老师加起来，每天大概需要供应两百份午餐，它们全部由校餐中心统一负责。校餐中心的重要职责之一便是积极寻找岛上的食材，从而促进地产地消，实现经济的内部循环。一些岛民自家种植了大米和蔬菜，也会主动推销给校餐中心，不出意外都会被接受。岛上还有一个培养和食料理人的“岛食的寺子屋”，也经常向校餐中心供应宰杀好的鸡和鱼——他们在日常练习中会产生大量的此类剩余品。每天的午餐前，老师们会向学生们介绍食材，告知他们生产者的情况。每年还有两次，学校会召开生产者和学生之间的食物交流会，大家一起其乐融融地吃着校餐。但凡生长在岛上的，都有可能会出现在校餐里，甚至有一次阳太所在的班级在自然课上种植了芝麻，收获的芝麻也成了校餐的一部分。这是海士町小学独特的食育法。

日本的小学放学很早。45分钟的语文课结束后，还不到3点，小学生一天的学习生活就结束了。美穗要和老师谈话，我便先拉着阳太的手回了家。岛上的小学生没有被培养出对陌生人过度的警惕心，个个都很大方，走在路上不断有人对我说“你好”，有位高年级的女孩和我们一同走了一段路，对我在日本的生活充满了关心。我们一直聊到了她家门口，然后我惊奇地发现：这是我曾经驻足过好几次的那个家！要说为什么，因为它的庭院里竟然装着一个大型篮球架！感觉到我的激动，女孩立刻骄傲地补充：“我家有三个篮球架哦！”原来她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哥哥热衷于此项运动。我第一次看到私人庭院里长出篮球架，觉得十分新鲜。后来，当我又见过其他长出各种东西的庭院之后，便明白了：在离岛上，因为缺乏公共娱乐场所，人们都想办法在家里建造自己的专属场所，女孩家的篮球架是这样，宫崎家的秋千和架在枇杷树上的梯子也是这样。



在宫崎家的厨房里，美穗偷偷拍下了这张照片。宫崎家的几个孩子对厨房热情高涨，一旦开始准备晚饭，便全部挤进来，各自找到事情做。宫崎家的厨房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参与，在这里，我做过好几次中华炒饭，甚至还做过一次贵州凉拌折耳根。

但在宫崎家，最重要的娱乐手段也不是秋千和枇杷树，而是厨房。这个家里，从来没有速食与快餐，对于宫崎夫妇来说，珍视食材、珍视一日三餐、珍视与孩子一起制作食物的过程，就是珍视自己、珍视家庭和珍视生活。生活在宫崎家三天后，我开始和他们一起做晚饭，每天贡献一道中华料理。晚上的厨房成了中华料理和日本料理的交流会。雅也把中华铁锅和圆形铲用得很好，炒菜时会熟练地颠锅，还会做正宗的姜丝蒸鱼，这全是在深圳工作的时候，他每天跑去跟食堂的一个中国厨子偷师的结果。而每当我做饭的时候，孩子们总是从四面八方围过来，我开始入“家”

随俗，放心地把打鸡蛋这项重任交给他们。偶尔鸡蛋壳掉进去也没关系，他们会小心地把它挑出来。几个孩子对厨房如此充满热情，我想这也是“被允许”的结果。一天晚上，我们包了饺子——在这个家，包饺子这件事，意味着要从擀饺子皮开始。几个孩子被允许擀饺子皮，于是那堆皮变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圆形。几个孩子也被允许包饺子，于是那些饺子变成了奇形异状的艺术博览会，一些是三角形，一些巨大无比，一些肉馅爆出来。但在这个家，享受食物是这么一回事：比起规范，参与感更重要。我们在那晚享受了过分愉悦的煎饺时光，奇形异状的煎饺，仍然是一锅合格的、美味的煎饺，毫无疑问。这也成为我在宫崎家接受的一堂食物教育课，它让我意识到了：所谓规范，多数时候毫无必要。只要它最后是一锅美味的饺子，就不用在意它长成什么样，以及是用什么方式长成了这样。往后我再想起宫崎家的人，都会想起那锅饺子来，我从中明白的道理，已经不仅仅是—锅饺子了。

在宫崎家，我们渐渐在一些爱好上达成了共识，比如我们都很喜欢民艺的食器，比如我们都很喜欢同样的歌曲，在厨房里播放着中岛美雪的歌曲做晚饭的夜晚，胜过地球上其他一切夜晚。尽管我难免还是会有寻找静音键和隐身披风的时候，但它们不妨碍我对这个家的喜爱。在这个家里，美穗是美丽和勤劳的诠释，而雅也是踏实和真诚的诠释，我觉得他们都是纯粹的人，人生经历丰富，但没有受到污染，始终心地善良，充满了同情心。我不确定这是否是自然生活带来的一种品质，但我十分肯定，他们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人，带着泥土的气息。

在宫崎家，我开始有一些喜欢上家庭感的片刻。例如外面下着小雨，竹子正在熊熊燃烧着洗澡水，突然炸裂出“啪”的一声的时刻；例如双胞胎中的一个正站在厨房台子上洗水杯，阳太辗转在榻榻米上翻来覆去，雅也在解剖一条鱼，美穗在读绘本给小女儿听的时刻；例如深夜孩子们都睡着了，我关灯后听见两人一边收拾厨房，一边窃窃私语的细碎的声音的时刻；例如雅也每次出门前都会高喊“我出门了！”每次回家也都会高喊“我回来了！”而孩子们也每天这么高喊着的时刻……每逢这些时刻，我都有一种感觉：这就是美穗从前就想过的那种生活。我也因为感受到她实现了愿望而为她感到开心。不可避免地，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坏的婚姻和家庭关系，但与此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存在着好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我想，我不应该吝啬于赞扬它。

当我开始习惯一天的生活在晚上 8 点结束，并习惯在和宫崎一家人道过晚安之后、独自享受泡澡时光的时候，我发现，我也开始习惯了一整天不看手机的生活。



库索

生于山，长于海。1985 年生于中国贵州，2015 年移居日本京都。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任《新周刊》主笔，豆瓣年度好书作者。青年作家。出版有《纵身入山海》《自在京都》、“京都新职人”系列等文化纪实类作品。字如其人，敏锐而真诚。关注女性、自然、传统文化艺术等主题，视角独到，细致中带有一丝狡黠。自由、浪漫、飒爽天真。以赤子之心面对世界。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时时刻刻》(2002)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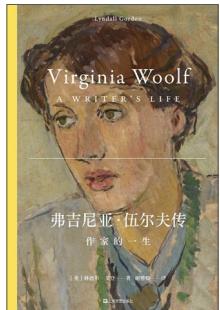
非虚构 创造艺术家： 伍尔夫与她的写作实验

林德尔·戈登 | 新书推荐

通过塑造记忆，她能够支配父母赠予她的天赋，
拒绝他们的错误，从而把自己锻造成艺术家。

在大众视野里，弗吉尼亚·伍尔夫常常要是一个性冷淡的脆弱女作家，要是一个远离真实世界、矫揉造作的唯美主义者。林德尔·戈登通过伍尔夫的小说作品以及日记和书信重构出这样一个伍尔夫：她是强健的步行爱好者，努力工作的职业作家，更是“不知疲倦的探索者”，探索“人类处境的奇奇百怪”。戈登想要呈现的并非常规的线性传记叙事，而是在真实性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详尽地追踪记忆和想象在伍尔夫一生中的持续流动。她同时论证了这种传记方法正是伍尔夫的发明，也曾由她实践，背后是一种全新的重视无名者的历史观。

《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作家的一生》最初出版于1984年，2006年戈登在新材料的基础上，从新世纪的女性主义视角做了修订。中译本译自2006年修订版。经艺文志eons授权，我们节选了第十一章《创造艺术家》分享给读者。



在一张曼·雷(Man Ray)给弗吉尼亚·伍尔夫拍摄的照片上，她鲜明的轮廓、艳丽的红唇和剪短的头发呈现了一个大胆的现代形象，就像她与薇塔时髦的“恋情”所展现的一样。在《达洛维夫人》里，彼得·沃尔什自1918年到1923年一直待在印度，当他回国后，发现“每一个女人，就连最有身份的女人……嘴唇都像用小刀雕刻过似的……到处都是设计，到处都是艺术”。公共表达与华丽的装饰取代了“阴影”，不过，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对“阴影”的关注却加深了。《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探索了疯癫、记忆以及像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和莉莉·布里斯科这样被过去所困的人。为了赋予阴影中的生命一种明确的艺术形态，她反复让角色停留在过去某个时刻，并追踪他们在那一刻的意识状态。

创作《达洛维夫人》的时候，弗吉尼亚·伍尔夫下决心去做一种“开凿隧道”的工作。她想要挖掘角色背后的“洞穴”，深入他们沉默的生命，由于这些生命的未知性，她的前三部小说只是绕着他们兜圈——雷切尔、凯瑟琳和雅各的生命都是未知的。达洛维夫人和塞普蒂默斯是她选择的更成熟的人物，他们背负着回忆的重担，他们自身就有能力去探索藏在威斯特敏斯特女主人和参战老兵这些表象背后相连的洞穴，把理智却受限的行为和错乱的疯癫行为区分开来。

中年时代的理查德·达洛维夫人是一位国会议员的妻子，她面色苍白，心脏有些毛病，如今，她一个人睡在一张白色的床上。她承受着女人们熟悉的痛苦，即她的外在形象（作为她丈夫的妻子）并不真实。克拉丽莎·达洛维反复回想起她人生的转折点，那时，她还是伯尔顿的年轻姑娘，她选择嫁给了让人感到宽慰的达洛维，而不是那个“可爱的”、苛刻的彼得·沃尔什。彼得很像伦纳德·伍尔夫，他认为，自由和思想独立比金钱或社会地位更重要。彼得从未从克拉丽莎的拒绝中完全恢复：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变成了不安的、将就的、轻浮的，不过他从不欺骗自己。他觉得克拉丽莎年轻时的那种羞怯会在中年变成一种拘谨的保守主义。彼得把它称作“灵魂的死亡”。

在小说描写的1925年的一天里，克拉丽莎正准备为丈夫在威斯特敏斯特的同僚举办一场聚会。她去邦德街购物、买花、缝补衣服。表面上看，克拉丽莎为她丈夫这个公众人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背景，但她的内在生命却“独自漂泊在海上”。她的回忆里充满感情：她拒绝了与“可爱的”彼得一起冒险的人生“情节”，转而选择了可以预见的、就在眼前进行着的达洛维的“叙事”。当大本钟的钟声响起，沉闷的声波把伦敦固定在原地时，她偷偷溜回了过去，质问那个还未变成“达洛维夫人”的女孩。战争英雄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以一种类似但疯狂的方式坚守着过去，他质疑战争，继续与死去的人们同行。就在同一天，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威胁让他选择了自杀。当人们来找他的时候，他在最后一缕日光中从窗户跳了下去。

在这个场景的“夜与日”中，达洛维夫人在夜晚最黑暗的时刻出现在故事的最高潮。大本钟敲响了午夜钟声，她离开聚会，站在窗边，想着那位英雄的死。此时此刻，她不是“达洛维夫人”，而是“克拉丽莎”，是一个拥有清晰的想象力的“未被看见”的自我，这让她能够看见一位陌生人。黑暗——掩盖了她的公众人格——加强了她的共情能力，让她和那个被战争清晰可见的“恐怖”逼疯的男人产生了共鸣。这是一个情感通达的生物，正与塞普蒂默斯相对应——塞普蒂默斯那美好的人性品质无法在公共生活中被发掘、被看到。

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对《达洛维夫人》最中肯的批评来自利顿·斯特雷奇，他觉得达洛维夫人让人讨厌，视野也很狭窄，弗吉尼亚在日记里记下他的抱怨，“我一会儿嘲笑她，一会儿又很想拿我自己来为她掩饰”。这幅肖像作品可能有些不连贯，但当弗吉尼亚·伍尔夫从对达洛维夫人的冷漠、嘲讽态度转向她过去的“阴影”时，她距离艺术上的成熟也更近了一步。如果她想成为伟大的小说家，就必须像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建议的那样，与某个和她自己（或她的哥哥姐姐——她前三部小说的人物原型）不相关的人“融为一体”。并且，如果她想超越战后风行一时的幻灭情绪，她需要像福斯特主张的那样，创作出一个可爱的人物来。

首要问题在于，如何通过一个“可爱的人物”表达她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上流社会文学界的厌恶呢？那群人“暗地里嘲讽别人，在公共场合饱食鹅肝酱，他们举止失当，却有滚滚而来的名利”。她承认，她对奥托琳·莫瑞尔夫人在牛津郡盖辛顿的府宅那“湿滑的淤泥”有某种迷惑，那片土地上种着“不比芦笋大的”年轻男人。“我心里充满了对人类的厌恶，”她继续写道，“他们的虚伪，他们的虚荣……昨晚和奥托琳的谈话让人相当不快……随后，我的脑海里混合着愉快与甜蜜、轻蔑与痛苦……我想说出心灵的捉摸不定。我总是太能忍受了。事实是，人们几乎不关心彼此。”

她在此说的正是塞普蒂默斯史密斯说过的话——他认为人类既无善意，也无信念，除了追求眼前更多的欢乐之外，没有仁慈之心”。1922年10月6日，弗吉尼亚·伍尔夫在《雅各的房间》的手稿里写下这部小说最初的计划时，塞普蒂默斯并未出现在其中。她最初的想法是围绕达洛维夫人写一本包含六到七个场景的小书，但每个场景都是独立的，从“达洛维夫人在邦德街”开始，以“聚会”结束。10月6日她还专注于“聚会的意识”部分。后来在10月14日的日记里，她却彻底改变了想法，她打算把这个疯子加进来，并通过他引入她自己的厌恶情绪。突然间，她想到了这样一部小说，它能够平衡对待社会的矛盾态度：“我将在此概述一项对精神失常和自杀的研究：展示精神健全的人和神志失常的人分别看到的世界。”

有了塞普蒂默斯承担起“异化”的全部重担，作者现在可以自由地沉浸于达洛维夫人在聚会上的意识了。事实上，达洛维夫人的场景充斥着她的可爱，而这种可爱并不完全令人信服，是对偶尔流露的轻微嘲讽的过度补偿。据说，达洛维夫人并不是基蒂·马克西的真实写照，不过，虚构的特权也无法掩盖构思上的不确定性。正如昆汀·贝尔注意到的，只有当弗吉尼亚·伍尔夫喜爱她的对象时，她的人物刻画才是接近准确的。她并不喜欢基蒂，基蒂是她母亲的学徒，是“集智慧、风度、美貌和优雅于一身的典范”。在最早的短篇速写“达洛维夫人在邦德街”里，她就讽刺了克拉丽莎·达洛维那追求时髦的势利模样。克拉丽莎心想：“要是有邋遢的女人来参加她的聚会，那简直无法忍受！如果济慈穿着红袜子，人们还会喜欢他吗？”当作者写到邦德街的爆炸声吓坏了女售货员们，而两位购买白色长手套的中上层阶级顾客却勇敢地坐直了身体时，她自己的势利与克拉丽莎是一致的。后来，她在《达洛维夫人》中笔锋一转，用自己的梦替这位女主人掩护：“当她看着那些出租车时，有一种永恒的感觉，她远去了，远去了，孤身一人漂泊在海上。”

刻画达洛维夫人时的反复无常被解释为“掌握经验、在光亮中慢慢扭转它的能力”。从理论上来说，这是詹姆斯·斯蒂芬爵士提出的为实现公正而进行的理性训练：“要意识到偏见在我们身上的力量……了解如何在内心深处与我们的敌人互换位置……但仍不动摇，仍忠实地坚持我们选择的标准——这就是胜利。”而他的孙女想做的，是对敲响的大本钟所支配的世界、对政客们的制度、对他们的女主人和哈利街做出公正的审判。她打算先向它们致敬，再以达洛维夫人与被异化的塞普蒂默斯最后的结盟来削弱其基础。通过这种训练，她可以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平衡。詹姆斯爵士说“实证主义和教条主义可能带来坚定的信念，但不会带来最坚定的心灵的信念。船只抛锚时的晃动确保了它停泊时的稳定。”在这部小说的高潮，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确完成了这种审慎的“晃动”。

时髦的克拉丽莎和破碎的史密斯之间只有最微弱的联系。当威廉·布拉德肖爵士在克拉丽莎的聚会上解释，他是因为史密斯的自杀才迟到时，克拉丽莎离开房间去消化死亡这一事实。通过这个疯子，达洛维夫人唤醒了对同类的情感，这只不过是隐藏在黑暗中的片刻时光，却彻底改变了她。她不再是那个穿着绿纱裙给首相引路的光彩照人的女主人，因为当她独自待在黑暗的房间时，她看到一个从未被充分认可的自我，一个拥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的自我。

小说第一稿更明确地把达洛维夫人推向史密斯的阵营。当她望着马路对面一位准备睡觉的老妇人时，她感到很羞愧，因为她忽视了普通人的生活。史密斯展现了深陷于“可悲但英勇的沉默中”的人们那“不为人知的”面孔。

当午夜的钟声响起，这种洞察力带给她的喜悦达到巅峰。随后，外在生活随着汽车喇叭声和客厅的闲聊声卷土重来，她坚定地走了回去，就像草稿里写的那样，“她要直面她的敌人”，这里的敌人具体指的是维护“正常”的威廉爵士。当克拉丽莎回到客厅时，她身上那种颠覆性的光芒让彼得·沃尔什激动不已。

小说结尾的几句话要求读者从反映克拉丽莎·达洛维的过去和现在、深层和表层生活的不断变化的场景中构出这个人物。当她打开门回到聚会时，一直爱着她的彼得展示了这种组构的必要性：

是克拉丽莎，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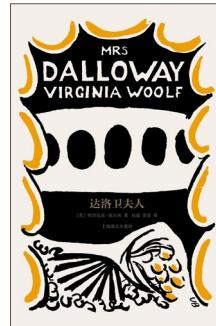
因为她来了。

弗吉尼亚·伍尔夫试图通过这位情人的喜悦激发我们的创造性回应。不过，我们能确定来者究竟是谁吗？

在下一部小说里，拉姆齐夫人引发的喜悦之情是合情合理的，但这里的喜悦，就

像在后来的《奥兰多》中一样，是刻意烘托出来的爱慕之情，让读者难以共情。相比之下，当弗吉尼亚·伍尔夫转向拥有维多利亚时代遗风的不屈不挠的人物——比如继承了祖辈的责任感的悍妇布鲁顿夫人和天生的探索者帕里女士时——她的文风更简洁有力。那些古怪的人无疑是可爱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描写她们的时候也带着宽容的幽默感。然而，她沉迷于用更夸张，并且潜在地更讽刺的方式去描写达洛维夫人，她的滔滔不绝总是夹杂着淡淡的嘲讽，这是《远航》里的讽刺写法的残留，更远可以追溯到斯蒂芬家的孩子们给基蒂·马克西取的绰号（基蒂的母亲姓勒欣顿[Lushington]，他们便叫她“格欣顿”[Gushington]）。弗吉尼亚·伍尔夫差点放弃达洛维夫人，因为她太华而不实了，于是，她创造出了她的回忆。“但我觉得，在小说出版后她承认，“某种对她的不喜欢始终存在。不过，这与我对基蒂的情感再次吻合。”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一封信中颇为神秘地说，她必须用塞普蒂默斯这个角色来完成克拉丽莎的角色。那位疯子的精神病态是对克拉丽莎半知半觉的生命枯竭状态的戏仿。他的态度是致命的，因为他在拒绝社会常规的同时，也拒绝了抚慰人心的幻象和让我们保持理智的适应能力。我们把理性付诸实践，将其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弗吉尼亚·伍尔夫也在刻意这么做：《达洛维夫人》从1923年一直写到1924年，她头一次没有受到疾病的干扰。通过克拉丽莎，她适应了社会规范，通过史密斯，她审视了精神疾病对人的摧残，不过，她从未让我们忘记，保持理性的代价是遗忘。



《达洛维夫人》

弗吉尼亚·伍尔夫放弃了叙事小说的章节形式和《雅各的房间》的极端碎片化叙事，她在《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里设计了一种一分为二的形式，几乎是图示般地阐明理智与疯癫、公众与私人、白天与黑夜、现在与过去这些对立概念。《达洛维夫人》是一场保持平衡的表演，它诞生于弗吉尼亚实现了生活上的平衡的二十年代中期。通过上午十一点到半夜十二点的精确的时间结构，小说维持了精妙的平衡感。这些时间尺度是为了衡量医生和政客的一天而设计的，不过，在它们沉闷的声波中，也有神秘的内心戏剧发生。

小说第一稿题名《时时刻刻》("The Hours")，强调了外在的时间框架的恒常性，它是通过更突出史密斯自杀后的六次钟声和克拉丽莎觉醒后的十二次钟声实现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按照后印象主义的目标来改造这部小说，罗杰·弗莱让她理解，现代艺术不应该追求对形式的模仿，而应该去创造形式。换句话说，艺术家要创造出表达某些特定经验的形式，比如，因为一位陌生人的自杀，克拉丽莎在午夜时分感慨日光的消逝，在这一视角下，她觉醒的瞬间找到了最完美的表达形式。

修改后的小说减少了对时间的强调，也淡化了对彼得和利西娅这两个失意爱人的批判，其效果是把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推向前景，让我们直接进入他们的意识中。在形式上，他们被钟点联系起来，而更微妙的联系在于他们的意识的韵律运动以及他们对死亡的共同关注。

意识那充满韵律的波流穿过时间，就像穿过一条河道。钟声带有一种欺骗性的终结意味，仿佛是句子结尾的句号，是富有韵律感的文章一起一伏的组成部分。1919年，利顿·斯特雷奇称赞弗吉尼亚·伍尔夫创造出了一种新型句式。她的句子就像大脑在平静状态下的深层波动，1924年，这种波动首次被脑电图记录下来。生理学家科林·布莱克默称之为自然状态下的心灵，此时，心灵能够接收各类印象，却不愿把它们置于预先设定好的意识地图上。弗吉尼亚曾告诉薇塔：“某个景象、某种情绪让心灵产生这种波动，早在它制造出合适的语言之前。”

当达洛维夫人缝补宴会礼服时，她的意识就处于这样的休息状态：

她一针又一针，把丝绸轻巧而妥帖地缝上，把绿色褶边收拢，又轻轻地缝在腰带上，此时，整个身心有一种恬静之感，使她觉得安详、满足。正如夏日的波浪汇合，失去平衡，四处流散；汇合，流散；整个世界似乎愈来愈深沉地说，“如此而已”。

达洛维夫人缝纫时在大自然无意识的韵律中休憩，弗吉尼亚·伍尔夫最常用海浪象征这种韵律。

同样地，当史密斯帮妻子做帽子时，他那焦躁不安的意识也渐渐平静下来，此时，他恢复了理智（讽刺的是，这正好发生在医生接他去疗养所之前，医生的到来促使他选择了自杀——此时他其实很清醒）。

这些平行的意识波动实现了她在 1917 年提出的计划：即“从这件事轻松地滑到那件事，没有任何阻碍。我想越来越深地沉下去，远离表面，远离它坚硬的、孤立的事实”。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实观就像她的句子结构一样改变了传统小说。她说，发现周日的午餐会、大主教、桌布和大法官都“并不完全真实”是多么奇妙。像科学家一样，我们必须把现实重新定义为一个谜团，它是铺路石上的“裂纹”，被迷雾笼罩着。《达洛维夫人》无视了“自杀”这一显著事实，也对霍尔姆斯医生咄咄逼人的力量不屑一顾，反而停留在一个做帽子的男人的意识中。弗吉尼亚在《现代小说》里指出，重要的瞬间在彼处而不在此处，她又在《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中强调，要成为一件艺术品，小说必须“远离茶桌”，也就是远离对外部细节的费力复制，而去探索意识洞穴中的隐秘事实。

这段时间，弗吉尼亚·伍尔夫正在读普鲁斯特，她对普鲁斯特的赞美高于同时代的任何作家。她说：“他探索着蝴蝶的色彩，直到最后一丝斑纹。他像肠线一样坚韧，又像蝴蝶翅膀上的粉霜一样转瞬即逝。”在《到灯塔去》里，她重申把严格的形式和微妙的感知结合起来的想法，这两种说法都一模一样地重复了她在 1906 年凝视圣索菲亚大教堂时产生的艺术理念。

普鲁斯特的感受力拥有“如此完美的接受能力”，就像一张有弹性的薄膜，伸展地越来越宽广，直到囊括记忆中最易逝的部分，这段话与她形容多萝西理查森（Dorothy Richardson）时的措辞几乎相同，她在多萝西的作品中发现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女性心理语句的句子。它由比旧句子更具弹性的纤维构成，能够拉伸到极限，捕捉最脆弱的颗粒，包容最模糊的形状”。

弗吉尼亚·伍尔夫想到，或许她可以为女人的声音赋予一种美学定义。她在《达洛维夫人》初稿的开头就写道，女性的声音“在核心之处有一种感应力，每个词语、每个音调发出时都在颤动，都是活生生的；不过，它也带着某种害怕生命力受损的犹疑，某种使其压抑的对过去的感伤，某种渴望进入内心深处的冲动”。就像她和凡妮莎能用“听不见的方式”交流一样，当雷切尔和海伦在夜晚交谈时，她们的声音似乎也随着海浪消失了。“把事情说出来难道不会毁了它们吗？”在《到灯塔去》的手稿里，拉姆齐夫人问自己。“我们默默地交流，难道不是更好吗？在比语言更吸引我们的奇妙的沉默中，我们（至少是我们女人）安静地在高处并肩滑翔，世界的王国在我们脚下一览无余，却不需要我们去参与，这时的我们不是表达了更多吗？”

“当我写作时，……我是一个女人”，弗吉尼亚·伍尔夫在 1929 年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二十年代，一种清晰可辨的作者声音已经在她的作品中出现，它有时会因沉默或喜剧性的灰心丧气而中断，但它就像滚滚而来的海浪，总能再次涌现。语句在划上休止符后依然跳动着，余音缭绕。多萝西·理查森的“女性”句子，普鲁斯特的感受力，以及弗莱主张的表现性艺术，或许都激励了弗吉尼亚·伍尔夫，不过，由于她的实验作品诞生得过早，倘若我们追根溯源的话，它们只能来自她本人。

她可能略微借鉴了艾略特和乔伊斯的某些写作效果：比如现代城市的场景和推动叙事的时刻。不过，艾略特笔下那“虚幻的城市”有种视觉上的统一性，那是诗人梦魇般的内心世界的投射。相比之下，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伦敦却是多样的，是一个当地人眼中的真实城市：动物园里眺望着摄政公园的棕灰色动物、哈利街朴素的色彩、斯特兰德大街上的巴士、海陆军商店中的内衣货架、威斯敏斯特教堂里互不打扰的跪拜者。

走在邦德街上的达洛维夫人心想，现代人根本没有写过值得阅读的关于死亡的文字。她低声吟诵着抚慰人心的古老诗句，“世上缓慢蔓延的污物 / 他未曾沾染”，以及不要怕骄阳炎热 / 也不怕隆冬严寒”。和塞普蒂默斯一样，达洛维夫人同样感受到，人死后依然会存在。达洛维夫人能够理性地说明她的信念，即她自己的某些残余将一直留在她熟识的人的生命中和过去的场景中（就像雅各死后依然存在一样）。而

塞普蒂默斯对死者的感知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自己的生命都被抹杀了。死者的确会来探望他，他有过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相似的幻觉，听到鸟儿用希腊语唱着“河对岸的生命乐园里，死者在徘徊”。战争结束五年后，他依然对死去的战友，尤其是他的指挥官埃文斯的命运耿耿于怀。他经历了生活的种种变化——他结婚了，还回去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他无法像作者那样去谱写一段婚姻或新生活。

《达洛维夫人》两部分之间的另一个微妙联系在于史密斯的利他主义预言。见证了战争之后，他一心想做的就是改变世界。他想立即向内阁透露，最高级的秘密在于“普世的爱”。而克拉丽莎再次用她低调的方式展示了理性的做法。她悄无声息地让人们聚在一起，让年轻人行动起来。这是她的天赋。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笔记里写道：“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它的设计，它是独一无二的——也很难懂。”其设计的两个部分并没有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它们能够连贯一致完全是技艺的壮举。在下一部小说中，她选择强调而非弱化这种一分为二的设计，这一次，她想展现的是维多利亚时代和现代之间那种更自然的、时间上的断裂。她最初的想法是用语言表达纯粹的时光流逝，它就像一条空旷的走廊，穿过战争走向战后时代。她直接将这一部分称为“岁月流逝”。

弗吉尼亚·伍尔夫最初为《到灯塔去》设计的图式是由时间走廊连接起来的两大部分内容。在第一部分，莉莉·布里斯科开始画画；而在第二部分，她完成了画作。为什么在那幅画完成之前要有十年的时光流逝呢？弗吉尼亚·伍尔夫既有一种神秘意识，又具有好奇的科学家的精确严谨。她的神秘意识是探寻性的，是方向明确的，而不是浮于表面的含混言辞。她最伟大的几部小说的框架都有清晰的、几乎是图式性的设计，每部小说都是一场实验，通向一个强有力的结尾。

要成为艺术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必须把新学到的现代艺术技巧与父母留给她的古老禀赋结合起来。这一至关重要的融合发生在《到灯塔去》的最后一部分。

《到灯塔去》的第一部分很长，它让我们沉浸在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家庭的生活中，在很多方面，它就像弗吉尼亚自己的家。旁观者莉莉·布里斯科一开始看到的是家庭成员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中的特写镜头，不过，作为艺术家，她尚不能带着坚定的信念把他们记录下来，直到过了一段时间，当她以下一个时代的视角再次审视他们时，她才能做到这一点。时光就像一阵风一样拂过拉姆齐一家的房子，在这儿碰到一个人，又在那儿触到一件物品。拉姆齐夫人去世了，不过，她的披巾还留在这儿，成为一件遗物。风儿戏弄着翻开的信件和书页，质问它们是否经得起时光的考验。许多年后，当麦克耐伯太太打扫这座废弃的房屋时，她回忆起拉姆齐夫人曾让厨娘端给她一盘奶油浓汤，而像钉耙一样瘦削的拉姆齐先生在草坪上慷慨激昂地朗诵诗歌。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活在麦克耐伯太太的记忆里，又终将随着她的死亡而消逝。她零散的回忆出现在艺术家深思熟虑的回忆之前。在小说的第三部分，成熟的莉莉重拾她给拉姆齐夫人画的画像，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再次审视她，与此同时，剩下的家庭成员正和拉姆齐先生一起踏上那延误已久的灯塔之旅。这家人在精神上、物理上和历史上都远去了，以便小说集中于莉莉把记忆转化为艺术的过程。小说结尾实际上写的是位艺术家的诞生，这也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本人的任务，因为她恰恰是在二十年代中期走向成熟。

她说：“我把那个〔斯蒂芬家族的〕世界嵌入了由我自身的性情所造就的另一个世界里。”她毫不羞愧地坚持自己的想法，无情地抛弃了父母身上那些对自己的成长不利的习惯，并一直——通过莉莉——筛选记忆，寻找能够定义并完成她的艺术的种种特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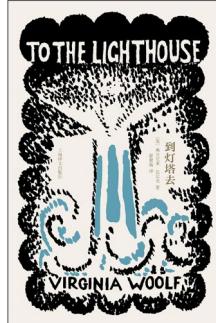
与这种美学上的开创精神密切相关的，是作家摆脱母亲的幽灵的需要，自 1915 年的精神崩溃开始，母亲的声音就一直萦绕在她耳边。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作家获得的成功有赖于她为生存所做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她必须把母亲当作艺术素材，从而最终重新拥有她。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人的心灵“能够通过父辈或母辈追忆往昔，就像我曾说的，一个从事写作的女人通过她的母辈来思考过去”。在《到灯塔去》里，弗吉尼亚区分了母亲带来的创造性影响和她病态的情感控制。当她试穿母亲那件蓬松的、维多利亚式的黑色裙装时，她正在写《到灯塔去》，那时的她到底是富于创造力的继承人还是被幽灵缠身的后裔呢？她面色苍白，神色焦虑，她的身材过于瘦削，并不适合那件丰满、低胸、缝着女性气质的荷叶边的裙装。蓬蓬袖在她弯曲的肩头古怪地耸起。这件衣服是为像玩偶一样身材挺拔的人设计的，但她身体前倾，她的双臂放在桌子上，脸上带着有主见的女人那种看似漫不经心的专

注神情。在衣服领口的老式蕾丝褶边上方，是一张极不协调的面孔。朱莉娅·斯蒂芬身上有种平静的安定感，仿佛她的圣母面具永远不会摘下。她女儿的面容同样典雅高贵，但那是一张更灵动、更脆弱，也更无遮掩的脸，不过，它也和母亲的一样带有警惕的被动神情。母亲的幽灵半控制着她，但她孩子气的一面却渴望被完全占有，就像在詹姆斯的一部小说里，男主人公变成一幅祖先的画像，为了获得祖先的身份，这位主人公回到过去：“让古老的幽灵把他当作他们中的一员。”

在“岁月流逝”那段黑暗的时光里，悲伤的心灵先是欢迎幽灵的到访，而后又抛弃了它们，在现实的阳光下苏醒。《到灯塔去》之所以受欢迎，部分原因在于，它成功地描写了一个从过去解脱的女人。并且，在解脱的过程中，它并没有抛弃过去，而是有选择、有控制地运用了它，这也使小说更加成功。《到灯塔去》还展示了艺术家如何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获得平衡。她没有屈从于祖先的画像，而是画出了一幅全新的揭示性作品。

构思一位艺术家并不在弗吉尼亚·伍尔夫最初的计划里，但莉莉·布里斯科却逐渐主导了这部小说。起初，她只是反映拉姆齐夫妇不同观点的边缘人物中的一个。一开始的手稿里，她是个名叫索菲的未婚女人，她很焦虑，有点愚蠢，非常虔诚。后来，当拉姆齐先生索求关注时，弗吉尼亚伍尔夫仿佛听到了某种陈词滥调，突然间，她把这位老处女重新想象成一个有职业抱负的年轻女子，并且，随着莉莉地位的提高，她对拉姆齐夫妇的观点也变得愈发重要，与此同时，她取代他们成为时代的代言人。



《到灯塔去》

一开始，莉莉在两种状态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作为一个未受过教育的女人，她极度谦卑，而另一方面，当她在画布上创作各种形状时，她又极为大胆。班克斯先生是第一位看到她的抽象画的维多利亚时代人，对于莉莉为窗边的母子赋予的形态，他颇感震惊。“那么它象征着母与子——这是受到普遍尊敬的对象，而这位母亲又以美貌著称——他们竟然被简单地浓缩为一个紫色的阴影，而且毫无亵渎之意。”莉莉对自己的画感到羞愧，但班克斯先生支持她。她所见的事物对他而言或许完全是陌生的，但作为一位科学家，他愿意公正对待任何审慎的观察。

莉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母画了一幅现代派抽象画，最终，所有外部细节都被抹掉了，为的是呈现他们的本质形状——一片阴影中的紫色楔形内核和另一个更不明确的形状，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大片树篱，对拉姆齐夫人而言，它“一次又一次围绕着停留的脚步旋转，象征着某种结论”。艺术家继承了拉姆齐夫人的内在精神和拉姆齐先生的刚毅不屈，她挑选出这两种品质，在她的生命和艺术中以精确的平衡悉心保存。刚开始，莉莉更清楚地看到拉姆齐夫人的母性形态。两种形态的作用未必是平等的。只有当这幅画是真实的时候，它才能成功，而直到小说最后一行，莉莉才明白，它就是真实的，因为在那时，她画完了最后一笔，她在画布中央用一条线把她想象中的遗产分成了两半。一半是“唯一说真话”的拉姆齐夫人——当莉莉完成这幅画时，拉姆齐家中最小的孩子詹姆斯已成长为一个青少年，他还能回忆起母亲以前是如何直白地说出心中所想的，因此人们也可以坦诚地向她倾诉：“只有她一个人说真话；他也只能对她一个人说真心话。也许，这就是她持久不衰的吸引力的源泉……”而在不容忽视的画布的另一半，拉姆齐先生毫不妥协地要求我们面对现实本身（他‘从不歪曲事实’），这是一种伴随着忍受精神孤独的勇气而来的真理。“我们灭亡了，各自孤独地灭亡了”，拉姆齐先生带着孩子们驶向灯塔时喃喃自语道。在小说第一部分，拉姆齐夫妇对于真理的争执因为两颗真心的结合而化解，同样，在书的结尾，他们的艺术家继承人也会把这两种真实平衡地融入她的作品中。

弗吉尼亚·伍尔夫发现，她自己就是这两个部分的总和；在二者交融的过程中，

一个新生命出现了。虽然这看似是偶然发生的，但在1925年7月30日，当她构想这场新实验时，她就提出了这个假设：“我想，我可能会在《到灯塔去》里做一些事情，让情感分解得更彻底。”换句话说，她从一开始就打算把自我分解为来源于父亲和母亲的不同组成部分，这就像在破解遗传密码。而考验在于如何把碎片再次组合起来。当她完成这部作品时，她在1926年9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她经历了一次孕育生命的过程：“我对自己感叹，幸福的事情就要结束了。这就像某种漫长的自然过程，它如此让人痛苦，又如此激动人心，我无法表达我多么渴望它结束。”

把弗吉尼亚·伍尔夫这部书写艺术家的诞生的小说与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和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做比较是很有趣的。对于乔伊斯和劳伦斯来说，艺术家是一个人摆脱家庭纽带和世俗野心之后余留的那个部分。保罗·莫雷尔和斯蒂芬·迪达勒斯都屈服于艺术家意志的利刃：一种顽固又浪漫的自我中心主义。然而，莉莉·布里斯科却使艺术家变成继承者，她自然地、几乎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从上一代人进化而来。

拉姆齐夫人无法看到莉莉的独特之处，因为莉莉属于下一代人。“在莉莉身上，贯穿着某种因素，闪耀着一星火花，这是某种属于她个人的独特品质，拉姆齐夫人对此十分欣赏，但是，她担心没有男人会喜欢她。”莉莉的中国眼睛象征着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狭隘品味相异的东西，因为这一点，拉姆齐夫人很同情她。但与此同时，她又意识到，莉莉拥有一种不屈服于男人的陈腐幻想的勇气。潜藏在拉姆齐夫人身上的东西，除了在回应灯塔的信号时发出了闪光之外，还在莉莉·布里斯科那里得到了延续。不过，由于莉莉身上的个性光芒丝毫不肯妥协，拉姆齐夫人只能转身离去。

莉莉望着拉姆齐先生、凯姆和詹姆斯穿过海湾向远处航行，当她画出决定性的最后一笔时，拉姆齐一家人也正好在灯塔着陆。“灯塔不代表任何东西，”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给罗杰·弗莱的信中颇为神秘地说，“在书中，总要有一条中心线把构思联系起来。”从远处看，灯塔显得很浪漫，它像是“长着一只黄色眼睛的神秘宝塔，到了黄昏时分，那只眼睛突然轻轻地睁开了”。而当拉姆齐家的孩子们在哲学家的指引下到达灯塔时，镜头拉近了，他们看到了赤裸裸的现实：那是一座“僵硬笔直的”、像尖桩一样的塔，周围的岩石上还铺着晾晒的衣服。看着这座尖桩，詹姆斯·拉姆齐心想：

这就是那座灯塔了，对吗？

不，那另外一座也是灯塔。因为，没有任何事物简简单单地就是一件东西。另外一座灯塔也是真实的。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日记里写道：“我想，我会发现关于小说的某种理论……目前我正在思考的是视角的问题。”不论在远处还是近处，小说中的好多人物都在望着灯塔，而艺术家又在看着他们，记录下他们获得启迪的时刻。拉姆齐夫人感受到了远处灯塔的光束，她的顿悟来得像闪电一样突然。而拉姆齐先生必须经过辛苦的征程才能到达灯塔。他并没有真正地被灯塔吸引，他只是想向妻子致意。站在灯塔的角度，他才能回忆起她、看到她。当他在海湾对面以真实的视角凝望她时，他让一个三角形闭合了，而三角形恰恰是拉姆齐夫人的象征。灯塔的光滋养了她，她又滋养了她的丈夫，最后，拉姆齐先生和詹姆斯一起踏上了她渴望已久的到灯塔去的旅程。

当小说人物越来越靠近灯塔时，莉莉也越来越接近艺术上的顿悟。莉莉的谦逊并没有掩盖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她对名利无动于衷，但她一心追求不朽——至少是为了她的艺术对象。为了实现这一远大目标，视角至关重要，但它还不够。

首先，莉莉必须接受艺术变形的必要性。如果她想画出一幅不朽的肖像画，绝不能沉浸在拉姆齐夫妇的生活中，只看到大量的细节，她必须抛弃拉姆齐夫人身上那些终将化为尘埃的东西——她对权力的沉迷，她一再重复的“结婚，结婚”——而去放大她的无私和真实，莉莉必须把这些珍贵的品质化为永恒。

其次，莉莉要懂得如何运用感情。她学会了有所思索地而不是自发地爱她的艺术对象：“你必须死死地盯着她瞧，一秒钟也不能放松那种紧张集中的情绪和绝不迷惑上当的决心。你必须抓住那景象——就这样——就像用老虎钳把它牢牢夹紧，不让任何不相干的东西掺杂进来，把它给糟蹋了。”抬头仰望，莉莉被淹没在记忆里；低下头来，她让自己的内心镇定。感情必须是准确的。莉莉在她对拉姆齐夫人的爱中笨拙地摸索着，她试图调整焦距，以便让她更清晰地呈现。困难在于，她越靠近

她的对象，它的存在就越会把她吞没。莉莉的画笔突然掉落了。她没能控制住自己的对象，反而因为死亡带来的分离而精疲力竭。突然间，她依稀看到拉姆齐夫人坐在那里晃动着手腕编织，并对莉莉的想法表示认可。“这真是一个奇迹，她还存在，这真让人欣喜若狂。在她画画时，它就停留在她面前……”在第一稿中，这就是莉莉看到幻象的时刻。当她画下最后一笔时，台阶上是空荡荡的，鬼魂已经离去，但莉莉捕捉到了她。

弗吉尼亚斯蒂芬十三岁时，她的母亲去世了。当她完成《到灯塔去》时，她四十四岁，正好是莉莉的年纪。在这中间的许多年里，母亲一直萦绕在她心头。“我总能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的形象，想象她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会说什么、做什么”，她回忆道。后来，当这部小说完成后，她不再看到朱莉娅·斯蒂芬，也不再听到她的声音了。通过塑造记忆，她能够支配父母赠予她的天赋，拒绝他们的错误，从而把自己锻造成为艺术家。



林德尔·戈登

1941年生于南非开普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博士，以罗德学者身份前往牛津大学，现为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资深研究员。著有《T.S. 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破局者：改变世界的五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传》。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Ellen Tanner](#) on Unsplash

01 封存

心理学与考古学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相似。我们一层层不断向下挖掘，然后小心翼翼地掸去出土文物上的灰尘，最终发现一整个比小说还要离奇的被掩埋的世界。

1986 年，一位主治性功能障碍的泌尿科医生打来电话，说他有个不同寻常的病例。患者是一位三十四岁的华裔男子，名叫彼得·张，患有阳痿。泌尿科医生在他尝试同房前一小时为他注射某种强效药物，之后对结果感到震惊：“从业那么多年以来，除了有严重血液循环问题的病人之外，我从没见过这种药不起效的病例。”彼得并没有血液循环方面的问题。这种药物有时会引起并发症，可能导致持续三天都保持勃起状态。然而，这种百试百灵的药物对彼得·张却完全不起作用。医生推断：“不管他脑袋里发生了什么，都强大到足以抵挡这种万无一失的针剂。”

当我问起彼得是否有可能是同性恋时，医生说他声称自己是异性恋。医生告诉彼得，经过详尽的检查，泌尿科团队推断他的性功能障碍并非生理问题，而是心理问题，因此建议心理学家接手。医生说会寄一份书面转诊单给我，并且提议我要是查明病因可以一起会诊，因为他们科室的人全都对这个病例束手无策。他在结尾部分说：“这真是个值得一看的病例。每当我们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的时候，就会有人证明，我们其实对人类的状况一无所知。”

尽管转诊时伟哥尚未被发明，但近年来我也遇到过来访者服用伟哥毫无效果的情况，不管剂量多大都是如此。（泌尿科医生向我保证过，伟哥比那些老式的注射剂药效更弱。）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只有在身体确实出现问题时才会起效，血液流动再怎么增加都无法解决情感上的问题。不管是怎样的性反应，大脑都必须和身体协调配合才行。

彼得迫不及待想要开始心理治疗，因此预约了我最早的一个档期。我走进等候室，看见一个其貌不扬、说话轻声细语的男子，他打扮低调，身穿印着“雅马哈”字样的黑色 T 恤、牛仔裤和跑鞋。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后并没有直视过我，而是以一种巨细无遗的风格交代了自己的过往。他诉说各种令人不安的细节时与其说是谈论自己，更像是在发表学术论文。

彼得在一个乐队里担任键盘手已经十五年了。为了补贴收入，他白天还有一份钢琴调音师的工作。他独自住在公寓里，没有伴侣。当我问起能以什么方式帮助他的时候，他说：“主要是我很孤独。我希望和女性谈恋爱，但好像做不到。”

我问他是不是在说性关系。“是的。”他轻轻说道，眼睛看着地板，“我无法进行性交，却还是渴望拥有情感关系。我希望有人一起聊天，一起分享。”

我问他之前是否尝试过建立情感关系，他表示肯定，又说经验十分有限。接着，他略带尴尬地笑了笑：“大部分都是我的想象。”

我告诉他，无论面对什么问题，心理学家都会收集有关病人家族史的信息，因为这些人际关系是其他所有关系的基石。1943 年，彼得的中国父母取道越南来到加拿大。等到 1952 年，这对夫妇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彼得的姐姐比他年长四岁，如今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小孩。彼得特地指出，他姐姐的丈夫不是华人。

彼得的父亲在他九岁时去世了。当我问起细节时，他扮了个怪相，想了半天之后说：“类似于自杀。我父亲有糖尿病，但他拒绝为此调整饮食。我的母亲每天都为他做甜食，告诉他是时候去死了。他变得非常胖，再也无法用肿胀的双脚站立。那几年里，他就这么静静地坐着，或者说是郁郁寡欢。我猜想他是陷入了抑郁。后来有一天，他心脏病发去世了。”

我十分同情，说他父亲去世时他才九岁，年纪还小。他说：“我很难过，但母亲说，这都是为了这个家好。”

彼得描述母亲是如何盼着父亲死去，还在明知他患有糖尿病的情况下给他吃甜食，导致病情加速恶化，并最终在他去世后表示解脱，就好像这一切稀松平常。我对他母亲的狠毒行为感到吃惊，但我不想在第一次会面时就显露担忧。我需要与彼得建立融洽的关系并了解他的过往。于是我故作轻描淡写，暗示他母亲有点儿严厉。然而彼得为母亲申辩：“我母亲是为我们好，她一个人要做三份工作。”我指出一个人的一天没有那么多时间，他说他母亲一次同时做两份工，接着再去做另外一份。他们在安大略省的小镇霍普港——现实证明，这个名字颇为讽刺——开了镇上唯一一家加籍华人餐馆。



孤独者听见音乐

顷刻间被簇拥

- 罗伯特·勃朗宁 -

《勃朗宁诗歌全集》

彼得告诉我，他父亲当时是餐馆里的厨师，母亲则是服务员，负责打点其他所有事情。当她有多余的时间，就会制作精美的串珠首饰卖给多伦多的一家高档百货公司。夏天她会在大花园里种大家平日吃的食物（中国蔬菜），还为中餐供应商提供批发业务。彼得顿了顿说：“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半夜里透过窗户能看见母亲头戴矿工灯一连好几个小时采摘蔬菜和除草的情形。”

“同时做三份工，还要照顾孩子？”

他迟疑了一下，随后平静地解释说，他姐姐待在厨房的婴儿床里，等长大一些，就会坐在餐馆的高脚凳上。母亲不准她说话，也不能弄出任何声响。“她一直很乖，我却不乖。我很小的时候——还不到两岁吧——会坐在凳子上打转，而姐姐则安静地坐在卡座里。我记得有一次我用菜单做了个纸飞机，想要飞着玩。我母亲可不允许有人在餐馆里这么胡闹。她忙得四脚朝天，我这么做会打扰到客人，可我就是不听话。”

我指出男孩通常比女孩更加好动，而他的举止其实很寻常。他谦恭地点了点头，接着又把之前说的那句话重复了一遍：“她这么做都是为了这个家好。”我注意到他已经牢牢记住了母亲的教诲，认为自己“特别淘气”，虽然他只是做了同龄的普通男孩都会做的事。我问起他母亲对于他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说：“从我记事开始，除了折纸飞机的记忆，能记得的就是一个人被锁在餐馆的阁楼上。我母亲早上会送来当天的食物。她要是来抱我回家的话，我在那个时候一般已经睡着了。”我问他在阁楼上被关了多久，他说一直到五岁。彼得说他母亲每天都把他关起来，因为父母一定要从清晨六点忙到半夜。

我在椅子上坐直身子，感到难以呼吸。我意识到眼前的案例实属罕见：这名男子在童年至关重要的时期一直被关着。两位儿童心理学的先驱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与让·皮亚杰（Jean Piaget）提出，儿童的发展有若干关键阶段，其中的每个阶段都建立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之上；如果彼得在大约两岁到五岁期间一直与世隔绝，他的身心发展就会脱节。他也许已经错过了最初的几个发展阶段，比如建立依恋关系和情感纽带，还有语言发展等。我们在儿童时期都会经历所谓的“窗口期”，在此期间会习得一些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特定技能；随着儿童的成长，这些窗口会逐渐关闭。如果孩子错过了某个时期相对应的阶段，之后很可能也难以弥补。举例而言，与世隔绝的孩子往往无法弥补语言方面的缺陷。

我对彼得的骇人往事有所消化之后，开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他：这位来访者的勃起功能障碍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我发出警示或者让他觉得自己很不寻常，就有可能吓到他。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继续提问，请他描述对那段独处时光的回忆。

“嗯，冬天很冷，夏天又非常热。”他说，“我被丢在婴儿床里。我记得自己有一天学着爬上栏杆翻出婴儿床。我挺高兴的，但等我发现门锁着之后，又变得很难过。”

“你早年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那段回忆有点儿难以启齿，但我想坦白。”彼得接着描述了自己小时候如何在一个空的番茄酱罐头里排便。他记得那是个商用的大容量装罐头，边缘特别锋利，根本没法坐在上面。“我担心极了。要是我弄到罐子外面，母亲就会很生气；要是我割伤了自己，她还是会很生气。”

我说：“一个两头不讨好的如厕体系。”

他微微笑着表示同意，脸上的表情不一会儿便消失了。“我记得自己因此很害怕那个罐头，我要是给母亲添了麻烦，她就会用竹鞭抽我，抽得我红肿出血。”

我说这听起来很痛苦，他便又一次说起口头禅，说母亲别无选择，只能努力谋生，不能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他皱了皱脸说：“我把绝缘材料剥下来做玩具那次被打得最惨。我当时想有个能拿在手里玩的东西。”

我插嘴说，要是母亲给他一个玩具，他就不会这样做。彼得说他们很穷，所有华人移民都得做出同样的牺牲，这是他们在加拿大生存的唯一办法。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华人移民不是非得把自己的孩子一周七天、一天十八个小时一直锁在阁楼里，而且一锁就是好几年。彼得跟劳拉一样，早已将家长的病态行为视为常态。在他们看来，家长疏于照顾很正常，因此他们会维护自己的父母。

随着谈话的深入，我开始质疑彼得对华人移民生活经历的解读。最终，我问他是否真的以为所有华人男性在各自生命前五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锁在房间里。他的回答令我震惊。“嗯，是我不好。”他静静地 said，“我在柜台前的凳子上打转，还跑来跑去。我母亲没钱请人照看我。我的姐姐已经学会安静地坐着，我却不听话。”很显然，他还没有准备好要看清这无疑属于儿童照管不良与虐待的过去。

实际上，彼得最深刻的童年记忆——也是唯一被他视为快乐的回忆——是夏天时从阁楼的窗户看母亲坐在餐馆后门的台阶上切蔬菜。母亲偶尔会上二楼拿一包储藏在那里的大米。彼得听得见她的脚步声，巴望着她会到三楼的阁楼监狱来；彼得记得自己当时有多么渴望母亲会上来看他，因此心脏怦怦直跳。可是，母亲几乎没有来看过他。（她一直到半夜他睡着以后才会上来把他抱回隔壁的家中；天亮后，又会抱着熟睡的他去开工。）母亲回到楼下的餐馆后，他的心也因此往下一沉。

“最糟糕的就是孤独感。”他回忆那些岁月时说道，“虽然我偶尔会挨打和挨冻，但最令我痛苦的其实是挥之不去的孤独。”他记得自己看见树上的松鼠时会乞求它们到窗前来。“我当时还不识字，但我记得自己在离开阁楼很久以后才学会了孤独这个词。大约七八岁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动画片《绿巨人》。绿巨人说他为了不被别人发现自己的身份而与世隔绝地生活，因此感到很孤独。他在动画片的最后不得不离开小镇，这时候的音乐显得十分悲伤。我记得自己对于别人也和我一样会孤独感到特别震惊，而且终于为那种糟糕的感受找到了描述的词语——一个叫作孤独的标签。”

我在之后的会面中问彼得，母亲有没有为他做过什么贴心的事。他说母亲有一次送给他一个白色玩具钢琴。许多年后姐姐告诉他，这是一个带着年幼儿子的顾客落在餐馆里的。昏暗的阁楼里，彼得拥有的只是这个玩具钢琴和那个番茄罐头。他说：“我很喜爱这个钢琴，还把它当成朋友。”

我问彼得如何与玩具钢琴交朋友。他说：“钢琴的名字是小彼得。我当时除了父亲之外从来没遇到过别的男性，所以不知道其他名字。我希望小彼得能跟我说说话，于是我开始弹奏，把叮当作响的声音当作对话。我既可以让小彼得难过，又可以让它开心。”（每当彼得听到乔治·哈里森的歌曲《当我的吉他轻轻哭泣时》，就会想到小彼得。）彼得获得玩具钢琴后情绪也有所改善，他有了一个挚爱的朋友，对一直冲他发脾气还把他当成累赘的母亲的依赖也大大减少了。

我在会面的间隙去参考图书馆查阅关于彼得的信息（当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脑还没有普及）。我发现他在一个知名乐队里担任键盘手，有一篇乐评还将他形容为“能让键盘说话、哀号、哭泣或雀跃的人”。我想起彼得提到过那个玩具钢琴之于他的意义，对这篇评论的准确性感到很惊讶。

小彼得是彼得仅有的亲密朋友，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是他的“过渡性依恋客体”（transitional attachment object）。儿童对母亲的依恋是一个复杂又关键的心理问题。正常的儿童发展过程中，在最初阶段，母亲就是儿童的整个世界。接着，在婴儿时期到学步时期，儿童意识到自己与母亲的差别，开始经历分离焦虑，当母亲不在面前时便会哭泣。通常，儿童为了避免焦虑，会选择一个能够代表母子依恋安全感的客体。这一客体就成了过渡性依恋客体，其通常是毛毯或毛绒玩具，会被蹒跚学步的孩子到处带着，尤其是上床睡觉的时候。过渡性客体可以帮助儿童更好地从依赖走向独立。

彼得与母亲之间的依恋关系非常不稳定。母亲从未向他表达过关爱，还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把他一个人关着。如果他调皮捣蛋、撒泼，甚或是在餐馆里大声说话，就会受到惩罚。他唯有在小彼得面前才能吐露情感，因此无论什么都只对小彼得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小彼得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发牢固。

由于彼得只字未提父亲，我便问起他父亲在家里的位置。“我的父亲和我或是家里的任何人都不打交道。他人不坏，从不会训我或者打我。他的工作是在餐馆里烧菜，一直会用收音机收听美国的爵士乐。夏天里厨房的窗户开着时音乐声会传到阁楼上，我于是会试着用小彼得重复听到的旋律。我特别喜欢夏天的那些音乐时光。”

我问起是什么事情导致他父母的婚姻出现如此巨大的裂痕。他说：“我母亲把三份工作的收入全都存了起来，从来没花过一分多余的钱。我们的所有衣服，包括我父母的，都来自多伦多的堂亲。她在城里背着沉甸甸的包来来回回；她没有车，也从不坐公共汽车。我的父亲每个月会去一次多伦多购买日用品。我直到今天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在其中一次去多伦多的时候投资了一个毫无价值的项目，所有的钱都被一个假冒的西贡进口公司骗走了。我母亲存了31000加元，结果全没了。”

我在笔记里写道，他的母亲虽然不会说英文，却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加拿大的房屋均价只有7000加元出头的时候存下31000加元，实在是数目惊人。我继续追问，希望能搞清楚彼得的父亲到底被卷入了什么样的骗局，可他当时年纪太小不记得了。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鸦片上瘾、赌博上瘾还是只是投资失败。他一直没搞清楚。总之他冷漠的母亲动不动就发脾气，每天都盼望自己的丈夫死掉。

他们后来不得不卖掉餐馆还债，全家人从头来过。当年五岁的彼得在举家搬到多伦多时结束了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的母亲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则把计件的工作带回家做，一直忙到深夜。她还开始做某种食品进口生意，彼得一直没搞懂具体的内容。失去餐馆以后父亲再也没工作过。一家人住在中国城最贫穷的地区，与亲戚一起生活，后者虽然不乐意，但还是碍于情面收留了他们。

在多伦多待了不到一个月，彼得就开始上幼儿园。他讲到这里显得特别痛苦，比谈到自己的孤独时还要痛苦。他喃喃地说道：“我在幼儿园留级了，那是我最大的耻辱。我母亲说我太笨，在中国人面前给她丢尽了脸。”

我在好几次会面之后才搞清楚彼得在幼儿园里经历了什么，总之，他似乎被吓坏了。入园之前，彼得除了姐姐之外，只在开学前几周与亲戚的孩子略有相处，此外便几乎未跟任何小朋友打过交道。而且，他既不会说英文也不会说中文。他在人生的头几年里听到别人用任何语言说过的话一共就没几句。他和姐姐都没有学过如何说中文，这让他们感到特别羞愧，尤其是在中式婚礼与正式场合中。

我请教语言学专家时，他们表示，要么是孩子由于受到虐待而屏蔽了施虐者使用的语言，要么就是家长几乎不怎么与孩子说话，让他们难以在学习语言的关键年龄段学会这种语言。（他们的父亲在失去家里的积蓄后便整日沉默寡言。）两个孩子长大后既没有华人朋友也没有与华人结婚。彼得听到别人说中文时会感到些许焦虑。他说：“我直到今天听到女性说中文都会起鸡皮疙瘩。要是对方大声嚷嚷，我就会吓得要死。”

所以说，彼得开始上幼儿园时还不具备语言交流能力。其他孩子对他说中文他听不懂，说英文他也听不懂。一起玩游戏时，他害怕跟人手拉手围成圈。“我已经习惯用番茄罐头上厕所，而且一直是不管做什么都会挨打。有一次在幼儿园，我想上厕所却不知该如何是好，结果尿了裤子。”

他还惧怕跟人有眼神交流，这让他觉得自己像在公共场合赤身裸体。每当有人直视，他都觉得太过亲密想要逃跑。他也从不知道在与他人分享空间时的正常状态：由于一直独处，他觉得所有人都站得离他太近。每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就会躲到教室里的黑色立式钢琴底下，抓着钢琴的木板条寻求安慰。实际上，那架钢琴对彼得来说是幼儿园里为数不多的美好事物之一。他将其视为小彼得的父亲，想要拥抱它、轻抚它，与它靠在一起。（钢琴成了一个更为巨大的依恋客体。）

令人难过的是，彼得在得知自己没能从幼儿园毕业这个坏消息之前，真心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彼得在钢琴之外获得的另一个积极影响来自一位善良的老师。彼得对于她的温柔感到特别惊讶。彼得起初很怕她，在她面前畏畏缩缩。可老师却对他微笑，这对他来说见所未见，他凭直觉认为这代表了接纳。老师也知道他热爱钢琴，因此在演奏儿歌《三只盲鼠》时便让他站在身旁。彼得会把手放在钢琴的一侧，感受弹奏时的振动与呼吸，像是拉着母亲手的孩子那样不肯松手。彼得把白色的琴键看作牙齿，整架钢琴仿佛在用灿烂的笑容接纳他。这是他经历过的最不同寻常的时刻。他听着音符化作歌谣，眼睛里涌出泪水。他相信钢琴是在对他说话。这是他在幼儿园的纷扰中领悟到的第一件事。

彼得得知自己留级之后震惊至极。他原本以为老师喜欢他，这下子则认为老师讨厌他。他母亲告诉他，其他所有人都升学了，现在他得跟比他年幼的孩子一起念幼儿园了。彼得认为自己就像父亲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失败了。“当我发现自己没能取得成功时，感到特别丢脸。”

我设法解释，在幼儿园顺利升学需要掌握多种习得性行为，被关在阁楼里便无法学会这些。彼得错过了太多阶段，根本没有做好入读幼儿园的准备。那位教师察觉到了，于是让他留级。我继而讲述一个人如何通过不同阶段的发展在世界上获得独立。如果这些阶段像彼得所遭遇的那样被打乱，发展就会有所延迟。

首先，在一个人以健全的方式进入这个世界以前，母爱必不可少。每当我提起这个，彼得便会反驳，说他母亲确实爱这个家，说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我说他的母亲无法直接对他表达爱，当他被独自关着的时候，也感受不到母亲的爱。

母亲必须抱着自己的孩子，感受到对其的依恋，反之亦然。到两岁左右，儿童意识到自己是有别于母亲的个体。为了锻炼自己作为个体的影响，儿童便会开始通过说“不”来反对周围的人（也就是“可怕的两岁”时期）。成功脱离母亲的幼儿实际上是在表达：“不，我不会按你说的去吃东西、不会穿上靴子，也不会按照你说的去做。我是一个独立的人。”这个阶段既帮助儿童学习“我的”这一概念，也是在学习如何坚

持自我主张。然而，彼得没有机会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发现独立的自我。事实上，他说自己到现在都会不向母亲提出要求——以任何方式将自己与母亲区分开来——小时候就更不用说了。

彼得也很害怕其他孩子，不知道如何跟他们一起玩耍。棒球或其他各种游戏的规则对他来说也似乎太过复杂深奥。我再次解释这并不代表他很笨：大多数儿童在上幼儿园以前有四年时间参与集体行为。别的家长会把球投给孩子，让他们练习击打，或是带他们上公园看其他孩子如何玩耍。两三岁的儿童看到大家开心地玩滑梯的话，也会跟着轮流去玩；当儿童第一次爬上滑梯，他们的父母就在一旁看着。可彼得不知道“轮流”是什么意思，他以为自己应该站在原地转个圈。他不知道如何跟上其他孩子的节奏，那对他来说太过混乱。

我向他说明大脑在我们出生时并没有发育完全，而是一部分一部分搭建起来的。在儿童出生后的头四年里，他们应该建立所谓的“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前额叶皮层必须在大脑中建立通路，这样才能将学到的东西都联系在一起。举例而言，执行功能有助于培养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学习如何忽略不相关的音频并对多种需求的优先级进行排序。这个世界何其复杂，我们需要循序渐进地去了解。

留级之后，彼得的情况大有改观。他又遇到一位相处时极其友善的老师。我问他“极其友善”是什么意思，他说：“她没有对我大喊大叫，也没有用竹鞭抽我。”那位老师很年轻，经常弹奏钢琴曲，其中就包括彼得很喜欢的《巴士车轮转呀转》。他觉得自己与大彼得都对歌曲十分陶醉。

那架钢琴也改变了年幼彼得的生活。彼得放学后通常由姐姐来接，但有一天，他的姐姐没有出现。他和老师有所不知的是，当天姐姐在学校操场上摔了一跤，于是去卫生室处理伤口了。老师去了解情况时，把彼得一个人留在了有钢琴的那间教室。

彼得走上前拥抱大彼得。他张开双臂靠过去时压到一个琴键，奏响了一个音符，随即开始弹奏。彼得说，他一开始就像老师那样以欢快的曲调弹奏《巴士车轮转呀转》，但接着，他又以一种仿佛车子在路上疲倦又迷失的忧伤情绪弹了一遍。他并不清楚“高兴”或者“悲伤”的意思，但他能通过钢琴传达。彼得不知道自己会弹奏这首曲子，他只是认真看过老师这么弹而已。接着，他又模仿老鼠奔跑的节奏以爵士乐的即兴曲调弹了《三只盲鼠》。他的腿太短，脚还不够到踏板，因此在弹奏个别音符时必须在琴凳上前后挪动身子才能踩到踏板。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等他抬起头时，看到几位老师站在门边上看着他，一旁还有他的姐姐、学校护士、校长和看门人。看门人鼓起掌来，其他人也都加入其中。

彼得的演奏生涯就此拉开帷幕。这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他在回家的路上感觉自己像变了个人。他的朋友大彼得替他说话，而且神奇的是，大家竟然听懂了。他记得那是秋天里的一个日子，所有的树叶都在向他挥手。那天的色彩超乎现实。彼得意识到，在那一刻以前，他一直在用黑白两色看世界，而且是字面意义的“隧道视野”。他并没有注意过周遭的情况。他说他的深度知觉也就此改善，而且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笨拙了。这是彼得在人生中第一次成功表达情感，他的心情无比灿烂。

02

爱的表达

张家从霍普港搬到多伦多过了差不多四年时间，尽管当时九岁的彼得已经不会再被关起来，他的家庭生活依然困难重重。他们从堂亲家里搬了出来，住在皇后街西端一间昏暗的一居室公寓里。放学后，他和姐姐会在小小的屋子里看电视等母亲回来。通过念书、看电视以及与姐姐对话，彼得的英文水平也有所提高。他不管去哪儿都会带着玩具钢琴，弹出他听到的每一首歌曲。他说：“小彼得只有八个琴键，所以当我弹奏《吉利根岛》的主题曲，我姐姐认出歌曲还跟着拍手时，我特别自豪。”

当时彼得的父亲——迄今依然在这位来访者的叙述中只占据很小一部分——变成了一个超重的糖尿病患者，他不仅毫不关心自己的胰岛素水平，还在妻子的提议下摄入糖分。离开霍普港的餐馆后，他的父亲由于疏于照管的糖尿病、超标的体重以及极其严重的抑郁症而难以找到工作，整天只是坐在椅子上听爵士乐。他偶尔会在听到一段特别动听的即兴片段时茫然地指指唱片。彼得明白，搞丢家里的积蓄后几乎不再与他有眼神交流的父亲是想要与他分享音乐。彼得听堂兄说起过，父亲小时候很有音乐天赋，看到新乐谱便能立即弹奏，但妻子并不赞成他将音乐当作事业，认为这些东西不切实际，是腐败的西方产物。

彼得的母亲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羞辱他的父亲“毁掉了这个家的未来”。她一分钱也不给他，哪怕是用来买他心爱的唱片或香烟。彼得后来得知，父亲来自一个音乐世家，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受到西方音乐毒害，并且涉嫌在越南参与鸦片交易。他的母亲将西方音乐视为造成他父亲游手好闲一事无成的一部分原因。

一天，彼得的姐姐正忙着做串珠的计件活，无事可干的彼得则与父亲一起坐在那里听爵士乐。这时，母亲出其不意地下班回家了，她见状气急败坏。“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如此生我们的气，”彼得说，“毕竟她出门工作，我们却在家无所事事。她说我和父亲一个德行，都受到了西方思想和音乐的腐蚀，不比颓废的法国人和其他欧洲垃圾好到哪里去。”（在他母亲小的时候，越南还是法国的殖民地。）母亲越来越狂暴，声音里带着一种似曾相识的危险音调，把彼得吓坏了。“她冲进客厅，将唱片顶在自己的膝盖上一张一张掰断。我愣在原地，希望她不会冲我发火，但她还是过来了。”他回忆道，“她对付完父亲收藏的唱片后立即看向我，随后冲进我的卧室，一把抓起小彼得扔出窗外。”她使出的力道如此之大，把纱窗也一道扔了下去。

彼得当时九岁。表面上，他是因为没有串珠子而受到惩罚，但实际上，他受罚是因为他与父亲相像。我问他是否因为失去小彼得而震惊。他说对他失去已经习以为常，感受到的只有情感上的空白。“这很难说清楚。我看着窗外为小彼得感到难过，觉得它就像是童谣里的‘矮胖子’。我倒没有感到悲伤，就是空落落的。”他吞吞吐吐搜寻着字眼，“有点儿像是我没有待在自己的身体里一样。”

我指出，在二十五年前数以百万计的回忆之中，他记得的偏偏是小彼得的毁灭。我说我相信是因为这段回忆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你当时遭受了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也就是你感觉与自己的心理自我产生了分离。你无法感受到自己内心的感受与情绪。整个世界似乎都很模糊，你与自己的联系也中断了。”

“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充满精神创伤的童年，这往往处在自我分化的早期阶段，外加高度焦虑。”

彼得说他之所以清晰记得那天的情形，是因为几天以后发生的事。当时是夏天，学校放假，因此姐姐从早到晚一直都在串珠子。父亲示意他跟着自己一起出门。当时父亲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却已经需要拄拐杖走路，且步履蹒跚，十分吃力。父亲带着彼得慢慢走向商场，走得大汗淋漓、筋疲力尽，脚踝都肿了。等他们来到商场，父亲走到一家商店的音乐柜台拿起一个合成器，随后便离开商店朝商场的公共区域走去。一名保安拦住他们并报了警。警察意识到彼得的父亲有些不对劲，因为问话时他一声不响。他们在彼得保证家里有钱支付后开车将彼得和父亲送回了家。“现在回想起来，我猜警察知道我们两个不是小偷，而是精神出了问题。他们好心地默默把我们送回家，我则一路紧紧抓着合成器。”好在母亲当时并不在家。姐姐动用积蓄支付了合成器的费用。警察不可置信地打量堆满大量珠饰俨然工厂一样的房间，还询问姐姐为什么独自做着童工。彼得听见他们相互交流，姐姐说这只是“中国习俗”。警察似乎很不解，但并没有提出起诉。后来母亲回到家，警察在离开前交代了情况。

彼得的母亲就是在这个时候彻底失去理智的。他说母亲平时就很可怕，但他从来没见过如此令人恐惧的模样。母亲疯狂地拉扯父亲，将其打得摔倒在地。她用中文叫喊着，因此彼得不知道她在说什么。父亲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颓然地靠在墙上，接连好几分钟都在喘粗气，后来便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彼得告诉我，他一直觉得自己对父亲的死负有责任，因为要是没有给他买合成器，父亲说不定还活着。

彼得没有什么关于童年的记忆，而其中之一正是父亲偷合成器的事。他小心翼翼地解释说，他感到羞愧是因为偷东西是无法接受的，而且他认识的人中也没有人会偷东西。不过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他认为这是自己短暂一生中唯一获得过的爱的表达。父亲虽然身无分文，但知道自己快死了，所以希望儿子有一架钢琴来取代被扔掉的那个。于是父亲一瘸一拐地走进商店拿起一个合成器，甚至都不屑于藏起来。彼得认为，这是垂死之人绝望之爱的表达。

他也承认父亲的死是一种慢性自杀。我问起他的母亲有什么样的反应：“她也许盼着他死，但等到事情真的发生了，可能她又有了另一番感受？”

彼得深深叹了口气：“不可能。她不是那种人。她盼着他死，等到他去世了便感到松了一口气，说她少了一个负担。父亲死后，她除了说我像父亲一样又懒又蠢之外，再也没有提起过他。”

“你像你的父亲吗？”

彼得说像。他们都有音乐天赋，都识谱并且能够凭听觉记忆演奏。此外，他们都

很安静，喜欢音乐，对赚钱或竞争则不太上心。彼得只会在自己的房间里玩合成器，因为他害怕一旦母亲意识到他如此珍视，就会毁掉它。

彼得的父亲去世没过几年，他母亲便买下一栋有四套公寓的小楼，四年之后又买了一栋。最后，她坐拥一排这样的建筑。她亲自维护、修缮、收租，还单枪匹马与市内的租金管制条令斗争。她在彼得二十多岁时将自己家附近楼内的一套公寓给了他。彼得的母亲依然每天晚上为他做晚饭，她会跑回家做饭，接着跑去做下一份工作。与此同时，彼得的姐姐一离开家就嫁给了一名非华裔男子，成了全职妈妈，母亲说她过着“懒散的加拿大式生活”。

彼得认为母亲将他视为负担。母亲称他为“窝囊废”，不断劝他去找一份正经工作。尽管彼得不在乎经济利益，乐队的巡演也没赚多少钱，但他其实已经在音乐界已经逐渐有了名气。

显然，彼得的母亲从他出生起一直到成年都认为他是个懒惰、迟钝的坏孩子。没有相反的证据能够说服她。这究竟是因为她憎恶彼得与她丈夫的相似之处，还是她认为西方音乐很邪恶，或是她整体而言不喜欢男人，我永远也不得而知。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当母亲给我们贴上负面的标签，我们会当真——还有谁会造就我们的自我形象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母亲生活的更多有趣证据浮现了出来，她的行为也随之变得合情合理。用弗洛伊德学派的话来说：“维也纳没有谜团。”

我们当时即将完成第一年的心理治疗。那段时间，彼得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柔和，而且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开始与我有眼神交流。由于极度缺乏情感上的经验，彼得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信任我。他必须认识到我关心他，随后才能一起为恢复而努力。

然而，我还是担心彼得的预后情况。他错过了那么多成长阶段，我对于要如何帮助他构建自我感到担忧。原材料如此之少，要用什么作为基础搭建呢？在不牢靠的根基上构建自我显得有点儿危险。我感觉就像建筑师在摇摇晃晃的支柱上建造房屋那样惶恐不安。

给我带来希望的是彼得莫大的善心。如果有人缺钱，他就会借给人家。有一次，有位女士在我的等候室里哭泣，彼得没有询问她怎么了，而是直接出门帮她买了一杯咖啡，告诉她一切都会过去。他对母亲的忠诚——无论怎样被辜负——都令人动容。善意与宽仁之心能让人走得很远。

可是，每当彼得感到愤怒或与他人的肢体接触过于亲密，便会经历人格解体并感到严重的焦虑。我怀疑这些情况是他阳痿的根源。他焦虑得都出现了出体体验，当一个人无法切身感受到生理上的兴奋，便很难在性方面获得成功。

心理治疗的目标是让彼得构建自我，这样他就能在面对压力时懂得如何应对，不会在情感上与自我分离。自我（ego）——即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是个抽象的概念，很难给出明确的定义。这好比是座一块块砖瓦搭建而成的屋子，就象征意义而言，这个家为我们提供庇护，保护我们免受外部世界的压力，是个安全的场所。如果彼得的母亲是一名心理更加健康的女性，就会说彼得很敏感善良、悟性很好、很聪明，还具有音乐天赋。赞扬这些正面品质能帮助彼得打下更坚实的基础。等到狼来敲门时，彼得——如儿童故事里的小猪那样——就会在坚实的砖房中得到保护。

恰恰相反的是，彼得的母亲几十年来一直说他懒惰、愚蠢、无法应对生活。彼得没有由坚实砖瓦筑成的地基，而是身在一座稻草屋里。当彼得想要与他人交往或者发生性关系时，他无法在稻草屋中得到保护。他的自我还不够强大，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身体，经历人格解体。

我希望在心理治疗中达成两件事：首先，我希望彼得意识到他母亲的心理异常，并且认识到她是如何通过自身扭曲的视角来看待他的；第二，我希望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帮助彼得搬出稻草屋，住进砖瓦房里。我的工作就是要帮他看清自己的正面品质，以此免受狼的伤害。我希望他能够对狼说：“我是彼得·张，这是我的安全屋。需要离开的是你，不是我。”

心理治疗进入第二年，是时候关注彼得的阳痿问题了。作为乐队中的成员，他有大把机会结识女性。彼得说这与他的吸引力无关，无非是“搞乐队的人都会遇到的事”。我指出就职业危害性而言，这比煤肺病更厉害。

他渴望体验性行为，但与女性有肢体接触却让他感到极度不适。对此，我们讨论过可以先与女性建立友谊并慢慢发展关系，之后再以自己能够接受的速度发展下去。

我告诉彼得，为了解决他的阳痿问题，我们需要审视他自出生以来的完整心理状况。

他遭遇的母爱剥夺 (maternal deprivation) 导致了英国著名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 (John Bowlby) 所说的“依恋障碍”(attachment disorder)。对婴儿来说，母婴依恋 (maternal attachment) 比什么都重要，连食物都无法相提并论，婴儿会为之放弃一切。如果得不到，儿童就会焦虑，并且无法以任何正常方式探索或应对这个世界。依恋障碍不单单会影响到与母亲的关系，对各种社交、情感与认知发展都会产生影响。如果孩子没有依恋体验，就无法发展到第二阶段：信任他人、在情感上依恋他人，并最终在性方面对他人生出依恋。换句话说，如果婴儿时期依恋体验缺失，就无法在情感上获得成长。

动物学家康拉德·洛伦兹 (Konrad Lorenz) 指出——这也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部分原因——我们可以从进化的角度来理解依恋理论，即母亲可以为婴儿提供安全保障。依恋性意味着适应能力，能提高婴儿的生存机会，因此成了大脑中生来就存在的一部分。婴儿需要母亲的怀抱、爱和拥抱。

可是，彼得很难将自己在幼儿园的焦虑行为与他早年缺乏母爱联系起来，阳痿就更不用说了。心理治疗师时不时会碰壁，因此不得不通过一些极端或非正统的方式寻求突破，以此让来访者发现固有模式。为了帮助彼得更好地理解母婴依恋的概念，我安排了一场特别放映：心理学家哈里·哈洛 (Harry Harlow)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猴子进行实验的电影，这可能是在社会心理学家实验室中拍摄的最著名的电影。私人放映活动设在多伦多大学（我偶尔在那里教书），放映员同意在我希望为彼得讲解时暂停电影。尽管这些实验按如今的标准来看不符合实验伦理，但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依恋障碍的独特渠道。以前这些影片只有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看得到，但现在，任何人都能在网上搜索观看。

哈洛的这些影片成了彼得心理治疗中的转折点。影片一开始，哈洛教授就解释了“母婴维系”(maternal bond) 的概念——他称之为“爱”——即婴儿与母亲之间的纽带。实验人员将刚出生的猴子放在笼子里，与两个假猴子母亲一起饲养。“铁丝妈妈”端着一瓶牛奶，幼猴得跳到母亲身上才够得到。“布妈妈”也是用铁丝做的，只是上面盖着一块毛巾；它提供的并非食物，而是触感，能让猴子拥抱依偎。哈洛和其他人员震惊地发现，拥抱胜过了食物。小猴子每天抱着布妈妈的时间长达十九个小时，只有在需要喝奶时才会去铁丝妈妈那里待上几分钟。布妈妈被拿走之后，幼猴因为分离焦虑吓得又哭又喊。当布妈妈和铁丝妈妈都被拿走后，小猴子前后摇晃，还啃咬自己，把自己都给弄伤了。

彼得开始兴奋地说起话来，尽管他的声音依然略显单调。他认识到自己就是那个前后摇晃还啃咬自己的猴子；他独自躺在婴儿床里时曾经反复用头撞床，幸好玩具钢琴拯救了他。彼得说：“小彼得就是布妈妈，会唱歌抚慰我，还会用音乐拥抱我。”他其实还记得或想象得出他的小钢琴用舒缓的声音抚慰他内心孤独的情形。他说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是自己在弹奏钢琴发出声音。他将玩具钢琴视作生命体，一个能安慰他的活物。

电影继续，我们看着幼猴第一次被带出笼子，锁在一个没有布妈妈的房间。那个房间里放着猴子通常会喜欢的物品，比如梯子和秋千。但小猴子缩在角落里痛苦地颤抖，对一切都显得很害怕。当布妈妈被重新引入房间后，小猴子立即爬到它身上抱住它。等到小猴子从布妈妈那里获得些许安慰，便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

彼得再次要求暂停放映。“我的天，”他说，“这就是幼儿园。其他所有人都有布妈妈，我却没有，因此害怕地躲在角落。我真为这只小猴子感到难过。我现在想起来了，以前我还纳闷为什么其他孩子没有像我一样被吓到。他们在那个布做的巨大毛毛虫通道里跑来跑去相互追逐，我却吓得要死。”

接着，影片中出现一个怪物形象，看起来就像一只巨大的金属虫子，长着硕大的牙齿和转来转去的脑袋。小猴子显然很害怕，于是跑去抱住布妈妈。等到猴子抱够了，得到了母亲的爱恋，它便转过身开始对大怪物发出威胁的声音。

彼得表示希望再一次暂停放映。“我受人欺负，找不到安慰。”他告诉我，“我只有躲起来，之后便陷入了不断被欺负的循环中。”

我们又看了几部哈洛的影片。研究者发现，那些母爱被剥夺的猴子长大后无法保护自己。最令人吃惊的是，它们都不愿意发生性关系。当它们被迫交配并分娩后也不知道如何当父母，无论公猴母猴都变得很残忍。它们行为上变得残暴，情感上则很冷漠，研究人员常常得将它们的后代移出笼子以确保安全。

最后一部影片放完，灯亮了，彼得却呆坐在那里。我凝视着他灰白的面孔。他一脸惊讶地看着我说：“它们不想性交。我的天！”

他终于恍然大悟。“没错，性是最终目的。”我说，“首先，你需要爱，接着是依偎、亲近，然后是保护，这样才能大胆地走向世界去闯荡。童年时与世隔绝的人们错过了所有的步骤，成年后便觉得性很可怕。”

彼得问我：“你看到那些只有铁丝妈妈的小猴子长大后要跟正常猴子交配时有多恐惧吗？我就是这种感觉。”我看到他腋下有很大一片汗渍，眨眼的速度也慢了下来。他太过心烦意乱，迟迟没有离开放映室。他经历了一次重温幼年时期的可怕历程。

彼得曾经听信母亲说他没用、窝囊又愚蠢的话。我企图改变这一印象，却并没能使彼得摆脱母亲对他的看法。直到看过哈洛的电影，他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发展中的关键阶段。彼得后来告诉我，没有什么比哈洛对猴子的研究对他的影响更大。这一举措起了作用，自此，我们将心理治疗的过程分为“哈洛之前”与“哈洛之后”。彼得开始意识到自己既不愚蠢也不失败，而是没有为生活做好准备。但他不解的是，为什么“其他有工作的中国父母的孩子没有遭受相同的命运”。我必须小心应对。彼得一直以来都对母亲很忠诚，从来没有说过她一句坏话。他反复提起的一句话就是：“她做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好。”

在我看来，彼得母亲极其缺乏母性本能。但作为心理治疗师，我知道对彼得说这样的话无济于事。他需要亲自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得等到他有能力接受的时候。如果我们都在来访者做好倾听的准备或愿意面对以前便指出一个“真相”——用一个比较好的词语来形容的话——他们就会对心理治疗师失去信任，内心被防备意识占据，并且只会在表面上有所改善。对来访者过度解释是心理治疗师缺乏经验或信心的标志。治疗师可以将来访者领到理解的大门前，但不应该强迫他们进去。来访者会在自己做好准备后踏入大门内。

无论有多么曲折，从人格解体到找回人格的心理治疗过程都很缓慢。彼得从未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对待，所以他最终并没有自己作为完整个体的感受。他在自己身体之外端详自己。心理治疗引导他踏上漫长的旅程，让他感受到自己的人格，也感受到自己的人性。

03

火烫的问题

彼得随乐队在美国南部巡演时，在阿肯色州一间酒吧遇到一位当服务生的女子。他要在那演出一周。女子为他端上饮料，点了歌曲《佐治亚州》，歌声悠悠唱着：“让我看看你有多思念佐治亚，因为那儿就是我的故乡。”彼得弹这首歌时，整个房间都安静了下来。演奏结束后，彼得对着麦克风说：“这首歌献给梅兰妮，她思念自己在佐治亚州的老家。”乐队成员大吃一惊，都转过头来看他：这是他们乐队成立十六年以来他第一次在舞台上发言。彼得说他看得出大家特别为他高兴——他们虽然不知道彼得在接受心理治疗，但还是意识到他有所突破。

梅兰妮在演出结束后等待彼得，然后他们一起喝了一杯。彼得告诉我，他尽力不去想到性，而是专注于享受当下。梅兰妮问彼得住在哪里，他报出酒店名字后，对方看着他，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彼得说他想到了我们的会面，以及他应该如何调整才能慢慢适应。他告诉对方自己演了两场十分疲累，但愿意第二天一起共进午餐。梅兰妮答应了。

彼得告诉自己不要太过担心性方面的事，而是可以先发展友谊。午餐时，梅兰妮告诉彼得自己的父亲收集老式蓝调音乐唱片，于是他们聊起了音乐——一个对他而言非常轻松的话题。他们之后又约会了几次，但没有发生性关系。他始终没有带对方去自己的酒店房间。

彼得回到多伦多后经常给梅兰妮写信，他在信中得以显露更多情绪，甚至有点儿热情。他决定花一个周末的时间飞去看她。随着时间的临近，我们对他即将说的话进行了排练。我告诉他不需要讨论他在性方面的问题，所要做的就是表现出善意与爱意。我向他保证这很容易，因为他的天性就很温柔。

“我觉得你内心是个正常、有爱心又善良的人，你会成为一位美好又体贴的爱人。”我说道，“你只是童年时经历了太多孤独与创伤。即便如此，你依然希望尝试建立联系。你的音乐中充满了真情实感，这说明你内心就拥有这些品质。记住，你受过挫折，但并不残缺。”

我们讨论了什么是依偎，以及如何依偎才能显得不太生硬。彼得的姐姐有一个孩子，会经常拥抱他——至少在彼得看来算得上经常。他会仔细观察加以效仿。没有什么

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可以做到的。

他带梅兰妮去吃晚餐。饭后，梅兰妮说想回彼得的酒店房间，因为她与其他三个女孩住在一起。他们躺到床上，可不幸的是，彼得又经历了人格解体。他犹如通过一个光圈越来越小的镜头看着自己躺在床上，感觉处在自己的身体之外。最后，他们都睡着了。

第二天，他们出了门。梅兰妮当晚八点到凌晨两点要在酒吧工作，因此彼得答应去那里和她碰头。可是，梅兰妮下班后搭上鼓手一起走了。酒保知道彼得在等她，于是说：“抱歉，中国人在南方这儿不怎么受欢迎。”彼得明白酒保本意是要安慰，但对方并不知道这其实有多侮辱人。

我为彼得感到难过，但我告诉他，可以把这当作一次试验。性不过是冰山的一角。百分之九十的冰山都沉在水下，处在无意识的状态中，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内容。

我试图引导彼得记录自己的梦，因为这是我们进入无意识领域的最佳途径。我让他把纸和笔放在床头，这样就能在早晨写下最先记起的事情。结果发现，他的梦境也千篇一律，一直会出现不受他控制的事件。

我四肢大张，躺在一辆公共汽车的车顶。车在路上疾速飞驰，我想要找个可以握住的东西，可一个把手也没有。当公共汽车从一条车道转到另一条车道时，我也被从一边甩到另一边。我试图朝司机大声叫喊，却发不出声音。最后，我缓缓移到公共汽车前端车顶与前窗的交界处，我俯下身子透过挡风玻璃朝里看，发现车上并没有司机。

每当彼得做这个梦都会被吓醒。我们探讨他生活的哪些方面如同公共汽车一样失去了控制。他说他无法与人建立关系时，我指出这并非事实。他尚无法做到的是发生性关系。他与我、他的姐姐乃至乐队的成员都建立了关系，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并尊重他。乐队成员通过音乐和他交流，这对彼得来说并不难。事实上，他的音乐富有亲和力，为他赢得了众多粉丝。他唯一没有发生人格解体的场合就是弹钢琴的时候，无论观众是多是少。

但彼得反驳说，他对其他人没有动真感情，所以怎么可能拥有真正的亲密关系呢？当梅兰妮与另一名男子一起离开酒吧时，他并没有感到悲伤。事已至此罢了。他登上著名音乐杂志的封面时也没有感到很高兴。他把杂志拿给母亲看，母亲说只有吸食鸦片的人和愚蠢的北美人才会看音乐杂志。

在心理治疗进入第三年的下半年里，发生了一件让彼得和他姐姐都感到震惊的事。这件事也成了治疗中的又一个转折点。

彼得的姐姐以前一直是个安静的孩子，会坐在餐馆的卡座里用蜡笔画画。她对母亲百依百顺，是个文静听话的机器人。她受到的创伤比彼得少得多：她从没有被锁起来，而且能够与顾客互动，从他们那里获得关爱。成年后的她依然文静温和，可她从不允许母亲虐待自己的孩子：一到这种时候，她就变得像个熊妈妈一样凶猛。彼得经常去看望三岁的外甥女，很喜欢跟她交流。他通过观察姐姐和这个小女孩充满爱意的互动学习正常的行为。

一天，彼得的外甥女把一锅炖腊肉酱从炉子上端下来时被严重烫伤，不得不住院治疗。外甥女的伤势对所有人而言都可怕至极。彼得说，他和母亲、姐姐一起去医院的烧伤病房看望外甥女。他眼见孩子们在痛苦中挣扎，被吓坏了。

随后，彼得母亲的举止变得很古怪。“我们在走廊上走着，我母亲忽然开始大笑，还说：‘看看她！看看她！’她指着一个被严重烧伤的孩子放声大笑。一位护士朝她看去，说道：‘你放尊重一点，不然就出去。’”护士对他母亲说话的方式让彼得非常震惊，“忽然之间，你说的关于我母亲的一切都浮现了出来。说出来也许你不会相信，我母亲还是在笑，护士说如果再不停止，她就要叫保安了。这下子，其他护士也都聚集了过来。我姐姐默默地在一旁看着。我对这个伤痕累累的小女孩感到很抱歉，于是冲母亲怒喝：‘你有什么毛病？这些小朋友很痛苦。你要么赶紧闭嘴，要么坐公共汽车回家去。’她于是闭上了嘴。我姐姐把手放在我的背上以示支持。”

这是彼得第一次有意识地朝他母亲发怒。（我无法想象他无意识中是有多生气。）我指出，虽然彼得对母亲过去的所作所为感觉不到愤怒，她如今对待烧伤患者的方式却让他感受到了愤怒。

接着，由于对彼得母亲如此奇怪的行为感到困惑，我问起他母亲的童年。他委婉地表示母亲的过去对他来说完全是个谜。据他所知，母亲并没有父母或兄弟姐妹。

他们在多伦多有他父亲那边的亲戚，但母亲疏远了他们所有人——虽然她在自己丈夫搞丢家里所有钱、需要地方落脚时利用过他们；现在她有钱了，还拥有几栋小单元公寓大楼，却拒绝借钱给他们创业。

彼得说，看到母亲对那些受伤的孩子显得如此无情，也激发了他心中对母亲过去所作所为的愤怒。他拒绝再去母亲家里吃晚饭。

彼得母亲似乎对他的回避很困惑，因此将晚餐送到他的门外。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的态度变得越发狂躁，她会在电话中大喊让他必须去吃饭。终于，他答应去看她。在我的提议之下，彼得尝试去了解她在烧伤病房表现得如此可怕的个中原因。彼得提起这件事时，他母亲发出了与此前相同的那种疯狂笑声。彼得对她的麻木不仁愤怒不已，开始倾吐自己的童年有多痛苦。他母亲再次摇了摇头，笑着说他根本不知道真正痛苦的童年是什么模样，还说她是在保护他不受任何坏人的伤害。

彼得问起母亲的过去。她避而不答，只说重要的是自食其力，永远不要依赖丈夫。她还说自己永远也不会当“第二号妻子”。

彼得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对母亲的往事有所了解。彼得的外祖母是越南一位中国商人的二房太太。（这家人是华裔，但好几代人都在越南生活。）二房太太在此指的是介于情妇与妾之间的概念。有钱的男人会在经济上给予女性支持，以此换取偶尔的幽会；孩子则不包括在交易之内。彼得的外祖母很漂亮，富裕的外祖父对她宠爱有加。但等到外祖父失去财富后，对她的态度也变差了。外祖父的社会地位下滑，不能再与任何损害他名誉的人来往。他拒绝给二房太太任何经济援助，也不允许计划外的孩子（彼得的母亲）享有任何法律权利。彼得不明白母亲所说的“权利”是什么意思，而且由于语言障碍，他也难以搞清楚这个问题。他的外祖母没有工作许可，由于当二房太太不合法，她也无法获得营业执照或像样的证件。最后，她为外国来的堕落人士“开设了一家非法的鸦片烟馆。那也是个‘喜欢热鸦片的男人’会去的地方——这是彼得母亲的原话，他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推断那是一个类似于妓院兼鸦片烟馆的地方，那些有施虐癖好的变态顾客会以烫人为乐。彼得的外祖母做着鸦片的买卖，妓院（或者说鸦片烟馆）里的姑娘——包括彼得的母亲——则会被用法国香烟烫。

“彼得！”我说着，彻底惊呆了。我问那些客人是不是法国人。他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因为那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贡，当时的越南依然是法国殖民地，华人作为当地最大的少数族群，经营着众多生意。彼得母亲的职责就是让男人高兴，挨烫或者做“坏事”——无论那意味着什么。彼得的母亲用英文描述的是“扭曲的性关系”和“热鸦片烫”。她在多伦多的医院看到烧伤患者时，想到了自己以前的家。彼得问起外祖母自己是否曾经被烫时，他的母亲面无表情地说：“不常有。年轻姑娘赚的钱更多。”他想知道当时的母亲和其他年轻女孩究竟有多年轻。他的母亲以“我听不懂你的英文”搪塞了过去。（她想敷衍了事的时候经常这么说。）

彼得的母亲后来在鸦片烟馆认识了她的丈夫。他当时和兄弟在街那头的私房爵士乐队中表演，偶尔会进来抽大烟。当对方提出要娶她并带她去加拿大时，她抓住了机会。彼得的母亲说她只关心赚钱，这样才不至于成为“第二号妻子”：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权益，而且只能做“歪门邪道生意”。

最终，彼得问了她一个重要的问题：“你的母亲有没有把你关起来过？”

她的答案很能说明问题：“没有，我把你关起来算你走运。”她说，“我一直要唱歌才能有晚饭吃。”

我缓缓地摇了摇头，盯着彼得看。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我一直说她尽力了。”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事后的感想，“我认为她之所以恨我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知道她的过去。”

“你父亲死后，她有没有和其他男人来往过？”

“从来没有。她一直穿旧衣服，哪怕是出席婚礼。她自己给自己剪头发。凡是有人对她产生兴趣，她就说别人纯粹是看上了她的钱。她爱的就是自己的钱。”

“金钱能够保护她不被烫伤。”我解释说，“她的母亲会把自己唯一的孩子献给施虐狂取乐。当你的外祖母看到这些烫伤的痕迹时，还会和客人一起取笑——就像你的母亲在医院里大笑那样。”

彼得那可怜的母亲根本不知道如何为人母，因为她自己就从未有过疼爱她的父母。一阵静默之后，我说：“我也为你的母亲感到难过。人性中最令人满足的母性本能和为人母的乐趣从她的生活里被剥夺了。母性能在一定先决条件缺失的情况下无法自然产生。当母亲的人自己需要拥有与依恋相关的记忆，并且通过目睹家庭或社会

中的榜样来触发自己的本能。”

彼得沉默良久。最终，我开了口：“我一直在想你母亲嘲笑烧伤患者的情形。她自己就是个烫伤的受害者。那些客人肯定都会嘲笑她，而她不过是在模仿他们。说到底，这些客人是在为烫伤他人的特权买单。她不知道如何与你建立依恋关系，因为她从未对自己的母亲有过依恋。她的母亲在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在情感上将她遗弃，之后还为了金钱把她出卖给施虐狂。这也难怪你的母亲认为供养你、把你锁起来避免伤害是对你的保护。”

“她还供养了自己的母亲。”他说。“她一辈子都在供养他人。”

“她真的对男人无法释怀。跟我姐姐就还好。”

“是这样吗？你的母亲既不允许她说话，也不允许她动。”

“她会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供养。难怪父亲丢了钱之后，她会恨他。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彼得叹了口气，接着说，“她为什么总是对我大吼大叫，说我一事无成呢？”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她是在表达恐惧。那些音乐让她感到害怕。她想起的是鸦片烟，接下来也许还有香烟头。”

我点头表示同意。讽刺的是，所有这些解读都来自一个儿时在幼儿园留级了的人。

多年来，彼得一直对母亲指出的不足信以为真：母亲这样对他还能有什么其他理由呢？现在他明白了。也许母亲的行为和他无关，而是和她自己的悲惨童年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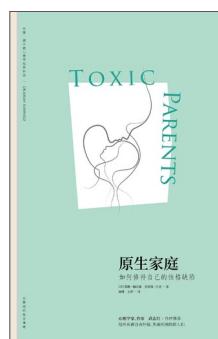
彼得试图再次与母亲谈论她的早年生活，可她再也不愿提起，还称之为“早就结束了的过去”。彼得问起母亲与父亲一起来加拿大时，她的母亲作何反应。彼得的母亲说：“我母亲可不在乎，她只关心自己的下一管鸦片烟在哪儿。”彼得恍然大悟，他母亲的母亲对鸦片上瘾。

如今彼得不仅对母亲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自己也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是时候为他介绍一种与母亲互动的新方法了。我给了他一本苏珊·福沃德（Susan Forward）撰写的《原生家庭》（Toxic Parents）。这本书想必让他深有共鸣。彼得说起他的母亲曾经指着一名邮递员说：“真是蠢人。你需要正经的工作。”他感觉自己简直要叫出声来。接着，他头一次这么说道：“我再也无法忍受她反复念叨我有多用了。”

这对我来说完全是好消息。因为他的表现是一位正常的儿子在母亲不断说其一无是处时应有的反应。

我边思考边问他：“你要如何才能让她停止呢？她并不介意争吵，那是她情感交流的唯一方式。她不知道如何表达忧虑、担心或关爱。她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些。”

“我姐姐抱着孩子时，母亲特别惊慌，还会说你要是抱着她，她就不会走路了或者你要是把她抱起来，她就会哭个不停”之类的奇奇怪怪的话。姐姐从不和她争执，除非她对姐姐的女儿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那样的话，姐姐就会大发雷霆。现在她看到我姐姐抱着孩子只会摇摇头。”我指出他的母亲可以学着改变自己对他的行为。毕竟他姐姐这么做的时候奏效了。



《原生家庭》

然而，彼得消极地认为自己永远也无法改变母亲。其实，他能够改变的是自己与母亲的交流方式。我提议彼得对母亲说他爱她，感激她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但他不会再忍受她出言不逊。他必须向母亲解释对他来说什么样的言行很无礼。如果母亲贬低他，比如说他跟他父亲一样是个堕落的搞音乐的，他就会离开，两个星期不去见她。这其实很难做到，因为他们住得非常近。彼得心地善良，不希望伤害母亲，但我向他保证，他的母亲会逐渐明白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我把他的姐姐当作例证，

说起他的母亲已经学会不去干涉他姐姐的育儿方式。而且虽然他的母亲来加拿大时既不会说外语也没有受过教育，但她拥有的房地产比大多数加拿大人都更多。她搞得清楚状况。

彼得勉强同意尝试这个计划，尽管他并不相信会奏效。他说如果必须一桶一桶地清空大西洋沿岸的沙子，他只要坚持不懈就能做到，可一旦涉及和母亲的关系，他便觉得像是面对着大海和沙子，手里却没有桶。我能够看出他既疲惫又气馁，便告诉他我会支持他，还会把桶递给他，跟他一起挖。他同意试一试。

彼得采取的积极措施之一是与姐姐分享事业成就。我在一本音乐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他和乐队的新文章后，建议他把里面的照片裱起来，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姐姐。他的回答一如既往：他从来没这样做过，姐姐也不会想要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建议他冒这个险，他同意了，于是把镶着框的照片送给了姐姐和姐夫。他们喜欢极了，还把照片挂在客厅里。不久之后，他们便开始出席彼得的一些演出。

结果，那张照片成了彼得和母亲之间关系转变的催化剂。在彼得姐夫的生日晚宴上，他母亲表示搞不懂为什么彼得的姐姐会挂一张如此伤风败俗的照片。彼得告诉母亲自己感到很不高兴，随后便站起来走了。这是彼得为数不多真正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刻之一。他告诉我他当时非常害怕，还以为没有人会理解他为什么离开。第二天，当姐姐和姐夫分别打来电话时，他惊呆了。他们二人分别对他的母亲说：如果她要贬损她儿子的成就，他们就不再欢迎她上门了。

这还不是全部。彼得的姐姐说她知道彼得年幼时受到了虐待。“我听完惊呆了，还为母亲辩护，”彼得说，“但向来很温和的姐姐说我要去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她说在我大约三岁的时候，母亲曾经带我去看儿科医生，姐姐作为翻译也一起去了。医生看到我扁平的脑袋不太高兴，询问我是否离开婴儿床得到充分的活动。母亲只是笑了笑，没有理他。”姐姐知道这样做不对，想把真实情况告诉医生。“可是，”彼得说，“她知道这么做等于背叛母亲，而且会被揍得屁滚尿流。于是她没有言语。她说她多年来一直对自己的沉默感到内疚。”

经历过姐姐家的那次冲突后，彼得的新原则是每次在母亲轻慢他时直接起身离开。他不会给出任何解释。我对这一策略表示赞成。“相信我，她会反应过来的。”我说，“小鼠和大鼠最终都会对正强化和负强化做出不同的反应。”

慢慢地，彼得的母亲不再辱骂他，也不再叫他换工作或是娶一个中国姑娘了。她一直都没有变成慈爱的母亲，但她确实通过行为矫正认识到，想要和儿子保持联系的话，有哪些事情不能做。她不希望一个人待着。她想要保障彼得的温饱，如果遭到拒绝，她便会觉得像是失去了亲人。这就是她心目中母亲的职责所在。

我们在心理治疗中度过了充满变化与收获的一年，也了解了彼得母亲的童年以及她遭受的伤害。彼得时而对她感到愤怒，时而又为她难过。他同时开始意识到母亲对他的反应和他自身并没有什么关系。彼得从姐姐那里获得的支持也让他感到更加踏实。他对于姐姐将他称为儿童虐待的受害者十分震惊，但也让他意识到为什么自己的生活中会遇到那么多问题。他还顽强地在与母亲的交流中坚持自己的原则，并且看到母亲的行为有所改善。他还应该完成什么呢？

04

突然袭击

不出所料，一旦彼得开始认识到什么是虐待行为并开始对母亲设立边界，他也开始注意到家人以外的人们是如何对待他的。彼得在乐队中也忍受着主唱唐尼的各种自以为是的举动。唐尼要求苛刻，而且错以为观众来看演出纯粹是为了看他。彼得客串参与其他乐队的表演时获得的尊重都比从唐尼那里得到的更多。终于，彼得与他对峙，说他不能再独自决定是否响应观众的呼声而返场，从现在起，他们要一起做决定。

三十七岁的唐尼以“派对动物”自居并沾沾自喜，而且很可能是个酒鬼。他希望成为摇滚乐手，并在演出所至的每个城市都跟人睡觉。他精心打造的形象的唯一阻碍是他已经与阿曼达结婚十九年，有一个四岁的儿子和一个六岁的女儿。彼得自高中起就认识唐尼和阿曼达，唐尼对妻子撒谎如此频繁让他感到惊讶，而且，唐尼还希望彼得帮他在妻子面前圆谎。

为了在实现自我与表达自身需求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彼得告诉唐尼，要是阿曼达

问起巡演中遇到的姑娘，他不会再帮唐尼隐瞒。当时正值艾滋病危机的高峰，且彼得认为唐尼不够谨慎。唐尼说他还以为他们是好兄弟。彼得对此表示同意，但他说他们的友情之中并不包含对阿曼达撒谎。

当儿童身处彼得这样存在虐待的家庭，或是置身于劳拉那样功能失调的家庭，他们很难与人确立边界。由于父母不会倾听他们的需求，因此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会允许他们制定各种社会交往的规则。他们得通过学习才会明白自己不必执行每一个人的每一项任务。彼得能与唐尼划清界限让我感到十分欣喜。

阿曼达向彼得吐露唐尼全然不顾她和孩子。有一次她走进家里的录音棚，要求正与乐队排练的唐尼上楼参加儿子的生日派对。唐尼拒绝了，还在她执意要求时抬起手打了她。彼得从椅子上飞身冲过去与唐尼打了起来。他说他受够了唐尼的浑蛋行为。

彼得的愤怒与困扰他多年的另一件事有关。他很纳闷，明明他们一起推出这些上榜专辑，为什么自己勉强才能维持生计，唐尼却有钱买下一栋房子和一间设备顶尖的录音棚。终于，彼得要求查看账簿。

在我看来，唐尼似乎一直在欺骗彼得，而彼得则屏蔽了自己对此的感受，一如他屏蔽自己对其他所有事情的感受那样。我称赞了他对自己的情感做出的反应。彼得告诉我，他的母亲有一件事说得对，唐尼确实是个小偷：他十六年来一直在偷彼得的钱。我持续关注有关彼得乐队的新闻，因此指出媒体几乎从未提到唐尼，他们主要关注的其实是他。

彼得在情感上有所成长。终于，他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要带着乐队中表现出色的另一名成员一起单飞组建自己的乐队。后来，他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再也不用为钢琴调音。他可以当一名全职音乐人了。

彼得并非唯一鼓起勇气离开唐尼的人。阿曼达提出诉讼，要求离婚并获得孩子的监护权。她料到唐尼不会有异议，结果也确实如此。唐尼将阿曼达手中的那部分房屋产权买下之后，阿曼达便搬进了彼得母亲的四联式住宅楼。实际上她就住在彼得楼上。她扩张了自己刚刚起步的簿记业务，偶尔还在见客户时请彼得帮忙照看孩子。彼得渐渐对两个孩子产生感情，还会教六岁的小女孩弹琴。阿曼达无力支付他授课的费用，因此与彼得商定，用每周一顿家常便饭作为回报。

彼得开始带着这一家三口去参加《迪士尼冰上世界》(Disney on Ice) 和《胡桃夹子》(The Nutcracker) 之类的音乐会，还跟阿曼达的儿子一起玩街头曲棍球。一直渴望得到男性关注的两个孩子对彼得善良和稳定的态度给予了热情的回应。

有一个星期，彼得向我坦言他从高中起就被阿曼达吸引，早在她嫁给魅力十足却肤浅的唐尼之前。

彼得母亲对二人的关系大动肝火，说阿曼达只是想继承她的财产，而彼得应该找个中国姑娘。彼得指出自己不会中文，而且在姐姐之外并不认识任何中国姑娘。

滚石乐队来城里演出时，彼得邀阿曼达一起前往。他向我保证这不算约会。不过，他还是担心这一举措会改变他们的关系，而阿曼达也可能以为这会牵涉性行为。彼得承认对她抱有性幻想，但又害怕失败而不敢付诸行动。“她既是我的邻居也是我多年的朋友，我也很喜欢她的孩子们。”他说，“这一切也许都会因为尴尬化为乌有。”

我能够理解彼得的顾虑。一次失败的性接触可能真的会让他有所倒退。可是，这就是他四年前来找我的原因！

我建议彼得仔细观察他的姐姐——一位好母亲——是如何对待她的小女儿的。他汇报了这样一些依恋行为：母亲抱着女儿、相互靠近低声细语，手牵着手，一起躺着，微笑，聊天，以及在女儿哭泣时给予安慰。我冒昧地建议，如果他与阿曼达进入一段恋爱关系，他可以跟她做一些姐姐及其女儿做的事情。我说他需要循序渐进，性欲无法一蹴而就。他需要学习如何建立依恋关系，如何进行肢体上的亲密接触，而性行为是所有之前这些亲密行为的终点。

不过，彼得表示其中的一些行为让他难以承受。比如说，他无法直视阿曼达的眼睛。光是想想就让他特别紧张。

于是我们列了一个亲密关系的等级清单，从上至下按亲密程度降序排列，最上面的是发生性关系，底下的有牵手以及最简单的口头表达关爱。我建议彼得与外甥女尝试清单最底下的那些依恋行为，直到他感觉习惯为止。至于和阿曼达的约会，我安慰说其实并不存在表现上的压力，阿曼达并不会在意这些，这种压力更多的是彼得自己的顾虑。

后来，彼得说起他与阿曼达去看了演出，一切都很顺利。他们回到家后坐在沙发上，

这时，阿曼达的儿子从房间里跑出来，想听他们好好讲讲晚上的经历。彼得松了口气。他不经意间透露自己感觉自己已经完成了一场约会，不想再冒更多险了。

在接下来的那次会面中，彼得讲述了一件令他感到气恼的事。他刚给阿曼达的女儿上完钢琴课，二人正在等待阿曼达做晚饭。这时，一位男性客户上门送来一些簿记的收据。阿曼达介绍彼得时说“这是我房东的儿子”，之后便继续与客户聊天。我对于彼得如此愤怒感到意外，毕竟，他这一生中有过远比这糟糕的经历。不过，我在过往的执业中见识过这种情况。当一个人初次打开情感阀门，迸发而出的情感是如此汹涌，有时会难以抑制。

彼得在晚餐时话很少。阿曼达的女儿察觉到了他的情绪，当她问彼得怎么了的时候，彼得说他不喜欢被说成是“房东的儿子”。阿曼达的女儿回答说：“妈妈应该说是我的钢琴老师。”

“或者是家庭朋友。”彼得说。

阿曼达全程什么也没有说。她的女儿随即补充道：“或者是‘我的朋友’。”

彼得被小女孩的真情实意感动得眼睛都湿了。“我喜欢这种说法。”他回答说。

阿曼达还是没有说话。晚餐后，彼得借口说要练习准备离开。阿曼达便淡淡地说了声再见。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阿曼达在夜里十一点左右敲响了彼得的门。她说那么晚来是因为得先安顿孩子上床睡觉，此外便没再说什么。她含泪坐在沙发上，还是没有开口。彼得表示握着她的手并搂住她感觉并不难。阿曼达把头靠在了彼得的肩膀上。他们就这样一直坐着，直到阿曼达担心孩子们会醒来说要回家，之后她便离开了。

“你们有没有说些什么？”我问道。

“没有。”

我问彼得作何感想，他一如既往面无表情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

彼得一星期后再次登门准备接着上钢琴课时，阿曼达告诉他，孩子们这星期在唐尼母亲的家里，这是她离婚以来头一次不用照顾孩子。彼得帮她一起收拾玩具和房间。他们外出共进晚餐，回家的路上还牵了手。

他对整个夜晚记忆犹新，仿佛那是一部反复看了很多遍的电影。他们观看一个二人都很喜爱的乐队在《周六夜现场》节目中的登台表演。接着，阿曼达进了洗手间便再也没有回来。最后，彼得来到走廊上。阿曼达说：“嘿，进来。”她合衣躺在床上，正抽着一支烟。她说：“得趁孩子不在的时候干这个。”她开始播放 CD。他们听着音乐，阿曼达将脑袋搁到彼得的胸口上。她告诉彼得，唐尼以前说她很冷淡，如今唐尼已经走了，她并不觉得自己冷淡。她在看书或者看电影的时候会产生浪漫的情绪，可是她在年轻时经历了这样两件事：她在原生家庭遭受性虐待，后来又在高中最后一年被第一任男友唐尼搞大了肚子。嫁给唐尼之后，她在怀孕第七个月时失去了孩子。

“我跟她说这段经历想必特别糟糕。她说性行为对她来说有点儿可怕。我这才反应过来，她是在为没有发生性关系向我道歉。”彼得决定跟她讲讲自己的问题，但也没有透露太多，以免吓到她。他说自己小时候常常被一个人关着，因此很乐意慢慢发展。他注意到阿曼达看起来松了一口气。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阿曼达告诉彼得自己有多么喜欢他的音乐。“然后她告诉我，她女儿问我有没有中国女朋友。”他说。阿曼达说她不知道。她的女儿便说要去停车场守着，看看有没有。彼得看着我，露出一丝我从未见过的笑容：“我告诉阿曼达，那她女儿可能要一直等下去了，因为我的女朋友就在这里。”

我为彼得感到特别高兴。我跟他说，有些人虽然有性生活，但一生都不会在情感上建立亲密关系。彼得和阿曼达彼此坦诚相待，已经在情感上变得十分亲密。

几星期后，彼得透露他与阿曼达发生了亲密接触。他们当时一起躺在床上抽烟，后来，当她为彼得解开衬衫纽扣时，他开始有了生理反应。阿曼达随后评价说她胸口的毛发不多。“我感到非常自卑，一下子乱了手脚，”他回忆道，“我听她这么说有点儿发蒙，但还是设法回答了她，说中国人的胸毛并不多。”阿曼达只是点点头，说了声“嗯……”。接着，彼得感到自己在慢慢萎缩，他的整个身体也在慢慢缩小。“我静静地从身体中抽离，感觉就像置身于阁楼，看着我的母亲拿着竹鞭朝我走来。我已经不在自己的身体里了。”他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缩在角落里的孤独男孩，看着成年后的自己和阿曼达一起坐在床上，“我缓过来之后，就找了个借口起身走了。”

一旦我们有个爱批评人——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具有阉割性”(castrating)——的母亲，都会对批评保持高度警惕。哪怕是像“嗯……”这样有点

儿不置可否的言辞，也会让人像被撒了盐的鼻涕虫那样变得干瘪。我告诉彼得，他得学着与阿曼达谈论他的真实感受。

对彼得而言，表达情感存在巨大风险。但过了几天，他确实和阿曼达讨论了这一事件。他焦虑得头晕目眩，但还是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原来，阿曼达以为彼得是因为不喜欢她的身材而离开的。与此同时，彼得则认为阿曼达觉得他没有什么胸毛缺乏阳刚之气。这一事件有点儿像是欧·亨利的小说，其中充满误解。他们都为彼此过于敏感而笑了起来。

四月的第一天，阿曼达身披长长的冬季外套来到彼得家门口，她说她的汽车电池坏了。彼得找来一些跨接电线后，阿曼达接过来，将一头夹在他的衬衫上，随后脱下外套。外套里头一丝不挂。接着，她大喊：“愚人节快乐！”二人倒在沙发上，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拥抱亲吻。彼得和阿曼达小时候都没有好好玩耍过，不过现在，他们可以抛开负担尽情嬉戏了。彼得脱去衣物顺势进行下去，终于，他在三十八岁的时候享受到了与女性发生亲密关系的乐趣。

彼得与阿曼达的关系不断发展，他的性体验其实并非一帆风顺。他已经明白自己需要理想的环境。如果他们之间有问题尚未解决，他就无法维持勃起。他们在体验性亲密以前必须解决每一个微小的冲突并在情感上确立亲密感。他犹如一枝罕见的兰花，只有在最适宜的条件下才会绽放。

彼得的母亲还是会因为阿曼达而大费唇舌训斥他。彼得说要是她再不打住，他就搬出这栋楼去。母亲对此嗤之以鼻。“我警告过她，但她根本没想过我会疯狂到明明确有免费的住处，还是要去租房子。她还以为她把我捏得死死的。”之后，他的母亲在为他送饭时连招呼都不跟阿曼达打一声。这成了最后一根稻草。彼得和阿曼达带着孩子从他母亲的房子里搬了出去，租了间屋子一起生活。“我知道自己必须说到做到，不然她还是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他说。不过，他每个星期依然会去母亲家吃一顿饭。彼得和阿曼达在一起很开心，而且他很享受当孩子们的父亲，还会出席他们的曲棍球联赛、音乐课和家长会。

彼得经历过最可怕的地狱，但在如今的梦里，他已经亲自驾驶起公共汽车了。尽管有时路太窄，他难以把车开过，只好靠边停车。在其中一个梦里，我站在一条狭窄的车道上引导他在房子间穿行，他成功驶过，既没有撞坏公共汽车，也没有被卡住。我告诉他，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心理治疗完成了的信号。他现在可以独自驾驶公共汽车，不会再受伤了。

彼得刚开始接受心理治疗时，他相信母亲把他锁在阁楼里并没有错。我不得不将那段经历重构为虐待，以此帮助他认清，正是虐待导致他在幼儿园留级并受到孤独与阳痿的折磨。等到观看了哈洛在影片中渲染的母婴依恋的重要性，他就此有了转变：他不再责备自己，人格解体的发作次数也变少了。之后，他获悉母亲在越南受到的虐待，这使她在眼中变得不再如此可怕。在我看来，他的最后阶段——即胸毛事件中所表现的——是识别自身的感受、对其予以重视并表达出来。一旦他找到自己的个性，能够感受到自身的情感，就能够进行性行为了。他已经融入自己的身体与人格之中。

彼得在心理治疗中产生的移情——即把我当作他从未有过的母亲——非常成功。他由此在重温童年诸多可怕经历时，获得我的安慰与共情。出于对我的依恋，他不想结束心理治疗。我说他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但我说到底只是个布妈妈。而且，成年人必须离开自己的母亲独自去广阔世界里闯荡。向来顺服的彼得开始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

人们会以各种惊人的方式成为英雄。彼得与劳拉不同，他乍看之下不像勇士。他的高尚品质其实在于他的宽恕能力。他让我想起我在天主教学校念书时读到的第一个英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代入受害者的角色轻而易举，彼得却原谅了他人的罪过。他一根接一根地将自己王冠上的荆棘拔去，在接受心理治疗后获得了重生：他在音乐界变得更加成功，与新女友恋爱，与她维持亲密的性生活，享受成为她孩子家长的感觉，此外，他还尽可能地与母亲和平相处。

我相信，正是彼得的宽容本性为他的恢复带来了莫大帮助。与其他在相同年纪被关起来相同时间长度的人比较，彼得的恢复堪称奇迹。他将坟墓前的巨石移开，重生为一个富有感情的人。

彼得曾经说过，如果必须一桶桶地清走大西洋岸边的所有沙子，他只要坚持不懈就能做到。他正是这样慢慢地、有条不紊地为心理平衡抗争的：并非给予一次猛击，

而是通过许多次轻轻的击打实现的。他永远无法让母亲相信自己受到了她的伤害——她自身受到的伤害太大，难以看清这点——但他确实成功地训练了她，使她不说那些羞辱性的话。

我非常同情彼得的母亲。不知道哪里出了错就莫名成了“坏”母亲，意识到这一点肯定很痛苦。她从未像自己的母亲那样把彼得交给施虐狂；相反，她一辈子辛勤工作，让儿子能有栖身之所，这在她看来是在保护儿子免受伤害。她从一个母亲有毒瘾、自己则身无分文的脆弱孩子，变成一个在遗嘱中给彼得留下一大笔钱的母亲。尽管情感能力极其有限，但她还是非常坚强，为孩子们提供了保护。

几乎所有虐待性的抚养方式都会代代相传，施虐者很可能自己就是曾经受到虐待的一方。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案例中不存在敌人，而是需要将失常的经历一层层地揭开。

接下来的那个圣诞节——差不多是在彼得结束心理治疗的一年以后——我来到等候室时看到一份用闪亮的中国红包装纸和紫色丝带包裹而成的精美礼物。里面是彼得改签大型唱片公司后推出的新CD。CD被放在一个红色的塑料桶内，旁边还有一把蓝色的塑料铲子。这是一个沙桶，就是小孩子在海边铲沙子用的那种。

二十五年后，我和彼得约在一家越南餐馆吃午饭。他看起来比我记忆中要高得多，而且因为健身变得十分健壮，他面带灿烂的笑容走了过来，不仅与我有眼神交流，还拥抱了我。他变得如此善于表达感情，我特别高兴。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不知不觉便度过了两个小时。原来，阿曼达在和他相处了八年之后回到了当时已经改过自新并戒了酒的唐尼身边。所有人都对此大感意外。

分手后不久，彼得皈依宗教。他说自己有一天感觉“充满了虔诚的能量”。我告诉他这真是太奇妙了，因为我在这本书里就将他的善良与宽仁与耶稣进行对照。他对此受宠若惊。他后来参与了几次基督教活动，还在教堂邂逅一名女子。他对她的爱远超他的想象。

他们已经共同生活四年，正计划在教堂举办婚礼。

彼得厌倦了乐队、酒吧和公路旅行，但他依然喜爱钢琴。他会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开设大师班，经常为此飞去国外。此外，他也为世界各地的钢琴公司提供咨询服务，还被戏称为“百分彼”：百分之百标准音调彼得。

他的母亲在七十八岁时因中风病故，而且在去世十年前就患上了失智症。令人惊讶的是，她的性格出现了巨大转变。彼得说她“兴高采烈”得如同赶赴初次约会的年轻姑娘。她对每个人都很和蔼，不再纠结于金钱或是子女的未来。每次彼得去养老院看她，她看起来都很感动。

彼得说的最出人意料的事情之一是，如果重新来过再活一次，他不希望有任何改变。他遭受了那么多痛苦，我对此大吃一惊。他说：“如果我像其他小男孩那样被抚养长大，没有被关在无人交谈的地方，我就不必靠钢琴来获得安慰并与之对话，也无法将其作为我表达情感的载体。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用你的话来说——对它产生‘依恋’。”他接着说，钢琴演奏给他带来了生命中莫大的快乐，如果他有朋友、有正常成长环境，可能就不需要钢琴了。“我现在喜欢这样的我，并且觉得我经历的一切都自有其目的。我想这就是上天的安排：让我成为现在的我。”



凯瑟琳·吉尔迪纳

加拿大籍心理治疗师、《纽约时报》畅销作家。著有《离瀑布太近》《瀑布以后》《回到陆上》和小说《诱惑》等作品。从业 25 年后，她决定全职写作，写就了关于心理治疗的回忆录《早安，怪物》。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读书会》(2018)剧照

露丝、弗兰克和达里奥

二月的“淑女午餐会”就在露丝的河畔公寓里举行，“淑女午餐会”需要加个引号。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露丝、布里奇特、法拉、洛特、贝茜这五个女人一起变老，每个月都聚会一次，围坐在彼此桌边。她们都在纽约生活很久了，分别来自加利福尼亚、梅奥郡、德黑兰、维也纳以及布朗克斯区，那些地方或许是她们的根之所系，但现在已经不怎么明显了。

“你们都记得的吧，”露丝说，“我们都得讲讲自己的故事？现在，我就有个故事要跟你们说说。”

“太好了。”洛特说。

“很好。”法拉和贝茜说。

“其实是一连串故事，”露丝对她们说，“但结尾却有点令人迷惑。”

“好得很。”布里奇特说。

下面就是露丝讲的故事。

西尔维娅在家里办了个派对，其实是她表姐的葬礼。在派对上，西尔维娅走过来问要不要给我拿把椅子，我对她说：“谢谢你的好心，不过我需要坐的时候自己会找的。”

“给你拿杯喝的？”她问。

我告诉她：“西尔维娅！我能应付。说实话，我拄着拐杖只是为了保持平衡的。”

“所以我不该这么大惊小怪，你要我走开吗？”

“你不必走开。”我们都笑了，然后西尔维娅说她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弗兰克，希望我别介意，因为他很想和我说话。

“弗兰克？哪个弗兰克？”

“露丝，你认识弗兰克·布鲁诺啊。”

“弗兰克·布鲁诺，哦是的，我一直以为他叫布鲁诺·弗兰克。”

西尔维娅说：“弗兰克在布利克街的一家画廊工作，他很想了解你的老朋友兼客户，是叫达里奥·达莱西还是什么的那个？总之他想跟你谈谈。”

“那他为什么不过来谈谈呢？”西尔维娅说：“他说他怕你。”

我觉得很生气：“简直是胡说八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在哪里？”

“就在那边，”西尔维娅说，“刚走出门。”

吃饭时，露丝告诉朋友们，当她发现自己在等弗兰克的电话，她非常恼火。她说，想到要讲讲老达里奥的事儿，简直就像在一堵厚厚的时光之墙上开了一扇窗户。于是她打电话给西尔维娅，跟她要布鲁诺的电话号码。

“布鲁诺？”西尔维娅说，“哪个布鲁诺？”

“弗兰克，我是说，想和我说话的那个弗兰克·布鲁诺。”

露丝拨通了电话，又立刻挂断了，因为她一时想不起来到底该叫他布鲁诺还是弗兰克，应该是弗兰克吧，她再次拨通电话。“弗兰克，我是露丝。你不是问起了达里奥·达莱西嘛，我的脑子里一下子想起了所有事儿。”

弗兰克说：“正合我意！天啊，正合我意。我在谷歌上搜了你，你曾经是达里奥·达莱西的律师吧？”

“是的，”她回答，“他曾经雇了些人来组装，对，就是这个词儿，组装，他的一件雕塑作品，其中涉及一些相关文书工作。所以我就和他一起去到了北部的一个飞机仓库，就在那儿，工人们就在一个二十英尺1高的黑色旋涡上工作。那可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啊，我可喜欢听工匠们聊天了。”

“天啊！”弗兰克说，“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露丝说：“以前他每次来纽约，我都是在他身边围着的追星族之一。几年后，我去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拜访过他，就在他家里，一处史前悬崖石窟般的住所，如果你能想象在意大利的山腰上开凿一个包豪斯洞穴的话。你认识他吗？”

“我？不，不，”弗兰克说，“只有一次，我看见过他从东17街的一家餐馆出来，我跟在他身后走了几个街区，然后他走进一家杂货店，我就透过窗户看着他，看到他又走出来，走进一家酒类专卖店，买了一瓶酒，随后上了一辆开往西边的公共汽车。”

露丝告诉朋友们：“我当时兴奋地想，这一定是达里奥去我家路上的情形，我就像看到了三十年前发生的场景一样。但后来弗兰克说，他当时才二十多岁，太害羞了，不敢追上前去告诉这个人自己喜欢他的展览——所以那一定是达里奥早期的展览，也就是在古根海姆博物馆之前的，那是在我认识他之前。我告诉弗兰克，达里奥很

非虚构 守灵夜和葬礼是 老年人的派对

洛尔·西格尔 | 新书推荐

超酷95岁女性作家，
犀利笑谈颠覆我们对暮年的想象。

过去三十多年里，五位淑女正在一起变老，携手踏入耄耋之年。她们每月齐聚共享淑女午餐会，给彼此的人生困境出谋划策，诉说着彼此遇见的趣事，展开对于友情、衰老与死亡的洞察。

她们有时跟护工斗智斗勇，只为来上一口面包加黄油；偶尔异想天开，试图开车营救被送往敬老院的同伴，尽管最后因视力问题无法更新驾照；有时会忘了派对的主题，直到最后才发现那是一场葬礼。

在《守灵夜和葬礼是老年人的派对》中，作者洛尔·西格尔还展现了历史的尘埃压在普通人身上的不堪重负。她十岁经历二战，被迫逃亡异国，晚年又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她的文字道尽往日的沧桑，又饱含深情，温暖感人。

经中信·无界授权，我们摘选了《露丝、弗兰克和达里奥》《有关马提尼酒和遗忘的日子》两章分享给读者。



可能会对此心存感激的，因为他过去常常谈到自己少年得志的孤寂，以及第一次到纽约谁也不认识时的情景。”

弗兰克说画廊刚刚收了一件达莱西的作品。

“哪一件？”

“作品名是《舱门》。”

“我记得，我记得！哦，哦，我还记得我们一大群人坐在一起，喝着一瓶马尔贝克红酒，为达莱西的新作品想名字，用来代替‘无题’。必须选一个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所说的‘独立于意义之外’的词，要知道当时我们最喜欢的漫画，就是一个博物馆迷站在一座俄国构成主义雕塑前擦掉一滴温柔泪水的形象。除非真的试过，否则你根本不会知道要想出一个不指向任何对象、任何感觉或任何价值观的词有多难……我曾经在夜里带着‘就是它了’的感觉醒来，想着就是‘回合’这个词了，但这个词有‘冲突’的意味。‘正直’这个词也被毙掉，因为可能影射了一些社会或政治行为。真的有太多故事可说了！”我说。

弗兰克说我是座宝藏，问是否可以在某天约我出去吃午饭，但到了约定那天，他又打电话来要求临时改期，说是画廊里一片混乱。不过我已经邀请他有时间来喝上一杯了。

三月的“淑女午餐会”在老罗金厄姆的贝茜家举行。弗兰克·布鲁诺最后也没有去露丝家喝酒，画廊有人打电话来，说弗兰克出国了，等他一回来就给她打电话。

朋友们说：“那你就把打算给弗兰克·布鲁诺讲的关于达莱西的故事说给我们听吧。”

露丝说：“我去拜访达里奥时有件事一直无法理解。我曾经指着一个男人让他看，是个农民，就坐在村口广场的人行道上，腿上卧着一只小山羊，那个男人握着羊蹄子，就像握着一个小女孩的手一样。达里奥告诉我：‘他打算把那只山羊带去宰了。’这件事我后来一直记得，人总是会记得这些不合情理的事儿。”

露丝说：“达里奥有一次带我去登山，他就像个登山运动员一样步伐稳健，但我还是赶上了他，觉得非常得意，但随后，我就得坐下来喘口气了，他却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最可怕的事是沿着山路往上开车，去看最高山脉上那些古老的房子。你们得明白，达里奥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司机。回来的路上，汽油也用完了。从统计数据来看，我们在路边看到纪念某人摔死于此的十字架，可能都比加油站多，所以当地人开车一般都会带着一罐备用汽油，但达里奥可不是这样的人。于是，我们只好开着车门坐在那里，一直坐啊坐啊，直到送牛奶的卡车路过。送奶工给我们吸了些汽油，才让我们回到阿尔托蒙特。达里奥掏出了钱包，但就算以我的意大利语水平，也能明白送奶工说的，‘不，不，不用谢！达里奥先生，不用谢！我只想要你的签名’。我真想知道纽约北部的送奶工有多少会更喜欢德·库宁或马克·罗思科的签名，而不是几张二十美元钞票。”

四月的午餐会在法拉家，露丝向大家报告说弗兰克·布鲁诺又一次取消了约会，因为众所周知，春寒导致的感冒总是难以痊愈，朋友们都笑了。

“露丝，”法拉问，“你生他的气吗？”

露丝说：“除非我亲口告诉你我生气，否则这是不可能的。”

贝茜因为丈夫科林身体不舒服，没能参加五月在洛特家的午餐会。

而弗兰克必须处理一个成年儿子的大麻烦，所以依然没能赴最近这次约会。

这就是令人迷惑的地方，也因此激发了四个朋友的想象力。

洛特说：“首先，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遇到大麻烦，或感冒了，或儿子有事儿，那就相信他们吧。”

法拉说：“你可以想象一个二十多岁的人羞于接近名人。但一个纽约中年男人无法穿过房间去跟一个女人说话，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老女人。”露丝回答。

“还是在一个纽约的派对上。”洛特说。

“是葬礼。”露丝说。

六月的“淑女午餐会”在布里奇特家。弗兰克依然没有去露丝家。布里奇特说她有个故事要讲：

“我问我可爱的二十岁侄女莉莉，是否还记得当年，只要我九十岁的母亲在家，她

就拒绝进屋这件事。莉莉说她只记得我母亲的眼镜腿儿就像是从耳朵中间穿过去，而不是架在耳朵上的，所以一直很害怕。她记得自己一直哭，不想进屋。”

“莉莉当时多大？”洛特问。“六岁吧，也许。”

“这和一个成年男人在派对上不跟露丝说话有什么关系？”

“是葬礼。”露丝说。

布里奇特说：“只是另一件不合情理的事儿而已。”

七月初，在大家动身离开去避暑之前，“淑女午餐会”在露丝家继续举行。对，弗兰克还是没来，但他打过电话……

朋友们再次微笑。

“弗兰克说他家隔壁的公寓失火了。”朋友们大笑了起来。

布里奇特说：“也许真的发生了火灾？”

“有可能。”露丝说。

有关马提尼酒和遗忘的日子

得见开心老人，不亦乐乎。

——佚名

“我喜欢你的披肩，洛特对派对上一位漂亮的妇人说，‘又大又美。’老妇人谢过洛特，下意识地向左边瞟了一眼，显然没认出洛特是谁，而洛特脸上的表情也表明了相同的情况。为了不让孩子们费神，她又不能说自己到底是忘了那个女人的名字，还是压根儿就没见过对方。洛特拄着拐杖继续走着，披披肩的妇人说要给她拿杯饮料。

“哦，谢谢，不，我很好，真的，”洛特告诉她，“我自己能拿。”

这时，她看到贝茜站在衣架旁，高兴地走了过去。贝茜说：“我得把拐杖收起来，它可有本事了，总是绊倒别人。”

“你还是想办法从罗金厄姆来了。”洛特说。“是啊，还是来了。”贝茜说。

“科林怎么样了？”

“科林很好，挺好的，他没事。”

贝茜肯定知道朋友们受不了科林，他是这群人中唯一还活着的丈夫。科林有房，有车，总在抱怨停车场不够用，因为某种慢性重病，已经快被折磨死了。

“那个披着红色披肩的老妇人是谁？”洛特问贝茜。“辛西娅，”贝茜说，“这里的女主人。”这时贝茜说她见到洛特觉得很意外。

“有什么好意外的？我第三次打电话问你地址时，你显得非常烦躁，倒可以理解。”“但你说过你不来的。”

“是说过，好吧，”洛特说，“一想到要离开公寓，我就想带着我的电子书上床睡觉。我有点广场恐惧症，可是我喜欢派对啊。”

“如果你想称之为派对的话，我希望能喝到马提尼酒。”

“这怎么就不是派对了？”洛特跟在自己的朋友身后问，这位朋友似乎非常了解这套漂亮的现代公寓的内部结构。

她们忽然被一个身材极其高大的年轻男人——至少比她们要年轻——拦住。他吻了贝茜一下，问：“有人看见辛西娅吗？”

“他是谁？”洛特问贝茜。

“不认识，”贝茜说，“这让我想起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不断被满脸大胡子的学生们拥抱。”

“辛西娅又是谁？”

“这里的女主人，披着披肩的那个女人。”贝茜说。

厨房里堆着各种饮品，贝茜在这里和熟识的人们攀谈起来。洛特向一个独自站着的老男人伸出手说：“我和已故的丈夫有个约定，就是每次参加派对，至少要和一个不认识的人聊天。”

“那今天我走运了。”老男人有一张好看的脸。“那些日子啊……”洛特说。

“有美酒和玫瑰的时光。”老人接了一句。

“我想说的是，那些日子里我曾经认识派对上百分之八十的人，但今天我只认识两个。”

“那你打败我了，我只认识一个，”他说，“告诉我你认识哪两个人。”

“我的朋友贝茜，我认识她半个多世纪了，还有那个披着漂亮红披肩的女人，我刚

和她说过话。”

“那就是我唯一认识的人，她是我妹妹，”男人说，“露丝是我们的姨妈。我刚从奥尔巴尼过来。”

稍微转过身子，刚吻了贝茜的那个身材高大、年纪较轻的男人也加入谈话。

“我们正在说我们谁也不认识。”洛特告诉他。

年轻男人说：“我正在开发一种算法，可以分析与你交谈之人的面部肌肉，告诉你他们的个性，帮你了解他们。”

贝茜给洛特和自己端来了马提尼酒，她说：“坐下来吧，我站不了这么久。”

“来得正是时候，我的开场白已经用完了。”洛特告诉她。

她们把酒端到一张舒服的沙发边，坐了下来。洛特对贝茜说：“再告诉我一遍女主人的名字。”

“辛西娅。”

“我刚和她哥哥聊了聊……”

“是塞巴斯蒂安。”贝茜说。

“露丝又是谁？”

“露丝·伯杰，”贝茜说，“是辛西娅和塞巴斯蒂安的姨妈，她总是让我想起《纽约客》上那幅漫画，就是《莫蒂默的第一任丈夫和她的第二本小说》。你还喜欢派对吗？”贝茜问洛特。

“喜欢。”

贝茜说：“我记得我们过去参加派对时总是满怀期待，总觉得会发生什么事，遇见什么人。但是今天，我到底为什么打扮？我从老罗金厄姆赶过来到底是要干什么？”

“见人，”洛特说，“说话。”

“那你今天聊得愉快吗？”

“不是那种谈话了。这就像老式舞会一样，你和这个舞伴转一圈，再和那个舞伴转一圈。”

“那你玩得开心吗？”

“是的，很开心。”

贝茜环顾着房间，她的表情告诉洛特，科林一定有事。“你今天有什么开心事？”

贝茜问洛特。

“让我想想。首先，据我所知，孩子们都很健康，经济条件也还过得去；第二，我的右膝盖今天不疼；第三，我喜欢看着……哦对了，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辛西娅。”

“……看着辛西娅那件华丽的红色披肩，还有她哥哥……？”

“塞巴斯蒂安。”

“……那张好看的脸。我喜欢待在这些漂亮的房间里，坐在舒服的沙发上，喝着上好的马提尼。我喜欢听着身后派对传来的声音和你说话。”

“是葬礼的声音。”贝茜说。

“又是葬礼？谁的葬礼？”

贝茜说：“这是辛西娅和塞巴斯蒂安的姨妈露丝·伯杰的葬礼啊。”

“哦，是哦！”

“这是谁说的来着？说守丧和葬礼是老年人的鸡尾酒会？”



洛尔·西格尔

美国女作家，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会员。1928

年出生于维也纳，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后，她作为犹太儿童难民被转移到英国，接下来的十三年里，她辗转多个国家，并在伦敦取得学士学位，最终定居美国。她的作品曾获得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奖、欧·亨利奖以及普利策奖提名。她有多年的写作经验，不仅创作小说、随笔等，还创作儿童文学，并拥有多部译著。如今她已95岁，却笔耕不辍，仍在《纽约客》上定期撰稿。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小鸟文学出品
卷三十九，2024.3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